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代序 和吴宓相遇

钟鸣

近来,关于大名鼎鼎的吴宓先生,在国内知识界,悄悄地有些热闹起来。想必有以下几个潜在因素:其一,历史的镞旋状发展,使不少睿智者发现,“现代主义”可疑的大肆盛行,与当年横扫千钧的“新文化运动”有相似之处,旧时天花乱坠是主义,现在天翻地覆是流派,那时“八股文”迎来了“普罗文学”,皇权意志和士的思想,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现时则是社会的紊乱和生存的无道德,唤醒了耶佛二教,每个时代,都有其沉思者,浅薄者,务实者,投机者,还有赶时髦的和深谋远虑的,面红耳赤之间,便自然容易让人想到旧时的风范。“学衡派”的“白壁德主义”与“白话帮”的“实证主义”对垒便在此例,而“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则又是这吴宓;其二,在吴宓的教帜下,莘莘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大家熟悉的便有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羨林等。傅斯年后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八十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流砥柱,从某种角度看,真可谓“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这不禁让人终归要问起吴宓的影响究竟何为,这点,其高足徒儿们也未必说清

过；其三，因为鲁迅当年棒喝或鄙夷过“国故”、“学衡”一类，于是，与反面人物相关的东西便很难见着。随时势变迁，公正客观在学术界逐渐苏醒，于是，海内外重估“新文化运动”得失的文章，多有涉及“学衡”和吴宓的，资料性的也略见一二，如前不久书肆上的《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吴宓女儿编写的《吴宓与陈寅恪》、《吴宓自编年谱》和《文学与人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这些都见不了要惹起人们对吴宓的兴趣。而张紫葛老先生这本《心香泪酒祭吴宓》，则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他在蜀地的最后生涯。当时周围许多能接近吴宓的知情者，多已故去。紫葛先生是幸存者。他们如何相识，如何成为忘年之交，吴宓何故入蜀，两人如何共度艰难岁月……那是个漫长感人的故事，一读便不能放下，紫葛先生写作时，失明的双眼和纵横的老泪，是能保证这点的。

按理，我等之辈，最无资格谈吴宓。可事出有偶，我又恰好几处，隔着晦涩的岁月，深深景仰过这位未曾蒙面的大学者和师长。

1977年，我考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那级入学较晚。时值1978年才入校。正是这年1月，吴宓病逝于陕西泾阳县。后来正是从张紫葛先生处得知，他于1977年，被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接回陕西。入校不久，我便听说了这位大学者。他的传闻很多，有的令人悲恻，有的令人感动，如他和第二个妻子邹氏的故事。在她死后，物感其类，室内摆设，不得有动。按旧时祭礼，吴宓还在家中为她设有灵位（后在“文革”中成为罪状，为红卫兵所砸），每餐必多设一副碗箸，每看电影，必多购一票，虚席以待。足见恭行君子之风。

但七十年代末，在我们的现代文学课堂上，每讲到“白话文运动”，“学衡派”却必以复古反派的面目出现。吴宓二字，在讲师嘴边嗫嗫嚅嚅，在号称三十年代大工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里，你恐

怕连他的影子也见不着。当时中文系宿舍在桃园,从窗口就能看见吴宓住过的那幢小楼。“文革”他被摔折了腿,室内囊洗一空,曾听他过去的邻舍说先生半夜呻吟爬行小渡的惨状。尽管多有谰闻,但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间,却激起了微澜,心里怏怏不已。每经过那座房子,也不由要多看一眼。他暗暗地成了我们心里的英雄。这和青春、历史、正义有关,也和日益崩溃的教育质量有关。记得,因吴宓的传闻,我们甚至怀疑系上还有没有有资格的教授。先生若活着,尚有精力,想必那外国文学课,我们是能洗耳聆听的。

有幸第二次景仰先生,是偶然借到他的藏书。吴宓平生惜书,年谱中有迹可寻。据紫葛先生回忆,内战期间,吴宓自武汉入蜀(吴宓把此行列入“大糊涂”一类,有“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语),虽衣物尽弃,但最心爱的书籍却是带着的。这部分书籍,1952年,“思想改造”时,有小部分被视为“反动”者,被迫交给了方敬(此公乃著名诗人何其芳妹夫,也算诗人,吴宓顶头上司,对先生颇多折磨),其中有杜威、叔本华、尼采的英文版书。后来吴公曾向方敬索要过。方敬说,已全部充公。余下的,直到1967年,文革抄风四起,先生有所察,便心痛如绞,提前交出部分,其它后来悉数抄走。先生为此常有隐痛感慨。我在外文书库借的《英语百年诗选》,想必是交出那部分中的幸存者。塘鹤版,两册,小条32开简装本。第一册扉页,有吴宓小方款识。《年谱》曾这样写道:“回国将近,宓已将自己历年所购书籍,及讲义、笔记等,装入一大木箱,封钉。于1920年暑假中,交托海运公司。运回中国,直至北京,送交姑母家中存放。”不知这套书,是否也在其中。

《自编年谱》还提及其它两本书,想来,也是先生曾喜爱过的,一本是奥松·斯威特·摩登编的《永往直前》。先生道:“君衍表兄,头发全秃光,日本学生皆如此。今戴假辫。先毕业上海南洋公学,

即后来之交通大学。素用功英文，所造甚深。此次赠宓英文书 *Pushing to the Front* 一册。宓读之多年，且译出若干页。”从吴宓女儿注释看，吴宓后来是译完了全书的。名为《青年励志编》。而另一本则是，詹姆斯·鲍德温编的《英文读本》，为先生在清华念书时所用课本。说来也怪，这两本书，我都在近一两年内，由旧书肆购得。可惜，不是先生所藏。《英文读本》共8册，我搜到的是最后一册。原书主人或叫王敬书（因签名为拼音，故只能猜测），是在1917年购得的。稍晚于先生。

说起借书，便想起张紫葛在回忆吴宓西师生活时，提及的一个女子。因有顾虑，紫葛称她“上官芬”。解放时，尚年轻，颇有姿色，其夫三青团，去了台湾，因此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属隔离对象。那年头，一个女子，苟且之中，想寻点庇护，尚可理解。但她择中吴宓，则是另一回事。因吴宓虽为名人，但那年头，也已自身难保。更何况，他以君子之风，照顾邹氏，已惹得风言风语，再加上个“上官芬”死命靠拢，为迫使先生与她结婚，胡诌已私通云云，招来不少麻烦。实际上，“上官芬”真正与之私通的则是方敬好友张东晓，被抓了个现场，方知先生的清白。但迫于政治压力和无奈，吴宓则不得不和发妻离异，与邹氏结婚，最后才算平息了一场“桃色风波”。在外文书库，常推荐借我书的，是位银发老姬，风度颇佳，当时，只觉得她有点与众不同，但说不出个究竟，后看了紫葛的回忆录，回想起来，觉着很像是她。算是推测。那套书就是她寻出借给我的。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书中一首诗，有吴宓修正印刷错误的手迹——塘鹅英文版，一个中国人改错，那需要多细致的心啊！这使我对吴宓越加崇敬起来。这套书在我手上辗转了一个多学期，直到满满抄在三个笔记本上为止。它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奥顿，艾略特，叶芝等。那是1980年。

但整个大学期间，对吴宓我仍所知甚少。甚至连他是怎样到重庆北碚的，都不知道。后来，购得上海书店影印的旧书《二十个人志》，开篇即吴宓，短文是从英文转译的，没署名，故不知为谁所写。旧时痕迹较重，尤其谈及主义，立论便有些偏颇，不过，关于形象性格，描述倒还生动，概述如下：世上只有一个吴雨僧，叫你一见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这种面貌太平凡了。他的脑袋形似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髭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每晨刮的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面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他对自己的学问是有相当的抱负。他为人慷慨豁达，乐为善事，每为人所误会，待人接物，每偏于忠厚，而对外间之臧否也不能漠然。因此雨僧的心灵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怅惘咨嗟，便是发愤著作。但虽然崇拜歌德，但他却未达到歌德所称羨——“不慌不辍”的境地。他待人以宽，待己甚严，是个立儒行的人。这样一来，吴宓在我脑子里才有了点具体的东西。

说到先生的为人，这段文字想来也还准确，尤其“乐为善事，每为人所误会”云云。后来听紫葛讲过这段轶事。似乎也能说明这点。这件事，恰好与先生的一帮学生有关，包括那大名鼎鼎的钱钟书与王力。1950年，吴宓所在的教育学院，和紫葛所在的女子师范学院合并。跟紫葛一起过来的人里，有不少吴宓的弟子。其中一个殷炎麟，另一个叫张劲公。殷炎麟虽迎合时政，仍被学生视为异己。日子非常难过。吴宓不仅和紫葛一起安慰他，还出面联系，通过华东文教部——当权者中，恰好有二人也为吴宓在清华教书时的学生，把殷炎麟调到上海去了。临行，殷问吴宓是否也让那边的同学，把先生调过去。吴宓不仅谢绝了，而且还晓以时势之厉

害,让殷别与他通信,怕因他而受牵连。自此以后,先生除1961年,南下广州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两人是通过俞大维认识的。陈那时已双目失明),北上回老家谒祖坟,便再没和与他有干系的人联系。慎他人之危,君子独行,可见一斑。至于那位张劲公,因有妻有妾,也大难临头。在西师日子定不好过。吴宓见状,便出面求西南农学院教务长陈某辗转将其调去。但张劲公一心想出蜀地,也知清华想先生去北京而被婉言谢绝一事,便向紫葛抱怨,先生未努力凭其声望将他推荐给清华。吴宓得知,便对紫葛有一番“力所不能及”的叹息,例举一二,便道出钱钟书与王力一事来。

时间在1940,或1941年。先生那时正好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钱钟书在法国学欲归来。在诸多弟子中,要说恩惠,吴宓给他的恐怕也最多。钱钟书的父亲,与吴宓私交甚好。请吴宓关心。吴宓便让钟书在清华旁听,并亲自辅导外语一年有余。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钟书后能去国外深造,再后来,能在中央编译室,作红宝书翻译的主笔,再再后来,能用了多国语言说卷耳蟋蟀密响旁通一类,都得益于老师。所以,师生素有通讯。当钟书要回来时,先生便与学校说好,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先生给钟书的信里也附有书信,只是未下确切聘书一类。钟书到了联大,校方派人与他谈话后告诉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

校方易辙,自然使钱钟书心里怏怏。而这怏怏后来一并索性给发挥到《围城》里去了。那“三间大学”,指西南联大无疑。抗战期间,联大乃由京都的北大、清华,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经长沙转至昆明。那“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中的高松年,虽不敢说,全数落得就是吴宓,但一半奚落陈福田或校方,一点附会先生(钱钟书: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

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倒也很明显。那个方鸿渐,自是作者自个安的吉祥名字,鸿(洪)福渐至。高松年也不算坏,高高的松树,经年不衰。但若是读了那段关于老科学家的调侃,还有对高松年的抱怨,如“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只觉得自己是高松年大发慈悲收留的一个弃物,满肚子又羞又恨,却没有个发泄的对象”一类,虽没什么道理,即是小说嘛,作者不已经申明虚构了吗,但隔了岁月,也还是隐隐要为先生捏把汗的。方鸿渐和高松年见面说话那段,要照顾许多面,看得出,作者颇费了些心思。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一说,那不过是事后一种谦虚的高明。小说笔饰耳。纵观《围城》全书,一段实写(观其一生的学术,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故有些生动,再者游历、市井、学问、趣味、民情点缀其间,也还合适,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精典之作的,许多微言大义一类,与《红楼梦》媲美一类,也不过是帮吃饱了饭撑着没事干的腐朽之笔,穿凿发挥而已。加之刻薄之气太盛,悲悯全无,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便又不知损失了多少。

后来,吴宓劝他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钱钟书去了。不久,通过王力又调至桂林广西大学。其间,向王叙说诸事,谈及先生,自然有些怨语。这些不了然的话,经过王力转口,不久便多处传到先生耳边。钟书辗转长途,吃些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先生一片好心,反受窝囊也当理解。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生,应该体谅。而且,吴宓也因校方聘用钟书易辙之事,心里有气,忍耐了一阵,最后终于拂袖而去了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抗战期间,京都大学迁移,清

华本有合并之意,但燕京执意不肯),然后又是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开始了他那最为不幸的第三个二十八年。其中替人受的委屈、肮脏——最后自投罗网(四川各类政治运动,较之其它各地,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古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之说,如果吴宓在北京或广州,尚好一些),这些事恐怕钱钟书未必知道。至于王力先生,为吴宓弟子,身为语言学家,便该知生活中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道理,也该知晓所谓“君子隐恶扬善”的用途与厉害。此话可作两解:一指不揭他人短处,只张扬他人长处;一指在人际交往时,君子过话有戒;与双方不利的话,听之不过,而有利者则过。王力没作到这点。致使吴宓心存块垒。王力此举虽为瑕疵,倒也可由此想及,那大学问是如何做的了。

再后来,道过朋友认识了定居成都的张紫葛先生。这也是个有来头的人物。他曾师从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兄吴之英先生。与许多作家,如夏衍、矛盾、郭沫若有过来往,而且,与周恩来、张治中、于右任等政界人物也有交往,还给宋美龄当过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前不久著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我让他寄给《联合报》陈义芝先生,在上面发表,随又在香港出版。宋美龄得到此书后,曾惊喜地问及张紫葛安在。抗战期间,紫葛先生,乃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渝后,曾给《大公报》写过措辞激烈,针砭时弊的文章。得以和《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一晤,深受器重,遂为报人。再经张季鸾引荐,又结识了大书法家、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成为他的再传弟子。有次,宋美龄召集各界人士开会,紫葛先生代表张季鸾前往。在宋的办公地,宋的助手于忙乱之中,请紫葛帮忙打电话,十多个号码,出口便被他记住,一一准确无误打出,记忆力惊人。此事为宋美龄知道,立即征得张季鸾同意,聘为她的秘书。重庆大轰炸时,他曾救宋美龄于险境。为此,上过蒋介石的餐桌。后来他辞

去秘书一职,在大学任教。再经茅盾推荐,被聘为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经宋美龄、张治中暗中提携,当了《新疆日报》主编。1948年,在南京与宋美龄诀别后回到重庆,1949年,任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第二年,这所学校,和吴宓所在的省立教育学院,在磁器口并为西南师范学院。紫葛任俄语组主任,而吴宓则为英语组教授,两人邻室而居。其实,早在这之前,两人因于右任的关系,就有了交往。于右任为国民党元勋,早年革命流寓上海,吴宓父亲曾多有资助。后来,于右任与吴家关系颇好。而紫葛先生,作为弟子,又常随其右。在他和吴宓父亲的撮合下,两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我第一次拜访紫葛先生是1990年。后偶尔去去。得知他和吴宓的关系,加上西师这共同的校园,和不同时代的影子,便劝他把吴宓这最后一段生活写写。过了半年多,去年夏天,紫葛打电话告诉我,书已完成。特地取来拜读,或许因为事涉我所熟悉的环境,或许因为吴宓的命运吧,亦或许是那个特别的时代吧,读完它,如果,过去你是个不痛不痒的人,那你似乎就永远地有了一种隐痛,任凭什么也除却不掉。这本书,是凭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在纸上摹写(写此书时,紫葛已双目失明)、经他妻子整理完成。书名原定为《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因吴宓曾不止一次谈及自己的三个二十八年。由此可见,吴宓是个知识微的人。但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猛然风行于世,遂改为现在的书名。不过“三个二十八年”,说起也还有意思。

从紫葛处得知,吴宓是这样划分的:从1894年出生到1921年留学归国,为第一个;回国任教授,到1949年改天换地,为第二个;然后到1978年寿终为第三个。而紫葛回忆所及,正是第三者。书中涉及人物事件颇多,因有书可读,这里只拣一二说说。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分别复校，吴宓本来自清华，自该回清华。但一来，先生为校方聘用钟书易张一事，心有不快；另外，当时海内外许多名校都来邀请他。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此还特别拜访过吴宓，敦促他受聘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授，为避打搅，吴宓却去了武汉大学。内战一起，邀请仍然不断，又尽拣了不知名的学校，到了重庆的省立教育学院。1949年，傅斯年曾特派人到重庆携吴宓到台湾。结果，在宾馆为他尿遁逃脱。1950年并入西师。1953年迁址北碚。没想到，遂成了他一生的憾事。吴宓在《年谱》中对此来自得最为清楚。那是因为他只想君子卓然独立，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后来，灾难虽一次次落到头上，但他一生终还是做到了君子独立的。忠、义、勇、信，在他身上的体现，真可谓人文精神的绝唱。尽管他敬佩西方的学术精神，首倡那白璧德主义到极致，但他只乐意在本土服务于大众，即使稍有异国势力的影响，他也是警醒的。这是他不赴台湾的一个原因。另外，和胡适也不无关系。人人都知道他“学衡”诸子，与胡适、鲁迅暗中对峙。多年来被浅薄的机械进化论（吴公曾戏谑为“学猴子变人”），红是红，黑是黑，用了二分法去其细节，作了阉割与定论。但晚年，他仍是坚持自己反对捋拾文学之皮毛的信念。除检讨当年未能及时澄清自己并非笼统反对白话文这点外，其它诸种观念，他仍坚持是正确的。忠于民族，忠于自己，恪守信念。

说到义，书中所及他的第二个妻子邹兰芳之事，最为明显。邹兰芳，当时是重庆大学中文系女生。那时，艾芜是系主任。他慕名请吴公任兼职教授。这样，邹兰芳得以认识吴宓。不断写信以示爱慕之情。但吴公均以小姐一时虚幻，而未在意。1951年，邹氏两个哥哥遭镇压，留下8个幼小子女，哭求吴老的帮助。吴公乃仁者之心，从此，便每月从自己工资抽出大部分，助她抚养孩子，帮助

这样的人,在当时非常危险。紫葛就曾劝过吴宓。但吴公按天性,自然选择了后者,即使这般,吴公对邹氏也抱坐怀不乱之势。直到后来“桃色新闻”事发,情势所迫,不得已和邹氏结婚。书中关于邹氏跪谢吴公,甘执箕帚,充侧室,以报三世之恩,而吴公自咎其贵的情景,不由令人仰天长叹。吴宓道:“我负担了小邹一家九口生活,就娶她为妻,成什么话?买她吗?前此一诺千金之仗义行为竟成狼子野心矣!且我再婚须与发妻离婚,糟糠之妻不下堂(从年谱看出,吴公和陈心一的婚姻是不美满的,也属大事糊涂一类),我离而弃之,于心何忍?天下知我之师友、弟子何以评价我?更何况还有3个女儿,我老年而弃其母,骨肉离散,其何以堪?”但当时,为保清白不与邹氏结婚,各种运动一浪高一浪,邹氏也恐怕小命难保。这方面并非没有例子。两人1954年结婚,这样邹才有了工作。两人生有一女,未足岁便夭折了。邹氏因体弱多病,不到两年,也香消玉殒。吴公照旧抚养其子侄,直到自己也快撒手人寰。紫葛和李源澄等西师诸友,都给予过资助。这些人,除紫葛,也都不在人世了。

从另外两件事,也可看出吴宓之义勇。他与大史学家陈寅恪1919年在美国相识。几经岁月蹉跎,后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两人自1961年一晤,便断了音信。先生常挂记着。1971年曾有一信写到广州中山大学探询陈寅恪夫妇。信中直言两人乃哈佛同学。那时这般写来,仍是十分危险的。此为永诀。因陈寅恪夫妇已于1969年相继撒手人寰。另外,五十年代土改时。西师外语系有一女于叫郭辉霞,其父地主,逃到重庆投奔她。她却叫来公安将父亲抓回家乡,并陪同回乡参加揪斗。结果,贫雇农过于激愤,连她也揪下脱了裤子揍得皮开肉绽。吴宓听说后,觉得大伤风化,也岂有此理,一气之下,便去求见邓小平(邓当时为西南局书记),要

求处理此事。邓小平知道吴公乃国际知名学者(曾说他是文化界的吴世光)。而且,言之凿凿,对他十分客气,并答应处理此事。缘此一面,吴公断言其三十年后,会有移星转斗之功。结果还真给言中了。

依《吴宓自编年谱》看,光生平生仅有两次受过皮肉之苦。一次是因家庭冲突遭祖母杨太淑人拧扯给别人看的。另一次,则是“文革”揪斗之时。这在紫葛回忆中有较详细的描述。“文革”期间,吴宓被揪斗在一百次以上。大会揪斗时,总有两大汉,将他拖出,风掣电驰奔向会场,快到主席台前,老远就抛甩出去,先生腓骨就是那时跌断的,还伤了膝关节。以后也未得以医治。先生曾对紫葛言及,他不怕辱骂吼叫,不怕揪扯踢打,而最怕的就是这猛的一甩:“每闻那声‘把吴宓揪出来!’我就心胆俱裂。”那时,吴宓常言自己最后一个二十八年时日不多。最神奇的是,他说自己将看到红太阳落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而吴宓先生则在1978年。值得一提的,“文革”前,吴公有许多书信日记、文稿,散落人间。部分是他提前分送学生,转移保存的。有些则是被哄骗走的。甚至还有两个所谓的“学生”,以研究出版为名,骗走日记文稿,并要挟吴宓,在他那里支钱。光生每领了工资后,便将钱币一小叠一小叠摊在床上分配,这是给周氏孩子的,这是给谁谁的,自己所剩无几,除40元伙食外,只有10元零花。那两个家伙,使先生深受其苦。于是,吴公便给他们取了两个代号,一个叫做“乌奚奴”,一个叫“马边生”,下各注“月摊30元”。那“马边生”,就是“骗”字,“马边生”,就是“骗子生”。至于“乌”就是“乌鸦”,“奚”与“欺”谐音,“乌奚奴”,即指此奴乃专门欺骗人而像乌鸦一类的不祥之物。据紫葛先生讲,还有某大学教授,拿了吴宓的讲稿,竟敷衍出论文,混了点国际性的名声。先生一代宗师,一生光明磊落,在那不明不白的时

代，粉身碎骨，除救周氏，委屈了自己外，终不做什么违心的事，最后，却为魑魅魍魉跳蚤一类，叮咬得厉害。若我有那多国文字的功夫，是要用来考据考据这些虫豸那一方厚脸的，文学终该有痛痒才行。

1996年4月于成都

绪 言

一

吴宓曾对我说过他的生命历程是三个二十八年：

第一个二十八年，从 1894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到 1921 年留学归国。这期间，吴宓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就读于哈佛大学。

第二个二十八年，回国就任教授，到 1949 年改天换地，进入新中国。这期间，他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学术刊物《学衡》，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重要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皆出其门下。

第三个二十八年，在新中国作教授 28 载，寿终于 1978 年 1 月 17 日，享年 84 岁。

1940 年暑假，我和吴宓聚谈于重庆老鹰岩云龙池西北于右任的别墅“小园”。

我提及一个小问题，就正于他：《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孔子又说：希望“假我数年以学《易》”。说明孔子很推重《周易》。《易》，主要是占卜之书。卜卦有神的成分。学《易》岂不

与“不语怪、力、乱、神”矛盾？

吴宓当即旁征博引，就“子不语”之“神”的实际含义，圣人以神道设教，古代占卜存在、发展的方方面面，详加阐述。最后说到《易》。他认为，《易》的预测作用不能否定。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除了列举史料中许多事例之外，顺便以他自己为例。说：他曾多次以《易》学测算此生之数，竟然每次预测结果相同：他得享年84岁，并可分为三个二十八年。第一个二十八年为出生（按古老传统，降生即为一岁）至1921年留美归国；第二个二十八年为1921年至1949年，在国家分崩离析中度过；1949年至生命终结，为第三个二十八年。我问：这第三个二十八年你将在什么环境中生活？他答：卦象稍欠明朗，尚难肯定。

1947年我俩相会于南京。恰值学运高潮，我们一起上街旁观了学生大游行。回到我的寓所中央饭店318号房间，纵论国是，看法一致：中国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中共。他又提到了他的预测——三个二十八年。并说：“我这第三个二十八年将在中共执政的新朝代度过。”

1949年，我们重逢于重庆。他也曾说过：“我的第三个二十八年开始了。”

我一时没省悟到，颇觉意外。他说：“你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了吗？忘记了我对你说过两次的——我的三个二十八年？”

接下去他再重复了一次三个二十八年的起止时间。

这以后，在1974年至1976年，我俩在重庆北碚特定状态下的每次惊险相见，他总会提到：他的第三个二十八年还剩多少时间了。

我总笑他这是不经之谈。直到他“如期”寿终于陕西原籍，我才不得不承认他的预测竟然如此准确。

二

本书只记叙我亲自相处时的吴宓，主要是他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此前岁月，除了纪载我俩认识、往还及友谊逐渐深化的情况外，概不涉及。

这是因为：我一向不习惯从报刊及他人著述中搜集材料据以传记人物。纪事纪言，是古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应该注重历史真实，而唯有写自己亲见亲闻的事，才能保证真实。在吴宓的第三个二十八年中，我是彼时彼地和他相知较深的朋友之一。他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很多是我和他同休戚，共忧喜地度过的。因而，我有责任忠实地记叙之。

吴宓是中国本世纪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他不仅学贯中西而通古今，而且还是一位平生诲人不倦、道高德重的长者。在我所记叙的时间内，吴宓与很多学者、干部有相当深厚的友谊。因为关联密切，本书不得不连带记之。主要有：

曾任西南文教部副部长、西南师范学院院长等职的徐方庭。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后任重庆师范学院教授)的周邦式。

著名历史学者、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副教务长李源澄。

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兼西师教育系主任刘尊一。

梁漱溟先生的侄女婿、民盟西南师范学院支部负责人、西师副教授黎涤玄。

早期留美学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共党员熊正伦。

早期留英学生、重庆大学教授黄永亮。

著名经学学者、前任武汉大学教授、后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的

杜钢百。

四川著名女诗人、书法家、重庆师范学院教授黄稚荃。

早期留法学生、前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柴有恒。等等。

因为本书专记吴宓，限于篇幅，对连带涉及的这些朋友，只能摘记精要，请读者见谅。

这些连带写到的朋友，均已先后作古。除徐方庭院长之外，他们都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谨以此书深深缅怀他们，纪念他们。呜呼，哀哉！

从前写作哀悼朋友的祭文，有一句套话：“谨以心香一瓣，泪酒一卮，致敬于某公某某之灵前而哭之曰：呜呼……”

我敬师其意，题本书之名为：《心香泪酒祭吴宓》。

三

人际关系千姿百态，上下左右至为因果，晤谈交涉，请托核夺，难免或正或负，或是或非。而记叙之时，唯有秉笔直书，才能反映原事原貌。然而人情之常，喜褒恶贬。我愿广结善缘，不揭人之短，不及人之非。无奈事实俱在，无可更成。故缘本中华古道：不为圣人讳其短也。因为所记全是亲见亲闻的事实，行文之际，不得不连带说到作者本人。但力求少提。只是不提不足表明实况的，才简略附载。

张紫葛

1996年10月1日

于四川成都

吴宓逝世已18年,这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位培育教诲过许多著名学者、斐声杏坛的大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还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我有责任笔之以书。

目 录

和吴宓相遇(代序) 钟鸣

绪言

- 1 “但愿一识韩荆州!” 1
- 2 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 7
- 3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8
- 4 窥夫子之堂奥 24
- 5 奥陵江水清且涟漪 34
- 6 教师的职业感情 51
- 7 花好月圆在眼前 64
- 8 夜半尿遁 79
- 9 痛惜失之交臂 83
- 10 喜迎王师 93
- 11 与人隐私者不祥 98
- 12 合校之初 109
- 13 统战部来了通知 114
- 14 挨了耳光之后 120
- 15 关于日记 136
- 16 治学之道 152
- 17 求见邓小平 159

18	在三反运动中	165
19	红学讲稿被骗	174
20	逼牯牛喝水	183
21	思想改造运动	197
22	1952年7月8日的《新华日报》	207
23	李源澄的“绝密消息”	223
24	尊重妇女,同情弱者	236
25	乔迁之喜	250
26	秘密家奠	258
27	我来到人世是尽义务的	268
28	斯文同骨肉	280
29	谈《天仙配》	293
30	规劝杜钢百	301
31	上德维道	306
32	“匈牙利事件”的消息	322
33	劫运	328
34	他一步一跛,拐进我的小屋说:“我是吴宓!”	335
35	难忘一九五六年	340
36	淡淡的悲凉	348
37	最是心胆俱裂莫过于会场的雷鸣吼叫	354
38	还是活够这第三个二十八年	360
39	黑旗队杂俎	365

40	牛棚友谊	373
41	昔日朋友大半已登鬼录	379
42	笑得比哭还惨	389
43	做邓小平的“黑喽罗”光荣	401
44	“聚餐”庆幸存	407
45	反对批孔	414
46	黑夜送别	423
47	痛哭吴宓	437
	跋 磁器口纪事(石琼生)	444
	后 记	453
	附 图	459
	附图一:西南师范学院磁器口时校舍平面分布示意图(1950~1952)	459
	附图二: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北碚校舍(部分)和毗 邻之北碚部分街道平面分布示意图.....	460
	附图三:1952年7月8日《新华日报》载吴宓署名文章的版面影印图	461

1

“但愿一识韩荆州！”

我和吴宓先生的友谊颇有传奇色彩。论年齿之长幼与闻道之先后,和他的许多弟子相比,我都只能是后学晚辈。可是我俩却结成了异姓手足般的朋友。而且我俩最初相识,还是他的老太爷(嗣父)仲旗公介绍的。

这得从头说起。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我负书担囊,跋涉千里,于1939年初春到达抗战陪都重庆。以文为贄,求见《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先生。季鸾先生睹文鉴人,视为可教之晚辈。随即因季鸾先生差遣,被宋美龄女士发现我记忆力特强,乃商于季鸾先生,临时借用我在她所主持的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帮忙”。使用中,信任日增,进用为她的秘书。其间,季鸾先生复先后向张伯苓、于右任两先生谈到我这样一个后生,并将我的文章拿给于右任看。引起了于右任的兴趣,想见到这个青年。

1939年初夏一个燥热的上午,季鸾先生突然把我找去说:“我带你去认识一个人。”

“什么人?”我问。

“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国元老。”

“您怎么了？带我去奔走权门？”

季鸾先生笑了：“这不是权门！——于右任先生，你愿意认识吗？”

“愿意，愿意！”我高兴得像在朗诵了。

季鸾先生把我领到上清寺监察院，踏进了于右任先生的办公室。

于右任没和张季鸾握手，却把他那又大又厚、结实有力的手伸给我：“听说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我这样请你移驾来见，你不见怪吧？”

“怎么会呢？”我说，“我再狂，也曾读圣贤书，知道尊师、重道，对您这样……”我顾虑会给人造成阿谀的印象，吞下了下面的词汇。

他仍抓着我的手，仔细打量着。我，与那时的同龄人相比，很土，很土。穿一条手织的紫花布长裤，上身穿一件白土布衬衫，腰间扎一条最低档的皮带。那时，城里青年男子都作兴擦头油，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皮鞋贼亮。我则蓬松着头发，上面除了青春自然的光泽外，无半点油脂。脚蹬锁口布鞋，沾满了山城坎坷路上的尘土。我土得够呛，于右任却很满意。他对张季鸾说：“唔，我看到了我的青年时代了！”

那时电力供应很不景气，桌上电扇忽然停了。“你穿了汗衫的吧？”于右任问我。“穿了的。”“把外衣脱了吧！天气太热。”

“不，没关系。”我没条理地说，“请您们宽衣，我……我是后生。”

“唔！”于老点了点头，对季鸾先生说：“惟傲人者始能为谦谦君子。”又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有梁任公手法。你喜欢任公

文吗？”

“喜欢的。”

“他受任公书影响很大，”季鸾先生对于老说，“然而其功力尤在乎名师之熏陶。”

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叹为苦儿困学。复问师承，我答：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赞吴师道德文章。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

我简单回答了几句，说：“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学无根底，有玷先师门墙。”

他抹了抹长须，说：“不要谦虚！谦虚过分就成了虚伪应酬了。”

他说话很少笑，语态也少抑扬顿挫，甚至很平板。可这却更令人感到他的诚挚、恳切。我便想起我读湖北省立师范时的陆老师曾经在上海大学念书，当时于右任是上海大学的校长。我就讲了这个情况，称于右任为“太夫子”。

于右任摇头说：不可，我只是承担了校长之名，未尝执教，不得滥等称师。又说：“我何德何能？敢与‘春在堂’并列？”

他又问了我的生活、工作情况，最后，郑重其事地说：“我见到你的文章，很想认识你，似有饥渴之感，故急急忙忙请了你来，见一见面。这个星期天有空吗？可不可以枉驾舍下，我们好好叙谈叙谈……”

当时，于右任已 58 岁，而我则刚满 20 岁。自那以后的 10 年中，我和于老未朝夕相从，有时一二年才聚首一次。但是每次过从，都像这初次相见一样，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随后，在重庆，在乌鲁木齐，在南京，我们过从甚密，师生感情日深。在这过从中，

我惯常称他“太夫子”，他也就不辞让了。并且，有时还自己称我为“再传弟子”。如，1947年5月，我去南京，在他的淮海路私邸，我初次与邵力子相遇时，他介绍说：“这是我的再传弟子……”。

如今且说1939年认识于右任之后，我间或到位于上清寺“一园”的监察院衙署，或位于老鹰岩的于右任别墅“小园”去，因而和吴公仲旗熟识了。

彼时，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这就是一位于公尊称为“吴公”或“仲旗公”的贵客。看外表，这位吴公似不比于右任年长多少，何以于公尊敬如此？原来他是陕西泾阳世家，早年游宦、经商，颇有豪侠之气。于右任奔走革命，为清廷追捕，亡命遁逃，辗转到上海，无以为计。恰吴公仲旗乔寓上海，居处宽绰，生活富裕，乃以同乡之情，迎馆于公，款待资助，礼遇有加。并厚赠资财，供于政治活动之用。复因于的影响，他也投身政治。民国肇始，他辅助陕甘总督赵惟熙，任其参谋长兼秘书长。袁世凯称帝，于右任主持西北护法讨袁大军，吴公襄助其事，出力很多。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右任以开国元勋，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长。既图涌泉之报，又申共举讨袁大旗之义，乃荐吴公为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并不时迎至私邸，谈宴叙旧。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谈。吴公熟悉经史，尤爱春秋三传，我更少年意气，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因而一老一少，颇为投机。

一日，吴公问我：知道吴宓否？我答：当然知道，且甚为敬慕，恨无缘相识耳。吴公便说：吴宓就是他的儿子。

本来仲旗公是吴宓的叔父。吴宓幼年时，根据祖母的命令，抱给叔父仲旗公。从此，吴宓称生父芷敬公为“爹”、“我爹”，称叔父仲旗公为“父”、“嗣父”。且和仲旗公骨肉之情特深。以后，仲旗公虽生育有好几个子女，但他俩的父子关系却没有改变。

当下,我大为心许,向仲旗公鞠躬且兼作揖:“既然您是雨僧先生令尊,我就恳切拜托您,介绍我拜他的门墙,做他的弟子!”

仲旗公颇为惊讶:“你何以这般推崇他?这么想和他认识?”

我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雨僧先生道德文章闻于天下,我万分钦佩,故愿一识。”

仲旗公甚为动容:“你既然这么喜欢他,我介绍他和你做个朋友好了。”

大约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于右任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的别墅“小园”一叙。我如约赶去,吴宓并他的老太爷仲旗公正在于右任的书斋。他那时任教于西南联大,适才刚从昆明抵达重庆。

于右任给我和吴宓作了介绍。他的老太爷接上一句:“希望你们做个弟兄般的朋友。”

我确实真心仰慕吴宓,便恳切地说:“我读过雨僧先生的文章,极为仰慕,恨不能立雪程门。今日有幸相识,愿执弟子礼,师事夫子。”

吴宓正襟危坐,客气地说:“……听说张先生是蒋夫人美龄女士的秘书,宓怎敢高攀?”

吴老太爷颇为不悦:“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我斟酌久之,才给你们慎重介绍。岂可说出这些市俗客套话?”

于右任接上说话,他告诉吴宓:这个张紫葛虽然年轻,确实“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当即拣出我的两篇文章给吴宓看。

两篇短文,吴宓连看了两遍:“……大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

我率直答道:“……我最喜欢太史公书和梁任公的文章……心师其法……”

接下去,吴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学问。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我则坚持师事吴宓。于右任不耐烦了,抚髯正色说:“紫葛,我早对你说过:谦虚过分就是虚伪。中华传统,古往今来,忘年之交很多,为什么你们俩就不能订忘年之交呢?”

吴老太爷又称吴宓的讳名补了一句:“你的十四弟就比张先生还要年轻。……”

就这样,我们订了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随即,在于公的客厅里,我和吴宓又单独谈了一阵。主要是,我向他坦陈了自己的求学经过及目前的自修情况,打算尽快辞去宋美龄秘书之职,改作教师。他赞成我的计划。建议我多读点西方名著……

这短时的晤谈,使我得以初窥他的学识之渊博、精湛。谈到国学经史,他总有独到之考证与精辟之论断。谈到西方文学作品及作家,无不了如指掌,剖析精确。例如,莎士比亚某作品成于某年月日,何年月日初次演出,……此作品成功之处何在,不足之处何如,等等。而且,他是那么虚心:“《易》?我非常浅学。”但是,待我叩问质疑,才知他对《易经》很有独到的研究。

总之,我衷心佩服、真诚以良师视之。

2

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

虽说订交了,我却有点茫然。也许是仲旗公的豪放令我形成了自然联想,也许是我自己受古书描绘才士的文字影响,我原以为吴宓当是豪迈潇洒、谈笑风生的才华横溢之士。今天见面的印象却完全相反,他显得过分稳重,似乎有些矜持。他面容清瘦,表情敦厚,说话基本不打手势,绝不左顾右盼。这一切,作用于我的观感:他是一位可敬的学者,感情上却似乎和我距离颇为遥远。无法想象,我们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异姓手足。

不一会儿吃午饭了。于右任家里的常规:凡属款待受到重视的客人,就不与家人同桌,由于右任自己陪同,在客厅旁的饭厅用膳。于是吴宓父子,于右任,我,四人一桌。于右任让仲旗公及吴宓上座。吴宓恭谨肃立:“我,晚生后辈,只能侧席侍坐。”

仲旗公身体很好,举止矫健。但吴宓却一路扶持着仲旗公,待他坐好后,才自己退坐打横。于右任坐了下方——主人席位,我坐在吴宓对面。于右任举酒嘱客,仲旗公举杯豪饮,我也跟着一口一口地抿。惟有吴宓只是端端正正举杯近唇,随即放下。两位长辈且饮且谈,语多恢谐。我已在于右任面前随便惯了,食量又大,便

随意用饌，或不时插话，或如孩童好奇，追问两位长辈所谈的下文。吴宓则不然，他端坐不语，进食极为缓慢。有时视线移动，表情恬淡，静听两位长辈的谈话。有时微微点头，表示领悟。说话间，于右任谈到八国列强来侵，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到西安。彼时于右任是省学的生员，巡抚命令，生员全部朝服整齐，郊迎皇上。于右任等学子在学台大人率领下跪地郊迎。御驾还没影儿，学台大人就下令跪起，直挺挺跪在官道旁的土地上。天大热，烈日炎炎，双膝疼痛，热渴疲惫，苦不堪言。——于右任详述彼时困窘之状，然后说，他就是从这天起，立志要推翻清朝这个专制政权的。

他讲得很是生动，我却一直未停进食。仲旗公也手执筷子，间或挟食一点菜肴。而吴宓则端端正正放下筷子，静坐注目，听于公说话。吃罢饭，仲旗公起身，吴宓立即上去扶持老人坐到沙发上，并为他取烟、点火，挪茶杯。举止虔诚自然。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享有盛誉的教授，对父辈孝谨如此。他开始在我心中植入了实实在在的可敬可爱之感。

然后少坐片刻。吴宓说：他要去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西南联大有人托他带有专函给张伯苓，他自己也应该去看望。因为吴宓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求学时，张伯苓曾经短期担任清华学校教务长，他和张有师生之谊。

吴宓第一次到重庆，道路不熟。于右任叫我陪他去。我不仅知道张伯苓的住址，而且随于右任多次见过张，也认识他。

于右任叫我们坐他的轿车去。吴宓却再三辞让，说是绝不能坐公家的轿车办私人的事。况且他正少壮，坐公共汽车毫无所苦。更何况我们身为后辈，坐上院长的轿车来来去去，迹近招摇，大碍于丈德范。于右任见他执意不从，只好作罢。

张伯苓住在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里面。从老鹰岩到那里，

得乘公共汽车到小龙坎；再转乘市中心区至沙坪坝的过路车。这时重庆的公共汽车有三大特点：班次不定；车易抛锚；乘客拥挤。我俩来到老鹰岩（又叫山洞）车站，售票窗口紧闭。窗前站、坐等候买票的乘客却不少。我告诉吴宓：这儿的惯例是既不站队候轮子，也不取、发购票号码。全凭车到窗开，一涌而上，谁挤在前谁先买票。上车也是这般情状。

“此之谓捷足先登，”他说，“然而无碍！你我一少一壮，不至落后。”

我强调说：那蜂拥拥挤之状很不一般，我们也不一定必操胜券。

他非常自信：“岂可自减锐气？我来奋勇一试。”

他也学那些乘客，按墙上贴的票价表所定价款，数好钞票（车站恕不找补），也像那些乘客一样，手捏纸币，目视售票窗口，有如短跑运动员，各就各位，只要一声令下，便起步狂奔。

车来了。那里站员开门，乘客下车。这里售票窗口板门哗地拉开，露出售票员的圆脸。乘客立即一跃而前，手举钞票，挤向窗口。吴宓确也敏捷，箭步向前。究竟有些文质彬彬，稍欠孔武，小小人潮，把他排在三、四层之间了。我一看，确信成功无望，当即转至车站后面，找到站长。我和他有一两面之交，他还只知道我是市长吴国桢的机要秘书吴经麟的老同学。但这也就够了。

“哎呀呀，我的张公，你怎么来搭公共汽车了呢？挤得很，那可不是你坐的呀！……哦，哦！这么回事。我给你取两张票，委屈你和贵友在司机台挤一挤吧！车厢里，那实在不成个名堂。”

他立即给我扯了两张车票，好一阵推让，才收了我的车票钱。我手捏车票，转到前面，窗口正在售最后几张车票。然而吴宓高举钞票的大手前面还有七、八支手。“噤！”售票窗口关了。吴宓一身

透汗，转过身看到我，很觉扫兴：“一战失利，时间还早，稍停再战可也！——我忘了曹刿论战说的：一鼓作气。现在得了经验：起步必须勇、决、大跨步……”

我告诉他，已有车票在手。

他听说是找站长开后门买的，大不以为然：“不可，不可！圣人言曰：道不由径。走捷路，取巧，皆非我辈所宜为，况拉关系，徇私舞弊乎？”

哦，他原来是这么一位占板夫子。我只有哄他说，车站有此规定，某些级别的公务人员可凭证件站内购票。此乃秉公正办，并无徇私情事。他勉强接受了。却仍说：这种规定远欠民主。公务员何得超市民一等而享此特殊优待？

上车也是“捷足先登”，好一场挤扎，加上他同我别扭了一阵，我们来到车门前，车上已经挤满乘客。站员准备关门了，却见站长过来：“张公，请，请，我已和司机说好，委屈两位就在司机台挤一挤。”那时的公共汽车，以及所有卡车，大多是六轮道奇，驾驶台窄，司机旁边一般只能坐一个人，坐两个人确是有点挤。但这比起车厢里，不啻天壤之别。谁知吴宓却拒不上去：“我们何得特殊——至于此！”我叫他看看车厢，还能挤得上去吗？确实，这号公共汽车，只环车厢有一圈条凳，人们大多挤立在中，人轧人，一如沙丁鱼罐头。

站长有点尴尬。我急向他耳语解释：我这敝友，才从国外回来，很是有点迂阔。站长点头，生了一计，上前对吴宓说：这是站上向例，车厢实在挤不下了，就在驾驶台上挤一二个人，“所以说委屈了你们二位。”

他总算接受了：“既属向例，那我们就谢谢了！”

我们总算顺利到了小龙坎。可是市中区开沙坪坝的车过了两

班,根本不在小龙坎上下人。他颇为不快,问:“难道市中区竟无人来小龙坎?”

我告诉他,另有来往市中区与小龙坎的班车。他问此去沙坪坝多远。我答:约2公里。而南开中学还在沙坪坝街头靠小龙坎这边约半华里。

“我们步行去吧!”他说。

他又问及此去南开中学途中有无集市,他决定在小龙坎买点礼物。他告诉我:西方礼节,拜访朋友,尤其看望长者,必须带点礼物。礼物不可过丰,亦不可昂贵,否则即有炫己之富,甚或变相贿赂之嫌。中国古礼,拜见尊长须有所贽。所以他须买点礼物。这时的小龙坎,街市很小,转了一转,无可取材,就在水果摊上买了几斤桃子,另买了一个棉线网兜,将桃子一枚一枚,轻轻装入网兜。叫我前导,向沙坪坝进发。时正盛暑下午,云空低压,似在酝酿雷阵雨,因而异常闷热。我两人都汗流浹背,他尤不耐热,汗水从下巴尖儿往下滴。可是我三番五次要替他提拎那网兜桃子,他却怎么也不允许,“贽见长者之礼物,必须我自己提。”

“夫子何其迂阔如此?上午不是说好了,我是你的异姓手足,譬如令十四弟与你一道儿,难道不可以弟代兄劳,换着提一提吗?”

“不可!即令你是十四弟本人,亦不可也,因为张公是我的师尊……”

进了南开中学,快到张伯苓住的那栋小洋房了。

“来,这儿墙边有风,我们歇一歇,风凉风凉,待汗渍稍干再去叩门。”

风凉了好一阵,两人都基本无汗了,才从容过去,叩门拜访。张伯苓正好在家,见到他非常高兴。书房坐定,吴宓取出昆明带来的信,交给张伯苓,并道拜谒师长之忱。张伯苓却很客气,称他为

“雨僧兄”，对于吴宓这般恭谨执弟子礼很不敢当。再三说：兄台乃当今著名学者、盛誉远播。能不弃老迈，与我作知己之交，我就深感荣幸了！

吴宓：您是我少年时代的教务长，有启蒙之德，终生为师，礼所当然。

张伯苓自谦：“滥竽学宫”，实不称其才，不论清华、南开，都只作行政事务，万万不可掠美称师。

吴宓则恳切表示：教务长乃众师之长，实乃师之尊者，岂可有失礼敬？且自古尊师乃重道之本。今宓亦忝为人师，岂可不身体力行，展尊师重道之德？

随后，他向张伯苓讲了西南联大近况，南开大学参加联大的诸君如何。我恐谈话涉及学校内情，我在旁边或有不便，便去客厅里和张伯苓的弟子——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闲谈了 10 来分钟。待我回到书房，他们两个正在谈叙一些老朋友的情况。然后谈到中文、外文诸系开课的问题，及吴宓的学术研究。由于他们谈的人、事，我所知甚少，而且不论年龄、学识，我都是后学晚辈，我不应该插话，就在一旁静听。他俩连续谈了一个多小时。所谈当时令我获益很大，印象颇深。但现在时逾数十年，难以全面完整忆叙。只能举其要点数则：

他们谈及很多当代学者、教授，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到这时尚不十分出名的西南联大陈福田教授，至少说了 30 来人。我窥张伯苓的思路，可能是广察当代学者、教授之短长，以为复办南开大学遴选教授之参证。因为每谈一人，他都询之甚详。但是，吴宓的答复很有特色：说到那人长处时，不厌其详，推重之词着重“道德、学术”两项。而对所涉及的人物，概无贬词。也并不是一律叫好，通统 100 分，而是褒扬各

得其当,各有所长;长处各有参差,则相对之下,短处不言自明矣。这就令我看到了吴宓知人待人的——大美德。明辨毫末,鉴人之长,不疵人之短。

谈到我国大学文学院系、科、专业之设置及应开课程,吴宓有许多独到意见。其中有这样几条给了我很深印象:

一曰:现今文学院涉及国学之系(专业),通常有三:中国文学、历史、图书馆学(只个别学校设有此系科)。而我中华之国学博大精深,绝非此三系所能概括。另有教育、哲学、法律诸系本应继承国学相应种类,然而现今各大学此类系科(专业)之教学,或根本不涉及国学有关内容,或有所涉及,但以西方学说为主,如法律。或仅稍涉国学而类似点缀,如哲学。长此以往,国学势将失传。中华五千年文化之丰富遗产,即将沦于灭绝矣。吴宓认为,应该根据国学内容增设适当科系,或在有关系科内增设适当课程。

二曰:现行各校之外国文学系实为单一之英国文学系,有些学校则干脆名曰英国文学系。以宓之见,世界之大,何得仅限于英国文学?宓以为:规模大之学校,宜分设英、法、德、意、俄文学系,及印度、伊朗、日本文学系。规模小者亦应设西方文学系、东方文学系及俄罗斯文学系。俄罗斯、印度、日本与我国关系复杂,尤其俄罗斯,与吾国领土接壤绵长,历史上纠纷至多,吾国学子不可不学俄罗斯语言及其文学。

三曰:音乐、艺术诸科现均独立设校、设院,但谈及文学系院之办理,不能不触类虑及。盖现今之音乐、艺术院校,均以西方音乐、艺术为主体,对于吾国源远流长、造诣极高之音乐、艺术或根本不予理睬,或仅设置选修课,孰不知吾国之音乐、绘画、舞蹈均有优于西方之处。倘得古人之真传,发扬而光大之,必将远超西方而获得世界之钦佩与崇信。宓意应在文学院专设音乐、艺术等系;在音

乐、艺术院校专创研究中国音乐、舞蹈之系科。

张伯苓盛赞吴宓在比较文学方面的贡献。说他是我国比较文学之成功开拓者。吴宓谦称他的研究及讲授水准远不足以承受师长之赞许。他认为,此项研究还有待现时各校讲授此课之教授们的继续开拓。于此吴宓略谈了他研究比较文学的主要方向:

根本之根本认为,以中国文学为主体,举其精华,灿其粹微,然后纵观世界文学宝库,取其杰出之代表,缕析透视,得其精华之绝伦者,与我国文学家之代表作比类论证,抉其短长,从而实事求是,得出精确之结论。

张伯苓又问吴宓所开独具特色之课《文学与人生》,说他顾名思义,即觉此课大有意义。吴宓扼要谈了这课之内容与意义。

辞别张伯苓,吴宓还要去重庆大学拜访他清华学校时的同学何鲁。我们在重大转了很久才弄清,何鲁回成都去了。出得重大,天已黑,在面馆吃了点面食,就步行奔往小龙坎。天已全黑,走到距小龙坎不足一华里处,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彼时,我也才到重庆半年多,不熟悉小龙坎附近的情况。只晓得它的东边有几个内迁的工厂。这当然是日机轰炸的目标。便领着吴宓朝工厂相反的方向奔跑。空袭警报实行灯火管制,灯光齐暗,一片漆黑。四野高低不平,吴宓又是穿的硬底皮鞋,不时打滑。奔跑得十分吃力。紧急警报响了,敌机临空,炸弹雷鸣,地壳颤抖。万幸,我们身边没有落下炸弹,敌机哧哧远去了。我们惊魂渐定,踉踉再行。我想,这么乱窜,不是个办法,还是要摸到马路上,朝西走去。估计方向,朝左,再朝左。摸上了马路,他舒了一口气:“不历坎坷,不知坦途之可贵也!”

正走得带劲,却听得一声断喝:“什么人?”

不用问,是防空队的岗哨。我随口答:“老百姓。”

跳过来一个人影，夹以枪机哗啦之声：

“站住！老百姓？紧急警报底下乱窜！八成是汉奸，给鬼子飞机指目标的！走，哨上去。”

我们被挡进一溜平房的里屋。三抽桌上燃着一支蜡烛，但见蒙了黑布的窗子和桌后站着两个士兵，坐着一个上士。

“为啥子紧急警报之下还要在马路上跑？”上士问。

“赶路，回老鹰岩。”我说，

“给我搜。”上士命令两个士兵。

两士兵迈到吴宓面前，喝声：“举起手杆！”

吴宓毫不犹豫举起双手：“搜就是，没有违法物品的。”

我抢过去猛一下将他举起的手臂扳得垂直：“不准他们搜！”

上士囁地站起，大声喝：“搜！”紧接着跳到我的面前，喝叫：“把手杆举起来！”

我比他的嗓门更大：“混蛋！”同时猛甩过去一耳光，打得上士窜出老远。

这一下镇住了三位兵大爷。两士兵缩回了伸向吴宓准备搜身的手，上士站住脚，向我说：“敢打人？亮帕式（证件）！”

一个士兵溜出去了，另一个士兵持枪堵在门上。一会儿，领来了一个上尉。军官制服整齐，脚蹬带马刺的硬筒马靴。

“你们是哪部分的？拿出证件来看看。”

他年不及30，看样子像是军官学校出来的。这就可能瞎吓唬了事，得亮证件。可是我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吴宓身上也许有证件，也不过是西南联大教授。那年月，兵大爷是不买教授的帐的。相反，他们会认为，教授之辈最好欺负。秀才遇到兵嘛！

“请拿出证件！”军官向我逼进一步。

奈何？脑子一闪，有了！今上午刚到妇指委，军需署长来求见

宋美龄，我不认识他，他便给了我一张名片。顺手插在口袋里了，这会儿当然还在。

“我的证件不能给你看。”我慢条斯理掏出名片，单手伸给他，“这里有张别人给我的名片，你可以参考参考。”

军官把名片看了又看，将名片双手递过来：“先生不肯亮自己的身份，鄙人不敢作主。敬请二位到敝连部休息一下，容我电话请示一下如何？”

说得有理，不便拒绝。一行来到相距不远的连部。我一见桌上的电话机便问：“你们的总机能接军事委员会吗？”

军官一怔：“这个，我没打过。”

我上前抓起话筒，叫总机接到了军委总机。“给我挂监察院院长别墅。”

“请问长官姓名。”总机功能很强，耳机里面声音很大。

我吐词严厉：“少废话，给我挂过去就是。”

耳机里传来于右任的声音。我告诉他，我们路遇警报，奔跑得很是狼狈。于右任说，蒋夫人来了三次电话找我。此刻她派来接我的汽车还停在他那儿。

“就叫她的汽车来接你吧！你们在哪儿？”

我转脸问上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上尉噤地立正：“报告长官：这儿是高滩岩大桥东头。”

我放下耳机，对军官说：“你放心，我不会找你的麻烦。”他又噤地立正：“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吴宓一直没有吭声。默默坐上汽车，目视前方。直到汽车爬上老鹰岩的盘山桥洞时，他才轻声对我说：

“半天同行，见你很是机警敏捷，进退有节。只是，刚才这番作威作福，宓很不解。”

我也轻声答：“我深知，这会叫你讨厌。但是事迫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我俩会叫他们剥猪猡（这是旧上海黑夜抢劫的一种，将单独行人拦于僻巷抢劫，连衣服鞋袜都要剥光），说不定还要挨黑打。”

他颇为惊讶：“啊！有这样黑暗？！”

车到小园，出于礼貌，我随他跳下汽车，送他到门前。他一面走，一面对我说：“宓以为：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稍顿一下，又说：“重庆太热了，且空袭轰炸可畏。我决定改变计划：明、后天停留两日，大后天搭乘飞机回昆明。”“那——，后天我来和你话别。”

他的回答是：“晚安。”

“晚安！”我转身上汽车。

3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我如期赶到小园去和吴宓话别。刚坐下,我就告诉他,我决定近期离开宋美龄去教书。并说,如辞职不准,我就不辞而别。

“善哉!”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你能决定舍弃攀龙附凤之富且贵,善哉!真吾弟也!”

说话间,又传来空袭警报。这年自“五·三”、“五·四”大轰炸以来,日本侵略者的空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不断升级。日寇大本营宣称,要以炸弹将重庆“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去”。“小园”地处重庆西郊老鹰岩(又叫“山洞”)的山间丛林,自老鹰岩至歌乐山林木茂密,日军飞机无法肆虐,故国民政府各部、院长官、富商巨贾,都在这一带建有别墅,以避空袭。每有警报,就驱奔到别墅,偃息自在。于右任的小园是这些别墅中最俭朴的一个,却也远胜城里的防空洞,加之于右任御下亲如宾朋,以故每有空袭,监察院的高级员司就投奔小园。或品茗闲谈,或就便商酌公务。济济多士,十分热闹。

吴宓已了解这种情况。听到警报,便约我步出小园,在丛林中散步闲话。走了一会儿,又觉饥渴腿乏。我便约他到歌乐山儿童

保育院去坐坐。这个保育院是宋美龄主管之战时儿童保育会办的重点单位。职司保育从战地抢救到后方之儿童。院长刘尊一女士和我很友好。保育院设备良好,远远优于一般小学。因无轰炸之苦,里面还在照常上课。吴宓看了,大为赞赏。刘尊一这时刚及30,白皙清秀,丰姿绰约。她留学英国,操流利的伦敦英语。与吴宓攀谈一阵,甚为相投。少顷,她去办理公务,剩下我俩品茗纵谈。上次,我们互相谈过求学情况,却都语焉不详,只说了梗概经过。今天高兴,又在儿童生活之环境,就不期而然,争诉少年事,进而忆及童年。

我们两个少年、童年生活,根本不同:他是在小康之家,养尊处优。我则生于湖北西部山区穷村中的贫苦农家,童年放牛苦作,求学时打工自修艰苦备尝。可他不仅没有因此看不起我,反而认为,我求学时代的生活远比他丰富,要我详叙打工种种。凡我所述,他无不感到兴趣。我就索性讲了15岁时“吃鬼钱”的事情:在摄氏42度的高温酷暑中,在武昌火车站为货主抢卸货件赶腾车皮。工钱倍于一般搬运,但盛暑力作,最易昏厥丧命,故俗称“吃鬼钱”。

吴宓听过之后,抚掌赞叹:“难怪于公这么器重你,诚有颜回之贤也!”

这天,他的谈兴极佳。原原本本讲述了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前后。讲了他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谈了这些大师各家之长,以及他们治学、讲学的特点;特别详细地讲述了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全过程,以及他自己为王氏治丧的细节。

在这以前,我听到过关于王国维的谈论,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以及投湖自杀,为的是忠于清王朝、哀怨传统文化的衰落。我便插问是否如此。吴宓告诉我: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王国

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他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骂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同时,王国维痛恨当时“全盘西化”的论调,痛恨崇洋媚外,并由此感到传统学术必将江河日下。于是,他就学了三间大夫。

接着,他又和我讨论了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和著述。

……

他对我的童年、少年生活很感兴趣。我谈一则,他就谈一、二甚而三、四则他的同类往事。而且大有妙趣。其中,有几则给我的印象极深。

我谈:我少时很不信神,庚午之年,我母病虐,问卜求医,说是“都土地”作祟,要以猪头、雄鸡祭奠求佑。我气不过,乘黎明放牛之便,闯入都土地庙,戟指秽骂“土地”,继而溲尿射冲,犹不解恨,搬起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往地上狠砸。诸神像乃是泥塑,一砸即碎断为两三块。我就干脆将他们扔进了庙前小溪的深潭。哪知次日村中哄传,竟认为“土地”显灵,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村中百姓善恶去了。……

吴宓听了大笑。随即讲了他少年时乡中过年祭神的繁文缛节,命他以长子承其事,拈香烧纸,燃烛奠酒,祖宗牌位神龛,天神地神,庭神,隅神,石臼神,磨子神,灶神,各院各屋,一一跪叩稽首,腰腿酸软。15岁那年过年(春节),祭了诸神,又去祭土地,因过于疲累,下跪时踩了自己长袍下摆,衣绊身倾,猝然前跌,头上磕了个老大疙瘩。

“我心里抱怨土地:你既有灵,何以我来祭你,你却不保我平安?……可惜我没你那蛮劲儿……”

从此,他对于宗教神灵持怀疑态度。“我日益信服孔子云不语怪、力、乱、神!”他又说,在美留学期间,房东都是基督教徒,吃饭时必于就座后祈祷罢了,才开始就餐。

“我心里很不愿意,”至今犹恨恨于怀,“何以如此不民主?我不是基督教徒,却强迫我跟着祈祷。”

他还曾几次被美国同学拉到教堂,跟着他们作礼拜。每次他都极反感,却勉强应付,跟着祷告。“……我这人过于温驯,竟流于懦弱。此乃我之一大弱点。”

我讲到我所放牧的牯牛如何深通人性,懂得人的语言、手势。

“对的,六畜皆通人性。”于是他讲了一匹骡马的故事。

他17岁,在陕西考取了入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科,乃于限期内乘骡车从西安赶赴北京。拉车的辕马脚力很差,观其骨架,少壮时当是良驹。然而现已衰老,筋瘦毛枯,屁股上还有两块创面,溃烂血泛。车把子毫不怜此老畜,总要驱它快跑。稍不快捷,就以鞭柄尖儿狠戳它的创伤,意在省挥鞭之劳,而捷驱驰之效。老马果然痛得浑身哆嗦,拼命前窜,累得通体汗出,热气蒸腾,鼻喘粗气,口溢白沫。然犹挣扎腾颠,竭力奔曳。终子,力尽疲极,崩然踣倒,瘫在地上。辕下狭隘,驱起不能,车把子便将它从辕绊中解了下来,且鞭且拖,使老马站起之后重新驾人辕绊,再驱之前行。马行迟钝,便重戳其臀部创伤,使其负剧痛而狂奔,又是汗漓力竭,颓然瘫倒。如此两起三踣,老马已衰竭垂毙,无力起立,而车把子并不稍加怜惜,反而大怒痛鞭,夹以戳其深创。老马痛极欲起,而力不从心。但有惶极战抖,引颈长鸣,其声哀切万状,惨不忍闻。这时,来往错行的骡马,不论负何重载,莫不应和老马,且行且鸣,哀切惨戚,一如老马。凡过40余乘,无一例外。

吴宓叙述得详尽细致,语态尤其激扬。接着感慨系之:

“余乃于此老马,得知人生之真谛。……此老马少壮之年固曾魁伟孔武,奔驰腾跃,大胜侪辈。四蹄生风,昂首长嘶,主人喜爱,行人赞叹,固马中之雄者也。而曾几何时,老乏困顿,惨惫如此。人生之英雄老迈,美人迟暮,不正是这个样子么?孔子说:‘后生可畏’,接着断言:五十而无为,斯亦不足畏也矣!就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良有以也!……”

他说:从那以后,他时常想到那匹老马的惨状,并引以自励自勉。又说:那次进京,进了清华学校,我总是勤奋攻读,未敢懈怠。以后赴美留学,总是孜孜不倦。归国以还,也未尝优游岁月。其所以如此者,固乃恪遵先圣先贤之遗训,益以诸师、前辈之教导。然而,此老马之刺激与启示,确亦令我念念不忘岳武穆的警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接着他又对众马应和,有所感慨:“……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乃有对他人之困顿无动于衷者。……甚至有对朋友落井下石者。……论其道德水准,竟不及牛马多多矣!……”

我对他的这段评论极表赞同,并加以发挥,详叙了我那牯子的许多事迹,赞其善良;历举我进入大城市所遇到的几个恶劣“高等华人”,对比他们的所作所为,远远不如我那牯牛高尚。

这天的畅谈,尤其是关于牛、马的谈论,大为融洽。年龄的差距一下子消除了。进而神交心许,相见恨晚。

整整十年之后,即1949年的7月,我到北碚夏坝找到吴宓的当晚,我和他散步于嘉陵江畔,闲话往事。说到我俩相识那天,两人都觉暖然如昨。我坦然说了我那天对他印象的起伏发展。

他接上说:这不稀奇。人之相遇相知,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的:或晤言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俯仰一世,取舍万殊。总是由不相知而相知,甚至由印象极为不佳,到不佳,而渐佳,

而甚佳,终至神交心许,成为刎颈之交。……“那天,我对你,岂止茫然而已哉。”

他接着具体明确说了那天对我感情的变化。即一听到我是宋美龄的秘书,他就不悦于心:我怎么能与他作朋友?继而和我见面。觉得此人年轻如此,仪表英俊如此,不问而知,第一夫人之幸臣也。因此,他立即答复:不敢高攀。实即明确拒绝。碍于两位长辈,又观于丈所示我的短文,觉得此人也不是饭桶,就姑且应付。客厅接谈,复知一未留学,二无学术著作,乃心怀轻视——不过乳臭未干之小青年。午餐桌上,见我在尊长面前谈笑洒脱,随意饮啖,举手投足,野性明显。公共汽车站买到黄牛票,乘上黄鱼车,歪门邪道不少。他进一步觉得,此人实在非我同道,不可交也。但到张伯苓家却又见我彬彬有礼,进退有节。跑警报时跳跃孔武,有履险若夷的气概,又觉此人尚有可取之处。及至遇到防空队士兵,居然作威作福如此,“我乃暗下决心,此公绝对不是我的朋友。”所以下车握别之时,便说了:“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此乃明白表态:“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儿,我不能和你作朋友。”谁知第三天你来话别,一见面就告诉我:你决定离开宋美龄。并且意志坚决:辞不准就不辞而别。我立刻感到:你完全理解了我前晚的话,不仅不以为悔,反而视为针砭之忠告,进而从劝如流,今天向我诚恳表态如此。我闻之深为感动。好,好!此乃可造之才,可交之友,所以脱口而出:“真吾弟也!”

及至在刘尊一那里畅谈,说到我的青少年时代,吴宓才理解到:我的“野性”从何而来;又对将来的发展有何益处。我们俩人童年、少年时代的境遇、道路不同,性格各异,互有短长,可取长补短。——这是10年后的后话了。

窥夫子之堂奥

这以后,我们如有相聚,总喜纵论古今,却又常常抬杠,奇怪的是,偏偏在这些争论中,友谊不断深化,卒成莫逆。如今回忆,这些抬杠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吴宓这人极为严肃。既秉孔子古训,席不正不坐,更守西方上流社会的绅士风范,不苟哂笑。我却有些顽皮,好为奇论,抬杠呕他,有意激得他面红耳赤,旁征博引,透彻论证。我也就得以窥夫子之堂奥了。因为他这人极为谦逊,如其正规请教,他就谦辞不谈,或者语焉不详。

但有时则是我们的见解原本迥庭。这多半是文学领域的各持己见。试举两例。

1940年暑假,我们谈宋词,说到李清照。我自来不喜欢她的词作,举凡传诵极广,最受赞誉的易安词,我都鄙而陋之。概括为“无病呻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愁来愁去。”……

吴宓大谬不然,说我浅薄。于是他长篇大论,详论李清照词作的诸般优点,誉为中国古代最优秀之女文学家。他说:仅以词作之风格、技巧言,李易安独创一格,为当时词学界所认可。如优秀之

词豪辛弃疾就非常推崇李清照，曾多次仿易安体创作新词。吴宓当即口诵辛弃疾仿易安体的词作数阕，并详加评说，认为大才如辛稼轩，其仿易安体之作仍不如易安词。

我仍不服，说：辛稼轩的仿易安体都是忧国忧民之作，而李清照诸词，可一言以蔽之：闲居无聊，想男人——“闺中怨耳！”

这话激怒了吴宓：“你读懂了易安词没有？……读懂了？试为我串讲一二阕。”“你我之间，何至于从串讲说起？”

“你姑且为我串讲之！就串讲你最鄙薄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我刚讲完，他便摇头：“肤浅肤浅！我且问你：《诗》三百，思无邪，风、雅、颂，尤其《风》，皆有所为而发。故言‘风，讽也’。那么，清照此词之寓意为何？”

“她有什么高雅寓意？全系白描，简单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说得明明白白，想男人……”

“肤浅！浅薄！我再问你，词中‘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作何解？”

我按白描解了一下。他气了：“荒唐！你又故意呕我吗？要知道，……”

于是他详细申论，此词作于南渡之后，弃家南逃之士大夫备受流离之苦，逃难百姓的颠沛流离就更不能以言语描绘。李清照目击身受，痛切于怀，故作此词以纪之。词中通篇皆寓此意，而“雁过也……”乃其警句。北雁南飞乃秋来之像，睹雁悲秋，乃古来常情。然而李清照说的是彼雁乃旧时相识。何所云？在金人人侵中原之前，这北雁南飞，固常飞过中原上空。彼时中原士庶人等常见到他们。日今，却于流离失所之际，国破家亡之时，再见这些北雁飞而过之。睹此旧时相识，望见它们从沦陷之家乡飞来，睹雁思乡，岂

不倍加伤心？

“妙哉此句，痛哉此句，”吴宓申论说：词人于此蕴有哀怨之长篇潜台词：雁啊，我的旧相识，你可曾认出我们这些流离南逃之士庶人等，原是你往年飞越中原时常见之旧相识？你可曾看到，我们今天的颠沛之苦，感到我们的国破家亡之忧？你从中原来，可否告诉我，我们那沦于侵略者铁蹄之下的锦绣河山，日今被践踏成了什么样子？……

他越说越激动，进而联系抗日战争的现实，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苏杭天堂到江汉平原，半个中国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今日炎黄子孙所受之苦难远远深重于易安时代。此时此刻，读易安此词，就更觉亲切，感触更深了。他说：我每见北雁南飞，就不禁望雁寄语：雁啊，你可见到我那北平、天津，我那清华大学，现在成了什么模样！你可认识，我……，“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痛哉，伤哉！

我也深深为他的激情所感动。待到唏嘘良久之后，他又进而讲到易安此词的艺术造诣，《声声慢》这一词牌的沿流，平仄两体的分别流行等。接着谈到易安此词使用仄体之深意。并指出：易安此词不仅用仄韵体，而且全押入声韵；宋词几大家不仅论词牌平仄，且分四声的妙处；举引周美成（邦彦）、姜白石（姜夔）等人的作品，论证分四声与宫、商、角、徵、羽、变徵、变羽与黄钟、大吕等曲、词、乐谱的配合之妙，及其规律。进而论及平水韵的形成及其优缺点。直谈到夜阑更深，才尽兴就寝。

谈论中，我有时插言，有时发问。他乃发现，他对美成、稼轩诸家都颇有所窥，且不固执己见。而我，得以登堂入室，亲聆他的精论卓识，自然对他更为景仰。概而言之，通过争论，大大增进了我们的感情。

1941年暑假,我们谈到《红楼梦》,说到林黛玉,也争得面红耳赤。他问我喜欢《红楼梦》里的哪个女孩子。我说:一个也不喜欢,勉强选一个,就是史湘云;而最讨厌林黛玉。她是个肺结核患者,只有病态美,不足取。而她心眼儿小,好生气,尤其说话伤人,尖酸刻薄。

他与我的意见完全相反。为了说服我,他把他早年留美所作《〈红楼梦〉新谈》的精华完全搬出来,并加上了近20年进一步的研究。

他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说起,运用欧美文学理论,逐一分析《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然后重点评说林黛玉,条列缕析,得出结论:这个人是《红楼梦》的灵魂之所在,悲剧的中心;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千千万万牺牲者的化身,中华女性之最善最美的代表者,且有最最崇高的道德和最最丰富纯真的感情,最可爱,最令人同情。在逐一论证中,他广泛引述了欧美许多文豪名著中的女主人公。

我仍不折服。我读过潘梓年早期著的《文学概论》。潘论述文学理论,动辄引《红楼梦》为例。他也对《石头记》及其中人物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评论。我在这次争论中多次用了潘梓年的著述。这时,潘梓年正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人,他那本《文学概论》早已绝版。但那本书吴宓曾看过,并认为其论泛泛,不足据以质辨欧美文学理论之论断。他觉得我太强词夺理,却又无可奈何。

我且作省悟状:“对,我明白了,你说得对,我同意你的论断。”

他睁大眼睛:“此伪词耳!学术问题,文学理论问题,对世界名著的评论问题,哪能这么儿戏待之!”又说:不抬杠了,我们谁也不勉强谁,各执己见可也,这也要讲民主,重自由。

我由衷地说:“兄长,今天的抬杠很有益处。我不仅从你的旁

征博引中增长了知识,而且感受到你融中西道德于一炉的高尚气质。我更尊敬你了。”

我印象最深的当是1944年8月下旬的一次相聚。那天,我陪吴宓去重庆歌乐山拜访一位学者未遇。天大热,渴乏难当,我们迈进了一家较为宽敞的茶馆。选定了座位,我便扒下上身的夏威夷衬衫和汗背心,往楠竹躺椅上一倒,舒舒展展,等“么四”拿茶来。吴宓是中装,长衫整齐,汗水淋漓,却一个钮扣也不松开。他有点儿生气地指摘我:

“你这算什么?赤膊袒腹于大庭广众之中,贩夫走卒为之尚属不雅,况我辈乎?”

我说:“太热了,暑天无君子!”

“暑天无君子?此话出于何经何传?”

“此乃俗语,俚语!”

“俗语?世俗之话也。身为人师,从俗乎?从礼乎?”

他说得认真,确乎兄长训诫弟弟。我便不再争论,迅速穿上了衣服。

喝了一会儿茶,也歇了一阵凉,我俩便说些闲话。我告诉他,下学期我接了3个学校的聘,分教3门课。他听了勃然大怒:

“这算什么?一人兼3个学校,分教3门课,你是什么大师学者,有这么大的本事?我看,这是胡闹!做教书匠,误人子弟!”

接着,他长篇大论地批评我,切切不可恃才自高,要刻刻激励自己:执教育才,乃最神圣而艰巨之事业,切切不可玩忽轻慢,殆误学子。并以他自己为范例,他自执教以来,总是兢兢业业,只专任一校一职,偶尔在附近学校兼课少许,只教自己最有研究之课程。不论重教该课程多少次,每次都如开新课,认真准备,详写讲稿并反复修改。……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当即表示,接受他的规劝,明天就去退掉两个学校,只在一校教一门课程。

说话间,来了一个年近 30 的高个儿男子,向我乞求“资助”。说他曾受高等教育,新从印度回国,辗转到重庆,投亲不着,访友未遇,周折之际,资斧乏绝,因见我两个是知识分子,乃敢冒昧乞求帮助。

我盘问其详,他却只说是上海济南大学(在上海真茹)毕业后去过英国,学的数学,却好歹不说姓名。吴宓便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对答流畅。

吴宓大为感慨:英语如此,专科学识可知矣!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可叹!

他立即掏出自己钱包,倾其所有,全部给了那人。又叫我:“全力资助之!”

我却没有尽其所有,而是留下了随身所带的约莫三分之一。

那人走了之后,吴宓竟对我大发愤愤之词,说我吝啬,不肯将身上的钱全部送给落难之人,既无恻隐之心,更无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忧。

我说:我必须留下一点钱,以便开茶钱,上饭馆吃饭,以及搭车回寓所。

“那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呐!”

我又解释说:那人自己说,他已打听到有好友在成都,只要到成都找到那朋友,即可找到职业。我们所给的钱,够他到成都的盘缠还有富余。

吴宓仍极为不悻。直到我承认:我没有做对,应该算一算帐,只留下喝茶、吃饭、回寓所的钱,剩下的全部给那落难文人。他才舒颜展眉。

可是,随后,由于马上开学行课,学校临时找教师困难,只有一个学校接受我退聘,我就仍在两校任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前者在四川璧山县城边上,后者在重庆远郊青木关,相去30华里,来回奔走,颇为劳顿。我去信告诉吴宓。这时,他已由西南联大转到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他没有回我的信,只在我的原信尾上批了两行字:

“天降其殃,犹可说也;自作其殃,不可说也。”

就把我的信和信封一并加套寄还给了我。显然,他气得不行,却也很有分寸。所以他把孔子的话稍有改动,并采用《诗·氓》中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老兄长下笔寓意,寄之以“说”,说我好比《氓》里的那个女子,自寻苦恼,“不可说也”。但究与自作自受、活该受罪,有程度的区别。于此可见,老兄长对我未遵其嘱心怀愤愤,却还犹有余地,无意和我割席绝交。

显然,我必须写一封长信,向他恳舒积悃,诚恳表达谨受兄长教导。无奈我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日复一日,没挪出这个时间。紧接着,1945年5月,我所写四幕讽刺剧(话剧)《飞》在重庆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公演,取得轰动效应,引起中统、军统诸先生震怒,要将我得之而甘。诚如后来宋美龄所说,如果我去找她,自可一言而解。奈何我桀傲成性,不愿去求她。三十六计,走为上。加之茅盾极力鼓励,我便应聘为新疆大学教授。仓惶起程,到了迪化(今称乌鲁木齐),来不及告别任何亲友,也就没有给吴宓写信。其后,1946年,我参加了新疆联合省政府,主持了这个省政府的机关报《新疆日报》,并在文教事务方面襄助省政府兼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后称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先生。忙碌万状,加以彼时新疆与内地的邮电极大为不便,前后累计,我有20个月没有给吴宓去信。

1947年5月,内战进入关键时期,全国学运掀起新高潮。北

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昆明等地，几乎一切大学都罢课了。吴宓去南京探亲，恰我也因事去京沪。乃又与吴宓邂逅于座落在南京淮海路的于右任私邸。我惊喜交集，趋前敬礼，伸出双手：

“兄长！”

他瞠目直视，似乎没有听见。我前移一步，再鞠一躬：“雨僧兄长，我是紫葛！”

他徐徐起立，并不伸手把握。“哦，张先生紫葛足下！”

于右任见状，讶问何以这般隔涩。我敬道原委，并深以自责，没有推半点客观。于右任微露笑意：“你委实疏忽，无怪雨僧生气。唔，我劝雨僧，《诗》云：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张紫葛究竟是上而不是女，然则按你那个回批之原意，你俩的友谊，犹可说也。且他心中，从未淡忘你们的友谊。就我记忆所得，这两年，他在和我谈话时，不止三五次提到他的雨僧兄长！”

吴宓也就不再生气了。

最后，我约了吴宓，到我的住处——中央饭店 318 房间，促膝谈心。直到夜 3 点才匆匆道了晚安，各自归寝。次晨，听说学生大游行，极为壮观。吴宓便约我上街看热闹。

出了中央饭店不多远，迎面遇到游行队伍。多路纵队，铺满了马路，浩浩荡荡，望不见尽头。十轮大卡宣传车令我们大为惊讶，那上面有三个角色：高大傲慢、趾高气扬而流气十足的美国兵，屁股后头跟着蒋介石、宋美龄，两人一路一个劲儿向美国大兵作拍马屁、讨好献媚、丑态百出的表演。而卡车后面紧跟一大队化装为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的歌咏队，则千人齐步，戟手指着蒋宋，高唱：

“不要你呀不要你，
你们真是坏东西，

……”

吴宓脸色陡变：“走，回去！”

回到我房间里，我问：“你气什么？”

“我毫不袒护蒋介石、宋美龄，我赞成通过任何方式把老蒋赶下台。但我不赞成那个宣传车。太不文明！违背中华传统道德。漫骂，比王婆骂街还等而下之……。”

他确实真话真说。当我们谈及当前国家状况时，他总是痛切陈词，历数蒋介石政权无能、不民主（他很少使用“独裁”一词，而他说的“不民主”就是独裁之意），贪污成风，“真乃祸国殃民之政府”。“腐败如此，昏庸如此，还能不亡！必亡无疑，惟愿它能早日终结！……”

中国何处去？吴宓认为：只能寄希望于中共。惟愿中共尽快掌权，以结束此兵连祸接、百姓水深火热之局面。

彼时国民党右翼盛行一种说法：国共之争乃中华文化存亡之争。假使中共得胜，则五千年中华文化从此荡然无存。吴宓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种说法纯属无知臆断，毛泽东饱读中国古书，他的文章，无不从中华古籍中来。……故可断言，中共主政，只会使中华文化更加昌明。

次日，我俩都有事要去上海。乃同乘京沪特快去申。我邀他同住国际饭店11楼。这个饭店上流、西化，侍者彬彬有礼，床单、枕巾每日一换。吴宓很为赞赏。但有些做法他非常反感：餐厅无中餐；一切用品概属美国货；浴巾、面巾、香皂诸物每次都用新的。哪怕你一天洗三次澡，每次都奉上原封包装的新品，供你验明启用。吴宓摇头叹息：这等奢侈，我在美国也没见过！我们是越来越殖民地化了。……国家越穷，民越贫，反而世风更趋奢糜！……

继而他联想到清华。说：当他就读于清华学校时，师生都相当

俭朴,三餐之外,还吃零食的人很少。而到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时,学生就较前大大奢侈了。他举例说:那时学生流行用丝绸手巾擦鼻涕、吐痰,每张绸巾只用一下即抛入垃圾兜。清洁工拿去洗盥整理,减价卖到市上,每月即此一项可获外块大洋十数元。时至今日,风气就更坏了。大学生上跳舞场,开舞会,已成常事。女大学生甚多奇装异服,穿高跟鞋,甚至口红胭脂者,不乏其人。……

此后,我们各办各的事,间断相聚。几天后,他就离开京沪,飞回了武汉。临别再三叮嘱我:谢绝官场,专心教书,做点学问,“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5

嘉陵江水清且涟漪

1949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辗转返回迪化(乌鲁木齐),酝酿新疆和平解放。他向我转达了张治中的叮嘱,传达了周恩来的安排,叫我发挥数年来与新疆省警备副总司令兼42军军长赵锡光的私交友谊(赵锡光于1946年任西北行辕南疆宣抚团团团长时,为流言中伤,我时为《新疆日报》负责人,与张治中朝夕见面,乘间为赵辟谣,赵得知,深为感激,由此乃私交颇厚),动员赵锡光起义。(按:当时国民党驻新部队3个军,另两个军负责人是死硬派,不可能指望他们起义。故新疆和平解放的成败决于赵锡光是否起义。)我按屈武的筹划,劝赵锡光弃暗投明,收到预期效果。新疆和平解放已成定局。屈武复告诉我,毛泽东希望动员黄埔系统的一、二湖南将领起义。建议我去宜昌动员时任川鄂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我乃于7月中旬由迪化飞抵重庆,拟赴宜昌。

一到重庆,就听说吴宓已到这儿来了,住在北碚相辉学院。凑巧第三天才有去宜昌的客轮,我便于次日清晨赶往北碚,寻找吴宓。几经周折,在北碚对岸,即隔嘉陵江与北碚街市遥遥相对的夏

坝,找到了他。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内迁的校址。抗战胜利,复旦迁回上海之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发起,筹建了私立相辉学院。它设有文、法诸系。吴宓被安置在操场西侧一栋单笆夹壁平房的尽头一间。房间约有12平方米大小,一门一窗。室内一床一桌两椅,外加一个竹制书架和粗木箱架。

我找到那里时,已过上午10时,为避太阳直射,板门敞开,木板窗扇却虚掩着,室内微暗而闷热,吴宓却仍坐在桌边,翻阅一本英文书籍。汗流浹背,几个麻黑苍蝇在他脑后盘旋。

大概怕热,门扇全敞着。这在吴宓是少有的。我大步迈了进去,朗声而快活地叫:“兄长!”

他惊起,转身看到是我,足足呆了三、四秒钟,才迈前一步,伸出右手,叫:

“紫葛! 呀呀!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看他这房子是单笆墙,与邻室声息相通,又不知道他的邻居是些何许人。这实在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便说:“你这屋子太热了,何不过江到北碚那边临江月台坝,找个茶馆,凉凉快快叙谈叙谈。”

他说:何必过江? 就在这边的东阳镇,就有个临江茶馆,很凉快的。

行不一华里,就到了这家茶馆。近午时分,茶馆人少。临江的吊脚楼八支楠竹躺椅,两张方桌空无一人。我招呼么四,这间房满座24碗茶,我包了。实泡香茶两碗,照24碗算帐,他不得在这间房另外安排别的顾客。吴宓没有表示反对。

江风悠悠,颇为凉快。我简要叙述了自己的情况,急问:“你何故离开武大跑到这儿来受这洋罪呢?”

他叹了一口气：“唉！我算又一次大事糊涂了！……”

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他的至好朋友陈寅恪一家与胡适同乘一架飞机飞离北平，到南京转上海小作停留，便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去了广州。随后，陈序经亲自到武汉来找吴宓，约他去广州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宓说，容他考虑考虑再定，先推荐了几个朋友到那儿任教。1948年末，陈序经再次来武汉相邀。吴宓答允受聘为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但得履行完武汉大学这一年度（1948年8月到1949年7月）的聘约后去广州。谁知，陈序经走后一月之谱，新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杭立武突然来访，说是专为拜访吴宓而亲来武汉，未带来人，只身来到武大找吴宓，只为促膝谈心，叙留美同学之谊。然后恳邀吴宓去台北，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如吴宓愿意“管行政”，则文学院院长、中文系、外文系、西洋文学系、历史系系主任任他挑选。吴宓辞以不习南方水土，只打算留在武汉。杭立武明白说：国际形势稍待将有“重大变化”；“中枢意图”，武汉“也将暂时放弃”，留在武汉“绝非良策”，再三劝吴宓“迟走不如早走”。吴宓咬定不想离开武汉。

杭立武讷讷然告辞。临行握别，他又说了几句：我公不愿离开武汉，恐系托辞。教育部业已获悉，兄台已受聘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将去广州。广州不是南方吗？

吴宓：诚有此约。岭南大学不也在贵部统率之下吗？

杭又说：中枢已有高瞻远瞩之运筹，广州亦将暂时放弃，以待国际之申张大义。据此，中枢厘定有抢运学术泰斗之计划，交兄弟执行之。陈序经、陈寅恪诸公均在抢运之列。而且，此乃非常之措施，党国大义，不论诸位大师个人之意向如何，其最后之步骤，将不得不勉强行之，绝对不能听任诸位夫子“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坐视你们这些国宝落入共方之手。

不等吴宓答复，杭立武便徐徐转身，昂然慢步而去了。

很明显，杭立武是硬话软说：你识相点，快去台北；不识相，我们就挟持绑架。麻烦，这事麻烦！怎么办？吴宓无以为计。

4月25日，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40多岁，略带江浙口音的男子。态度恭谨，语言简单：他奉杭立武部长之命，“特来拜谒”，“通知吴宓教授”，半个月内结束这边的课程，作好旅行准备。他将于五月初旬前来“恭迎”，“陪同”吴宓登机赴台北。一切用费及手续全由他们负责，“吴公不必操心”。

硬是要挟持绑走了。

我绝对不去台湾。吴宓决定逃走。恰好四川大学校长和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都来函敦请他去那里任教。一个念头闪现在他脑中：逃跑到边远地方，躲几天，躲到改天换地，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巴蜀乃边远之地，逃到那里，在四川大学，或者相辉学院，不声不响……

无巧不巧，就在这当儿，相辉学院的院长许逢熙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老学长，我是专程前来迎接你老人家的。时局发展很快，战火马上就要烧到武汉了，我们快走吧！

怎么走呢？吴宓差点儿把杭立武以及那中年男子的事都和盘托出来了。

许说：一切我去办，您不用操半点心。坐飞机，以快为佳。

吴宓迟疑了很久，说：那么，我先去看一看，如何？

许：可以，可以！您如不满意，决不勉强……

吴宓深恐杭立武在他附近安有耳目，决定小心为上。不声不响，只带了简单的衣物，最心爱的书籍，日记，手稿等等。在许逢熙的协助下，漏夜离开武大，过江到汉口，于4月29日乘飞机到了重庆。下飞机后直投北碚，住进了那间小平房。休息了一个星期，便

开始给中文系、外文系各开了一门课：《诗词研究》(中文系)、《世界文学》(外文系)。5月下旬，抗日战争时期认识的四川朋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历史学教授李源澄，偕梁漱溟先生的侄女婿黎涤玄来访。说是梁漱溟派他俩在北碚筹办一个勉仁学院，已招学生若干人，希望吴宓能在那里兼课。

从5月中旬到放暑假，吴宓在相辉学院两系上课各九次，深感学生们基础很差，而且程度高低相差太大，教学很难收到实效。其间，过江去看了看勉仁学院，情况更逊一筹。经再三打听，才知两校均未参加统一招考。名为各自招生，实为来者不拒，虽有个别学生功课很好，毕竟凤毛麟角，而且他们很少来上课。

学校的设备更差，经费短缺，房舍简陋，伙食办得很不好，预交了很高的膳费，原说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很快递减成了一菜一汤，目前只有一盘蔬菜和米饭，填饱肚子算数。勉仁更属筹办初期，学生很少，撑持维艰。

吴宓一口气诉说完这些情况，叹了口气：“进退两难，狼狈如此，皆自取也！”又说：当初，假如我不到重庆，又该怎么办呢？

我说：他杭立武总不能派警察武装持枪绑架，再说，即使要躲，又何必万里入川。就在武大，搬进学生宿舍，叫进步学生保护着，至多溜出武大，在武汉什么地方租间房，闭门读书。我问：你告诉了陈寅恪他们吗？

他说：没有告诉任何人。临行那天收到陈寅恪来信，说他绝不离开广州。

该吃饭了。我叫来么四，问这东阳镇有无像样的饭馆。

么四说：斜对面就是东阳镇第一大餐馆，掌勺大爷是大城头白玫瑰大酒家当过二师傅的，煎得上好的脆皮鱼。馆子里大池子养着鲜鱼，二位可喊他拿鱼来，看中了，再下锅，……就在这里用饭。

这，高桌子，低板凳，又清静，又风凉。

此计大妙。不一会儿，幺四手捏一大尾鲤鱼跑过来，请我们过目，那鱼眨眼摆尾，好像在说：“看，我是活的。”

可是吴宓却嘀咕了这么一句：“唉，干嘛要看了下锅？瞧这鱼，不停地努眼鼓腮，似在求饶，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吃个别的吧！”

我自管和饭馆幺四讨论除脆皮鱼外，还闹点儿什么别的菜。正在这时，进来两个人：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身穿夏布长衫，面团团然；另一个很是清瘦，身穿陈旧的褪色灰布下裤和袖口毛了边的白布短袖衬衣，脚穿草鞋，手提兰布提包。两人一般汗水淋漓，衣服的前胸后背都贴在身上了。一迈进外间，胖子就喘气朗声：

“好，好！在这里不是！我就默到（四川方言：估计）在这里嘛！”

吴宓呀了一声，站起身，胖子大喘着气：“来，来，要不要我介绍：这是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柴有恒院长！……”

原来他就是柴有恒！我早听说过，四川教育界有个苦行僧柴有恒，果然名不虚传。

柴有恒抢前站到吴宓面前，立正站好，恭谨鞠躬：“雨僧老前辈，我们是见过面的，恐怕您忘了。1945年在黄季陆那里一起吃过饭的。……”

“记得的，记得的！”吴宓抢前握手：“法国留学生！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时那胖子才望着我，问吴宓：“这位是……耶，好生面熟哩！”

吴宓：“耶，耶，你忘了？紫葛，这是李源澄兄！”

啊！李源澄，四川有名的历史学教授。4年不见，他益发长胖

了。我起身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忙叫幺四添了几样菜,另叫泡两碗茶来,四人坐下说话。

不一会儿,扯到正题。李源澄说:柴有恒是专程来北碚敦聘吴宓到川教院任教的。

柴有恒赶快立正鞠躬: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乃一洼之水,难驻吴夫子这样的大师。说是聘为教授,实在不敢出口。我今日此事,首先是自己立雪程门,执弟子礼,拜于夫子门下。如蒙收列门墙,就恭迎夫子到敝校避暑,以便弟子朝夕聆教。倘若夫子垂怜莘莘学子乏良师之教导,在夫子精神许可之时,给中文系、外文系,即或历史系诸生开开讲座,开其智慧,长其见识,那就更是敝校诸生之大幸了。

吴宓也站起:“柴院长何得如此多礼?宓实受之有愧!请坐下慢慢商量。”

幺四们搬来了菜饭,我请大家入席,吃了饭再说。

四人一桌,各据一方,倒也宽绰。可是举箸一尝,四个人都皱眉了。肴饌虽多,烹调太差。肉、鸡都有馊味,两大尾金鱼既非脆皮,亦非红烧,但觉辣椒、醋、酱油之味混为怪品,难吃极了。李源澄放下筷子:“算了,算了!过河去吃!那边的馆子再蹩脚也比这名堂强一点。”

柴有恒:“……我去看看。有材料,我来烧,当不至令三位倒胃口的!”说罢,他就匆匆到对面饭馆去了。

这里李源澄对吴宓说:本来柴有恒准备带些礼物来的,是李源澄再三劝阻,说是吴宓最不喜欢这些礼数,送礼物他会生气,反把事情弄僵了。

吴宓:“你做得对。知我者源澄也。”

李源澄:“老柴非常诚恳。我看,你就到川教院去吧!”

吴宓皱了皱眉：“这事你该先同我商量商量，不该突如其来把柴公领到这儿，叫我穷于应付。不答应柴公，有负登门之访；答应呢，又对不起许公逢熙……”李源澄：“什么对不起？他这么待承你！……”

吴宓：“这不怪他，……”

我也插话：你这待遇实在太糟了，单笆墙，木板窗，连洗脸架都没有一个。脸盆放在床底下，洗脸毛巾挂在窗栏钉子上。……

吴宓仍说：“人家私立学校，创立不久，惨淡经营，许公自己也就和我一样，同甘共苦。……”

李源澄：“不管怎样，我是不能再让你这么同甘共苦下去。这才7月，重庆照例8月最热，如不尽快乔迁，你会被烤成板鸭的。”又对我说：“你可进去过？他那房间简直是蒸笼！上了大气的蒸笼，六旬之人如何受得了？”

我说：“可是我这兄长居然还坐在蒸笼里仍在挥汗翻阅书籍，钻研学术，其情其景，令我心酸，不忍卒睹！”

吴宓语态忧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转瞬之间，已近花甲之年。奈何继八年抗战又复同室操戈。播迁连年，不得宁静潜心学术。老之将至，一无所成，岂可更复优游岁月乎？”

我说：“战争即将结束，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兄长要紧的是保重身体。”

李源澄：“对了，现在重要的是保全身体，准备箪食以迎王师。我都决定不再搞勉仁学院，回川教院陪老兄等到天明。……”

接着，他讲了目前通货膨胀的狂浪。千家万户以及私立学校十分困难。银元券又已毛荒，它与银元的折价一日数变。工薪阶层领了薪水片刻不敢停留，赶到去找贩子换成银元。现刻没有哪个主妇不与银元贩子打交道，也没有哪位太太不熟悉银元档次、时

价。私立学校操作稍失灵活,就会入不敷出,无以为继。相辉、勉仁都为此穷于应付,岌岌可危。

吴宓抚掌顿悟:难怪他们的伙食原说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现已逐渐降为但有素菜素汤各一,馒头、花卷已经取消。而米饭也变成了粗劣的糙米,实难下咽。

李源澄:“所以你万万不可再在这儿煎熬。到了川教院,就在我家吃饭,可保你到天明。”

吴宓仍然踌躇:“宓平生最恶为德不卒,尤重一诺千金。弃相辉而去,既属为德不卒,更是言而无信也!”

柴有恒率同两个幺四,捧了菜饭来:一大盘脆皮鱼,一盘素炒青椒,一盘素炒空心菜,一盆鱼片汤,一大瓮米饭。

“各位尝尝,”柴有恒说,“全是我亲手烹制,米饭也是重新焖的。那猪肉、鸡肉全都变味了,只有鱼是活品,所以只烧了这一样荤菜。”

饭和菜肴无不色香味俱佳。脆皮鱼尤其可口,皮脆肉嫩刺酥,吴宓首先称赞:善哉!柴公竟然有此绝技,足见其多才多艺,学识一定渊博!

柴有恒:夫子谬奖。这些实是憋出来的。有恒家资不丰,要借山荆留学法国,那样一个米珠薪贵的世界,我们岂可不自为生存之道?便想了个笨主意:分投名师,我学中菜烹调,她学西餐手艺。到了法国,果然管用,她求雇做娘姨,从不失业。我间或打工炒菜,也能赚些钱。……

李源澄:“你该到女师学院家政系去教烹调学。”

吴宓却说:“善哉!前贤言之不谬,士穷而后工!”随即说到我苦儿困学,打工“吃鬼钱”等事。

柴有恒朝我拱手:“张公竟是这般苦学困学,佩服佩服!如蒙

不弃,我要高攀做个知己……”

我正要答话,外间传来喧闹声。举目一观,6个佩着相辉学院校徽的学生——3男3女,正在和幺四争吵:

幺四:“实在对不起,楼前的座位那几位客人全包了的,没法招待你们。”

男生甲:“怎么包法的?”

幺四:“满座24碗茶,那位先生已经会了帐,——24碗香片茶,全交了钱的!”

男生乙:“老子交48碗香片的钱!你欺老子没钱?老子家里一年收1000多担黄谷,……”

女生甲:“文明点儿,开口脏话,像个大学生吗?”

男生乙:“跟这些人说话,干净个槌子!”转对幺四:“快,给老子们把那躺椅腾6把出来,泡茶。”举步要往里走。男生丙拉着他:“算了,算了!那里面坐着吴宓,他是许逢熙从武汉聘来的,相辉学院王冠上的宝石。”他声音不小,我们都可清楚听到。

男生乙大声嗔呼:“吴宓又哪个?宝石个槌子!再王冠,我当它是个学店,栈房!”

吴宓脸色陡变。

女生乙对男生乙:“你娃还是文明点儿,里面那几位看样子都是老师,听了实在不雅。”

男生乙:“老师又哪个?不过是教书匠个嘛!你我这6个家头,随便哪个,家里跑二排的(四川方言:二等家奴),也比他们有钱。……”

我担心那小伙子说出更不中听的话,忙出去答话:“同学们,喜欢这间凉快,想进来吃茶,请进。空的躺椅、桌子,随你们选。幺四,给这几位同学泡茶。……”

与此同时,男生丙斥男生乙:“你最好收起!收千多担租又哪个?马上共产党来了,共你的产,半担不担,你才……”

女生丙也对男生乙说:“你再这么粗野,我们就坚决不和你耍!”

女生甲却过来对我说:“先生太客气了!谢谢,我们就在这间坐一坐,这里也还凉快。”

我回到饭桌上,吴宓脸色仍很难看,还有盖碗底的一点儿饭也不吃了,放下碗筷:“我们吃完饭就走吧!”李源澄却对他说:“你认识一个叫刘尊一的女士吗?”

吴宓问:刘邦的刘?尊师重道的尊?六王毕四海一的一?英国留学生?四川江安人?

他问一句,李源澄应一句是。柴有恒接上说:她很尊崇吴夫子,同我一道来拜访的。无奈天大热,她晕车厉害,到了北碚,很是委顿,我们便叫她在那边休息,待傍晚天凉些了再过来。

吴宓说:既然如此,我们过去看她吧!紫葛也和她友谊很深的。哪有叫妇女远道跋涉拜访绅士的呢?

柴有恒放下碗筷:“那么,你们三位稍坐一会儿,待我去买把伞来。这阵太阳正毒,别把吴夫子晒坏了!”

吴宓拉住他:“用不着!我哪能就娇稚不禁风雨到那等程度?”

两人争让了一阵,柴有恒放弃了买伞,却仍要出去走一趟。他估计过了江,吴宓今晚回不来,得去关照吴宓宿舍的邻居照看他的寝室。刚才他和李源澄去那儿找吴宓,遇到了吴的两个邻居,都是他很熟的朋友。他去拜托很为恰当。并说:他深知吴宓不会有什么金银财宝,但吴夫子平生爱书如命,随身必有珍本、善本等古籍,不可不注意及之。吴宓说:还是他自己回去一趟。柴有恒却执意“有事弟子服其劳”,将吴宓强按在躺椅上坐下,他便飞奔而去了。

吴宓还要站起身去撵,李源澄一把拉住他:“不必了!撵了去,岂不好像对他不放心?”

吴宓莫奈何,踱到躺椅上坐下喝茶。其实是要隔那几个学生远些。因为学生们在那一间屋里嘈闹得厉害。

男生丙:“未必我说错了?昨晚我在E先生那里听了新华社——共产党的广播,共军已经攻克湖南常德,正向鄂西挺进。我们几个算了,按攻克武汉的速度,最多10个月,就会攻克重庆。不出一年半,你我这些绅粮子弟都得讨口。还熊个啥子?”

女生丙:“讨口?不会的!共产党相信学生,依靠学生。我们可以参加革命!”

男生乙:“你们做梦!共产共妻,要把你们拉去共的!”

女生乙愤气大呼:“滚,你给我们滚!你是个反动派!我们怀疑你是特务,你坏得很!”

男生乙涎脸:“我晓得你是共产党。”

女生乙立刻郑重申明: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正在争取,要做共产党员。你去告密,叫特务来抓我吧!

男生乙:我也郑重申明,我不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准备投靠共产党。“还望你携带携带。”

男生甲:“够了,够了,各位,静坐喝茶吧!”靠到楠竹躺椅背上,仰面高唱重庆学生反饥饿大游行时的自编歌曲,却把歌词略有改变。

“物价一天天高啊,/菜就一天天少!/功课那么重,/营养那么差,/你看我们学生娃儿怎么得了咧怎么得了!/呜——耶——!”

他在这歌后面加上了自编的几句:

“天气那么热,/太阳那么大!/心里那么烦,/只有过江去跳舞!……”

女生乙大声干涉：“喂！什么意思？把革命歌曲肆意添改，……”

男生甲：“小人知罪！”改啦啦词：“蒋介石，/王羞羞(四川方言：蹩脚、窝囊之意)！/看到看到就要垮！/垮，垮，垮！”

他唬地坐直身子，伸双臂挥舞，俨然不久前全市学生大游行时指挥吼叫这个啦啦词的神气。男生丙对女生们说：“你们也唱个歌吧，歌儿可以消夏避暑的！”

女生乙：“我赞成。来，我们一起唱。听我起音，——‘你是灯塔……’”

6人一齐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

这时，吴宓小声说：“他们也唱这支歌了！”

李源澄说：“早就唱了，前年大游行时在大街上公开唱啦！”

吴宓：“正是前年，”指我，“我和他在南京大马路上看大游行，学生们就是这么唱的！——人心所向如此！大势所趋复何疑哉！”

柴有恒回来了。吴宓立刻站起来：“快，我们过江。楼下就是渡口，”

我们四个人坐上了一支渡船。艄公在后舱把着舵，篙手在前面提着篙，却是不开船，一个劲儿吼叫：“过河咧！——两块银元券一人咧，马上就开咧！”

吴宓急了：“喂，船老板，你要装几个人才开？”

艄公：“微少不得也要装十一、二个人嘛！”

吴宓说：我们有四个人了，再加六个人的船钱，你马上开，如何？

说话间，岸上奔下两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跳上了船。吴宓对

艄公说：我付足你 10 个，不就 12 个了吗？

艄公说只要他付足 24 块钱的银元券，“立马开船”。吴宓正要付钱，却见柴有恒已抢先付了。这时，岸上飞奔下来那 6 个大学生。男生甲高叫：“慢点慢点，我们要过河！”

篙工拢住船，让这 6 人上了船。吴宓很为不快，问艄公：“老板，我付足了你 12 个人的船钱，你怎么再搭人呢？”

艄公不答话，篙工却指点我们：“你们四位先生请拢一拢，坐一条船板儿。让出这条来给这几位同学。”

我和柴有恒忙移坐在吴宓和李源澄左右。四个男女学生立即坐在了我们让出的船板上。吴宓仍扭问艄公：“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我付了 12 个人的钱，还挤得这么紧！”

艄公：“老先生，他们是大学堂的，不搭他们，他们要打我的！”

女生乙：“耶，船工师傅，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们什么时候打了你们呢？”转对吴宓：“吴先生，你何必嫌弃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学生嘛！”

吴宓只淡淡地答了一句：“哦！你们都是相辉的！”

船开了。照例先往上划，再往对岸放。男生乙朗声高吟：“坎坎伐单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沁起连起，/……不猗不腊，/胡檐尔庭有悬孤兮！”

女生乙重重拍了他一巴掌：“你这饭桶！自己说念了多少白字！”

“耶，耶，”那个满不在乎，“照《诗词研究》教授板书教的念的么！”

女生乙：“《诗词研究》教授就坐在这里。你问问他，他是这么板书的么？”

男生乙：“呀，呀，你把我的疮疤戳得太痛了！痛煞我也！有何

面目复为人乎！罢，罢，不活了！见龙王去！”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嘉陵江。渡船被蹬得大幅度摇晃，我忙扶住吴宓，吴宓却大叫：“快救人，快救人！船老板，快，你们快救那学生！快，快！我出3块银元！……快，快，快！5块，我出5块！”

艄公用力把住舵，骂前面的船工：“快划呀！你龟儿子展劲，展劲点儿，没吃饭的么！”

吴宓站起急叫：“艄公，救人！救那学生！我出5块银元！”

女生甲朝吴宓：“老人家，莫急！他涮坛子的（四川方言：儿戏，开玩笑之意）。和他认真做啥子？”

“什么意思？”吴宓问我。我告诉他，看来那男生乙精于游泳，泅过江去了。

男生甲却若无其事，望江水而吟哦：“划过嘉陵江兮，/江水浑且浊兮。/不国不共，/我们怎么办兮！”

女生甲肘他一下：“少出丑啦！《诗词研究》教授就坐在那边。”

那个答：“他有什么了不起？写黑板一笔一画，像捉虫一般。”（吴宓一切谨严，板书一笔不苟，且有一定的排列方位。）

吴宓气得哆嗦。那边女生乙对男生甲说：“不国不共正好投奔革命！这阵洪水季节，江水当然浑浊。到冬天，江水自然清的！”

男生甲：“那么，嘉陵江水清且涟漪！”

吴宓睁大眼睛盯住5位大学生，头上直沁汗珠子。

渡船在北碚码头靠岸了。船刚泊定，就从囤船那边跳过来一个人，高叫：“哈罗！诸位小姐、先生们，坐船辛苦了么？”他正是男生乙。身上的西式短裤汗衫都已晒干。

男生丙骂了一声：“你会出洋相！”

吴宓似乎异常疲乏，举步迟缓。我和李源澄一左一右费力地搀扶他，好不容易才登完了码头石梯，来到了河街。李源澄指指茶楼

说：“这是北碚最老的茶馆。北碚还是么店子的时候就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儿歇一歇？”

吴宓喘着气点了点头。上了茶楼，柴有恒叫我们歇息吃茶，他去叫刘尊一，“老夫子都过江来了，还不该叫她动动步？”

吴宓伸伸展展躺在楠竹躺椅上并足叉手，闭目屏息，似在丢盹儿。李源澄抽出旱烟吃烟。我凭栏闲眺，夏坝历历在目。江水奔腾，大大小小的木船，或漂流急漾而下，或橹桨挣摇，艰难上行。10年前，我曾在这儿见过冬天的嘉陵江。那个季节，嘉陵江水确实清且涟漪。

柴有恒回来了。走在他前面的是两个人：刘尊一和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柴在路上遇见他，告知吴宓在这儿，他便一块儿来了。

刘尊一大不似当年少妇风采，很是长胖了，戴上了近视眼镜。白绸短袖汗衫，盖到脚顶的黑绸裙，步履缓慢，十足的教授风度。热情稳重却一如当年。

待刘尊一和吴宓、我寒暄一阵，吴宓便叫住许逢熙，说：“十分抱歉！请容许我离开你这儿。你赴武汉邀请我所花的往返旅费，我如数赔偿！”

许逢熙张口结舌，半晌才问：“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们？……我明白，我们太寒伧，十分简慢您！”

吴宓：“不是，绝对不是为这个。我多少懂得中华传统道德并身体力行之。前贤教诲：与朋友交，要能同甘共苦，要言而有信，一诺千金。何况君子固穷！”

许逢熙尴尬地望望柴有恒：“唔，大概，要到柴院长那儿，到省立教育学院去！”

“我打算到川教院走一趟，要回拜柴院长和刘先生。至于是不

是在川教院任教还不一定。总之，我决定离开相辉。今天就离开。”

“那您到底为什么？是我礼数有亏？”

吴宓迟疑了好一阵，说：许公别想到一边去了。实对你说吧！相辉学生的素质太低了。不只是知识基础，更要紧的是纨绔子弟太多，特别不尊师重道。我实在不能忍受。“圣人曰：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乐也。我今适得其反，乃一大苦事！然而，我得申明，绝对不是说，相辉学生中没有可造之才，没有德才并茂之士。只是纨绔子弟太多。唉，岂止纨绔子弟而已哉！”

许逢熙颓然不语，好久，才期期艾艾地说：“夫子说得对。传道授业，艰苦无怨而诲人不倦。惟有弟子顽劣，朽木不可雕，最难容忍。逢熙谨守先贤之训，不敢勉强夫子矣！”

6

教师的职业感情

那时还没有现今从沙坪坝直达北碚的公路。磁器口到北碚坐汽车要绕沙坪坝、小龙坎、歌乐山、金刚坡、青木关、歇马场，转一大圈才达北碚。遥远费时，又值大热天气，刘尊一又晕车，因此，大家决定，乘合川——重庆的小火轮南下。这条航线，每日合川、重庆各有一船对开。大水季节，下水船行甚快，合川下行的火轮，刚过8点就到了北碚。我们一行五人，上了船，柴有恒取出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介绍信，找到船长，请求照顾房舱票。这小火轮本来有3间舱房。卢子英是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的弟弟。小火轮的合、渝航线正是卢作孚开办的，船长如何不买卢子英的帐？当下说，客舱已有客人，欢迎我们在他的船长室休息。柴有恒却仍坚持补了舱位客票。小小船长室，五人起坐，绰绰有余。我们一路随兴闲谈。我们把昨日吃饭、过江之间所遇相辉六学生的情况讲给刘尊一听，言之甚为愤慨。可刘尊一听了却哈哈大笑：

“却有一桩，可喜可贺。那三个公爷三位小姐的政治倾向完全一样：认为蒋介石一定要垮，欢迎进攻宜昌的大军快点到四川。……”

吴宓：“这点你说对了。也算是他们先获我心。嗟夫，我已行将 60 了。希望尽快河清海宴，得享太平盛世，我们也好做点学问！……”

约上午 11 点，我们到了位于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没有满院走动。柴有恒把我们领到第二教室楼的二楼上，到东西南北几面房里凭窗一眺，全部校园就了然了。其中临溪一间约宽 16 平米的房间空无一人。地板、墙壁一尘不染，两孔大窗光线、空气都极佳。凉风悠悠，迎面拂来。我说：“快哉此风，南风之曛兮，可以解我忧。”

吴宓笑了：“然则，此乃庶民之雌风也！”

柴有恒趋前躬身：“如果夫子不嫌狭窄，就暂时在此下榻。那边就是源澄兄的宿舍，这里算是源澄兄的客房吧！”

李源澄对吴宓说：你算是我的客人，在我那儿吃饭，在这儿休息，既方便，又自由。暑假完了，你不愿教书，就在这儿继续将养。要教书，川大，重大，川教院，由你选。

到柴有恒家里吃罢午饭，吴宓休息了一会儿。下午 3 点许，刘尊一郑重邀请吴宓和我到她家去吃晚饭。柴有恒无论如何不让走，说现在最热，别热坏了老夫子。挨到 4 点多钟，才让我们三个步行去刘尊一家。

刘尊一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就在重庆大学校外。可是：她家里却有一个客人坐候已久。刘尊一介绍，他是川军将领夏仲实。三个男人互道姓名之后，刘尊一便请我和吴宓客厅吃茶，他和夏仲实到书房说话去了。吴宓捂在我耳边说：“看样子，他们有重要事，我们走吧！”

我点了点头，迈到书房门前说：“刘大姐，想必你和夏公有紧要事。我们两个且到重大去看看朋友。”

刘尊一十分不安：“唉，太不凑巧，夏公确实有点事情，城里有个朋友等我们去办一点事情。你们就在这里耍，我急去急回……”

我叫她不要客气，今天就算了。等我从宜昌回来后，再和吴宓一起来好好耍两天。吴宓也再三说：不能以闲游误正事，来日方长。说罢，就告辞走了。解放后才得知，刘尊一早已参加民革，夏仲实则是民革重庆市委的负责人。

出了刘尊一家，我问吴宓，是不是送他回川教院。吴宓说：到了重大大门，何不进去一游？

那时，我们对重庆大学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大操场，叫作“团结广场”。重庆历次学运，全市大、中学生大集合，开大会，然后大游行，都是以团结广场为集合点及大会会场。吴宓叫先一观此广场。我则感到离渝四载，景物依旧。这4年，重大并未添建新的房舍。我们穿过广场，就近参观重庆大学两大建筑之一的理学院大楼。吴宓对这圆顶建筑很感兴趣，认为在军阀混战时期，四川执政者能够筹建重庆大学并营造这样规模的大楼，是霸道不能离开王道的一大证明，是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力量的体现。

时在暑假，又是下午闷热之际，自广场至大楼，寂无行人。圆顶大楼大门半掩，楼里仍很寂静，几间教室里都有小伙子在纳凉酣睡。出了后门，吴宓仰望大楼圆顶，出神久之，说：

“这里多么安静恬适啊！而江汉平原，秦岭北边的广阔土地却正是炮火连天。这当然不似隋朝统一中国时的‘门前韩擒虎，楼上张丽华’，而是人们在恬静中期待着炮火的洗礼。这巴蜀古国啊，能不能像新疆那样和和乎平地改天换地呢？”

我领他来到傍嘉陵江那条长长的马路。所谓“傍嘉陵江”，只是它的方位在嘉陵江这一面，其实它距离嘉陵江水边至少有数百公尺。据说，重庆大学建校之初，这儿是斜趋嘉陵江的一溜荒坡。

建设者便在斜坡临近顶端的地方画了一条线——砌了一条石堡坎,将坎里填平,使与理学院大楼的基脚水平。堡坎蜿蜒,自工学院前直到中渡口附近,坎的外壁高度自两三公尺至十来公尺不等。间有石砌梯级通行坎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重大的学生们,抗战时期内迁这里的中央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的莘莘学子,每于课余,朝霞晚霞辉映之下,男女双双对对,漫步于这条路上,远望嘉陵江,近睇坎下林木,好事者便称这条马路为“鸳鸯路”。我向吴宓讲述了这条路的简史。他笑称典雅。

我们徐行在鸳鸯路上,朝工学院石砌大楼走去。走不多远,望见坎外十多步处有一凉亭,背衬嘉陵江远景,颇有画意。吴宓赞道:

“诚如欧阳修所说‘有亭翼然’!走,我们到那儿去欣赏欣赏。”

可是,当我们跨出鸳鸯路迈上通凉亭的石梯时,看见亭子里已有两位小姐,都只20多岁。一穿绸花旗袍,一穿大翻领绸衫和三角裙,同样光赤着腿脚,背靠亭柱,对坐在弧形护栏里的亭板上。两双高跟凉皮鞋露在板前地下。她们在看书,亭中的石桌上,放着两个书包,一小堆糖果。穿的,用的,全是港式或舶来品。显然,这是两个大学生,名门闺秀。

吴宓顿住脚:“不行,亭子里有人。”

穿旗袍的小姐发现了我们,也听见了吴宓的话。她合拢书回答了:“啊,两位先生!请吧,我们只有两个人。亭子里宽得很呢!请,请!”

我走向那里,说:“谢谢!你们是重大同学?”

“是的。先生是远客?……哪所大学的?”

我答复了我的姓名和学校,没有说吴宓。她却告诉我们她姓杨,那位小姐姓刘。

吴宓跟在我后面,两人进了凉亭。他问:“重庆这么热,怎么暑假留校的同学还这么多?”

旗袍小姐答:“今年情况特别,一是旅费太贵,车、船、飞机一律要银元;一是旅行很不安全,比如,重庆到岳池这么近,也成问题。过北碚100里的华莹山,就有共军游击队。”

我的视线落在她拿着的那本书的封页上,原来是张恨水的《落霞孤鹜》。而这当儿,穿裙子的小姐仍专注看书,旁若无人。我问旗袍小姐:“她看的什么书?这么有兴趣?”

“其实没多大意思。”她抓过那小姐的书递给我:“你看嘛!”

书名《文坛妙趣》,《南京晚报》编辑部编辑出版。出版时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内容是教育、文化各界名流的逸事趣闻。翻开目录的头一面就有曹禺与吴宓的大名。我翻开说曹禺的那篇。那里说了曹禺的两则“趣闻”:

曹禺在《日出》里写了被人拐卖为妓的女子“小东西”,很觉发挥不够,立志要写一篇专门为“小东西”一类女子申冤诉苦的新作。为此,他再度权作“嫖客”,去某妓院“白相”。谁知机会不巧,恰有警官来查,将他挡住,带往警察局。曹禺没奈何,亮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并且说了为何而来。警官大笑,吩咐老鸨好好招待。……

曹禺名士风度,不修边幅,尤不喜欢收拾、铺陈物品。因而房子零乱,耗子纷纷光临。某日曹禺在位于北碚夏坝之复旦大学讲课,正讲到精彩之处,却有一支小耗子从他所穿的长袍衣领里轻轻爬出,溜到他肩头,伸头摇尾,状甚舒展,引得学生哄堂大笑,曹禺还不知何故,云云。

这后一则还配了一幅漫画,画得很是传神。

我急忙翻到写吴宓的那篇。有三则:

一则说:大学者吴宓教授极为尊重妇女,以保护天下妇女为己

任。每与女弟子上街，必手执文明棍走在女生外侧，为女生护卫。倘有车辆冲来，他就举起手杖，喝斥车辆停止。待女生抢上人行道后，他才放下手杖。

一则：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时，昆明有一商人开了一家餐馆，取名“潇湘馆”。吴宓得知，大怒。来到那家餐馆，质问老板：汝何得以林黛玉所居之芳地命名，亵渎林黛玉？当即挥动手杖，将餐馆砸得一塌糊涂。

一则：吴宓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授时，一日，雇一人力车进城，半路上，车夫困乏倒地，涕泪交流。问其原因，乃是车夫鸦片瘾发了。吴宓大动怜恤之心，当即将车夫扶上车座，问车夫何处有鸦片烟馆？车夫含糊其辞，说了地方。吴宓马上抓起黄包车把，把车夫拉到了烟馆，并给他付了鸦片烟费，才拭汗而去。

第一则附了一张吴宓的半身照。第三则插有漫画，吴宓身穿西服，脚蹬皮鞋，拉着黄包车，全力奔跑，情状异常有趣。

我不禁大笑，将书递给吴宓：“你看看，实在是妙趣。”

吴宓看了，毫无表情，只微笑了一下。

刘小姐：“先生，笑什么？觉得有趣吗？”

我告诉两位小姐：这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玩意儿，是无聊书商骗钱的把戏。抗战时期，重庆确实有个南京晚报。胜利后搬走了。可是，这家报社编辑部从来不编辑出版书籍。那时，纸张极缺，出书多用很薄很薄的土纸。而此书白报纸印刷，显系近两年所印。至于它的内容，仅就我看的这两篇而论，全是胡乱捏造。我先驳了关于曹禺的两则，然后说：

“至于吴宓先生，你们看，他就在这里。这就是吴宓教授。”

两小姐大惊。便问吴宓：“书上说的是事实吧？”

吴宓：“你们先对对照片，我是不是吴宓。”

两位小姐对照书上的像片,看了看吴宓,大喜过望,奔了过去。

“呀,真的是吴宓教授!我们能在这儿巧遇,好幸运呀!”

“您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认识您呀!”

“请,请到我们宿舍里,那儿还有许多您的崇拜者哩!”一个去收拾石桌上的书包等物,一个扶住吴宓要走。

吴宓:“且慢,先得弄清这书上的胡说八道。”

两位小姐:“呀,这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不实在,也并无恶意。”“您看,把您写得多么好啊!保护女同学,不容许褻渎林黛玉,我们都举双手赞成的。”“您西装革履拉黄包车,同情车夫,多圣洁的心灵,多叫人崇拜的学者啊!”

吴宓:“不管怎样,这都是捏造。我的确尊重妇女,但是从来不曾和女学生一块逛街。还举起手杖,挡住车辆,我有万夫不当之勇么?……”

我插话说:你们也不想想,一个教授,哪有权力干涉餐馆老板取什么招牌?更哪敢舞动手杖砸人家的饭馆?

两小姐笑了,说:我们怎么这么懵,竟没想到这一层?我们的吴宓教授绝对不会这么粗鲁。我们完全明白了,这书全是胡编,可爱而愚蠢的胡编。又说:“不管怎样,务请吴教授移步到那边,让那几位同学认识您!他们是您的最最虔诚的崇拜者。”

两小姐一左一右,挽定吴宓,来到石砌工学院大楼门前,朝上面咋唿几响,便听得几个男音嘈杂,随即风快奔下来三个小伙子。杨小姐叫他们:

“快快立正,敬礼,九十度鞠躬。上帝降福,我们请到了吴宓教授!……”

刘小姐:“这位就是国学大师、红学专家吴宓教授!”

三男生深深鞠躬:“吴教授,弟子有幸,有幸!”“敬请吴教授楼

上稍憩!”

刘小姐向吴宓介绍,这三个是中文系三年级的小陈,外文系三年级的小王,和两小姐同班的数学系一年级的的小徐。

众学生不由分说,簇拥着吴宓进了石楼大门,登上了二楼。小陈且走且向我请教尊姓大名,说:“啊,张教授……是远客。”

来到一间本是教室的大房间,里面有铺陈华贵的单人床,两张条桌,一张方桌,几把藤椅。原来电大当局把暑假留校的男生一律集中到了石砌大楼,叫小陈代行房屋管理员的职务。

石砌大楼果然名不虚传,里面无风自凉,暑气全无。杨小姐告诉吴宓,小陈是某要员的大少爷,是暑假留校同学的“会长”。学校总务处委托他代管石砌大楼,因此同学们又戏称他为“总务长”。说话间,小陈又叫来中文系一年级的小何和殷小姐。王生出房片刻回来,却已西装笔挺,领带端整,举止斯文地挨坐在吴宓身旁,和他英语攀谈。说他们中文系、外文系的教授中各有一个吴宓的弟子,两教授在课堂上以及和诸生交谈时,都盛辞赞扬吴宓教授。又称:同学中很多人崇拜吴宓,主要是:仰慕吴教授学识极为渊博,复尊崇吴老师道德高尚,尤其与四川已故才子吴芳吉义高千古之友谊,令人感动;芳吉先生生前,吴老师为其排难解困,死后又长期接济其遗孤。

杨、刘、殷三位小姐不时汉语插话,说女同学尤其感佩吴教授尊重女权之道德情操。她们议论:当前中国仍属封建之至,男权中心,轻视妇女,不尊重女权之事随处可见。

她们的插话很为得体,并不紊乱王生与吴宓的英语交谈,足见她们都能听懂两位男性的英语对话。吴宓了解了这一点,就一律以英语回答,聊天进行得相当和谐。

我正暗自纳闷,还有三个男生哪里去了?却闻步履杂沓,三人

领了四个围腰上印有“五芳斋”字样的堂倌，担了一桌酒席进来。两男生奔到走廊那头，抬来一张大圆桌，众人七手八脚，瞬间酒席便罗列整齐了。吴宓大愕：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接受。”站起来叫我：“我们马上走。”

小陈端立鞠躬：“我们亲自受业于您的弟子，是您嫡亲的再传门生。今日有幸，得以亲聆太夫子教诲，恰逢晚餐之时，岂可苦太夫子枵腹以论道乎？”

杨、刘两小姐一左一右，按吴宓坐下，说：“天下的教授教天下的大学生。两位教授把我们当及门弟子才进来坐一坐，该吃饭的时候吃点便饭，您客气个什么？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粗茶淡饭，聊以充饥而已。您再拒绝，我们就无地自容了。”

诸生众口纷纭，一致恳表敬意，万望太夫子不要拒绝。杨、刘两小姐又把住吴宓的肩臂，按他坐着。脱身不能，他便不作声了。

这里小陈却招呼中、外文两系的同学，面对夫子并排肃立，说：“尊师重道，乃我中华之优良传统也。今日得遇太夫子，三生之幸，岂可不行礼如仪？我们几个，谨行大礼，叩见太夫子！同学们，拜——”

吴宓忙叫：“不可，不可！”急于站起，却叫杨、刘两小姐牢牢按住，站立不得。

这里男女四人一齐下跪，小何在一旁赞礼：

“拜——！起——！再拜——”

吴宓无可奈何，焦急地说：“你们简直恶作剧了！好了好了，请起请起。”

这几个礼毕，小陈过来按住吴宓，杨等三个数学系学生转到前面，并排站定，杨说：

“我们三个隔了专业，不敢妄称再传门生。就行常礼拜见夫子吧！”

小王代小何一旁赞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大家入席。小陈从餐馆食盒里掏出一瓶美国葡萄酒，举瓶在手，来给太夫子斟酒。吴宓跳起来：“不能喝酒，不行，绝对不行！……”

小陈双手捧着酒瓶：“太夫子，孔圣人有时也喝点酒的呀！”

殷小姐：“喝点葡萄酒嘛，有什么？”

吴宓：“那是在什么场合？岂有师生聚饮者乎？”

小陈尴尬地收起酒瓶：“好，好，谨遵太夫子教诲。”

吴宓没有边吃饭边说话的习惯。今日与诸生初识聚餐，态度更为严肃。见他这样，学生们不敢嘈杂了，大家默默进食。不多时间就吃罢饭了。堂倌收走了餐具，学生们换上香茗，围着吴宓坐下，请求太夫子不吝教诲。争先恐后，提出了许多问题：

《茶花女》的评价。

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何在？

莎士比亚著名喜剧与著名悲剧何者最佳？

对《水浒》的评价。

怎样评定李白的人生观。

鲁迅的代表作到底该是《阿Q正传》还是《狂人日记》？

拜伦与杜甫谁的造诣高？

……

吴宓一一作了答复。大半简捷扼要，征引不多。但拒谈《红楼梦》。当学生们第四次提到《红楼梦》时，他才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再谈吧！

现仅就记忆准确的,记下几个片断:

1、不太推崇《茶花女》,认为它最多只能比得上王实甫的《西厢记》。

他认为:《水浒》在刻画人物,揭露彼时社会、政治各种丑恶方面都有独到之妙。语言尤为脍炙人口。但有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有不少场景、剧情有重复之处。他说:我曾经想过,假如这部著作的素材拿到鲁迅手里,也许会浓缩成精美的短篇。

莎士比亚的最大功绩就是净化、美化了英语,使英语大大提高了,规范化了。

悲剧、喜剧各有特点。概而言之:创作成功的喜剧难,创作成功的悲剧更难。喜剧的感染力往往流于浮泛,如浅水涟漪,一漾而过。悲剧常如高空布雷,重云翻滚无穷。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与著名悲剧也应作如是观。喜剧中的《威尼斯商人》较弱,其剧情有不近情理之处。此剧借贷双方约定:欠债人到期还不起债,就让债主在他身上割一磅肉,这太不合理,也可以说,绝不可能。悲剧中,他最赞赏《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它的悲剧植根于两个家族的世代仇恨。这个问题——家族、部族、民族间的仇恨,有其广阔的历史背景。人类有史以来,直到现在,许许多多流血悲剧,甚至伏尸百万的悲剧,都是这种仇恨造成的。……

吴宓说:从反封建、从鞭笞历代黑暗政治来看,可以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代表作。但是,论作品的魅力深,概括生活之高度精练,论写作技巧之火炼纯青,鲁迅之代表作当推《阿Q正传》。像《阿Q正传》那样,将许许多多乃至整个民族(社会成员除了极个别英雄俊杰之外)或多或少存在的性格弱点、心理缺点统统集中到一个小小的人物身上,加以恰到好处的嘲笑、讽刺、挞伐,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很为少见。我曾经向一位外国朋友说笑话:如果把

《阿Q正传》的题材拿给托尔斯泰,他可能写成上、中、下三卷一大部;拿给巴尔扎克,他可能写成五部人间喜剧:阿Q、小D、吴妈、赵太爷一家与假洋鬼子。(学生们大笑)

2、为学之道,必广博始能渊深。故:不论古文、唐诗、宋词,都不可只读选本。要读《礼记》全文而不可仅限于《大学》、《中庸》两章;要读春秋三传或唐宋八大家的全集,不能仅限于《古文观止》;要读全唐诗、全宋词,不能限于《唐诗三百首》、《花间集》、《绝妙好词》……

为学首在发挥大脑的记忆功能。背诵,滚瓜烂熟背诵如流才能算作确切掌握了。所以我一贯主张:学而思之,学而时习之,学而倒背如流之。学古文要背,学外国语要背,学习中外诗、词、歌、赋要背,凡拟认真研究之好作品、论文、杂文、小品、戏剧、小说,都应背,达到背诵如流之程度。不能背诵,即没有印刻脑际的知识,何得算作你的知识?我自己的经验,许多朋友的经验,都说明这一点,学外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背诵。……

已经夜10点了,我惦记着明天清早进城上船去宜昌,便再次催吴宓回去。并对学生们说:我们和李源澄约好的,晚上一定回去,不能叫李先生着急。

杨、刘两小姐都认识李源澄,是她俩父亲的朋友。7个学生簇拥着吴宓,直把我们送到了川教院。李源澄还在乘凉,学生们又在这儿和吴宓拉了几句才走。

大热天,少不得洗了澡再坐在院子里凉快凉快。我向李源澄简述了我们今下午的情况。李问吴宓:

“你何以前天对那6个学生那么呕气,今天却又这么热情呢?”

“前天那些后生,特别是那个男生,太不成材,真正是朽木不可雕也。而今天这些学生是这么尊师重道,热心求知。我能不教诲

勤勤？——总之，是出于做教师的职业感情。……学校不同，学生之素质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李：“这很简单：前天那些子弟，皆土老肥之后，土纨绔也。而今天这些娃儿，均资本家或书生之后，家庭习染不同，家教大有区别……”

李说，据他听来，今天这些学生提的问题其实浅显，吴宓的回答也没有深入发挥。

吴宓则说：这些都是大学本科的在校生，其中有几个还是学理科的，能提多深的问题？至于我的答复，当然要结合他们的知识水准，这叫做因材施教。况且散坐闲谈，又不能板书，就不便过于旁征博引了。

7

花好月圆在眼前

次日,我乘轮船东下,几经周折,在巴东县衙内见到宋希濂。他对我的劝说大为不满,以客气的语言把我臭骂了一顿。幸经他的兵站(补给)司令罗文山及总务处长王秉文大力营救,我才免遭杀身之祸。迁延至8月底才逃回重庆。此时,重庆、新疆之间已不通航。我只有滞留重庆,随后担任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

当吴宓知道我受命动员宋希濂之时,非常赞成。他说:我希望国民党还盘踞的各省各地,都像你劝说赵锡光一样,叫他们幡然改图,化干戈为玉帛,整个大陆早点儿进入新天地,生灵不再涂炭,实在是功德无量。

到我那天清早动身搭船时,他又郑重叮咛:“此去务必小心。须知:此乃与虎谋皮,非同小可。这些武夫是翻脸不认人的。……”

我回到重庆,将动员失败的情况向吴宓简单说了一下。他很表失望,却又说:也好,总算幸免于难。

就在我上船的那天,吴宓在李源澄的帮助之下,自己购置了几样简单家具,住进了二教室楼二层的那间李源澄的客房。本来柴

有恒让川教院总务处长给他配置家具,但他婉言悬辞了。说他尚未接受川教院的聘请,就不能享受川教院教授的待遇。

住定的第二天,重大那7位学生郑重来谒,恳请吴夫子给他们暑期补习,愿意敬备丰厚的束修金。吴宓说:

“鉴于你们向学之忱,可以给你们讲点什么,共消长夏。若要送礼送钱,就请快点回去。”

耐不过诸生百般相求,吴宓答应:隔日一次趁清早凉快,讲两个小时。先讲红学,然后介绍一些西洋文学知识。结果每次都讲到11点甚至12点。总共讲了17次。谈《红楼梦》9次,西洋文学8次。

这期间,柴有恒屡次敦促,吴宓终于接受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聘约,担任了这个学院的外语系教授。重大中文系负责人又来邀请,并请刘尊一从旁敦劝,吴宓答应兼任重大中文系教授,每周去授课一次。

可是那7个学生却先后离开了重庆大学。根据他们家庭的安排,王生、杨、刘两小姐均去了美国就读,其余各生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香港。7个学生曾轮番来缠吴宓,劝他到美国、香港、或者台湾。杨小姐并出示了她父亲的亲笔信,具道他对吴宓的仰慕之至诚。如果女儿能请动吴教授大驾同去美国,他愿不惜重金,保证吴公旅行之一切方便,并可在美国提供良好之物质条件,供吴教授作学术研究之需。如其吴公要携家眷,则一切费用概由他支付。凡此,纯属仰慕吴公道德文章,且为弘扬中华文化,绝无任何交换条件云云。

吴宓坚决拒绝了诸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怂恿。多次说:“我如其愿意到美国,早就应聘担任了哈佛大学的教授。”

其后,吴宓明白表示,他对这种劝说很是反感。并且宣布:鉴

于诸生准备离开大陆,各须准备行装,即日起停止补课。

他们先先后后来辞行,吴宓都态度冷淡,甚至不伸出右手给他们把握。为什么这样?吴宓对我说:“他们要出去作白华呐!这种不爱祖国的青年!我太失望了!”

1949年的10月3日,离中秋只有3天了。刘尊一来看我。说是那回邀请我和吴宓到她家,碰巧夏仲实找她,她分身无术,只有让我们走了。两个月来,为此歉咎于怀,很是不安。中秋即到,她已和吴宓约好,那天到她那儿聚会聚会,现在特来邀我。并说,她想索性请几位陪客,热闹热闹。问我:吴宓在重庆还有哪些好朋友?最好是她和我都认识的。我告诉她:据我所知,他现刻在重庆的朋友不多。重大有熊正伦(留美同学),黄永亮(英国留学生,1944年和吴宓相识),还有城里的康心之、康心如昆仲,他们是吴宓留美前的朋友。再就是现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刘志弘,他们是陕西老乡,不过吴宓和他并无深交。还有许逢熙,可他在北碚,太远了。刘沉吟了好一阵,说:康心之、康心如两位是四川金融界名人,她和他们也认识。估计他们这一天应酬必多。把他们邀到沙坪坝来有困难。刘志弘是个军政要员,目标太大,且又并非吴宓的好友,再说也和我们这些教书的人没有共同语言。就请熊正伦、黄永亮、李源澄。这样,都是好朋友,欢聚一堂,却也不大闹嘈。又和我商量,中秋乃团圆之节日,是不是一并邀请朋友们的太太?

我说:李源澄太太一贯不参与朋友聚会,我们在他家耍,她也难得出来一起说话。熊正伦太太是学理科的教授,一向沉默,把她请来反而叫她拘束。惟有黄永亮和他太太形影不离,女儿君展更是他的掌上明珠,就邀他一家三口得了。有黄君展一个小客人,就再邀上李源澄的女儿小志勉。

中秋这天上午10点,客人来齐了。君展、志勉两个小客人自然和刘尊一的女儿们一起玩耍,我们6个老朋友就在刘尊一书房里品茗聚谈。那个时节,——1949年秋季开学之后,各校教师——知识分子们相聚聊天,有个不约而同的程序:说点生活琐事,就骂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抱怨物价直线上涨,日子过得艰难,社会乱成一团,“天哪,你塌了吧!”然后,很快转入当前的战局。

我们当然也是这样。说战争进展,黄永亮首先详述了昨天新华社的广播。他是每天准时不误收听新华社的新闻广播的。

黄永亮眉飞色舞,全面重述新闻内容,并且全用新华社新闻稿的词汇:“我二野大军”,“我一野XX兵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从西北战况直说到鄂西、湘西一线的战况。最后他加上了一句:“真正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熊正伦也是逐日收听中共新华社新闻的。他作了补充。说他统计了,自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取南京、上海,花了多少时间,克武汉,花了若干时日;攻克胡宗南盘踞经营了十几年的西北重镇西安用了多少时日。他得出结论:再有五个月,重庆必可解放。

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座的几个人,只有吴宓和我没有逐日收听新华社广播。这是因为,我两个都是不久前远道轻装来到重庆,没有带得收音机。现购吗?彼时物价腾涨,生活维艰,腾不出这笔“巨”款。

当熊正伦作出五个月解放重庆的估计后,刘尊一说:太保守了。她认为,当不出四个月。李源澄手持长约一尺有许的旱烟管,一摇一晃:“你还是保守了。我看,北越秦岭,南溯乌江,两路夹攻,拿下重庆,当不过百日之功。”我附和李源澄的说法。众人问吴宓的看法。

吴宓微笑一下：我们谁也不是军事专家，没有指挥过军队作战。要具体论定解放军攻克重庆的时间，恐怕缺乏把握。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根据历朝历代摧毁旧政权改天换地的战争历史。根据这次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战争情况，概略地类推一下，那么，你们的估计大体不差。我想，总之，越快越好。快上加快，才能尽早结束这物价闪电上涨，生活维艰的糟糕日子。迅雷不及掩耳，才能使国民党盘踞川康云贵的部队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减少生灵涂炭。兵贵神速！望中共大军神速！……

黄永亮说：这丝毫不成问题。指挥大军扫荡西南的，南有世界著名的红色军事家刘伯承，北有虎将贺龙。……

于是大家漫谈重庆解放后各人的打算。吴宓却对刘尊一说：“你大概要转入政界！”

刘尊一：“不，不！我并不想离开教育界。”

人们都表示无意改变教师职业。只有熊正伦说：他很想回家乡——江西。不过，江西没有历史悠久的大学，他的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黄永亮说：他自来随遇而安，就窝在重大也可以。刘尊一说：“我们两个大半会窝在四川。老张是要回新疆的。”转问吴宓有何打算。

“我有三个愿望，”吴宓说，“第一，到岭南大学，那儿老朋友多。第二，到武大。那里老朋友也不少。第三，回清华，旧地重游。”

大家问他，何以把清华列为第三志愿？怎么一点儿也不考虑四川？难道我们这些不是你的朋友？

吴宓只回答说：四川只有两个地方有大学：重庆、成都。重庆太热，成都太闭塞。而且四川各校图书资料都远比岭南、武大、清华少，不利于学术研究。

这时，熊正伦说：“哦，有一个万分重要的消息，请容许我郑重

补充——，六天前，即本月一日，神州大地的新的国家政权已经诞生。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满地红缀上五颗金星，一颗大的，四颗小的。……”

黄永亮：“其意义，大的象征……”他接上详述了新华社关于开国大典的报道。

吴宓：“好，很好！是时候了。可惜我今天才知道。那么，花好月圆就在眼前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同胞之花好月圆就在眼前了！是不是我们该起立致敬，表示一点庆贺之忱？”他缓缓站了起来。

大家都跟着站起来。黄永亮带头，大家一齐鼓起了掌。

刘尊一说：“等一下，吃饭时，再郑重其事，为我们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大家一致赞成。入席之后，刘尊一便拿起酒瓶，给每一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了酒。李源澄忙说：“慢点！雨僧老大哥是不吃酒的。他的规矩，以醋代酒。来，给他换上醋。”伸手去端吴宓面前的酒杯。

吴宓却抢先捂住了自己的酒杯：“不，这回得真的吃酒。”他端起酒杯站了起来。这样，他就成了第一个起立举杯的人了。他说：“这不是随随便便应景，为什么干杯？这是，我们这些与中共素无关系的学人——不过，紫葛例外，——在此诚诚恳恳，向新政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拥护，表示欢迎！”

黄永亮：“应该说：表示效忠！”

吴宓却说：效忠？既然拥护、欢迎，就不会反对效忠。但是，大学之道，意诚而后身修。意诚者，诚实无欺也。必也言之诚实，能够做得到的才说。效忠也者，当为之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宓自量不能做到这一点。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抑且天下即将底定，亦勿

待我辈冲锋陷阵以效忠矣。自然,我只是说的我自己。我们各人情况不一,就我已知,紫葛当可说效忠二字,因为他不久前才去巴东游说宋希濂,几乎丧了命,斯可谓也曾效忠于新政权矣!……

刘尊一:“老大哥言之有理,祝酒词各说各的吧。请,举杯……”

“为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为……干杯!”

吴宓分作好几口,喝干了他那杯酒。脸上立刻泛出红晕。大家坐下后,刘尊一说:“我以为,雨僧老大哥已有实际行动,表示效忠人民政权。这就是,从武汉到四川而不去香港、台湾!”

她并不知道杭立武到武汉动员吴宓去台之事。只是根据当时的现象,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逃离大陆,就认定为吴宓飞重庆就是不愿去台湾的具体表现。

吴宓却说:“你溢美了。”第一,到四川来的人很多,目的动机各不一样。有的是效忠国民党,到四川来负隅顽抗的。有的则是忌怕共产党,躲到四川来的。第二,我飞到四川这个行动,只能证明,我飞四川而不飞香港、台湾,乃是拒绝跟随国民党,即坚决抛弃那个政权。又说:至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欢迎它。只是今天,此刻,这也只还是口头上的。“我这人,历来主张言行一致,既然今天说了,将来就一定做到。不论新政权待我如何,我绝对始终如一,拥护它,欢迎它!……”

黄永亮再斟上酒:“吴夫子,谨受名教,小弟表示敬意,请干此杯!”

吴宓:“这回我只能以醋代酒了!”

肴饌很丰盛,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不知谁说到和尚做的素席:不用鸡、鸭、鱼、鹅、猪、牛、羊肉,却能烹调出肘子、烧白、蹄筋、全

鸭、全鸡等等。我对和尚一向没有好感,便说:有什么好,外形各种各样,其实千篇一律,菜油烹黄豆制品。黄永亮夫妇赞同我的评价,他还接下去长篇大论说了好些寺庙的和尚招待游客吃素席,然后索要布施捐助,“形同高价酒席,简直是敲诈。”继而大谈佛教唯心、迷信,“实乃精神麻醉。……我自来一不信神,二不信教,我不喜欢任何宗教。……见了和尚就厌烦。……”

李源澄:“你可不能反对宗教。中共宣布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

熊正伦:“这是中共英明,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信仰佛教的、伊斯兰教的人很不少,不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就一古脑儿排斥了这些宗教的广大信徒,那在政治上该有多大的损失?”

吴宓说:关于宗教,是个大问题。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对佛教作了初步研究。为了这个目的,我还略学了一点梵文。佛教,有它的特点。一切宗教,能够有那么多人信仰,就不可随便抹煞它!……你们两位颇不赞赏和尚,这有欠公允。任何一类人群,总有智、愚、贤、不肖。连我辈教授之中,也难免不肖之徒,况和尚乎?诚如二位所言,确有不少和尚,六根不净,酒色财气之好尚存;或租赁庙产,行佃东之苛,或放高利之贷,盘剥平民,或交通官府,包揽词讼;甚或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但也不可忽略,自佛教传人我国,出过不少学行并优之高僧。即以唐释神清而论,其学识之渊博,不能不令我辈叹服,凡先秦诸子百家之说,无不有精湛之研究。吾人如欲研究老、庄,即不可不读神清书。……

黄永亮思维活跃,却谈话最易发岔,他问吴宓:“我也并不反对和尚,只是我很不理解,如按佛教规矩,四大皆空,严格清规戒律,自然一不能讨老婆,二不能生育子女,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做和尚又为了什么呢?真正能修来生富贵?……耶,你老大哥既然对

佛经如此研究了一番,那么请问,你愿意当和尚吗?……”

我满以为吴宓要生气,谁知他反而微露笑意:我只不过作为学术研究,涉猎了一下佛经。至于当和尚,我哪有那种秉赋?我戒不了荤腥口味之好,免不了七情之牵连,上眷父母,下恋妻小。出家?不那么简单!

李源澄:我以为,要出家就得远离闹市尘凡,潜修于高山古刹。常年守在深山古刹,实在不是个味儿。哪个受得了?

熊正伦:说得是,这名山古寺,如四川峨嵋山的报国寺之类,偶然去游览一下,倒觉新鲜,实有心旷神怡之感。如要常年住在那里,实在不能想象。……

刘尊一:好了,好了!反正我们这儿谁也不想当和尚。我看,雨僧大哥也是苏东坡一样,研究研究佛经,与和尚交交朋友,归根结底还是学者,唐宋八大家之佼佼者也!

我说:对的,苏东坡并未遁入空门,所以也过中秋节,大醉之余还记得弟弟苏辙,作《水调歌头》以赠子由。

吴宓郑重其事说:苏轼这阕《水调歌头》最好之警句应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参透了人生之常,悟尽了人生之路。抵得上《波多密多心经》;有此足矣,何必一定要当和尚,潜身于深山大刹呢?

下午四时许,宾主尽欢而散。我和吴宓、李源澄携同志勉,来到沙磁马路上,正要和他们分手搭车回家,李源澄却抢先提出,要我和吴宓一起在他家晚饭后赏月。吴宓说:沙坪坝街市那头有个旧书店,他想去逛逛,叫李源澄和志勉先回去。

我也喜欢逛旧书店。每月付给旧书店的钱,不少于我月薪的10%。因为常逛,我就比较懂得旧书店老板的特点。他们只极个别别人知识比较丰富,熟悉各类古籍版本、贵贱。大多数人则是文化

水平不高,古籍知识更为贫乏,常常把珍贵古籍当作一般旧书,阳春白雪混于下里巴人之中,拉杂混陈,听任顾客翻拣。他在一旁观察,品鉴你择取某书,注意你触及某书、选取某书时的表情以揣摩该书品味,量情喊价,一旦他拿准你的心理状态,就会漫天要价,绝不短少。有一位朋友深通此道,教我以应付书贾之妙法:迈入旧书店,要状似闲步,顺便一览,看到好书切忌露出欣喜表情。要先从邻书翻起,懒懒散散,看到你的目的物,漫不经心瞟它一眼,再翻拣其它。如此这般,每翻出一本好书,就配以别书几本,一并撂给书店老板,问他各卖几个钱。让他一一开价后,还价讲好,再一本本拨过去,挪过来,似是勉强选购你要的那一本。我虽无这么好的耐心,却也多少参酌其法。

吴宓却全无此种经验。他大踏步迈进店里,店主的眼睛陡地一亮,视线盯牢这位老先生。

吴宓将手杖置于墙角,双手操作,快速翻拣旧书,从中挑出他感到兴趣的书册,嘴里不停地朗声嘀咕:

“哦,这是本好书!……唔,好像是书院本(指明书院刻本),……呀,呀!周邦彦的词笺!嗯,好本子!……我说呢,这儿就是有好书嘛!……”

不到半小时,他就选好了5本,其中有一“本”实为一函内装四册,周邦彦的词笺。店老板开价:每本银元1元、2元、3元不等,总价14元。这时银元与银元券的比价已上涨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一个高级教授的月薪,只能换得8—9个银元。

我不能听任吴宓叫这店主敲竹杠,便凑过去交涉:“你也太见外了,这么漫天要价!”

不等店主答话,吴宓却说:“不能这么说。这些书能值这么多银元的。”

我把书翻拣了一道,说:“很一般的,喊价太高。”

店主:“先生莫濶坛子!这位教授说得很对,我见外个啥子?你二位是重大的老师嘛!这位是老教授,……”

吴宓嫌他罗嗦,对我说:“算了,给他买了。光这本美成词笺,就值得5枚银元……”

我还力图挽回:“这有什么稀奇?扫叶山房翻印的,也能算得上好版本?总共4元,他不卖就拉倒!”

吴宓:“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你不信?城里米亭子(重庆的旧书市)多多的有。赶明日我去给你买,照买这么几本,管保不超过3枚银元。”

店主急了,朝我词态怨尤:“先生何必嘛!又不是你自己买!我们做小生意,低三下四讨口饭吃!难得有个识货的买主,你先生三番五次戳个啥子嘛!”

我正要回答,吴宓却开口了:“别罗嗦了,我买了就是,给我包扎一下。”掏出钱包打开一看,却只有5枚银元。“耶,怎么的?哦,源澄帮我换的银元还没给我。”转对我:“先把你身上的银元掏出来!”

全月的月薪才换成这9枚呢!我将钱包一古脑儿交给了他。他倒出计数,还好,两人所带,够付这笔钱的。

买了书,快步朝磁器口走去。默默通过市街,又到了刘尊一门前马路上。我正想提醒他:买书上了当。他却先开了口,边走边埋怨:

“你这人!在新疆这几年,很是沾染了市井吝啬习气。和这些小商小贩拈斤论两,唠叨不休!”

我辩解:“这些书商很狡猾的,和市井之徒打交道讲什么君子风范呢?”

“这是什么话？和市井之徒打交道就首先自己市井化？为了省下几枚银元，就和市井之徒比赛铜臭气吗？”

我不敢再说什么，算是默认了他的理论。不料到了李源澄那儿，老李也捅出这么一句：“这么几本书就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薪水？你们两个迂夫子，上当了，双料上当！”

吴宓很没好气：“什么？你又没涉足官场，也这样市井气？！”

李源澄情知吴宓有气。便装着旱烟管堵塞，用力吹吸几下，一似不曾听得吴宓说了什么，随又出门磕烟锅，折腾了好一阵，才吸着亮火的旱烟管回来，仿佛忘了刚才在说什么，另自起了个话头：

“我以为今天刘尊一会请柴有恒的，谁知却是没有。不知是个什么道理。”

吴宓：“他是院长，她请了他有奉承之嫌。”

李源澄又说：她也没想到邀请赖以庄？随又自作答复：大概是赖以庄年纪大些，怕他走不了这么远。还有，请老赖就得请中文系的另一位老夫子钟先生，那更是年老体弱。

这么闲扯了几句，就开饭了。我们3个人的酒杯里饮料各异：李源澄是白干，我是广柑酒，吴宓的是醋。

吴宓的习惯，以醋当酒，举杯如仪，却并不喝。直到进餐已毕，才将这一酒杯醋缓缓一气吸完。

酒过三巡，李源澄说：“今天请你们二位鉴赏四川名产——阆中馒头。这名堂很有趣：从阆中买得蒸好的馒头，携带千里，搁上个把星期，冬天甚至一个月，——只要不遇大热天气，要吃的时候回锅一蒸，依然鲜美，其味甚妙。”

我们两个都大感兴趣，李源澄便叫女儿志勉快端馒头来。

志勉托来一盘馒头，圆嫩光洁，状如塞上之酥，而香气喷溢，胜过新麦嫩浆烙饼。夹之以箸，松泡一似上等发糕。试一品尝，竟有

不可言传之美味。吴宓赞赏不已，问：从阆中带来多久了？李源澄答：快半个月了。并介绍说：此物只能在阆中蒸好，设或从阆中买了面粉，到别的什么地方蒸出来，都不能达到这种妙处。

吴宓：“这是自然。譬如山东东阿驴胶，必须东阿之驴皮以东阿之并水熬制。……”正说到这儿，忽然瞥见了志勉一身新衣，当然全是棉布制品。

“喂，”吴宓指点志勉，对李源澄说，“我好久想和老兄一谈此事。你何必给女儿总是这么打扮？穿男孩子衣服，剪男孩子头发，我初见她个把月，还以为她是个男孩哩！耶，名字也是男孩儿的，志——勉！完全是个男孩名字。”

李源澄漫不经心：“她喜欢这么着，我也就让她这么了！”

吴宓：“耶，耶！言不由衷！我最不赞成这样！紫葛，你说说，到底是孩子喜欢这么着，还是老子喜欢这么着？”

我说：“小事，小事！比芝麻还小的小事！管他谁喜欢这么着！”

吴宓以箸指我：“你呀你！最近两年市侩之气大增。这么点小事，知心朋友之间，也和稀泥！”转对李源澄，“一言以蔽之，你重男轻女。生了女儿，心有不甘，就把她女扮男装，聊以自遣。才生了一个女儿就这么着，我连生了三个女儿却不曾这么想过。相比之下则何如？”

李源澄：“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大概你想起你的三位千金了。可见，每逢佳节倍思亲。诚然诚然！”

吴宓猛地一愣，冷了好一阵，才缓缓地曼声说：“诚然，是啊，诚然！每逢佳节，何况是中秋节乎？！……”

他一气说了十多分钟。我们当然不便打岔，只能默默地倾听。他能坦诚如此地向我们倾诉自己的骨肉感情，我们自然感谢他的

信任,更窥见了他的感情之真挚,之深湛。我们看到了这位饱学大师的圣洁心灵。可是,我们实在想不到怎样安慰他!李源澄又使出了“王顾左右而言它”的绝招儿,待吴宓的表白略一停顿,便叫志勉:

“把馒头端去,换一盘热的来。小心,别打了盘子!”

饭后,李源澄主张听听中共的广播。3人散坐静听,收音机声音宏亮:

“……我军奋勇追击,消灭了中央蒋匪军XX万、地方蒋匪军XX万!……”

听完新华社的新闻广播,李源澄关了收音机说:“黄永亮几个的估计硬是太保守了。这阵仗,打到重庆何须4、5个月?神州大地的花好月圆硬是就在眼前了。”

开始赏月。除了大小月饼,还有上等合川桃片、江津米花糖。这天月亮很好,皎洁光灿,莹莹于碧空银河之中。她越到中天越显得晶莹欲翔。我们三个不约而同,靠在躺椅上,仰望婵娟。

李源澄用旱烟管戳了我一下,又朝吴宓指了一指。我才注意到,吴宓在轻轻吟哦。听不清吟的什么,只能从音态判明是在吟哦诗句。李源澄朝我摇了摇手,我俩便静悄悄盯住吴宓,倾听他的曼声吟哦。

吴宓的吟哦更加深情婉曼,音度也略有提高,我倾耳凝神,听清了!他在反复吟诵杜甫的五言律诗《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一遍又一遍，越念越慢。终于，他滚下了眼泪，吟声也就停止了。李源澄朝我打了个手势，我领会他的意思，赶快转脸朝天，仰望明月。自然，李源澄也是这般动作。又过了好一阵，我听到了李源澄朗声吟咏：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好！”李源澄坐起身，极其轻微地摇晃着脑袋，“苏东坡不愧是一代才子。这首词，真可谓千古绝唱。而其妙中之妙，就在这几句。尤其是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说得太好了！”

8

夜半尿遁

吴宓在川教院隐居下来了。“隐居”重在隐。从1949年4月到11月,他很少和朋友通讯。很多老朋友都不知吴宓到哪儿去了。

无奈,吴宓弟子遍天下,关心他的人太多了。1949年11月23日,吴宓的好友,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所派遣的黄先生和教育部的刘先生,联袂来川教院找到了吴宓,专责敦请他去台湾。

“谢谢!我不服南方水土,不能去台湾……”

黄、刘两位先生再三劝说,吴宓却执意不允。两位使出了绝招:

“清华要迁台,……您是清华的老教授,清华需要您!直言之:您吴雨僧教授者,清华的老前辈,我们的宗师。凡我清华同学,绝不能撂下您!今天,哪怕您恼我们,打我们,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

两人一左一右,似戏似嗔,硬把老夫子携进了汽车,驶进城,住进了重庆宾馆。机票已经买好,五更奔白市驿机场上飞机。

借口天寒保暖,请老夫子里间安卧,两后生外间就寝。夜半人

静，外间鼾声隐约，而吴宓却怎么也不能入睡。真正身不由己？不，我不能听人摆布！吴宓悄悄穿好衣服，屏息鹤步，摸出里间。却仍惊醒了两位后生。吴宓只好诈称要上厕所，两位忙跳下床，扶夫子入厕。吴宓迳直迈上蹲位，声称要解大便。

“好吧！您蹲好，我们去披了衣服来扶您。”黄先生语音哆嗦，同刘先生奔回卧室去取衣服。

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刚刚下完楼梯，已听到两位后生从厕所奔往楼梯了。吴宓急中生智，钻进了楼梯间。

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光明亮。值班侍者在门里靠椅上打盹儿。

黄先生问：“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

侍者迷迷糊糊：“唔，唔！好像！是啊！”

两位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点头磕脑，吴宓徐徐向前，轻轻迈出了大门。马路空空荡荡，朝左直望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不见黄刘二人，想必他们奔进了对门通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很快会回来的，得躲一躲。恰好，左近一个路灯电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伏身迈了进去。刚刚站定，那两位先生就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两头张望了一小会儿，判断老夫子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处奔去。

见他们去远了，吴宓迅速从广告牌后钻了出来，快步跨过马路，溜进了苇家院坝。……

这苇家院坝一带，吴宓从未来过，完全莫知西东。诚恐穿过大街时，为追踪者望见，三十六计藏为上。选了两条小街窄巷，来来回回徐步徘徊。好容易挨到天色微明，街巷有了行人，他问路出城，再崎岖上下，绕千厮门到过街楼，找到一家旅馆。老板见他憔

悴苍老,身著褪色朽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无力再上街奔走。说:

“老板,你莫衣冠相人,那边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心之就是我的朋友。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派个茶房送去,我叫他赏银一元。”

过街楼转拐就是美丰银行。可是康心之此时还在公馆高卧未醒。电话把他吵醒了,是银行的事务员。

“那条子说个什么?”康心之有点不快。

“字迹端正。写的是:请向来人证明:我是先生好友张紫葛之兄。并请赏送信人银元一枚。”

康心之想了想,答复:“给送信的一块钱。派人把这条子送给张紫葛。”

条子上的字,笔笔楷书,我一看就认出了是吴宓写的。立即奔到美丰银行,打听明白字条来处,转身来到旅馆。老板见美丰银行总还理睬,便容吴宓在“堂口”且坐。见到我,他尴尬地笑了笑:

“惭愧!身无半文,居停主人不容……”

我要了一个上等房间,叫茶房上街买来早点,陪他吃喝之后,他才约略说了昨晚的事。

我不禁大笑:“妙!那年我给宋美龄留了个条子,不辞而别,你讪笑我是‘土遁’。这回你可是‘尿遁’了!”

我叫他到我家去住几天再说,他却不敢出旅馆,害怕在街上遇见那两位先生。拿定主意,就在这旅馆里藏他个把星期,再到我家或是回教育学院。我给他留了足够的用费,叮嘱旅馆好好照应。然后到康心之那里说明了情况。康听了也大笑:

“这位老先生!直接到我美丰银行不好?要住旅馆!来个条子,写明吴雨僧,叫我送百把个银元去也就完了嘛!给我打个闷葫芦:张紫葛之兄!叫我怎么也猜不着是他老先生。唔,大概尿遁之

余,体疲头昏,懵了,瓜了!”

康心孚、康心之、康心如昆仲是吴宓的老朋友,早在民国三年,就在上海相识。青年时代的朋友,交情自不一般。和我聊了几句闲话,转觉不能让吴宓住在旅馆里,便起身和我一起去看吴宓。

“快,快!到我那里去住。”康心之不待坐下,便说:“我开了车子来的。出旅馆门就上汽车,……没那么遇缘,会碰到那两位先生。……”

我也极力鼓动:“眼下飞机票万分紧张,他们二位不会牺牲了机票来满街寻你的!再说,即便遇到了,有我两个保镖:就是不去台湾,他们能抢走你?”

最后,我们两个也采黄、刘二先生之法,架起吴宓就走。吴宓扭不过我们,不笑而诙谐说:“瞧,瞧!一日之内,雨僧两次被绑架焉!”

9

痛惜失之交臂

1949年11月,表面看来,国民党还控有西南几省,蒋介石也到了四川,他口头答应四川上绅、官僚的劝进:考虑迁都重庆,以稳住西南。实则紧张搬迁台湾。为使这种口头允诺更具现实性,他把国民政府五院的首领召到重庆来。于是11月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司法院院长居正都被请来了。我确知于右任于11月26日到达了重庆。这时的于右任已在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之下,他实际已经失掉了自由。

1949年11月26日,于右任到达重庆的当日,晚上华灯初上,我驱车迳至川东师范——现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那个地方,一直开到监察院临时衙门。

“于院长现在不见客!”一个穿黑呢制服者再次挡驾。他口音带浙江味,10年来,我在监察院和于老家中都未见过此人。我没理他,直往里走。后面另有一人朝我的汽车玻璃上照电筒。司机火了:“照个槌子,弄花了我的眼睛,碾死你龟儿子!”

“对不起!”那家伙大概看清了挡风玻璃后面的通行证。

“真的,于院长不见客!”黑呢制服站到我面前挡住我。

“有趣！”我冷笑一下，“蒋先生我都看了，于先生却看不得。”

“那！——让我通报！”

我不理他，与他并肩走进了于右任的住房。

这时的重庆，蒋介石及其亲信对四川上层分子特别客气。我算是依靠习之有素的重庆话，来他一个莫测高深，顺利地见到了于右任。

最先闯入我眼帘的，是于右任先生的背影。他正在房里徐步徘徊。

转过身发现是我，呆住了。他那不大显露表情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感情：意外，失望，不满，并夹着愤怒。这是我完全理解的。因为早在南京时，他就叮嘱我，和张治中一起走新的救国大道。他的大女婿屈武由北京返南京再转迪化，在南京与他晤谈时，他也对屈武提到过我。不言而喻，他以为我正在迪化，已参加了两个月前通电宣布的新疆和平解放。现在我竟突然出现在这里，表明我没有听他的话，他自然感到意外、失望。

我不自觉地“啊”了一声，跨上去向他伸出右手。他却不理我，右手拇指在内、四指在外，轻轻揽住长髯下幅，脸上除惊讶、愤怒之外，又加上了一丝厌恶。

这却产生了另一方面的效果：那位和我一起进来的黑呢制服“随员”，解除了对我的戒备。因为于老反应表明：我和于老很熟，但关系并不融洽。——那人一声不吭地退出去了。

我的视线无可奈何地从于老脸上移到写字台上，那里摊着一张16开白纸。我迈到桌边一看，在一张“监察院便笺”上，于老直书了几行字：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这首辛弃疾的《永遇乐·北固亭怀古》下面该是“斜阳

草树……”，于老写到“阳”时，笔上抖落了一大滴墨汁。墨汁未干，“阳”字未全，显然，于老心情极坏，抖落的墨滴似被衣袖抹了“胡子”，叫人分不清它是“阳”是“阴”。我想借机打破尴尬，也是真情流露，讪讪地说：“啊！斜阳好像斜阴了。阴、阳难辨。”

于老转过身，低沉地说：“有何阴阳之可辨？混沌未开，乾坤未奠，气之轻轻者未上浮，气之重浊者未下凝，何来阴阳之辨？”

《幼学珠玑》上的原文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轻，上浮则为天；气之重浊，下凝则为地。”于老将它变了几个字，既指当时时局，也指对我的突然相见莫名其妙。用古文影射，自然是为提防那些“随员”——特务侦探。

我说：“不，混沌正开，乾坤正奠；气之轻轻者正上浮而为明朗之新天；气之重浊者正夹泥裹沙而入南海。阴阳之分，即在眉睫矣。”

“唔——！”他理解此话，并开始谅解我。

我朝他迈了一步，缓缓地说：“小子既说赵锡光率部举义，别经文而赴彝陵，说宋希不成，几遭鼎镬之烹；脱走渝州，滞于逆旅；闻太夫子紫戟遥临，敬候起居！”

“经文”是屈武的号名，“彝陵”是宜昌，“宋希”是宋希濂的简称。我说的是，我已在新疆动员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42军军长赵锡光将军弃暗投明，赵将军接受了我这个文人的劝说，率部起义，新疆已和平解放。随后，屈武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又鼓动我再到湖北去劝说时任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起义。无奈劝说不成，差点儿被杀。

“唔！”又只有一个词。但视线陡地明朗，表明他内心的宽慰。

他徐徐就坐，我跟着坐在他旁边。

“经文如何？”

“推动西域反正，卓有成效。”这是说屈武推动新疆和平解放，颇有功绩。

“为今之计，汝将奈何？”

“海宴河清，指日可待矣！”

“何如？”他的意思是：你说得具体点。

我小声答道：“夜郎已经易手。大地噫气而为风，万窍怒号，前者唱喁，后者唱吁，滚滚而西，不出旬日，渝州必将易帜。”

“夜郎”指的是恩施，“万窍怒号”指万民共怒。我是说，恩施已经解放，目前共产党的军队进得快，国民党的军队逃得更快，滚滚而西，重庆不日解放。

他沉默，我也不再说话。时间在寂静中过去了许久。

“你见到经文，”他缓缓地说，“给我传个口信：好自为之，勿以我为念。”略停一停，又微带诙谐地接上一句，“这也算是‘烦君传语报平安’罗！”

我小声说：“您不能……噢，就是说……摆——脱？”

他迟缓而沉重地摇了摇头，眼睛盯着地板，好像是那地板底下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魔鬼，在狰狞地指挥他，使他无可抗拒地遵命动作，他吃力地摇头。

“好自为之，勿以我为念！”多么深沉哀怨的语言！这九个字里，藏着千言万语，藏着整整一部历史悲剧。

我怜恤地凝视着他，但他根本没看我。这样又过了很久，我迟疑地问：“您对我，还有什么教诲吗？”

“没有了！我要对你说的，从前都说了，在南京的时候又说了又说，再没有了！”

我喉头发硬，什么也说不出。

他偶然转头，发现了我的情绪。“唔！”他平静地说，“我们不是

楚老相逢，何必泣之悲也?!”

我无法控制情绪，也不能说出任何语言。为排解这种困窘，我抬起身，走到写字台前，揭下了那张“便笺”——他写上了两句辛词的便笺。

“你做什么?”他问。

“留下作个纪念。”我一面将便笺折叠好，藏进衣袋。

“我不是给你写过许多条幅吗?这几行太不成体统，不要保存!”但他并没有认真制止我收藏这张“便笺”。

等我坐回原位时，他迟疑了一下，说：

“唔，好吧!我再给你说一句话，算是临别赠言吧：我贫寒力学，不忘民瘼，这两点，你……可以……学。而我尸位素餐，你万万不可为训，不可为训!”

“尸位素餐”!好沉重的语言啊!就这四个字，他对自己的命运、归宿、近20年的历史，作了高度浓缩的概括，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又透露了无可比拟的酸辛和懊恼、惆怅。

由于不敢在他旅途劳顿之余多消耗他的精力，我告辞了。我们都错估了形势，以为他可能会在重庆呆上5、6天。临走时我约好后天来看他。他说很好，因为他明天要去谒见蒋介石。

第二天，于右任在和蒋介石接谈终结时说：我那几个随员太不成话，他们盘诘、刁难、甚至阻挡我的客人。我总还是个监察院长嘛!未必果真失了自由?我的客人能有什么危险人物吗?不过是四川的几个实业家、陕西的几个老乡，再不然就是从前的邻居、诗酒朋友……

蒋介石心想：原来这老头儿窝了这么一肚子气，难怪今天气鼓气胀、拳头擗脑的!这些蠢人，怎么能这样干活?!当下，他压住心头的火，和颜悦色地安慰于右任，表示自己关心不周，非常抱歉。

叫他放心,保证以后决无类似事情发生,他有什么朋友、亲戚,尽管来往。

于右任在国民政府干了20年,也就是与蒋介石合作20年,竟第一次发现,他对蒋介石说的话,生效这么神速。等他回到川东师范时,那几个随员统统换上了新人,态度特恭顺,趋奉特别殷勤。晚饭后来了两个老乡,“左右”立即躬身道“请”。客人一进房,他们奉茶进烟之后,就悄悄走得不见影子了。

于右任很高兴,待这两个老乡走后,他打电话给康心之,叫他通知我去“聊天”。康心之从电话里的语态感到老先生情绪良好,决定同我一起去。因为找我花了些时间,等我们坐至于老身边捧起茶杯时,已经11点了。我有点不安地问:“太夫子,有点晚了,该不会过于劳累您吧?”

于老兴致很好:“唔,‘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复电灯灿烂,不用秉烛,正好作彻夜之谈,何劳累之有?”他原原本本地向我们叙述了他今天的日程及感想。最后说:

“我引以为快者有二:驱逐了那几个齷齪吏,其快一也。四川——重庆还可苟延残喘,其快二也。唔,但有3月之闲,让我得以到故地再寻旧踪,一赏腊梅。如能找到内子及小女等一晤,就更好了。”

康心之不断点头,他接口道:“我只要他能延其残喘1个月也好:让我有时间处理好我的正事。香港一摊子,这里一摊子,必须归拢一下,理顺一下。要不然,怎么得了?真是,实在是来得太快了,太快了!措手不及。时间,时间,现在对我来说,第一是时间,最少要1个月,1个月……”他太急切,以至词句不大连贯。

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微妙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这种希望,所以,接下去再分析形势,都越来越确信,战事在川东僵持2、3个月

是完全可能的。我明知他们的结论并不正确,但不忍心给他们造成心灵上的痛苦,就没有发表反对意见。

随后就愉快地闲聊起来。越扯越高兴,于老忽然问康心之:“今天误了你赌梭哈罗?你近来赌运如何?”

“哪里还有心思赌梭哈?忙我那两摊子呐!再说,我这两年少于赌钱了。”

于是他谈起有次赌博差点儿输了美丰银行。

“都是谁赢了?”于老问。

“他们个个是赢家,赢得多少不等,就只我是输家……”

“他们合起抬你的轿子吧?”我问。

“不,绝对不是。”

“那你怎么办呢?”于老问。

“我能怎么办?我象泄了气的皮球,摊在沙发上,五腑六脏都空了,飘飘荡荡,六神出了窍。”

“后来到底怎么了帐的呢?借钱再赌?搬了本?”我问。

“搬本?谁还同你赌?”康心之说,“是鲜伯良积了个德。就是复兴面粉厂的老板鲜伯良。他站起来说,‘算了吧,这一场赌要赌跛了老康就太缺德了!算了,我们大家抬个手,讲个朋友,这场赌不作数。叫老康请我们吃一台算数。’他又开双手,把大家面前的筹码一顿乱刨,搅乱了。大家勉强地说:‘好吧,算了算了!’我也只有厚着脸接受这个施舍。从此,我既不敢再赌,也不好意思和他们赌了。”

于老也爽朗地笑了:“好,好!这个鲜伯良,不错,有君子之风,得教育之道。你应该奉之为师……”

一语未毕,来了电话。

于老听完电话,忽然情绪猛落,脸色异乎寻常的难看。我两个

也不好问,只是面面相觑地坐着。停了好一阵,还是于老先开口说话,他望着康心之:“我算是领会了你当年输掉美丰银行时的心情了!”

“不打紧,您是没有银行可输的!”我打算说这种轻松话来缓和缓和空气。

“适奉上谕,”于老缓慢、低沉地说,“我明早首途飞港转台。”

死一样的沉寂。

万般无奈,我提议告辞,以便于老休息一下,让高龄之躯有力量承受明日飞机旅行的劳顿。

于老和我握手,紧握不放,并把左手放在我肩上,低沉地说:“好自为之,勿以我为念!”

这本是他叫我带给屈武的话,现在又对我说。我体会,这是对所有留在大陆的人说的。

我冲口而出:“太夫子,您何必去殉葬?”

他定睛看了看我,发出极其低沉苍凉的声音:“事已如此!——《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女(汝)皆(偕)亡’,这与殉葬不同,不是殉葬!”

“那么,我们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几乎是在哭。

他迟疑了一下:“也不尽然。‘天下恶(乌)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有德者一之。如果我中华定于一之日我还健在,岂不又可重逢吗?”

我拉着康心之,快步出门,踏上了汽车。我不能让于老看见我悲痛的表情,我也不愿多看他那强作镇静之下深藏着无限悲愤的眼睛。

汽车开动了,康心之忽然迸出一声长叹:“真是悲剧呀!真正的悲剧!”

我彻夜不眠,强烈要求再看到太夫子一面,决定要在于右任出发之前,赶去给他送行。不料,汽车出了毛病,我只有徒步从小什字跑往川东师范。

天刚蒙蒙亮,我迈进川东师范大门,快步走下斜坡。这时,对门来了一辆小汽车。天色朦胧,又有点儿雾,迎面未能看清车里坐的是谁。等汽车和我擦身而过时,我才瞥见于右任坐在里面。在他左右各有一个身穿黑呢中山服的“保镖”壮汉。汽车没有改变速度,从我的身旁徐徐滑过,我转身伫立,望着它爬完小坡,滑出大门。但当它刚刚驰上马路,转向去白市驿机场的方向时,却“嘎”地停住了。我急忙奔了过去。车门开了,于右任抓住车门旋把,欠身探出头来,表情肃穆,吐词缓慢地对我说:“好自为之,勿以我为念。”顿了一顿,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着重语气说:“记住,学太史公,勿学三闾大夫!”

我热泪夺眶而出,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他轻轻带上车门,朝我挥了挥手。汽车开动了,我呆立着,凝神注视驰去的汽车。汽车渐去渐远。太夫子,永别了!

连同清早送行,我一共三次去于右任那儿,却莫名其妙地一次也没有想到约吴宓同去。送走了于右任,我心情沉重,一步一挨,从罗家湾步行到康心之那儿,直到见了吴宓,倾诉我的离别之情时,也还语无伦次。

“呀!”吴宓说,“你简直没说出个头绪。是怎么回事,给我详细说说。”

我约略说了三次见于右任的情况。我的语言刚落,吴宓便勃然大怒:

“可叹!可笑!尤其可恨!你还好意思来向我诉苦叹气!难道你不知道我和于公是世交?三次见于公而不约我同往,其故安

在？”

我顿然省悟，却是连自己都不明白，是个什么原因。一时呆若木鸡，吐不出半个字眼。

他囔地站起，状似呼天吁地：“怪哉，怪哉！你平时何等敏悟？怎么到了要紧时候这等糊涂？中共即将占有全部大陆，而要跨海以取台湾，当非短期可办。于公业已老迈如此，我也年近花甲，是生离即死别也！天赐这等生离死别之良机，你却不予我以方便，秘而不宣，使我不得与他永诀！哀哉，痛哉！你，你，你！简直残忍，残忍，残……忍！”他声音并不高亢，却是如怨如咒，语态十分痛切。

这会儿我才呐呐地说了几个词：“你骂得是！我，……该打，实在……该打！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懵到了这等程度！”

他对我的话似若罔闻，兀自痛心疾首：

“华阳奔命，有去无归矣！于公于公！今生不得相见矣！两世之交，生离死别，不能一诀，交臂失之，岂不哀哉！”

10

喜迎王师

1949年的11月28日,我已确知:国民党全部撤出了重庆,山城已属真空状况。一般老百姓还不知道。我便从康心之那儿将吴宓接送到了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因为各大学师生组织了护校队,守卫巡逻,比较安全。

吴宓是个知名学者,早为中共地下组织所关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共地下党支部指定了学生专责关心、联系。谁知那天他被人架走了,数日不见,估计是叫弄到台湾去了。今见回了学校,那几个学生便马上来拜访他。吴宓只字未提尿遁之事,只说他进城到朋友家呆了几天。学生告诉他:国民党已经撤离,后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开进这座古城,占领它,解放它了。学校师生正在作各种准备,明天半夜出发,徒步进城,欢迎胜利之师。

“要老师参加吗?”吴宓急问。

“欢迎!欢迎之至!不,不能这么说,这次行动是师生共同发起的……”

“我要参加!一起步行进城迎接王师!”

“好几十里哩!您这年纪,怕走不了这么长的路程吧!”

“我能走！决不落后，深望二三子勿以老迈弃我！”

学生刚走，李源澄就来了。这几个月，吴宓就在李源澄家里搭伙吃饭。吴宓失踪数日，李源澄当然知道。老朋友与学生不同，不能相瞒，吴宓便向李诉说了尿遁之事。

李源澄乐了：“这才是未来《吴雨僧传》中之最佳篇章哩！……我看，你这回，离开武汉西上，可以为你作一长诗。……可以仿古诗名篇《孔雀东南飞》，……喏，我已有了起兴之句：‘凤凰西南飞，千里无徘徊’……”

“不可，不可！”吴宓大幅度摆手，说：“我何人斯？何能比为凤凰？”

“完全可以！而且是‘凤兮凤兮，何德之盛’！我缺文学修养，明天，我请中文系赖以庄兄大笔续成可也！……”

11月30日上午7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江北，过嘉陵江，同由长江破浪西上的登陆艇所运军队汇登重庆朝天门码头。浩浩荡荡的人城式开始了。这支追着望风而逃的国民党军、拼命奔跑得疲惫不堪的胜利之师，迈着雄壮、威武的步伐；不久前还涂着国民党标志的美式装甲车，隆隆前导；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同样美国制造，经蒋介石的将军们转赠的十轮大卡，此时已是装饰一新的大型宣传车，它敞开高音喇叭，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读毛泽东、朱德的布告。庞大的腰鼓队，打虎武松般的装束，豹子头林冲般的雄姿，五彩缤纷的秧歌队，使山城百姓第一次见到大秧歌。疲惫但威武的步兵，如绿色的激流，成12路纵队前进……

夹道欢迎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从过街楼到浮图关，绵延十数里，一望无涯，爆竹、锣鼓、高音喇叭，万众欢腾，震撼山城。爆竹腾起的硝烟给山城罩上了浓雾。

但是，这盛况仍不足以充分抒发大学师生们的欢呼之忧。巨

浪接狂涛,下午2时,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将要举行全市高等学校师生共庆解放大会。大学生、青年助教、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欢呼喜迎王师刚毕,又匆匆赶往沙坪坝。昨夜,人们不用任何交通工具,徒步进城,以见赤忱;现在又开动双脚,匆忙赶路。

此时,我忽见对面人丛中的吴宓,贴耳竖起右臂,高举手杖,朝我这边摇晃。我拨开人丛,穿过马路,挤了过去。

吴宓只说了四个字:“疲惫、饥渴。”

我连忙扶他穿过打铜街,到小什字,进了一家饭馆。喝干了馆子的那壶待客的茶水,吴宓才说:

“疲乏,喧嚣,拥挤,都是我平生所未遇。尤可恨者,当其万分哮喘欢腾之际,有一不肖后生,公然解我衣,劫去我的钱包,公开抢劫,明目张胆!”

我要了几样菜肴,为求快速,叫堂倌先来两笼汤包。宽慰吴宓,不要气恼。“我不恨失大洋20元,恨世风之不古。”吴宓叹息。

包子来了,我举箸劝吴宓且吃包子。吴宓据案进食,绝不举目四顾。正当他小口小口地对付一个包子时,来了一个青年乞丐,不过二十二、三,饥色明显,却仍肌肤充盈,身著瘪三西装。

“你这么年轻力壮,也像有点知识,为何讨口叫化?”我问。

“先生教训得是,实是一时落难,两天没吃没喝了。仰见先生不俗,就行此无脸之事。”

我不再言语,掏出一块银元,正要递给那人,吴宓一抬视线,看清了那汉子,勃然大怒:“就是他,葫芦脸形,抢了我的钱包,抓住他!”

那人急忙转身要跑,我抢前一步抓住他:“给我说清楚,是不是你抢的?你这混蛋,怎么这般可恨?抢了老人家的钱包,还装蒜来讨钱,是何道理?”

那人连连鞠躬：“我一转身，就叫贼把钱包抢走了。饿昏了眼，没认出老先生就是失主。万恳高抬贵手！”

吴宓恨恨骂道：“你乃真正歹徒。身为中华子民，缺中华仪礼；也穿西人礼服，却无半点西方道德。盗亦有道，像你这种人，概无廉耻良知。……人家欢迎解放军，你来白日抢劫，欺侮长者！”

“小人知罪，愿从此洗心革面。”

我说：你既表示洗心革面，我们姑且饶你这遭。目前业已解放，若实无生路，可去投解放军，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是会有前途的。切切不可再鼠窃狗偷。“来，给你这笼包子，拿去吃了……”

那汉子接过包子，倚在楼梯口，两手操作，往嘴里塞包子，几乎没有咀嚼，顷刻之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笼小包。朝这边鞠了一躬，快步下楼去了。

吴宓和我一直注视着那汉子，吴宓既愤怒又惊讶。他下楼后，对我说：“你简直作了东郭先生。”

“他不见得是中山狼。”

“也未见得不是中山狼。”

可我仍说：只要还没百分之百证明他是狼，我总把他当人。他无赖，还不是饿了，没法子。

吴宓只徐徐点了点头。

这天晚上，锣鼓喧天，欢呼雀跃，仍觉未能尽兴。黄永亮便邀约了几个朋友，在他家做通宵之欢，以抒发鼓舞之情。也邀了吴宓和我。

干杯，跳舞，畅谈。回忆各自留学时代受洋人歧视侮辱之愤，畅想今后大展才华。吴宓却从容恬静，说话很少。黄永亮提议合唱两天来学生教唱的新歌《跟随毛泽东前进》。吴宓说他不会唱，大家便叫他打拍子。唱得很欠整齐，却个个精神抖擞，极为带劲

儿：

“……火热的心，/跟随毛泽东前进！/一心跟随毛泽东前进！/……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前进。”

有位太太笑对吴宓：“雨僧老大哥，你的拍子打得不错，只是欠灵活。老是左右、上下，仿佛在划十字，是不是还得加个‘阿门’！”

吴宓却一本正经：“加个‘阿门’也可以的。既然可以山呼‘毛主席万岁’，当然也可以说‘阿门’！”

夜3时许，聚会散了，我随吴宓到他那里过夜。入室坐定，都不想睡觉。我便问：“你似欠高兴？”

他答：“我今天既高兴，又忧虑。”他说：高兴的是，看解放军这么士气高昂，真是百战百胜之师，攻无不克之师。可以相信，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手里，会富强，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忧虑的是，“竟是这样讲究领袖至上”，特大的领袖画像，山呼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他还谈到中外历史上，“乐臣民山呼万岁而颂其功德极天极地喻为太阳者”，以及他的担心。

但他再三说：我不愿意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更不愿意成为白华。“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说话间，已是1949年12月1日的凌晨5点了。吴宓提议睡一睡。临躺下时，他却补充说：说到底，喊毛泽东万岁也没什么，只要能致中国于富强，登斯民于康乐，我也欢迎。“你知道，我对党派、主义，概无兴趣。我以为，什么政体都能造福民众。美国竞选总统，英国君主立宪，不是一样都国富民康吗？”……

11

与人隐私者不祥

1950年的春节将届,我去看吴宓,打算约他来我家过节。不想,作家艾芜正在他那里。原来艾芜到重庆大学任了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特来拜访吴宓,请他继续担任重大中文系的兼职教授。遇见我,艾芜很高兴,谈兴大增,不仅讲了他接办中文系计划,而且讲了不少文艺界的动态:电影《武训传》拍摄经过;西南文联正在筹备,革命作家林辰即将到我们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鲁迅研究》;重庆市文工团、话剧团、歌舞团等等即将正式成立。……末了,邀请我到 he 那里去讲《苏联文学》。

艾芜走后,吴宓问我:艾芜过去教过大学吗?又自己作答:唔,这不是个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左翼作家……。本来,教授应以学识为标准,而不能拘泥文凭、资历。“我主持清华研究院,最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是王国维,可他一没留过学,二没得过博士学位。”……

我问吴宓近来生活怎样。他情绪良好,语言略现诙谐:“想必和你们一样,师生一起停课学习,学猴子变人(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又说:这个第一课很好,摧毁《圣经》的创世纪。“我自来不

相信上帝造伊甸乐园,捏出亚当、夏娃的说法。”……

等我开言邀他去我家过节,他却踌躇了,说了许多理由,婉言谢绝。他说一条我驳一条,最后,他忽然问我:“你说,我这副尊容,还能叫少女爱慕吗?”

我记忆里的吴雨僧,本来不是翩翩佳公子,日今年近花甲,顶秃鬓霜,髭须斑白,清瘦肤黄,很难想象会引起少女的倾慕。

我说:“怪哉此问。你知不知道,爱情千姿百态,有专讲外表的,有根本不考虑仪容的。哪个少女爱上了你?快快据实以闻!”

原来,1949年9月,吴宓到重大中文系第一次授课后,就收到了女生邹兰芳小姐一封长信,具道素昔仰慕吴宓,今有幸亲聆教诲,深感夫子学识渊博,字字玑珠。誓当顶礼门墙,虔领教导,求其登堂入室云云。吴宓心情切怛,置未作复。而后此每授课一次,必得邹生一函,越写越长,渐道家世情志。祖遗田产若干顷,两兄皆国民党少壮将军,手足感情很深。小姐兴趣广泛,尤好文学,特别喜爱楚辞汉赋、中国古典小说。……

“你爱她吗?”我问。

吴宓摆动双手:“不敢,不敢!我年近花甲,而伊刚过20;况且值此鼎革之际,我乃遗老子民,”而伊正属跟随毛泽东前进的“妙龄青年”,“爱情,于我无份。不敢,不能。此不过伊之错觉,——一时虚幻耳!”

但吴宓却说,他已同意和邹兰芳一起吃年夜饭。不过郑重声明,来客是7个高才弟子,五女两男,他们都系一声炮响,革掉了家庭接济,身无分文的少爷、小姐。吴宓出钱,他们一起动手烹调,小酌清谈,听夫子品评中外文学。

接下去,他又谈及:积两个月之经验,师生员工一起学社会发展简史,大搞劳动,搬米运煤,开荒种菜,却免除老先生们,表示照

顾；大批学生调往军政单位，充实干部队伍；军政干部概行供给制，而给教师发工资，月数十个折实单位（注：每折实单位米、面、油、肉各若干，发放时按市价折算货币）；上旬全市戒严，大捉特捉反革命。……凡此，他归结说：实乃“周文王祗祗、庸庸、威威、显民之良好应用。而其举措之颇中窍要，远非文王、周公之可比，更不是蒋中正辈所能望其项背。”又说：看来，毛公确实高秦皇、汉武一筹，此必臻于铁桶江山。告诫我：自古疏不逾亲，庶不逾嫡，你务必谨守前朝遗民之身份，切切不可为曾经动员一军之众起义，以民主进步人士自居。……

此后，我一连两个多月没有去看吴宓。在女子师范学院，我是最年轻的教授，理所当然该同学生一起劳动。搬运、修路、捣塘泥，到农村义务劳动，都应身先士卒。因此我很忙。这期间又在1950年的3月13日和3月31日进行了两次全市性的大逮捕。5月中旬，吴宓来看我了。

他提到大逮捕，说：这才是大张旗鼓，光天化日之下，全市戒严，大捉特捉。军车开到学校，军警荷枪实弹，直入寝室、教室捉拿，当众戴上手铐，押解而去。然后全校集合，公安登台宣告：某某为反革命，某某为国民党特务，予以逮捕。然后师生分组讨论，踊跃发言，历数被捕人等之罪状，表示支持拥护当局逮捕法办之措施。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偷偷摸摸，半夜三更，墙边路角，绑架而去。……

我也认为，共产党要巩固政权，必须彻底肃清反革命，把反对人民政府的敌特分子、反动会道门、封建把头、恶霸等等统统逮捕起来，是完全必要的。

他说：史实历历可考，任何一个朝代奠定之初，总得杀一些人。自不待言，……政治就是这么残酷。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政权，应

正大光明,武力镇压就是武力镇压,公开行之,而不口是心非、暗中杀害,才不失为政府,不失为统治者。……于是,他说:他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快哉此文!”他说,本文词藻有太史公之风格,气势滔滔,淋漓尽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必须一边倒。……”

又说:此文实为定正朔,定国策之诏书。……然而其要害之所在,竟是无定准可循之活套头。普天臣民,类分两种——人民、反动派。人民当家作主,而反动派则为专政之对象。然而到底何为人民,何为反动派?并无确切之标准。“一划之微,祸福迥异”。“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何谓乱说乱动?更是活套。……

最后,吴宓说:我说这些不过是对你重申前论。我认为,凡我文人,只要不是共产党员,就应该自规自戒,诚惶诚恐,切切不可“老臣危素”!(注:危素是降明的元朝旧臣。一日,朱元璋闻殿上履声橐橐,便问:“谁在殿上?”危素亢声答:“老臣危素!”朱元璋:“噢,我以为是文天祥呢!”随即将他撤职罚去守墓。)

1950年6月,西南文教部着手实施调整西南高等学校的第一步措施。其中较大的一项就是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业系科迁至北碚,扩建为西南农学院(后发展为今日之西南农业大学),其余系科并入女子师范学院,在川教院原址(重庆磁器口)建为西南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日之西南师范大学)。并已初步决定:任原川教院教育系教授周西卜为西师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历史系教授郭豫才为教务长。我得知了这些情况,去看望吴宓时告诉了他。

他当即郑重其事叮嘱我:估计当局正在考虑这西南师范学院

之中层负责人。以外语系言,这边(川教院)无可取之才为系主任者。两校之原系主任皆国民党院长所聘用,不论其才、德如何,除非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均将不能续任。你年才30,是两院外语系教授中最年轻者,且有动员国民党一个军之官兵投诚之功,又历来左倾,广有朋友为中共地下党员,现任西南团工委书记康乃尔即与汝有厚谊。谅此种种,可能考虑叫你当系主任。我意,你千万不可承此重担。这不是国民党时代的大学系主任,你不仅是前朝遗民,且乃前朝之旧臣,承担不起的。……

我别他返家。他步行送我,从磁器口(川教院)直到沙坪坝登车(因当时女子师范学院在九龙坡)。在这长距离漫步中,他又谆谆告诫,叫我牢记他的叮嘱。并申论说:11年前“于公及余父子(指于右任、他和他的老太爷仲旗公)”就认定我敏悟强记,必能在学术上大有成就。但是,我1946年在新疆涉足政坛,实为不务正业,以至虚度韶华,至今成就不大。“今乃而立之年,正值中华振兴之盛世,如能潜心学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于乐育英才之同时,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切切不可趋虚名而误实际,华而不实,不求造诣。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时的吴宓,头顶早已全秃,鬓发须眉多白或灰,面容躯体都较清瘦。从磁器口到沙坪坝,一路上坡,天气大热,两人都汗流浹背,他还微现气喘。这就更衬现出,他的恳切叮咛确乎出自肺腑,语重心长。我深切感到,他确乎是我的兄长,是我的良师。不,首先是良师,最令我尊敬的情深谊厚的老师。

我回到女师学院,恰遇学生罗玉清(后任重庆建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这时,各高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尚未正式公开,但也不特别保密,所以我早已知道,罗玉清是女师学院党支部书记,她也不否认。闲谈之间,她自谦党龄很短,马列学得少,工作经验更缺乏,

因而谈到她的入党情况：读中学时订阅《新华日报》，她乃接近“报童”得到帮助，思想进步很快；经那位“报童”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罗玉清敦厚稳重，又知她是学院的实际领导人，所以我很器重她。见她如此坦率谦逊，也就倍感亲切。这时她忽然迳直说到西南文教部关于撤消女师学院、建立西师学院的事情。并说，眼下正在搜集同学意见，考虑系科负责同志的入选。外语系同学多数反映要我作系主任。

果如吴宓所料。我便遵照吴宓的叮嘱，向罗玉清反复陈说，我不适宜作系上的行政事务。希望她作个主张，另荐其他教授担任。

说来说去，她赞同了我的意见。却反问我：除了我之外，系上还有哪位教授可作系主任？我一时答不上来，也不敢贸然乱说。

“那么，”她说，“你仔细斟酌斟酌，也可以在老师们中间征询征询意见。过几天告诉我。”

由于对罗玉清的良好印象，也由于我感受到她对我的友谊和信任，我爽快地答应了，并随即认真执行。某教授和我比较接近，我便决定先找他征求意见。岂料他正约了某资深讲师准备去找我。

“有个大问题找你商量，”某教授说，“合校之后，谁当外语系系主任？我们得合计合计，发扬主人翁精神，过问过问，别弄得胡乱上个落后分子，大家跟着抹黑。”

我表示赞同，并询问他们的意见。他答，某资深讲师附和，他两个已经斟酌再三，唯有F公最为理想。最最要紧的一条：F公是中共地下党员。

F公是私立相辉学院的教授，在女师学院兼一门课——《莎士比亚》。我问，可以推荐兼课教师吗？

某教授答：“完全可以……”

我表示同意。他两个就提出由我到学生中去提示、启发,让学生向文教部反映。“学生反映,力量大,才能保证中选。”那位资深讲师说。某教授紧跟补充:“你在学生中威信高,她们相信你的话。你说F公好,她们会深信不疑,就把我们的意见变成了她们自个儿的主张了。不过你得注意,说F公好,只能说他思想进步,学术水平高,在教师中享有很高威望,却只字别提你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因为目前地下组织还未公开。”

我基本接受了他俩的说法。心里却在琢磨:不知F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天下午,某教授就陪了F公来拜访我。F公态度异常和蔼,丰满冲和,穿一身中式衣服,操一口重庆方言,说话讲修辞,说到学术,也很谦逊。交谈中,说到他的妻子是某左翼诗人的妹妹,几个孩子了,还要读大学。F公给我的印象很好,我也就完全接受了某教授的意见。

我第二天便去回复罗玉清。她听我说完,并不立即表态,却追问我:F公有哪些优点?我全如某教授两人的设计,一一说了,只字未提F公是地下党员。罗玉清又问:“F公思想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表现在平时的言语行动嘛!”我照某教授的话说:解放前,历次学运,他都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公开指斥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讲授莎士比亚,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引同学正确认识莎士比亚。……

“还有呢?”她再追问。

“我就知道这些。”

罗玉清这才表态:“我很重视你的意见。当然还得搜集搜集外语系同学的意见。”

我既然说出了口,就希望意见获得采纳。随即又先先后后和外语系各年纪同学提到这件事,殷勤“提示”、“启发”。结果,各班同学一致反映:除了张紫葛,F公教授是最合适的系主任人选。

随后,暑假开始。全市高校学生全部集中到重庆大学,进行暑期学园的学习。它的目的是理清学生的历史状况,查明其政治面貌。由西南文教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才改为“共青团”)西南团工委等大批干部,设立专门机构,主持其事,却调了4名教授作文化咨询,其中有我。这以前,师生都已学完了社会发展简史,弄清了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学园一开学,就批判李宗吾的《厚黑学》和《阿Q正传》中反映的阿Q精神,力求联系实际,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可是学生们近半数未读过《阿Q正传》,95%的人不知《厚黑学》为何物。领导问我,可否给学生作个报告,介绍一下《厚黑学》和阿Q精神。我答:考虑考虑。

重庆大学与川教院相距不过3公里,我便于晚饭后散步去川教院看吴宓,顺便问问他的意见。

一见面,他就问我,女师学院那边挑选系主任的事情如何。我如实告诉了他。

“错了!错!”他很不高兴,“你完全作了某教授的传声筒!”

原来李源澄早已备知其详,只是不知道我夹在里面的情节。李源澄是民盟骨干成员,西南文教部正部长楚图南也是民盟的,并与李源澄交情较深。加上老李在重庆高教圈子呆得很久,所以颇知内幕。他告诉吴宓:组织人事部门对地下党员当然是信任的。但地下党组织与进军西南的干部刚刚会师,安排何岗何位少不了还要考虑斟酌一番。高校调整遴选系科负责人,有条原则:尽量在各校——指原公立学校现有教职工中挑选,不含兼课教师。私立学校则另是一摊。打算在公立院校调整妥了,搭起架子之后,再把

私立学校的师生员工分片划拨出去。F公是私立相辉学院的专职教授,虽然党龄较长,却只是保有组织关系,并未担任地下党的具体工作。也就并无组织上的级别(指连、排、科、处、县、地级之类)。重庆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所得地下党组织交过来的名单,只能知道有F公这样一个党员在北碚相辉学院。F公如果老老实实等待安排,西南师院建校就没有他的份儿,等到分拨私立院校师生员工时,他也只能随众分到某一个学校。而那时,各校的行政职位早已坐满,他更难以一下当上系主任了。现在他以兼课教师,得到女师学院外语系各年级学生和支部同时提名推荐,他就在高教行政首脑机关面前大大显示了他的社会威信和群众基础,不仅马上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而且就拥有了较雄厚的政治资本,步步高升。现在的系主任只是起步罢了。

李源澄知道,某教授是F公的同学、好友,估计是他活动奏效的。却不知道张紫葛在里面起这么大的作用。吴宓说到这些原委,再着重语气说:

“你实在糊涂,办得糟!”

我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过了一会儿,吴宓才说:自古道:与人隐私者不祥。F公以老共产党员行此勾心斗角之计,乃一大隐私也。你躬与其事而为前驱,是深与其隐私也。据李源澄所论,F公脱颖而出,必不止于作西南师范学院之外语系系主任。他一旦成为本院之专职教授,则组织关系转入此院,必将取学生支书而代之,转眼一跃而为西师之最高领导。你于他既非同学旧雨,自然功高难赏;且又备知其登龙之秘,那么,就必然是他的眼中钉,你还想在此西南师院过日子吗?尤有进者,诸生纯洁,当然不知保密,叫你踢下去之现任女师院外语系系主任必然很快备知其详。你就无端结了一个仇人。值得

吗？有此必要吗？愚哉！“尔何愚钝至此耶！”

他说得对，但已改弦无术！我怅怅久之，悔恨而已。

嗟叹一阵，说到介绍《厚黑学》之事。刚一提及，他就举双手连摇几摇：

“不可不可！绝对不可！断然不可！”又说：如果你愚昧为之，必然自己营造一个无可解说之莫大劣迹：利用此一堂皇讲坛，宣扬反动透顶之厚黑学！吹嘘鲁迅所鞭笞之阿 Q 精神！

感谢他的这一耳提面命，我到底没有干那件蠢事！

果如李源澄所料。西南师范学院建校方案出台。F 公被任命为外语系系主任。原女师学院的支部书记罗玉清调到政府机关，西师支部书记由学生张伯华继任。张伯华年轻纯洁。不久，就改成了 F 公。

暑期学园结束之日，我连夜去看吴宓。他门上门，小声说：“你们就要合并过来了。记住，我两个务须装着从不认识。”又说：这，关系重大，至为重要。“现在，你马上回去。不可在此逗留，让别人看见，知道我俩是老朋友，以后要添无穷之麻烦！”

“李源澄、刘尊一不是早知道的吗？”

“他们会保守秘密的。”

1950 年的 8 月 28 日，原女子师范学院师生搬到了磁器口。9 月 1 日，西南师范学院成立及开学大典隆重举行。当日下午，外语系教师开会，F 公主持，郑重介绍原属两校的教师：

“这是鼎鼎大名的吴宓教授。……这位是我们女师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张紫葛。……”

吴宓身穿褪色的蓝布长衫，它的下摆放了贴扁，现出 4 公分许未脱色的蓝布镶边。长衫高领窄袖——30 年代初的流行款式，足穿布鞋，手执当时一角钱可买两根的手杖。

他右手扶牢手杖，抬了抬眼镜，仔细审视了我一眼。谁也不会怀疑我俩或曾相识。更有趣的是：我被安排住在紧挨吴宓的那间宿舍，我的右邻则是西南文教部驻校的联络员李志刚同志。这是此刻这所大学的头档单人宿舍。

这时的西南师范学院校址——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校园，由东、西两列山岗构成，两岗之间为石桥流水，水流蜿蜒一公里许，便入了嘉陵江。故遇洪水季节，则江水倒灌，东、西山岗之间往来须假舟楫。为此，洪水可侵地带不敢建房，校舍概建于两岗高处。西岗列学生寝室、办公楼、食堂、饭厅、科学馆及两栋较好的干部家属宿舍。东岗有教室、图书馆、单身教工宿舍、职工食堂等。东岗北端的高耸之大坡上，另有十数栋蔑泥单壁平房，那是大众化的教工家属宿舍。

我和吴宓邻室而居的这栋房子，算是这所古老校园中的甲级房屋，砖木结构，三层楼。一楼为教室，三楼为单身宿舍，二楼本是中文系、外语系的办公室，挤出了三间房来容纳我们这3个住户。这就比较清静。那位西南文教部的联络员李志刚，年仅20几岁，却是少年老成，诚朴敦厚，不论师生，凡来访的，他都亲切接待，也主动拜访个别老师。因而他给师生印象很好。因为邻居，和我很快就厮熟了。

12

合校之初

合校后,政治学习是师生的头等任务。按行政(学生按班级)编组。外语系是一个组,系主任F公任组长。

政治学习的第一炮是批判《武训传》。从钻研《人民日报》社论入手,听大报告,阅读大量参考文件,反复讨论座谈,步步深化,再对准武训的“反动本质”口诛笔伐。转而联系自己,举自己的经历及历年教课内容,痛骂旧我反动透顶,实为蒋匪帮之忠实走狗,为蒋匪帮培养反动统治之爪牙;肯定今日之我仍是“反动知识分子”,必须痛下决心,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吴宓严守学习纪律,从不迟到早退,一直正襟危坐,专心听别人发言,自己却很少说话。直到每单元讨论将完,规定每人必须发言,他才拿出毛笔楷书的发言稿,郑重宣读。讲的内容全是扼要重复文件要点,基本不联系自己,直到尾巴上才赘上一句:

“通过这次学习,宓乃深感前此未能信奉马克思主义之真理,因而无所贡献于人民。”

这时还没号召展开互相批判,也还没有派学生代表参加教师学习,只是吴宓发言时,F公不断皱眉头,其余教师大多面面相觑。

那位以进步自居的女助教、系务助理小姐 M，一阵阵眨眼努唇，势欲批评。吴宓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瞅大家；念完发言稿，便安然端坐，眼观鼻，鼻观心。F 公实在有点耐不住了，下次宣布讨论时，特别详细地启发大家，反反复复地说：

“必须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家庭的、历史的、学术的、生活的、工作的、教学的、实践的……”

F 公大小发言，作大报告，都喜欢重叠形容，往往一面说，一面戟右手食指，指点左手指头，一个一个，屈指以计。后来干脆不指名地批评吴宓，“有人始终拒绝联系实际，发言只是机械地、干瘪地、挂一漏万地、言不由衷地，重复学习文件。这实际是对这次极为重要、严肃、伟大的学习运动的冷淡、悲观、消极、应付、抵制态度，……”

晚上，我悄悄规劝吴宓。他却说：我只能这样。告诉你，我不仅不能丑语自诋，连旁听诸位先生的自我辱骂，也觉辱莫大焉，如坐针毡。“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究竟没到上断头台的时候，为何就腆颜卑辱到这等程度！”

我按文件精神，特别是《人民日报》社论，详为譬解，提出我的见解，再三说，我认为，我辈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否定旧我，才能很好地和工农结合在一起。

吴宓却说：《易经》八八六十四卦，这才翻开头一卦——乾卦“元、亨、利、贞”。往后日子还长。既然抓住电影《武训传》这么个微乎其微的题目，号令天下文人批而判之，自作丑态，则见微知著。……“批评、自诋方兴未艾，设若现在就百词自诋，将来日复一日，由渐而入，复何更丑更秽之词以进一步自诋，以示长进？你年轻，可塑性大，自可按你之体会全力以赴，我老迈顽劣，实难一蹴而就。然亦不得不顺应潮流。汝姑待之。我将先以一二年之岁月，敬聆

诸君之自诩,渐习渐惯,再随诸君之后亦步亦趋。”

他苦笑一下,诙谐地说:“此可谓后进于腆颜,落后分子也!”

1950年下半年还有两件事可叙。

一个是排课。事在9月。某课由哪个教师担任,完全尊重学生的意见。这个原则吴宓很为赞成,他认为,教师的良莠,天经地义应由学生认定。

但具体实行的方式却使吴宓感到意外。全系教师及各班学生代表齐聚一堂,教师坐一方,学生坐一方,逐班逐课论列。学生发言,教师恭听。不是简单说某课请某老师担任,而是先说理由,对教师当面鉴定。政治、学术水平,道德作风,优点何在,缺点是哪些。到会的学生代表都是积极分子,最能破除情面,直言不讳;指责缺点,决不含糊,措辞尤其锋利。但对吴宓却意外地客气。学生们说吴老师学识渊博,工作谨严,教学效果良好,生活简朴,只是思想守旧。按他的年龄和经历,这也可以理解。请他教高年级英语精读课,希望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进步。

学生们一致称赞系主任F公政治过硬,思想先进,但鉴于他的行政工作繁重,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暂不请他任课。

张劲公,是吴宓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时,英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现在早已是资深教授,在座的就有两位教授是他的弟子。学生们却情词激昂地斥责他:“思想顽固,品行不端,——讨两个老婆。……建议送你到革大学习,我们不要这号教师。……”

张劲公面红耳赤:“同学们,这太过分了。讨两个老婆是旧社会的事,现在均已老夫老妻。……”

一个女学生站起来戟指痛斥:“你还有脸狡辩?……全系同学一致认为,你是我们系上的顽面堡垒!认真说,应该送去集训!”

然而更令我们惊奇的还在后面。年近五旬的殷炎麟教授,是

吴宓在清华时教的高材生。论学识,功力深厚;论品行,谨严敦厚。教学认真,效果良好,政治上尤其追求进步。自旧政协以来,历次学潮,他都积极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每次上街游行,他都积极参加,和学生并肩前进。我们满以为,今天学生会盛词赞扬他,请他担任高年级主课。谁知学生们正眼也不看他,直到把全部课程排完了,才提到他,而且措辞冷酷:

“殷先生自从解放之后,政治热情日益低落,思想日益倒退。这在你殷先生是不可原谅的。你以为人民的高等教育非要你不可吗?那就大错特错了!……”

重庆解放10个月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早已改变:称“同志”是最高荣誉;称“老师”则是一般礼貌;至于称“先生”,则等于说你是“资产阶级老爷”。

资产阶级老爷,布尔乔亚!无产阶级的对立面,革命的对象!殷炎麟顿时脸青唇黑,猛地瘫软蜷缩。幸亏左右邻座的两位老师赶紧挽着他的胳膊,他才没有栽倒。

晚饭后,吴宓约我一起去看殷炎麟。

“老师!”殷炎麟对吴宓低低叫了一声,似有千言万语。

相对默然。坐了10来分钟,吴宓起身告辞,才说:我去找F公,附我的书面,请他推荐你到华东,上海,随便哪个学校。……

殷夫人插语:“那倒很好!能行吗?”

“试试看,你们就当不知道!”

F公没有接受吴宓的请托,却告诉了他华东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等,叫他自己去联系。凑巧这些当权人物中有两个是吴宓在清华时教的学生。只一个月,殷炎麟就获准调到上海了。辞行时,他问吴宓,他到上海后是不是建议那些同学把吴宓也要了过去。

“不用,不用!”吴宓果断地说:即使他们有此意念,你也要力予

劝阻。我已老迈,但求优游于祖国之土地上,无企无求,在哪里都一样。尤有要者,在此社会,宜惟组织是依是靠。凡昔日之同学、同乡、同事等等,最宜疏远。“你到上海后,尽量少和老同学来往,也不要和我通信。此点至为重要,务须切切牢记,不可稍有疏忽!”

另一件事是评工资。即改折实单位等额工资为差额等级的货币工资。采民主评议之法,学生评议,提出具体意见,院(校)领导、学生会、院(校)务委员会审查,西南文教部核定。

评议结果,我和吴宓一样,在全系教授中级别最高,即使在全院教授中也是最高的。吴宓很为惶恐,对我说:此事再糟不过。非份之福必招非份之祸!你我何功何能?居然比 F 公还高两级,得何以自处而不生危殆?!“务必自请降低,至少低 F 公一级。……”

我觉他说得有理,便分别向学生、领导解释,并向西南文教部驻校代表李志刚再三恳求,终于获效,我俩都下浮了两级。但吴宓仍甚怏怏:“似此仍与 F 公同级。奈何?——再向 F 公恳求之!……即使不能生效,也使 F 公知我不敢与他平起平坐之心情!”

13

统战部来了通知

紧接抗美援朝运动之后,来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1951年2月24日下午,学院通知,明晨8时集合,准8时半到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开大会。师生员工,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我正在吴宓房里向他转达这个通知,房门哗剥作响。进来的是邹兰芳。

“吴老!”她扑向吴宓,却一趔趄跌倒了。她匍伏地上,嚎啕痛哭起来。

吴宓慌了手脚:“快别嚷了!小声,小声!这楼上人多,那边就住着军代表呀!”

她毫不理会,越哭越伤心。

我起身要走,吴宓拦住我:“别走!帮我劝劝她。——耶,兰芳,到底出了什么事?起来,好好说!但凡我能出力的,一定拼死相助!”

哭了好久,她才在嚎啕中夹了几个含糊的字眼。我们俩才得知,她那两个身为国民党将军的哥哥被处了死刑,留下了好几个幼小的子女。

吴宓反复小声说:

“别哭，别哭！死者不可复生，哭也无用。”又说：至于你的侄儿侄女，我帮你抚养。我每月只留最低生活费和我一向资助别人的份额，其余悉数捐赠。……

我只能无声地坐在旁边。

邹兰芳一直哭了个把时辰，才渐渐跌坐在地板上，抽抽噎噎诉说。前前后后，足有两个小时，才坐到椅子上来。

饭厅里开饭时间已过，我说我们到磁器口饭馆里去吃饭，邹兰芳怎么也不去。我只好独自去买了些菜肴、米饭、馒头、花卷，拿回来三人一起进膳。左劝右劝，邹兰芳才吃了很少一点点。

我回房不久，吴宓过来了：“我和你抵足而眠吧！”

就寝了，吴宓痴痴呆呆，悲天悯人，似有无限同情之忧。我很想说：同情反革命家属，是个立场问题。况且，这几天，山城天天开公判会枪毙反革命，昨天南开中学对面场子上枪毙了10几个反革命，现在还摆在那里示众，他们都有子女家属，你同情得了？但，我知道，吴宓的犟劲儿，劝说是中不用的。我车转身独自睡了，由他去辗转反侧。

第二天，到了重庆大学团结广场，才知是召开高等院校的公判大会。全市大专学校的师生员工全部到会，主席台两旁跪着两排“反革命”罪犯。大家认得，这是不久前“3·13”、“3·31”等次大逮捕时，从学校捉去的师生中之一部分。控诉过后，法庭宣判：原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侯枫等若干人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等，或处死刑缓期执行，或处无期徒刑。枪声乒乓，死刑犯倒地毙命。西南文教部书记登台讲话：宣布高等学校镇反运动开始。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又说：公安当局在南开中学专设了高等院校敌特登记处，正告一切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三青团及袍哥、青红帮等反动会道门的成员，马上到这个登记处去登记，

争取宽大处理。正告这些人：交代比不交代好，全部交代比夹屎夹尿好。……

下午，西师学院又开大会，动员师生开展镇反。会上当场揪出了一个暗藏在学生中的反革命——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一位女生，年方21岁。口号震天，控诉相接，人们群情激愤。在主席台左侧放了张方桌，将她反绑跪在上面。控诉她的罪状有：参加过反对外蒙独立的游行；阻止、干扰全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等等。有一重庆大学的男生来控诉，说她惯以谈恋爱等方式，色情勾引拉拢男同学，破坏学生运动；说她下流、淫荡，并当即朗诵她写的情诗：“爱吧，爱吧，春天在召唤我们！……”

控诉完毕，警察入场，宣布逮捕，随即把她押走了。

散会后，我和吴宓一起回宿舍。快上楼了，后面有人叫我们，院镇反学习委员会的干部通知：我两个也应到南开中学那个登记处登记。我俩目瞪口呆，我们从未参加任何党团及社会组织，竟然要去登记？！

无可解说。我只有去找F公。这时，中共西师支部已公开，F公任书记，他是这个学院的最高领导。不想吴宓已坐在里面。我未便退出，干脆说了来意。

人，大凡一经负了重要责任，公务执掌，忙得不可开交，就难免急躁。F公现在正是这样。但见他脸一沉：

“你还不该登记？！《新疆日报》社长，国民党大区一级干部！……”

我说：“耶，那是新疆国共合作，联合省政府的机关报呀！”

“那种披着联合、民主外衣的东西，比国民党《中央日报》还反动！……老实说，我们全校，论思想反动，你（指吴宓）最冒尖；论历史，你（指我）最突出。”

吴宓无言亦无表情,起身告辞。回到宿舍,小声对我说:“…和他们无理可讲。你还年轻,用不着和他们拗。我已经老了,就决心拗到底,大不了人头落地!”

登记已经结束,学校正在分组公开评查这些人登记交代的政治历史。吴宓仍然没有表态。这一天,F公找了他去,和颜悦色说:

“……统战部来了通知,你是我党的高级统战对象,我们要尽量照顾你。你有什么愿望可随时告诉我。……”

果然,从此学院上下,对吴宓的态度大大改善了。登记的事情自然无人提谈了。镇反学习的墙报、黑板报,决不提及吴老先生。这时,西师师生尽人皆知,学院教授中有两个头面人物:即吴宓与教育系的周邦式。

周邦式原是女子师范学院的,和我认识也已十一、二年。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是李大钊的弟子,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也是毛泽东的同乡。毛在北大图书馆任馆员时与他交厚,同是杨开慧家里的常客,与毛泽东有通财之义,甚至一起游逛。后因生活变迁,周邦式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弄脱了。解放了,他心怀惶恐,乃急函上呈毛泽东,具道别后情况,自咎自责,求毛教诲。不多久,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亲自送来毛泽东的亲笔函,称他为“邦式兄”,颇道契阔。嘱他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有何要求,可向程子健提出。并说:开国之初,政务繁忙,容稍闲再邀周会晤叙旧云云。

周邦式把这封信供在家里客厅上方,如设神位。来客请求参观毛主席来信,他都慨然应允,三揖三鞠躬,然后,双手从神座上捧下那特大信封,抽出信纸,请来宾恭读。有人问:把毛主席的信当神牌子供着,可以吗?他答:当然可以,人民领袖坐江山,比封建皇

帝神圣万倍；他的手书就是真正的圣旨，香烛供奉理所当然。

然而这当儿，我的处境却很糟糕。一方面，我仍是教授，要履行公务；一方面，天天过关，有关方面随时秘密传讯，学习小组上群众粗鲁追问历史，直接表示怀疑；墙报、黑板报大小文章随意指责，外系教师不敢和我当众招呼，流言四出，说我政治面貌不清，八成是潜伏特务。……

这天晚上，吴宓把我叫到他房里，促膝而坐，小声说：

“先严命我以弟兄待你。我们相交 10 余年，确也情同手足。我乃不能不对汝有所指点。”

我说：“请兄长耳提面命。”

“你为什么惶惶不可终日？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

我简单说了自己的处境。

吴宓：“小焉哉也！我试为汝一筹。”

他分析：专政方面并未对我下结论。就算是“政治面貌不清”，也不过是看不清楚究竟是革命或反革命。那好，真金不怕火烧，请君细细辨认可也！“什么墙报、板报、小组发言，都不过是一些无知群众，宁左勿右表现自己，瞎起哄而已，何足怪哉？！”他又说：所谓“孤立”，大概是 F 公有意无意造成的，充其量是个人发泄情绪。他举了个例子：上次大会发言，我们的老朋友、教育系教授刘尊一上台，步态缓慢，站定后又向全场看了一遍，方才说话。F 公便向旁座的某教授耳语：她这人就是过场多，资产阶级味道十足，讨厌得很！吴宓坐在 F 公身后，听之真切。刘尊一早年 and F 公等都是北大同学，共产党员。后被捕，脱了党；再后留学英国。合校后，她任教育系系主任。群众只知道她是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民主人士，而 F 公则说她曾变节叛党，很看不起她。

吴宓说：F 公身为执政党之部门负责人，此等言行实属轻率，

闻者当然要误认为是组织之态度,仿而效之,扩而大之,何足怪哉!于是他评论F公:第一,是共产党员,有组织观点,所以尽管他不悦吴宓,仍遵统战部的意见,改善了对吴的态度。第二,同时他重感情,多感情用事。

说到这里,吴宓举了个例子:某教授参加过国民党的“诚社”,现在论定“诚社”是特务外围组织。如果是别人,早已入了另册,但他是F公的同学好友,交好10余年,交了张登记表便万事大吉了。

因此,吴宓说:今之群众对我的许多做作,大半是看F公的脸色所至。你要知道,上面决不会把这么几千人的大学交给F公一人,而不加辅弼。“我们那边不是还住着一个叫做文教部‘联络员’、实际是军代表的李志刚吗?别看他不声不响,他是大权在握的,他对你的态度不是依然亲切友好吗?”

听了吴宓的分析,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我看呢,”吴宓说,“你锋芒过露,才高震主!”又说:凡此,还属次要。我对汝着重言诸者:立身之大本也。本者,本立而道生。我们处此时代,不可不立其本。有此根本之道,才能随心所宜(他又解释说:是“宜”,不是孔子说的“欲”),不逾矩。“这个本就是:——皈——依——毛——泽——东! 皈依,皈依! ……”有了这个信念,就再也不会戚戚于一时得失,就能清心寡欲,淡泊自守,勤勤恳恳,敬德修业。有什么升迁福泽,感谢龙恩浩荡;有何挫折不利,算是命定如此,无所怨尤。

14

挨了耳光之后

1951年的暮春时节,星期三上午,第一节课不到半小时,院办公室的一个干部来教室叫我出去。来到教室楼外,她才向我耳边小声说:“公安局来电话,叫你马上到派出所去,有要事找你。”

公安局找我?我立刻意识到,是关于清查“反动”历史的事情。那天在公安局登记处登记后,公安干部曾找我谈话,斥我交代不老实。“明白告诉你,这还是审查阶段。你回去照旧作教授,……不准对任何人透露我们审查的情况。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另外,还有几条纪律:除了学院领导安排、派遣,我不得擅自离开学校;工作不得马虎,否则以怠工破坏论;随时听从公安传唤,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

现在叫我去派出所,当然是传唤询问,何得怠慢?我也顾不得留在讲台上的教材、教案等等,转身就奔出大门。干部没有指出哪个派出所。不言而喻,必是学院所在地的主管公安——磁器口派出所。我以竞走的速度赶到磁器口派出所,可是那里值班干部答复,他们没有叫我。那么当是就近的沙坪坝派出所。我又连忙赶到那里,却得到同样的答复。我再到磁器口派出所,遍问干部,齐

说不知。我再赶到沙坪坝派出所,值班干部和颜悦色:

“教授,你不想想,你们那地段是磁器口派出所管,我们怎么会找你?”

我到沙坪坝街上挂电话回学院办公室问那女干部,到底有无电话叫我?答复非常肯定。并说:来电话的干部语态严峻,只说了一句:“叫你们外语系教授张紫葛马上到派出所来。”便挂断了电话。

我不得已,再奔磁器口派出所,找到所长,说了如此这般的情况。他恍然大悟:

“哦,你是登了记的?那,可能是沙所。你再去问问:有没有城里来的干部。”

这回弄对了。沙坪坝派出所的值班干部说:“你真是个书呆子!早不说是找城里来的干部。喏,他在那边会议室里!”

会议室里只有一张长桌,几条板凳。一个穿便服的青年坐在桌旁,手持茅盾写的《腐蚀》,且看且品茶。茶杯旁边是他的公文挎包。一见到我,他把书往桌上一砸:“你个龟儿子,怎么这阵才来?”

我答:“你在电话里没说到哪个派出所,我往沙、磁两派出所来来回回跑了三趟……”

“你还有理?给老子站到那边反省。过去点,靠墙边一点,向后转!立正!规规矩矩站着。听着: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低头,好好给老子反省!”

他监督我如今站好面壁反省后,仍回去坐在条凳上继续看小说。

沙、磁两派出所相距不少于4公里,我竞走急行跑了三个来回。重庆的暮春已如初夏,热乏渴躁,很是狼狈;现在又这样立正低头,委实困顿。他却若无其事,直等我两腿发麻,周身发僵,才命

令：“过来！”

腿麻身僵，转动自然无法伶俐。他大怒：“你这龟儿子，咋个故意磨蹭！”

“同志，你也太过分了！”我语态恭谨，“不论怎样，我现在还是教授，怎么开口就骂？……”

“怎么？骂你又哪个？教授，什么东西教授？我们随时可以逮捕你！……”

“等你把我逮捕了再骂不迟！”

“你龟儿子还敢回嘴！”他跳起就扇过来一耳光。我究竟没有想到有这一着，猝不及防，扎扎实实打在左脸上。我后跳一步，大声质问：

“你是什么干部？共产党有这政策吗？！”

“打你这个嚣张反动派！”他抓起一根板凳，朝我打来。

那青年看来年纪不到30，却很柳条，窄长的脸，白净面皮，身高至少比我矮10公分。手腕远不及我粗壮。我也不言语，只是伸双手接住打了过来的板凳这头，握紧凳头及凳腿，稍稍用力朝他搽了过去。他也似乎毫无防范，嚯地跌了个仰面朝天。不等他站起，我就撂下板凳，匆匆走出派出所，一迳回到了西南师范学院。

刚进校门不远，迎面撞见书记F公。他顿住脚，沉下脸问：

“你到哪儿去了？课也不上！”

“有事情！”我只答了这么3个字，就自顾走了。

回到寝室里，痛不欲生，鞋也不脱，倒在床上，不知人间何世。就这样僵在床上，大睁着眼出神，一不知饥渴，二不知炎热。

夜深了，万籁俱寂，皎洁的明月透过敞窗，直投到床上。忽听门锁微响，门轻轻打开，闪进一个人影。哦，吴宓！

他蹑到床边，附耳低声：“出了什么事？两顿不见你吃饭！”

“挨了打！……”我极扼要地说了事情经过。“受此大辱，生不如死！”

他默然久之，才缓缓说：事出非常，张良圯上之羞，韩信胯下之辱，都不适合引以譬解。“我……，很笨拙，不知道怎样劝你是好！……但是我想，这个小伙子是自己在发泄情绪，不像是共产党的安排。假若是，你当场反抗了，了得，都 19 个小时了，还不来捉拿你？”

我没作声。他仰望明月，仿佛在向嫦娥祈祷。因为月光下，他那清瘦的面部显得那么虔诚和圣洁。好久好久，他转过脸说：

“……你，自幼思想左倾，向往中共。今中共当权，百废正举，振兴中华，指日可望。你才 31 岁，留有用之躯，献才学于祖国之兴旺发达。我为尔谋，挨这一耳光，视为往昔高车驷马应得之余殃可也。倘若就此忧伤病沮，自戕自贼，是屈原、贾生之复辙也！……太史公《报任安书》你是烂熟于胸的，望你反复默诵而神会之！……听我的话，务必以屈原、贾生为戒！”

他一手握我的胳臂，一手抚我前额，停了好一阵，拍拍我的前额，缓缓站起，以极其轻微的动作，开门出去，再带上了门。

我仰望婵娟，反复默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觉得大半词句根本和我对不上号。倒是吴宓刚才的话回环重复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恍兮惚兮，不觉已是第二天中午。西岗学生饭厅的喇叭传来学生的广播：开会通知、报道新闻，……继而人籁渐微，午睡时间到了。我微有渴意，打算起床，却又怅然未动。忽然，房门徐徐推开，吴宓进来了。手里提着他的帆布文件包，闩上了门，他盯住我，伫立了一小会儿，小声微怨：

“还是这么躺着？硬是要学三闾大夫？”

稍一踌躇，他快步迈到书桌边，从帆布包里取出了两件东西：

他的餐具饭盒、牛奶锅儿。然后再从包里取出他的筷子，掏手巾仔细擦了一阵，放到了桌上。这才踱到床前，命令我：

“起来吃饭！”

我没动，也没答话，只是大睁着眼睛盯住他。不为别的，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无力动弹。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转而眼神慈祥：

“圣人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你不吃不喝，以自戕自贼，无愧于‘哀哀父母’乎？……你称我兄长已十有二年于兹矣。今天，我第一次行长兄之礼，命令你：起来吃饭！”

他语音很低，语态却十分严厉，不容违抗。

“兄长！……”我说不出第二个字。挣扎坐起，他拉了我一下，我下床偏偏倒倒，坐到了桌前。

揭开餐具：一盒蒸饺，一锅儿鸡汤。不用问，这是他亲自到磁器口街上餐馆里买来的。

“兄长！”我捏起筷子，手直哆嗦。

“吃吧！”他的语音非常温和。随即坐在我对面，注视着我。

待我吃完饭，他才说话：“……昨晚，我回去翻来复去想了又想，这事情只能是那小伙子一时胡闹。”他说：我们念在中华之国运昌隆而皈依共产党，皈依毛公，就应仿教徒之虔诚。世界上宗教多矣，而其教义只有一条：信仰者自认有罪于天，求上帝、神祇宽恕。既皈依，就应诚心自认：既未参加红军、八路，亦未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那就是有罪的。此后生一掌之掴，亦乃为你减灾折罪。古人顿悟今是昨非时，往往自批其颊。“你往宽处想，只当是他代你自批其颊吧！”

“兄长！”我说，“你放心，我会深思你的告诫，振作起来的！唉！我深悔当年未深思你的谆谆教诲，涉足政治，至有今日。我看，为这历史，将受多大祸殃，实难预料。为了避免我连累你，请你把日

记、信札、那个自编年谱稿重新检查一下，务必彻彻底底，去掉表明认识我的字句……”

“放心，放心！我早虑及此事。我俩 10 多年前就结为异姓兄弟，现在又邻室而居。设有朱元璋‘奸党’之条，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早已三检三查，百分之百消除了尔我相识之一切痕迹矣！……”

吴宓走了不到 2 小时，来了个不速之客：登记期间代表公安当局和我谈话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干部。

这个时期——1951 年，人们习惯以服装区别干部为三个档次。穿便服的是地下党员，例如冬穿中式长袍，暑穿夏威夷衫；二是褪色蓝布中山服（又称干部服）或列宁装，这是随军西进甚至南下再西进的老干部；三是军服，乃部队干部。所谓军服，其实不过是国民党军需署各被服厂粗制滥造的士兵单（棉）军装，它们到了共产党手里，就焕发出了特殊的光彩。1951 年前后，在一些行政单位，特别是文教单位，见到穿这种草绿色军装的人，便会肃然起敬。因为这表明，他（她）是部队下来的，曾经枪林弹雨打过天下，此刻是级别较高、权力较大的干部。迈进我房间的这位女干部，尽管年纪很轻，却身穿军服，而且又是代表公安当局训诫过我的，当然不比等闲。她亲自驾临，想必是昨天的事闹大了，来逮捕我，而且由她亲自执行。

不料，她的态度竟是这般和蔼，与我上次所见判若两人。

“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昨天，我们那位年轻同志对你的粗暴动作，是他个人的违纪行为。我们已经责令他反省检查。党的政策不容玷污，我特代表领导机关，亲自来看你，向你说明情况，也可以说是来慰问你，向你表示歉意。”

我呆了。坐在她的对面，眼睁睁望着她，半晌才说：

“啊！共产党真伟大！”

她好似没听见我的话，注视着我，接上说：“派出所的干部只望见他罚你立正，打你，却没听见他说了什么。请你照直告诉我，他骂了你些什么，说了什么？”

我如实讲了。

“哦！”她语言明朗，“他的全部言行都违反党的政策。说什么随时可以逮捕你，全是胡说八道。我上次就对你说得很清楚，我们只是对你的政治历史提出疑问，要求你老实交代。我们将认真调查、核对。现在你仍是我们的革命同志，教授。昨天那位同志年纪轻，参加公安工作不久，我们没有好好教育、考察，以致于他昨天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一定会认真教育，严肃处理。——但，你为什么就赌气不上课呢？！”

我如实向她说了我的情绪，丝毫没有承认我不去上课的错误。自然也只字未提吴宓劝诫我的事情。

“你这位教授！”她微微一笑，“再气不过，可以进城找我告状嘛！何必这么绝食、罢课？自己颠倒犯个错误！好了，现在想得通了吧？”

她刚走，我立即到隔壁一五一十告诉了吴宓。

吴宓仿佛吃了一惊：“啊唷！他们太，太，……太了不起！派出所的干部立即上报，让上面召他回去，责令反省，不过30小时，就派出级别较高的干部来向你当面说明并表示歉意，而且已经了解到你没上课，没吃饭！呀，了不起，了不起！国民党何能望其项背？毛公的确远超秦皇汉武，值得高举他的画像，山呼万岁！……”

我却说：你昨夜的判断完全正确，到底是兄长，见识确比我高出多多。

他说：高什么？只不过旁观者清。我当局者迷的例子难道少

了吗？

第二天起，我照常上课，一切正常。但一星期之后，又出现了料想不到的情况。这天，我走进外语系教室上课，不禁大惊。偌大一个教室，只有一个男生——陈道安。小伙子黑蛮健壮，憨厚稳重。他一本正经：

“起立！敬礼！坐下！”仿佛那些空课桌上全坐满了同学。

我愣了一阵才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同学通知罢你的课，叫大家莫进教室。我质问：谁布置的？为什么要罢老师的课？为什么专罢张老师的课？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他们也答不上。……我不顾一切，要来上你的最后一课！你敢讲吗？”

“你敢听，我就敢讲。只是别说‘最后一课’，那，是大大的错误，那是另一回事！”（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写的是法国战败，割了两省给德国，割让地的爱国教师给学生上法语的最后一节课。）

我跨上讲台，如常授课，他也如常听讲，记笔记。两节课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休息。下课铃响，他表情诚挚：“能不能，往后，我们照常上课。”

我答：这得弄清情况。如果是党支部的意见要罢我的课，我们就绝对不可违拗。（按：这个学生后来以专业拔尖而留校作助教，后提讲师，很受学生欢迎。却在当时认为他政治上属于“进步较慢”之列。我很担心对他的这一评价的最初阴影，就是去上了我这两堂课。总之，他后来郁郁寡欢，以酒浇愁，40余岁便去世了！）

第三节课我走进另一个教室，情况完全一样。却也有所不同：这个教室比较大，也就显得特别空荡。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等我的，是共青团员、团支部书记、秀外慧中、成绩拔尖的G女生（后为西

师教授)。

她关上教室门,回到第一排正中座位上,摊开笔记本,却朝我说话:“我拼着违反纪律,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独自来这里,为的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情况,别让你蒙在鼓里。”

我有点慌张:“你最好马上走,我不能连累你。你年轻、敏悟,前程远大,……”

“正因为 I 年轻,必须坚持真理。我相信,真理在我手里!……上个月党支部书记就布置我监督你,说你政治面貌不清。我当然执行领导的指示,我一直监视、观察、考察你,却没有发现你的任何劣迹。相反,你是个好老师。于是我思考了:不清,不过是不清楚嘛,这是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不能仅凭‘不清’就把你当作敌人。这并不是我的阶级立场不稳。假如公安机关逮捕了你,宣布你是个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我会毫不犹豫和你划清界限,声讨你的罪行。可现在,你还是我们的教授,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你的言论、行为、工作态度、教学质量,都表明你是一个难求难找的好教授……”

接着,她三言两语讲了事情的原委:那天我从课堂出去没再回来,次日另一班的课也没去上。两班班长不约而同去问系主任、亦即党支部书记 F 公。他的答复很干脆:“我不知道。”

头一天,他确实不知道,而第二天,即那位公安女干部来和我谈话的下午,他已经完全知道。学生们摸不着头脑,两班班长转身要走,他却补了一句:“现在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张紫葛政历问题比较突出,是不是他的思想、情绪、精神受到一些影响,你们应该关心关心!”

有个学生问:“他的政历还没弄清楚?”

F 公摇了摇头。另一同学问:“是说不清楚,还是他不说清

楚？”

“你们应该知道嘛！这个老师一向和同学很接近嘛！我呢，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学生班长莫名其妙地回了教室。教室里有很多同学，就中有一个男生也是系学生会的干部，锐志进步，苦无捷径。F 公的夫人也是这个年级的学生，这位男生把她看作靠拢领导的最佳桥梁，有意接近她，不时向她请教学习、工作以及一切可谈可问之事。何不找她谈谈？

她想了很久：“我也不明白 F 公是个什么意思。要不然，我打听一下后告诉你。”第二天她就作了答复：事情很简单，张紫葛政治面貌不清，背思想包袱。某男生问：“那么我们该怎样关心他呢？”

“哎呀，这个人太自高自大，用不着为他操心。他无故旷课，我们就自学。稀罕他！”

某男生夜不能寐，终于想到一点门路。次日，独自去见 F 公，说：“张老师旷我们的课，同学们很有情绪。都说：他旷我们的课，我们也可以旷他的课。你看，这个……”

“你靠拢组织，有情况汇报，这很好。我们党一向走群众路线，是尊重群众意见的……。”

某男生心中有数了。书记不制止我们旷老师的课就是赞成。于是他在系学生会、班干部会上大声疾呼：“张紫葛旷我们的课，我们就罢他的课，以罢课对罢教，给他施点压力，推动他交代历史。”

理由堂皇，得到了附议。进而磋商办法，集思广益，作了两条决定：1、动员各班一致行动；2、逐个同学串联，在罢课的同时孤立他。“不理他，鄙视他，打击他的嚣张气焰。”

即刻付诸实施，各班进展顺利。唯有 G 女生这班小有卡壳：团支书 G 女生不同意，她认为：事情源于某男生个人动议，无上级

布置,无政策依据,不能盲从。她很有威信,谁也不好反驳。在此关头,班委、F公夫人说了一句:“我们也不必与各班唱反调,请示领导好了。”领导就是F公,他说得很轻松:“我们党有一条原则: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这个问题是明确的、清楚的、用不着争论的、不言而喻的……”

G女生讲完了。我问:“你怎么知道某男生的这些曲折秘密的?”

“他的恋爱对象和我很要好。而且她内心厌恶他这一套。”她压低嗓音问:“你是不是和F公有个人矛盾?我听女师院的老同学说,是你鼓动同学们把他从私立相辉学院要过来推上去的。”

“别理这些闲话,当心影响你。……那么,再会了。”我打算走。

“不,你给我上完这两堂课。”她挪过笔记本。

“好,我们来个快速作业。”我开始讲授。可以说,跑马摘花,拣最紧要的地方,择精指点。到中午12点,把这学期该学的东西全部跑了一遍。

她很满意,边收拾书包,边急促说话:“谢谢!你不要泄气。除了极个别人,我们同学谁都不愿失掉你这样一个老师。我衷心希望,你的问题早日解决,我能继续听你上课。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别泄露我们今天的……”

“这恐怕办不到。不能没有同学看到你进教室呆了两个小时。”

“不,我是说,别泄露我们的谈话内容。至于上课,我要大胆承认,毫不畏缩地顶着:是我要你上这两节课,给我开了个小灶。我要知识!我是来求学的!”

我呆想了一个下午:是不是进城找那位女公安,把这些情况和盘托出?还是慎重一点。

夜里请教吴宓,他不假思索:“千万不能进城报告。你怎么知道某男生等等周折?说出实情,你就出卖了G女生,她的前途就彻底断送了!”他说:这没什么,罢课就罢课,总不能不给工资。而且这是私货,是维持不久的。孤立你,学生大伙不理你?也罢,落得清静。又说:这都是你一马当先,抬F公出山之过也!“圣哉前贤之论:与人隐私者不祥!旨哉斯言。”

我起身回房,他又叫住我:“慢点,我要和你谈谈修身养性之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论语》第一章,何以植此章于篇首?盖所言乃治学、修业、处世、立身之本也。”他说:知,概五伦人际之相知。齐桓贤管仲,知也;楚王放屈原,不知也。知,自然好,不知,则何如?圣人教诲: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君子。“你自来倾向共产党,赤诚拥护。今乃不为所知,汝当何如?应深体古人之言:不愠。愿你做真君子,坦荡荡,毫无愠意。且而,究竟知不知你,尚未定论。应相信,真金不怕火烧。共产党终究会知你的。勉之勉之!君子坦荡荡,务必务必!”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兄长金玉之言,小弟一定铭记在心。君子坦荡荡,小弟决不辜负兄长的教诲!”

“慎勿怀怨F公。他,人情之常也。你应体念他在地下党12年,提心吊胆者12寒暑,这才稍肆其志……”他没再说下去,就道了晚安。

第二天下午,张劲公教授来访。他明天赴北碚西南农学院就任新职,特来辞行。

自合校以来,学生们就不断打击张劲公。第一次排课,面斥他为“顽固堡垒”。评议工资时又拒评他。随后又在各种场合抨击他,甚至说:人民的高等学校不能白养像他这种取两个老婆的人,

“应该把他驱逐出高校”。但他并无政治历史问题,又和 F 书记有点交情。F 公初得教授职称,曾得力于张劲公的帮助;F 公得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兼课,也是他推荐的。(因那时的女子师范学院外语系系主任 C 公就读东南大学外文系时,张劲公是该系助教,两人友谊颇深。)F 公顾念旧谊,并未按学生意见行事。

张劲公却很不自在,急于要调走。乃求吴宓帮助。吴宓知道李源澄和西南农学院教务长陈让卿很要好,便由李向西南农学院推荐,现已办妥调动手续,明天去西农就任公共外语课的教授。吴宓告诉张劲公:暂且到西农,以后再图他调。

张劲公在女子师范学院和我邻居,颇有友谊,能够开诚相见。他具道辞行意后便说:他这样一个英国文学系的资深教授,跑到西农去教公共英语,实在窝囊。因而直截了当说:恩师吴雨憎使他有点失望。“我与殷炎麟同为吴公弟子,吴公能为老殷谋得东调,却不介绍我跳出重庆,何厚此而薄彼?”

我说,恐怕是不便向上海再介绍第二个,而他处又别无机会。

张劲公连连摇头,说:现摆着北京有吴公的知好朋友贺麟来信,专问吴公愿不愿意回清华(按:清华大学此时还是综合性大学,后来才调整为工科大学)。如去,他就让清华那边报请中央来调他。“吴公不去,却又不介绍我去。”

我劝了几句。张劲公说:吴公是他情长谊深的恩师,他也决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淡化了数十年的师生情谊。

因即回忆他们的师生之情。1921年暑假后,张劲公正就读于东南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由于缺乏良师,他情绪低落,很想转入他校改习别的专业。可是新从美国归来的青年教授吴宓吸引了他,他这才坚定信念,在东南大学读完英国文学专业,并以优异成绩留校作助教。

张劲公还盛词赞誉吴宓，是中华民国时期很少的部聘教授之一，是中国研究比较文学的鼻祖。至今我国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无不出其门下。真正是学贯中西而通古今，其渊博精湛，“凡我同学，莫不五体投地。……而其教学之功力极其深邃，统博大于集约，阐精而发微，……我自1925年侧身外文教学，迄今二十有六年矣，自量，不论学术水准，或教学之才能，仍远远不及当年之吴师！……”

说到这里，张劲公转前膝恳谈：自古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现在又流行两句话：在北京——新民主主义社会，重庆——社会主义，而成都——共产主义。运动之“左”，莫过于巴蜀。我辈文人，最不宜留处巴蜀。“愿兄与吾师早日设法调离重庆。倘有机会，望兄力劝吴师速应清华之邀，早日赴京……”

这天夜里，我与吴宓相聚，再提清华之事，重申前劝，叫他考虑去北京。他却坚持己见，绝不考虑离开西师。再三问其原故，他道了三条：一是此地有我这样一个异姓手足，年齿比他小20几岁，世事阅历欠深。相识遍天下，知交能几人？数平生相识，日今尚能肝胆相照者，我算其中之一。和我在一起，能享推心置腹之快；他已老迈，有我少壮，可代尽奔走拱卫之劳。而我历史有疵，涉世欠深，也需要他耳提而命，避危就安。“我不能撂下你不管。”第二，此地还有李源澄、刘尊一等朋友，日今天下士人，大多追求进步，父子异趣，夫妻猜忌者多矣，虽与他处老友相识数十年，现今能否如这些朋友之神交心许，很无把握。第三，旧社会分崩离析，各地品位迥异。今日一统天下，不论哪个地方，哪个学校，都一样。孙悟空的筋斗云，十万八千里，还在如来手心之中。何必费神费力，营求调动？“但能虔诚皈依，便可求得我佛神佑。——日今我辈文人，但应自勉自励，勤恳效力，……”

我乃转而提醒他：既然他坚不去清华，何不介绍张劲公去？并说：像张劲公这样一个对英国文学很有功力的资深教授，去农业大学教公共英语，实在可惜了人才。

他默然良久，说：“我推荐过的，没有成功。……”他闷了一会儿，又叹息说：因人成事，时恒如此。就是往昔学校，院长、系主任自有聘用教授之权，“我不在其位，举贤荐能也只有随缘听命。”因举一例，说：西南联大初期，有吴宓的高才弟子留学法国，得了博士学位，拟回国任教，吴宓荐之于西南联大，校方同意聘为教授。及博士抵昆明，联大校方却变了卦，好歹只愿聘博士为副教授。吴宓只得另荐博士就任一新建之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为此，博士心甚怏怏，并与好友谈到，有憾于吴雨僧师者有二：吴公年高德劭，老谋深算，理应于博士回国之前，洽谈的确，获得联大之教授聘书。吴公竟未办到，其憾一也。当联大变卦之际，吴公如能以去就力争，校方忌失雨僧教授，自必允其所请。吴师竟计不复此，其憾二也。其后，老同学间辗转传述，终于将博士之言传到了吴宓耳里。

“吁嘘嗟乎！”吴宓深深叹息，“岂知我者哉？人家并未拒聘，有权确定学衔，我能奈何？至于去就力争，我是争了的。正是为这件事，我于1944年才愤然离开西南联大，就聘内迁成都之燕京大学。……”他说：今张劲公事，实亦类此。他来辞行时，两度谈到，我应调去清华，不然，可惜了这个机会。“可惜云云，乃彼遗憾于心之自然流露也！”

他说：张劲公江苏常熟人，现年逾半百，思回故里，人之恒情。设或力所能及，他当尽全力谋求之，以了此心愿。

有志者事竟成。1958年，张劲公到底调到了苏州师范学院，离开了四川。其后，吴宓告诉我，张劲公的调动，他稍稍尽了绵薄

之力

关于吴宓不愿离开西师、北上清华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年,1955年的5月,他的观点完全打了个颠倒。那时,正雷厉风行开展肃反运动,学习毛泽东亲自加了批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对胡风的上书、他和朋友之间的通信,都一一论定为反革命言论,甚至是反革命行动纲领。而这些信,按常人看来,都是正常通信。此时,全国各地都投入了这个热火朝天的运动,都在清肃“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西师学院自不例外。人人都在肃反浪潮中诚惶诚恐。吴宓悄悄对我说:我也和大家一样,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当作暗藏的反革命。尽管我自己完全坚信,我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事情很明白,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观点,任何人都可以被揪了出来,随便拈几条文字、信函,定为反革命。……

最后,他痛心疾首,说他悔不该于1949年来到四川。“就在武汉大学不也一样可以尿遁,不去台湾吗?”也悔1951年没有应邀到清华去,“却赖在重庆”。他说:“你看,这儿的一些人有多么左!……我这人就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15

关于日记

1951年,在登记、交代历史,继之以“三反”运动的紧张气氛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批判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祖平。

当时,西南文联举行盛会,学习并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邵祖平在会上闯了个祸,我和吴宓都未在场。据邵祖平后来向我们两个诉说,他在发言中提到鲁迅,竟在颂其俯首甘为孺子牛之精神时,顺便形容鲁迅病体清瘦,说了“很像久吸鸦片的瘾客”。

西南文联领导则宣布说:邵祖平在发言中肆意诋毁鲁迅先生,说鲁迅“像个鸦片鬼”。人们因相信文联领导的话,认为邵祖平是在狡辩,妄图抵赖“罪行”。

吴宓告诉我:邵祖平这个人和他同时期留美,回国后大家都任大学教授,唯邵只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谋得国文教员的席位。邵因而由愤懑转为自高自大,牢骚满腹,发为连篇累牍的旧体诗。恰好梅光迪约同胡先骕等筹办《学衡》杂志,接纳外稿。邵祖平看不起教授们,独与胡先骕交厚。胡将邵的旧体诗大量编入了《学衡》创刊号。刊出后,读者大哗;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分别为文批评,

鲁迅指斥尤不客气。

吴宓说：邵祖平为此耿耿于怀，日今老气横秋，桀傲尤甚，“有渚内必形诸外”，说到鲁迅，随口称为鸦片鬼，“当属确切”。

批判邵祖平的火力越来越猛。大会小会，口诛笔伐；报上批判邵祖平的文章日必数篇。众口一词，确认邵是有意诬蔑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大家分析，追索根源，自然触及鲁迅当年对《学衡》所刊邵祖平作品的批评。而吴宓是《学衡》的主编，批判之火也就自然烧到了吴宓头上。虽然并未在报上点出吴宓的姓名，却也呼之欲出。而且，文联领导两次找吴宓谈话，要他和邵祖平“划清界限”，出来揭发邵的“反动言论”。西南师范学院领导也为此和吴宓多次交谈，启发他认清形势，“站稳人民立场”，“勇敢地、坚决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揭露、分析、批判、斥责邵祖平”。吴宓除了在每次和领导的谈话中详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及他个人对邵祖平的一贯态度外，又前后写了3次书面交代材料。还写了两篇批判邵祖平的文章。但被告知，文章态度“不够坚决”，未能采用。

1951年冬初，文联在西师组织了一次揭批邵祖平的座谈会。中文、外语、音乐、美术各系的教师，概属文联会员，基本都到会了。文联最有威信的领导、作家柯岗、女作家曾克也来了。会上发言异常踊跃。维时，人们思想觉悟提高极快，故尔批判火力极强。毫不迟疑地用上了最为尖锐的词句，痛斥邵祖平。由于到会的年轻教师占大多数，而他们对20年代——《学衡》早期的事知之甚少，叙述情况时不免走样，甚至张冠李戴，把郭沫若的话误为邵祖平的。20年代，郭沫若在创造社，曾与鲁迅对垒，笔战交锋之际，自然有些不敬语言。今天，人们就将其误断为是邵祖平诋毁鲁迅先生的言辞。

而揭发批判之际,发言人往往要捎上“邵祖平在《学衡》主将的纵容下”,有几个人甚至说:“我们不能不怀疑,邵祖平的这次表演,是在《学衡》主将的指使之下进行的”;“这位主将现正在重庆,和邵祖平不时相见。邵祖平应该交代他和他的主将进行了哪些勾结”云云。

吴宓在场,目不斜视,毫无表情。

散会时,他独自步出会场,缓慢,稳重,昂首漫步,态度安祥。

第二天清早,吴宓找我说:“我筹思了一整夜,决定把所有的日记全部烧了。”他抱来一个大纸包,说:“给,全在这里。你拿到柑园你母亲那儿,趁烧饭之便,烦你亲手放入柴灶炉膛,妥善烧化。记住,亲手,确确实实,妥善烧化。”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比照近来批判邵祖平所表现之深文周纳,他历年所记日记,尤其是这两年,很多地方的词句都容易被曲解。

我讥他庸人自扰。随后又详细解释,我认为,批判邵祖平,报上的文章,会上的发言,都不过是我们这些文联会员个人各抒己见,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意见,绝对代表不了人民政府。目前,大家政治水平不高,有点宁左勿右,这更联系不到政府头上。据此,我劝他不要自寻烦恼,更不要烧日记。

他说我头脑简单。“你难道不知道,批判《武训传》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说:从批判这部写武训办学的电影发展到了批判武训这个人。数不清的调查材料、文章,断定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孝子,利用办学来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瓦解农民武装斗争,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仿佛武训比考茨基、托洛茨基更懂得怎样反对无产阶级,比清王朝的王侯将相更懂得维护封建统治的战略策略。……“对死人犹是如此,何况活人?对一个乞丐尚且如此苛刻诛

伐,何况我是一个薄有虚名的大学教授乎?……我认定,保留日记乃会留下无穷之麻烦。……”

接着,他又论:何以要烧日记以避祸?此乃由于,“我对历史上之文字狱作过一些研究。”文字狱可分两类:其一,舞文弄墨者确有不滿乃至仇恨,下笔泄愤,落墨疾仇。题其书曰《维止录》者,实有不共戴天之仇,就是要砍下雍正皇帝的头颅。刘禹锡两度贬谪期满回京游玄都观之诗,一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再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都乃有感而发,意在讽刺。其或为朝廷得知,兴狱论罪,均在意料之中,乃敢甘冒大不讳,勇敢为之。另一类则不然。舞文弄墨者决无仇恨之意,反叛之心,“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之作,何曾想到以刺清廷,讽朝廷皇室不识字?且清朝各代皇帝谁不饱读诗书?他们的朱笔诏书大都是写的汉文。“不识字”,又何以讽刺彼辈?竟然被论为反诗,实在冤枉。还有不少人竟是歌功颂德,而横被奇冤。颂朱元璋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何曾梦想到朱元璋会认定“作则”乃“作贼”之谐音而治以大逆之罪?……两类文字狱大有区别。前者冤而不冤,含愤就义,有慷慨悲歌之雅。后者冤哉枉矣,含冤九泉,负屈千古。今我虽属前朝遗民,却无反对新朝之心,但有拥护之赤忱,笔下绝无指斥朝政之处。然而文字之义,引申别解,举不胜数,弦外之音,更难定论。横看成岭侧成峰,日记中可资猜疑旁解、断章取义、构为第二类文字狱之处多矣。“我拟将其付诸丙丁,盖在避免此种无谓枝节而绝莫须有之烦恼耳!……”

我无法说服他,便同意接受委托。只是今、明两天我都上午4节课,下午开会,决定后天回柑园宿舍去办这件事。他不无遗憾地抱着日记过去了。可是次日晚上,他却告诉我,他到底还是舍不得烧掉那些日记。已改变主意,把它们整理一遍,凡可能被曲解误会

之处概予修改或削剪而清除之。他当即把业已“加工”的日记拿给我看：“你看如何？”

他是倒着由今而昨，才修改了十几天。挖补、剪接的痕迹清清楚楚，我感到好笑。但觉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未置可否。直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前，他告诉我：日记已经修改完成。并说：他已停止记日记。

可是，到1952年秋至53年初，西师迁北碚新址后，他又恢复了写日记。并将前此未写的那些日子，凭记忆一一补记无缺。这是后话。

吴宓1951年即第一次整理日记，花了相当时间。又是星期六了，照例我要回柑园家属宿舍和母亲及孩子聚叙一下。正要动身，吴宓来了。他告诉我，日记整理已经完成。扯下、剪下的残笺无法处理，丢垃圾箱、厕所当然不行；自己烧，会有纸烬烟气，易引起猜疑。唯一办法仍得烦我带回家，塞在柴灶里烧掉。我不便拒绝，却见残屑里有一迭完好的整页。

“我可以看看吗？”

他没有反对。我翻拣浏览，发现了一篇很有特色的文字——那次高教系统公判大会之夜，吴宓写的日记。可分为三大部分，大意为：

头一部分：叙述公判大会的概况，其中写明共判决了若干人，枪毙了原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侯枫及各高等学校捉去的人犯某某等若干人。然后记了回校后西师大会重复全市大会上西南文教部书记的号召，动员师生员工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彻底交代历史。随即分组座谈，谈参加公判大会的认识，表示响应“忠诚老实运动”。发言确属争先恐后，而其内容则完全一致。人人痛斥所判诸犯罪恶滔天，侯枫等犯尤属罪在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可

宽大,不是非杀不可的,就刀下留人,判以无期徒刑等等。“我坚决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再三恳表忠忱,热烈拥护人民政府迅速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宓亦主动发言,比众人简短多多,但其实际与众无二,且宓概属由衷之言。”

接下去说:“此举确出宓意料,镇压如此严厉,教授辈亦有人头落地者。”当劈劈啪啪,就在场后枪毙众死刑犯时,“宓见会上师生,莫不震恐。尤以教师为最,……然此只一顷刻,随即众情振奋,高呼镇反口号……”到底这种镇压是否过火呢?“宓乃一介教员,无力全面考其是否允当”……,但从情理判断,共产党继国民党混乱二十余年之后执掌中国政权,且国民党之前,中国分崩离析,动乱已久,共产党当政,“理应治乱世用重典。……宓乃深信共产党此举,应属不得不杀。……如自人道观之,侯枫辈良可悯也。然自华夏振兴,中华民族之复兴,必须建至高之阜极,以开万世之太平,则杀一儆百,以教平四海,允属必不可少。是以宓之随众振臂高呼万岁,座谈发言恳表拥护者也。”

接下去他自问自答,谈了三个问题:

镇反还会扩大、高教界还会有第二、第三……批侯枫吗?答曰:无法肯定,事在当局者决断。可能这就是最高潮,也可能方兴未艾。“质之《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者可能性较大。”

我吴宓“可不可能成为诛戮之对象?”答曰:八成不可能。因为“宓从未涉足官场,从未反对学运,平生更无反共之言论。”但有两成可能。因为以时下风行之政治标准言之,宓留学美国,可论为美帝国主义培养之文化走狗;宓从事中华古籍之研究,可断为封建之余孽。宓复于国民党中有世交如于右任辈,则“铲而除之,大有可能。”

“然则悔不该留大陆乎?”答曰:“绝对不悔,虽死无悔。”于此,

他首先申述,当他决心留在大陆之时,就已下了决心:纵使肝脑涂地,也愿涂于祖国土地之上,死于自己同胞之手。早有这种思想准备,还悔个什么?继而旁征博引,论述一个道理:观中外历史,大凡改朝换代,开太平盛世,总得这样那样死一些人。或死于冲锋陷阵,“或死于兵祸池鱼之殃;或死于镇乱重典之治;或死于走狗之烹”。于死者个人而言,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有青史留名,配享廊庙;有暴骨沙砾,葬身草莽。然而不论怎样死,死得如何,仅就死之一端,扩而观之,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服从于结束离乱,开创盛世。”他列举自鸦片战争以降,八国联军入侵、北洋军阀混战等等死人无数,国弱民贫的种种事例,解放以来共产党锐精励治,干部勤政清廉,行政效力之高,各界民众之一致奋发与竭诚拥护,“均必平生所未见,亦读史所未闻”。乃得出结论:人民政权执政之新中国,“必可百废俱举,不久之将来即可国富民强,雄踞东亚,……”。“有此前景,则必纵使不幸罹难,虽肝脑涂地亦当含笑而甘之也!”

看罢这段日记,我疑惑不解:这么好的一段日记,写得真实、热情、思想进步,品格高尚,何以要撕下烧掉?

他说:你虑其一,未虑其二。日今衡事论人,必曰右、中、左。这段话,右者观之,必曰:兔死狐悲,禽兽犹伤其类;尔吴宓并此种感觉竟亦乌有,中华道德云乎哉?人性、人情云乎哉?中者观之必曰:徒费词章,说些空话,无益,无聊,无趣。左者观之,必然嗤之以鼻,或曰:说来说去,其实是畏罪惶恐,乃此巧饰其词,冀博同情而滑过关去;或曰:反复申论,说得好听,拥护赞颂之中,夹攻击诬蔑之词,真是个老牌反动分子!“我想来想去,烧了最好。……”

我劝了一阵,见他主意坚决,毫不动摇,也就不再说了。

我只是问他:有关我俩友谊的记载,消除了没有?

他答：消除了，消除了，“彻彻底底，天衣无缝！”并说：不只是简单地抽掉，而是换以另外的记载，使其不着半点痕迹。于是他翻开我们过往交谈时间的日记给我看，那里面全部换成了其他的记载。其中有些时间还从根改造，记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城市。

例如：1947年5月，各大城市学运高涨，大学全部停课，武汉大学也不例外。吴宓从武汉飞到南京，和我相遇于于右任家，随后又一道在南京、上海。历时6天，他才从上海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回武汉。来往共历时9天。原写之日记逐日记载明确，其中7天日日有我。现在经过改造，日记所写：他根本没离开过武汉，而且大半时间都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内，逐天何来何去、做什么事、会何人，历历不爽。

又如：1944年，他在西南联大请假一年，受聘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原本是同年8月23日，从昆明乘飞机到达重庆，从8月24日到29日，他和我一起相处往还了6天。8月30日他独自进城买得31日的船票（30日那天遇空袭警报，躲了很久），和我分别，他独自去了四川江津白沙，吴宓清华学校时的同学好友（时已亡故）吴芳吉的家乡，访问吴芳吉旧居，看望吴的家属（吴芳吉逝世后，吴宓一直接时寄钱抚养他的遗孤。吴芳吉的长公子吴汉骧现为设于四川永川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退休教师）。盘桓至9月下旬，才搭汽车去成都。原来的日记一一如实记载详确。

现在却改写为：1944年8月23日在昆明复燕京校长梅贻宝的函；8月30日“复重庆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养电”；9月23日才“由昆明出发”，不是坐飞机而是坐的汽车，“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于1944年10月26日傍晚才“抵达成都”。

改写部分是整页替换了的，只是装订欠佳，痕迹明显。

我看罢笑道：改得很好，确实看不出痕迹。只是1944年这笔，

任何大学都是9月1日开学,你受聘到燕京,9月半还在昆明,所为何故?10月下旬才到燕京就任新职;8月30日,即开学头一天,才去电顾毓琇退聘,所有这些,概属不合常规,能不叫人生疑?

他只微笑说:这个改装只是防备人家翻了日记,发现我俩从前认识,谁来管你合不合常规……

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吴宓又彻底修改了他的日记。

为了还历史的真实,现将吴宓1955年修订日记的情况详记如下。

大概是1955年的初夏。这一年,重庆热得特别早,三八妇女节那天,人们就穿汗背心,持蒲扇乘凉了。(我的记忆只能记得清楚是单衣挥汗之时,故略记为初夏)

运动由批判二胡(胡适、胡风)进而公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是由毛主席亲自审定、逐条批注定讞的。追查胡风分子雷厉风行,凡历史上曾与胡风集团任何一个成员有不论什么样的来往,都得自己交代,广泛检举。一经查有嫌疑,即收押审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H教授(后来调至成都某大学,前几年逝世了),即被捉去,关审了一段时间才放出来。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吴宓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仔细阅读了,不禁深为惶恐。《材料》的单行本分发下来,运动也进入了高潮。吴宓再次细读了《材料》,惶恐加深。中文系那位系主任H教授被传讯扣押的消息令吴宓更加不安。当晚,他通夜未眠,细读《材料》,逐条对照自己日记、年谱中的某些地方,觉得如果以《材料》按语的观点方法来处理,皆可施以《材料》中的类似判词。他不禁心惊胆战。天刚亮,他去找李源澄,诉说了他的忧虑。李源澄答:

“我和你的感觉完全一样。这绝不是我们做贼心虚。我们凭天可表，绝无毫厘不臣之心，而是胡风这些人妄生事端，弄得天下书生忠奸难辨。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颂扬解为叛逆而横受诛戮者，史不绝于书。……我也是彻夜未眠，已找出一切日记、札记之类，填进灶膛，煮了稀饭。我劝你一了百了，把日记、年谱全部烧了。这是最妥之办法。”

吴宓沉吟了好一阵：完全烧了？我舍不得。“雪泥鸿爪，好歹留个生活的痕迹。”又说：“我仔细琢磨，余所记文字可资曲解之处不太多，只须把这些地方修改修改，便可放心。”

李源澄说：你主意都打定了，找我商量什么呢？

吴宓：“你能不能帮我一把？”他说他改写换页之后，叫李帮他审阅研究，看看有无不妥。……

李源澄却说：“我哪有这个时间？何况我视力欠佳，这事，你找张紫葛嘛！”

吴宓约我那个星期六到他那儿夜战通宵。他自己选定了应予修订的地方，换写了新页。夜战开始，他拿出改写的新幅，叫我对照原日记前后相接之页，仔细辨看，有无不妥。并要我以“吹毛求疵”之眼光，看他的新页所记，有无破绽。

他换写的新页搞得十分认真、审慎，哪怕只删两句话甚至几个字，都全页重写替换。我每看一处，都询问他何以要砍下旧作。因为很多地方，我都认为原作千妥万妥，不知他何以要修改删除。

经他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他的顾虑可以理解。结果，他所预写妥善的替换之页，我都未能否定。也觉新页和前后相接之处并无破绽。只是早期日记、年谱的几个替换之处，临页相较，墨色显有新旧之别。总不至于硬要拿去刑事鉴定。我又没有办法给他弥缝此一破绽，也就没有吭声。

清晨5点,大功告成。他叫我给他拆开日记,换上新页,装订妥善,恢复旧观。这可难着我了。拆、换我能办到,装订我却无法。我最不会干这种活儿。商量一阵,决定:我马上动手,给他拆开原日记,换上新页,一本一本棉线拴札起。并且跟即将拆换下的旧页,在他厨房里,填进灶膛熬稀饭。我俩心情都有点紧张,但这是在他北碚新居自己家的厨房里,比起4年前那次处理日记,我俩在磁器口时,住在教室楼上,不敢亮火冒烟,必须要我带到柑园家属宿舍我母亲那儿去烧,要方便多了。次日决定,我去找黄稚荃来,就说吴宓的日记有若干本扯散了,请她来代为装订好。

如法施行。天大亮了,我操作,他巡风,烧完替换下来的残页。当晚,黄稚荃应邀和我同来。她丝毫没有怀疑我们说话不实在。于是3人一起,她操作,我俩参观,且作且聊闲天。她和许多书法家一样,精于金石,也擅长裱糊装订。驾轻就熟,不到夜11点,就全部完成了。经我们3人反复比较,与其他原封之本毫无差别。

兹就记忆所及,将吴宓此次修订日记的删除之处及他删除的原因(想法)条记于下。

一、关于毛彦文的。

1、第一次见到毛彦文的情节及他的感觉,中有描写彦慧美动人的词句(只有几句);

2、毛彦文与朱君毅离婚,吴宓作他们善后委员会主任之处,及吴朱转交赔偿金时,有时毛亲来取钱,颇为缠绵,吴宓很为动情,却极力自持,未及于乱。

他要删除的理由:恐据此论为吴宓“一贯作风不好”,秉德自持,坐怀不乱云云,必被斥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不如彻底删除,落得干净。

二、记王国维自杀原因处,删了几句话。大意是:

有些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愤激填膺以斥革命党,而以效忠清皇自誉。及清鼎既革,又摇身一变,装扮成自来革命之民国要员。先生(指王国维)深恶此辈无耻之徒,不愿与彼辈同复载。

删除理由:这段文字最易误为“借古非今”。且王国维蓄辮子,穿马蹄袖衣服,论者多已确认,他效忠清室,并终于以死殉之。我的此段文字,虽系据王国维平时对我愤愤然言之再四的原意,然已死无对证。留在我的日记里,徒为我贾祸也。

三、1937年冬,离开北平南下一节,删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长沙情节。

理由: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必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实为“道德败坏之徒”。(按:1953年朱小姐兄妹来北碚探望一节,根本未记在日记中。因为1952年后,吴宓写日记已至为慎重。原因及情况详见本书后文。)

四、杭立武到武汉大学拜访,动员吴宓去台湾及随后派中年男子来逼各节,全部删去;许逢熙去武汉邀吴宓同行飞到重庆,又柴有恒赴碚恭请,执弟子礼一节,也删除了。

删除原因:

1、以“当前”之政治水准观之,杭立武各节,必被认为我吴宓与杭立武有深刻之政治勾结。而我与杭仅只认识而已,绝无特殊关系;无法交代。

2、许逢熙于1953年调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审查历史,他有黄金一条,未曾缴公,在学习会上自行长跪求饶,随后就高血压发作去世了。“因而也未闻彼之政治历史有了结论”,则此“许逢熙实为政历未清之辈”。“彼去武汉聘我,不过是慕我虚名,想弄来作招牌,冀利招揽学生。彼与我实无私交可言。写在日记上,徒自生

事,有口难辨。”

3、柴有恒去碕邀我,执弟子礼,虽与许逢熙性质不同,然我与彼亦只1945年在黄季陆邀宴中相识。他去邀我,礼贤下士,实为学校延揽教师作法,按现今之观点,实难理解。且此柴公也是迄今(指1955年肃反时)尚未获得政治结论,吉凶难卜。我何必留此痕迹,自招怀疑。

五、1949年暑假,在北碚渡船上遇到6个相辉学院学生,次日又在重大遇到7个重大学生等情,原有简略记载,也删除了。

删除原因:

我在日记中斥相辉诸男生为纨绔子弟,“朽木不可雕”云云,乃以今日之政治觉悟衡量之,彼辈实皆“思想进步,有工农气质”。原记云云,乃有诬蔑之嫌疑。而重大七生,解放前均先后逃离大陆,概属资产阶级及官僚子弟。将彼等载于我日记中,又多一起无可解说之关系。

六、删除了多处与李源澄谈论毛主席文章文笔之记载。本来,他们的谈论基本上是极其佩服毛泽东的文采词章。认为毛主席的文章,将马列主义之深刻哲理浅显化,通俗化,深入浅出,故能产生莫大之宣传效果。而其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无不得自中国古籍。是以毛泽东之功力,首先得之于中国传统文化。

为什么一定删除?吴宓认为:我们谈论之本意,确乎是颂扬,表五体投地佩服之忱。然而我二人之马列主义水平实在太低。自量颂扬必然“难合符契”。设或精通马列理论之同志审查之,必然诸多悖论,最易被论定为反动言论。故尔万万不可留存于日记之中。

七、尽量删除女学生、女教师、女职工和他往还之事;彻底删除Z女士和他相识、来往的情节。(Z之情形详见后面章节。)

理由：一如删除天津朱小姐，部分删除毛彦文往还情节的理由——避免涉嫌“作风问题”。

有关他和邹兰芳的事情，他根本未按真实情况记载。原因很多，主要是怕牵涉帮助他的这些朋友。（详见后面有关章节）

八、关于谒见邓小平，李源澄谈邓书记关怀之“绝密消息”，以及关于和董学隆争吵之事，原本记得极为简要，可以说只是提了一下。如原记有：“今日源澄兄谈，宓文之发表（按：详见后面有关章节）及诸多优遇，悉出邓公小平之惠”云云，这次整理，均彻底删除了。

理由（原因）：

1、谒邓书记，与董学隆之争（详情见本书后面几章），如被摊出来，各级干部、领导都会据此认定：“此吴宓乃极不安分之刁徒，不可不收拾之。”

2、李源澄之“绝密消息”万一露出，必将祸及李源澄，并牵连涉及消息来源之许多好人。“则余之罪过大矣！”

日记整理、装订妥善后，吴宓又作了一番统计。两周后，他情绪良好地对我说：

我详细计算，删除的日记，连同在磁器口时所删除者，不及日记总篇幅的百分之三、四。日记之原貌伤损不大也。

1955年秋，神州披上了新装——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为此，1955年国庆，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狂欢之夜的第二天，我和李源澄、吴宓聚谈于吴宓家。这天三人的情绪都很好，李源澄高兴之际，想起了吴宓的日记。因问他的日记到底怎么了？烧了还是修补了？吴宓答：修补整理了，弄得很好。李源澄索取一观，他先逐本察看了外观，认为装订妥善，毫无拆订痕迹。然后细看了1951——1952的两年。看完，合卷赞叹：

“修补得很为精妙，看不出丝毫痕迹。恐怕福尔摩斯也找不出半点毛病。”

吴宓微笑说：“全赖紫葛、稚荃大力相助。”他简叙了审阅、装订过程。

李源澄却说：“然而我有一言，只怕夫子听了要勃然大怒。”

吴宓：“天厌之，天厌之！我哪里是不听逆耳之言的人呢？你尽管说吧！”

李源澄：读夫子这个日记，不待掩卷思索，便有直观之感觉：这位学者，吴雨僧先生，乃是生活于悬空而封闭之世外桃源。与其所处之时代——20世纪50年代，简直不生关系。起伏相接之轰轰烈烈的运动毫不触及夫子，而夫子亦对诸般运动无所感觉，不，简直是毫无所知、所见、所闻。“恐百数十年后的学者，还得先进行考证：这位吴雨僧曾经生活于20世纪之50年代乎？”

他转问我：“兄台以为然乎？”

我说：汗我茅塞，诚如兄言。

李源澄又问吴宓：“夫子以为然否？”

吴宓木了好一阵，坐正身子：“先生似乎言犹未尽，请毕其词，宓宴安承教！”李源澄徐徐划亮火柴，点燃旱烟：“夫子真知我者也！谨遵命。”他说：倘有一二学者，广其忖度，查一查50年代之报纸，翻开重庆《新华日报》，乃不得不大喜过望：咦，1952年7月8日刊有吴宓夫子之检讨一文，说得如此明明白白：我要努力改造思想，以求勉为人民教师。则此吴夫子之政治倾向明矣！况且，文中具道往昔之思想情感甚悉，则吴夫子绝非不国不共，超政治纯学术，更不是生活在上下左右皆真空的世外桃源也！那么，对于研究吴夫子之学者来说，此篇文章，抵得上你这日记之价值十倍而有余。准此，小弟建议夫子，把这些残存之所谓日记一火而焚之。约

而言之,你这日记实在无甚价值了。然而,如用批注《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之手眼,用高倍显微镜吹毛而求其疵,仍不能担保这日记绝对无懈可击,无隙可乘,“因此,我劝夫子,仍以烧了为宜。只有烧了,才六根清净。——夫子以为然否?”

吴宓说:你不愧是历史学教授,言之甚当。然而闻君高论,“更觉余之措施恰当。”日记也不用烧,且今后还当照此格式写了下去。何也?今日令人感到我确与世隔绝,乃纯粹学术之辈,“则可保我不至于做俞平伯,更不至于串演胡风分子。斯乃余愿足矣!”尔后,后人阅之,或疑其语焉不详,或疑其不尽情理,或怪其悬诸半空之上,或有好学之士深究而博览文献,发现《新华日报》之文,“能如先生适才所云以触类旁通之,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正余之望也,岂不善哉?!”

李源澄以未执烟管之左掌抚膝而叹:“善哉夫子之深思远虑也!”

19年后,即公元1974年。我俩在经历了坎坷岁月而秘密重逢时,吴宓曾对我说:我的日记,连同自编年谱等稿,全部被抄去了。七年于兹,(文革初期被抄去),并无纠葛,我亦高枕无忧。如无那年的整理功夫,“曷克臻此?你与稚荃之助不可忘也。”

我问:“抄去后还写日记吗?”

他说:还记的,一直记到去年(1973年)。不过,我已掌握了要领,后此所记,概无自贻烦恼之笔。现在(指1974年)视力进一步衰退,我已看不见写小字了。“日记之作今生休矣!”

他随又叹息:日今又多一重要心得了:自古最诚朴鲠直之忠臣也得小施权术以自存。肖何功成名就,亲为相国而乃多买田宅以自污,果能免除汉高之疑忌而全肖何效忠汉室之终始。

附带记叙:1955年我见到的吴宓自编年谱稿,写至1947年4月中旬。

16

治学之道

已是1952年1月了。这天,几个高年级女生来我处闲谈,说及吴宓,深表遗憾。说她们深知吴先生学贯中西,诸如莎士比亚某剧作于何时,初演于何时,初版于何年何月,如数家珍。可是近来她们多次问他莎士比亚,他竟问非所答,或支吾其词,甚至连莎翁的几大喜剧都颠倒不清。……

近来学生拜访老师,常系奉组织之命,或探究某事,或启发某问题,或动员何任务。我疑学生们是要我查问吴宓何以如此。晚饭后便据实转告吴宓,问其何以。

吴宓注视我久之,说:“你连这点也不懂?自来炫能实足以贾祸。你可告诉诸生,雨僧先生患老年痴呆症,健忘殊甚!”又说:F书记原来就是教莎士比亚的,我何敢逞能?何况莎翁并非无产阶级。

自合校以来,吴宓深居简出。总是一身陈旧褪色的蓝布长衫,出房必携手杖,而手杖则是粗劣的无把木棒。每逢周末,全系师生文娱晚会,他总是及时到场,举止木讷。会终全体扭大秧歌,他第一个站起来,走在最前头,拄杖龙钟,步履摇曳,似学京剧台步,又

似惴行独木桥上,总之绝对不像秧歌,也绝对不合乐鼓拍节。学生们笑,他却茫然四顾,似惊似惑。学生们乐了,拍手叫好:“吴老师进步了,进步了!跳吧,吴老师,就是这样跳!”啦啦词甚至喊道:“吴老师,跳得好,各位老师快快学习到!”

晚上,吴宓和我聊天,说:二十四史读通则易,读懂则难矣!古人云:学因年进,旨哉斯言。

默然良久,他又举周邦式为例,说周镇反运动开始后,拆了供桌,将那封毛主席来函锦缎包好,专箱收藏。同时收藏的,还有那对珍藏了30年的铜压尺(镇纸),那是他结婚时毛泽东送的礼物,虽未镂刻毛的姓名,上面的两行题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却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周邦式也不再打太极拳了,不再自己开伙,而是与夫人一起上食堂用膳。每顿菜肴非常简单。甚至有人提及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他也连连摇头,郑重声明:“不,不,完全误传。……我,只不过是毛主席的学生,一个极不成器,叫毛主席丢脸,应该开除学籍的学生!”

1952年的1月中旬的一天,晚饭后,我从食堂出来,几个三年级男生正簇拥着吴宓,朝我们的宿舍走去。见到我,一起招呼。一个学生对我说:

“我们正在和吴老师聊天。我们几个都有同感,明年我们就要毕业了,大学几年,什么也没学到,毕业之后能干什么呢?想到这些,很是不安……”

我只能宽慰鼓励他们,说:目前,投身各项运动,政治上进步了,还愁不能为人民服务?书本知识以后随时可以积累,云云。

学生散了,吴宓到我房里闲话:学生们担心学无所成,实属真情。而我辈作老师的,也只能答以大道理,如你所云。然而这确实是个问题。前朝平定天下,总是很快就休养生息,复太学之常。今

者天下救平数年,而运动相接,“太学不学,其将伊于胡底?”

其实这时还是上课的,只是上几天停几天,真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同时师生政治活动太多,下了课就撂开功课不管,如何能收教学之效果?

这时,李源澄来了。便三人一起聊天。闲谈常如原野信步,随兴所至。说着说着,便转为论治学之道了。这个问题,我和吴宓交往10余年,无数次谈到,但都不过点滴言之。今天因为李源澄向他提了些问题,他便讲得稍稍系统一些。他说:他归结为“四大皆实,缺一不可”。

一曰勤奋。有史以来,人类之一切活动,生生养息,百工巧匠,老农老圃,明君贤相,一言以蔽之,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大圣大贤,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之勤奋。诚然,才智有高下,敏悟有捷钝,而欲有所成,必须勤奋。业精于勤,荒于嬉,设或不勤不奋,虚耗光阴,虽上智之才,也必无所成就。反之,勤能补拙,即使天资稍钝,苟能楔而不舍,终必有成。是故西方有格言:天才出于勤奋。连爱迪生也说:他的成就,主要靠的勤奋。宓自束发受书,成绩未尝落后于侪辈。及负籍美国,能为导师所称道。执教以来,各方谓我,学问尚有根底。窃自衡量,尺寸之进,莫不源于勤奋。今宓年已花甲,阅人多矣,还未见过仅靠天分,不加勤奋而学有所成者。忆余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宓不能及其十一。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学,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中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

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虽假日、星期也未尝逍遥优游。今莘莘学子，或一曝十寒，或嬉戏岁月，欲求学有所成，岂非缘木求鱼。

二曰谨严。治学必须谨严，此乃欲求真才实学必不可少之前提。而治学谨严之本在于为人谨严，生活谨严。其为人也放荡不羁，生活自由散漫，起居无常，随心所欲，则其治学必然虚空浮躁，绝不可能学有所成。所谓治学谨严，其道有四：一是择善固执，绝不朝三暮四，时作时辍；二曰循序渐进，谨恪认真，绝不躐空夹生，弄虚作假；三曰谨心向学；四曰严苛以律己。向学，指对待学问——知识；律己，指严格约束自己，在治学修业方面，虚怀若谷。圣人曰：“弟子……谨而信”，此乃说的为人修身之道，待人接物之际，皆一谨二信。余所谓：求学之基本态度也必须一谨二信。析言之，尔欲治某一学，例如：欲治经学之小学，尔下此决心之前，务须慎重三思：吾有此基础乎；时间、精力许可乎？慎重考察，认真严肃。一经据此斟酌作了决定，则当信守决定，竭尽其努力，百折不回，务底于成。即绝不推拉拖延，马虎了事，更不见异思迁，不半途而废。严苛以律己者，严格苛求自己，学问之道，务须虚心求实，来不得半点浮夸，切切不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

三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实为不可多得之佳品，宋人将它取出并《中庸》之章，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后生初学之教材，实属法良意美。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其根本，又重在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大学》言：治国、平天下都得植根于个人的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即：“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洞彻探求客观世界之奥秘，唯能如此，始可以致知——求得真知灼

见,得认识之进步,求得真才实学。益以余之亲身经验,平生所见师、友、诸生之治学经历,乃能确切认识:欲求治学有成,必须诚意,正心,格物以致知。致知是个关键,正心是其基本,尔欲学有所成,必须诚心诚意,端正态度,即勿存邪僻之心,取巧之意,更不得不懂装懂,“嘴尖皮厚腹中空”。立定决心,务求确切掌握此一学问,务求登堂入室,穷其究竟;求得真才实学。

四曰讲究方法。方法不是取巧,学术、科学的进取,绝无取巧之可能。方法者,求其循序渐进,由渐而入,收事半功倍之效。以记笔记而言,今日诸生,恒多且看且记,对书抄录。于是记时了然,合上笔记本及原书则茫然矣。以余之经验,作读书笔记,应在详读某书一章一节甚至全书后,以记忆所及撮要缕记之。盖于刚刚看过,书中梗要及精华之处,获有鲜明之印象,但印象并不深刻,设或抛开闲置若干时日,则印象迅速淡化,转而模糊无存矣。设或当即默诵。撮要而缕列记录之,则此默忆、撮要,组成条款,以自己语言表述,秉笔书之于纸,等等过程,皆反复习、思,加深印象之过程。设或某一段落、要义默忆不全,以及前贤警句未能全忆其词章者,皆可翻检原书核对校正,而此校对校正之过程,亦即复习深化之过程。凡此等等,众效齐奏,便可使所阅之书熟识脑中,成为吾人牢固、妥善之真知。真知灼见妥且善,亦即《大学》所云:“止于至善”。

言及方法,先贤之旧章万万不可全费。即如前人所谓读书五到——眼到,耳到,口到,心到,手到,即为治学必遵之要诀。眼到,专注阅读;口到,朗声诵读;耳到,注意听读,包括听自己诵读;心到,一心专注;手到,动手记笔记、作实验、写文章等。对此“五到”,绝不可视为老生常谈,无足轻重。《论语》开卷第一句说:“学而时习之。”前贤注曰:习,鸟数飞也。说的是小鸟学飞,得其父母传授之后,必须数数练习,反复自飞,始能将“飞”之本事学到家,进而展

翅高飞，翱翔天空。吾辈治学，岂可不数飞耶？凡百学问，追求之道，归根结底，须将学问印之脑际，烂熟于胸，融汇贯通，成为自己之真知灼见。理工诸学，重在实验、实习，其理一也，必须五到，使该学科之定律定理了然于胸，深印脑际，举手操作，驾轻就熟。世界上有哪种学问，学子无须深印脑际便可谓为已学到手了呢？然则不五到，又如何能够印之脑际呢？

吴宓最后归结说：此四者，必须切实办到，而非徒托空言。故曰：“四大皆实”。欲求学有所成，必须在这四方面下功夫，四者缺一不可。中外前贤，谈治学之道的教诲多矣，综而观之，不外这四端。余以为，我辈为人师者，应不仅止于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尤应鼓励诸生勤奋治学，传以治学之道，以此四端要求诸生。遍观英美之高才教授，和美国之白璧德，中国之著名学者，如我在清华所聘之四位导师，莫不以勤奋、谨严等项要求诸生。例如听课前写预习作业，听课后再写心得体会。教授之讲授只不过发幽阐微，指引研究之方向，开阔学子眼界。而教学之主要效果，还得求之于诸生之预习，复习，广读参考书籍，深入钻研，以猎取知识。

他进而感慨说：自抗日战争以来，我国大学之教学水准江河日下，以至局限于教材。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则两肩承双耳，出席课堂听讲而已。“教学质量云乎哉？”……

我的治学之道与吴宓大致相合。不过我多年来喜欢阅读心理学、教育学及有关教学法的中外书籍。谈话间，我引述了心理学、教育学的理论来为他的主张作注解。李源澄也多次插话，引述古人治学之事迹，表示他也赞成吴宓的治学之道。

三人正谈话之间，来了历史系某班的学生班长，找李源澄。他当然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这位学生班长说：“断代史”很难学，历史史实头绪纷繁，还要批判认识。同学们很忙，没工夫复习。本

来,李老师教的进度太快,很多同学已经跟不上了,马上要大考了,希望老师考虑到实际情况务必设法保同学们过关。

李源澄表态:决不难为同学。却是想不到妥善办法,问这位班长,有何良策。

班长的主意很简单:拿两节课“总复习”,请老师选出“要点”,反复温习,考试时就在这范围内命题。

李问:“选几则呢?”

“五则,最多六则。多了,同学们消化不了。”

李表示同意。班长满意而去。

这里吴宓问李源澄:“这岂不是指定几个考题,课堂熟习答案?”

“你还不知道?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各系这学期都是这个搞法。”

这学期吴宓没有任课,他当然不知。

“各系教师都不抵制?”他问。

李源澄答:抵制?不接受这个办法?谁敢?那就是纯技术观点,以业务冲击政治!——不过,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年把运动太多,学生确实太忙,不行此权宜之计,就要他们的命了。

17

求见邓小平

1951年夏,一批学生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四川进行首批土改,吸收一些教师参加,以接受教育。我也参加了。暑假后,土改师生凯旋归来,吴宓高兴地把我叫到他房里,品茗闲话。

“你晒黑了,却更壮了。”他说,“我希望听点土改花絮。”

我说:没什么花絮。勉强算一个吧,我学会了不穿内裤、汗背心和袜子。

不知怎样兴起的风气,内穿短裤、汗背心是资产阶级老爷的名堂。哪个农民这么讲究?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就得丢掉这些布尔乔亚臭排场!不仅如此,工作组的男女工作人员,必把上装的长袖撈上一截,长裤也卷起几转。而且得随便抓扎,高低不一,做农民下地干活模样。

吴宓乐了:好,有趣,“此乃这个时代之一罗曼蒂克画面。”闲聊了一会儿,他忽然问:“刚才我听到说,我们英语专业一年级有个女学生叫K的,你知道吗?她叫农民打了屁股……”

这是西师教师众所周知的事。K于1948年芳龄16岁,就在市女中参加了地下团组织。1950年乃考入西师外语系。她的父

亲是个地主,从乡里潜逃来重庆,到西师找到她,说是已两天未吃饭,走投无路,拟投江自尽,来和女儿见最后一面。K把父亲领到寝室里:

“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来吃。”

她没买面条,而是叫来了公安,捉走了她父亲,并随公安把父亲押回了家乡。土改工作队长很为赞许,叫她参加斗争会,接受教育,进一步提高觉悟。会场情绪激昂,贫雇农争先恐后控诉跪在主席台下的那排地主,诉说一阵,上前拳打脚踢一阵。忽然有人望见坐在主席台上工作队末端的K,大喊:

“把那个地主女儿抓下来!跪起!”

人们众声轰应:“跪起!”

“跪伸展!”

继而大吼:“打这恶霸地主女儿!”

“打她的骚勾子(四川土语,屁股的丑称)!”

立即多人拥上,把她按翻开打,全场大哗,乱喊:

“扯下裤儿打!”

“对,打光勾子!”

工作队长大声制止,但没有扩音器,群众根本听不到,队长急了,忙命工作队的全体女队员——她们都是大学生,一齐扑上前去,把K抢救下来,却已皮开肉绽。队长随即叫人把她送回重庆,交给西师,好在未伤骨骼,现已基本愈合。

“这女孩子才19岁呐!”吴宓愤愤然,“太岂有此理!”

这天晚上,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在学习会上呆若木鸡。吃罢午饭,他立即动身,迳到西南局统战部找到程子健部长:

“我是吴宓。要求见邓小平书记。”

“哦,哦,吴宓教授!小平同志非常忙,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不

可以？”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当然很忙。但吴宓坚持：

“这事不属统战部管，我还是向邓小平书记面呈的好！”

程子健进去打了个电话，出来对吴宓说：

“小平同志答应见你。只是这阵正处理要紧公务。请等一等，稍缓他就见你。”

直等到下午5点半钟，程子健才陪同吴宓去见邓小平。邓小平没有含笑寒暄，却是表情亲切。吴宓坐下就说：

我们一个女大学生，大义灭亲，捉拿并押回了逃亡的地主父亲，她却叫农民在大会上打了屁股。……

说了事实，进之评论。吴宓认为，这是大事，偏差太大。既违反共产党的政策，又大伤风化。……他一气说了好几分钟。最后说：“宓所报全系事实，请邓书记派干员调查，倘有不实，我甘受极严厉之惩处。对我的意见，如有不当，迳请邓书记当面教诲！”

邓小平无表情地静听吴宓陈述，没有半点打岔。待他说完了，才缓缓开言：

我早知道，吴宓教授是有名的大学者。我相信你绝会说谎。你的意见也很正确。你反映得很好，我要马上理麻这事。……

邓小平亲自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那个斗争会的县、乡名，又对吴宓说：

“很欢迎你爱护我们党，给我们反映情况。以后有什么重要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给程部长，我们派人去和你联系。”

送吴宓走时，邓小平又对程子健说：请你代替我招待老同志便饭，然后派个车子送他回去。

车过沙坪坝不远,吴宓就要求司机停车,他不愿让师生看到他坐着西南局小轿车奔进西师大门。

次日早上,我不见吴宓去饭厅吃饭,担心他病了,忙去看他。根据吴宓的意见,我俩互换了一把自己门上的钥匙。约定听听房内无客,就自己开门进去,以免敲门哗剥,惊动四邻。但见吴宓还酣睡未醒,原来前夜一宿未寐,昨晚心情舒畅,就酣然大睡,我的脚步声才把他惊醒了。

“哦,哦!”他跳下床,悄声:“我昨天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这会儿,我只能和你说这一句,等吃午饭,我们到街上去找个雅座,细酌细话,我再详细告诉你。”

我和吴宓都从不吃酒,今天他却一定要“吃点酒”。要了2两广柑酒,他亲手酌上两杯,愉快地详述了昨天会见邓小平的情况。然后举杯:

“来,为邓小平干杯!”

喝完,我笑问:“你这祝辞欠完善。为邓小平干杯!为他的什么呢?健康?事业?”

“全面地,”他说:“就是为邓小平干杯!——我早从像片上给他相了面,认定这个人有管仲、周公之贤。昨日亲睹细相,呀,实乃不世之才。“30年间,当有移星转斗之功!……”

我颇惊讶,悄语:“低声,低声!这话倘或被人听见,嫌涉大逆,甚至可为邓公招不测之祸……”

我知道,1950年出现过一本薄薄的《刘伯承将军传》,是一个青年时代曾经和刘伯承有交往的人写的。刘伯承得知,很为震惊,立命彻底搜尽,严予禁止,同时专门向中央作了汇报。触类推想,吴宓此话,自属危险之至。

吴宓说:这个还用你说!我只是和你体己言之。怕个什么?

我说：诚然如此。不过我仍觉得事属荒诞。你应记得，我们早就谈论过星相之学，意见一致，认为相面预卜休咎穷通，是不科学，不可信的。……

他说：“但是我们也一致认为，有诸内形诸外。”星相——相面，相体态，相背，确可察知其人之德操情志、才能气质。这可是科学的。我今以星相学察邓公，相其面、背、侧、体态，观其举止风范，听其语言，而领略其思维，从而得知其德懿情操，才智风范，确属聪、睿、正、直之士，概而言之，周公、管仲之才也。刘邦暮年与吕后谈论朝中大臣，说到周勃，认为勃“重厚少文”，然而“安刘氏者必勃也！”彼时刘氏并无危殆，“安刘氏”或所据而云哉？此不过假定之词，就是说：此人德才，非比一般，假令刘氏社稷或有危殆，必可指望此人转危为安也。今我之评论邓公，意犹类此，但也不止于此。读二十四史，历历可考，许多朝代于开国盛世之后，创业天子龙驭上宾不久，往往发生动荡、周折。必得不世之才移星转斗，而社稷复安。鉴往知来，察历史以测未来，虑或然之可能，思贤才而寄弼振邦国之望。此乃科学之论断，有何荒诞？“且移星转斗绝非改天换地。寄邓公移星转斗之功，也绝对谈不到大逆不道。虽然，此亦不过我个人一时高兴，弟兄之间抒景贤之忧，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后，他把声音放得极低极低，几乎是耳语：古今中外，一切天纵英明之圣主，其生命历程仍不能超出自然规律。毛主席年已花甲，再过30年，华诞90矣。那时，需要德高望重之元勋以辅弼之，俾保国家星斗运行之常。“而彼时邓公正在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所以我判断，邓公30年间当建移星转斗之功。岂可斥为妄言哉？！”

饭毕欲归，我问：“兄长，相交10余年来，我们坐而论道，未尝参差，堪称莫逆。可是这两年，你对事论人，却往往令我不解，时或

谨小慎微，寅敬寅忌；时或又险着独运，执拗莽撞。其故安在？”

他说：“先圣先贤告诫多矣：有为有守，克柔克刚。因事而制，不可拘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者，避无谓之祸，留福泽之基也。冲锋陷阵，视死如归者，舍生取义，沛然之气也！……”

这以后，吴宓仍像往常一样，拘谨木讷。可到三反运动时，却又发了一次牛劲。

18

在三反运动中

这是1951年冬。三反运动，发动时宣布，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不提后两项，实际是一个反贪污运动。

给西师派来了工作队领导三反。领队名叫董学隆，5年前，他是昆明大学潮中的积极分子。现在掌握三反运动，自然雷厉风行，锐不可挡。第一次大会就揪出了一群贪污分子——大大小小的老虎。其中有数学系教授王元吉，他现在是兴建新校舍的基建委员会主任；柴有恒教授，董学隆说他“任职期间，学院收支巨大，必有大贪污”；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成九等。不论解放前后，只要任过行政职务的人，都揪出来了，连化学系实验员李某也被揪出来了，因为他保管仪器和药品。接着便揪一般任课教师。中文系教授杜钢百也被揪了出来。贪污分子？从何说起？

杜钢百，经学大师廖季平（又称“南廖”）的关门弟子，历任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从未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经手任何经费开支，且是民革早期成员，民主人士。因为他多才多艺，被当时的学术界称为“多宝道人”。

杜钢百被排立在贪污分子行列尾上,他撑拒不胜,就叉足而立,侧目而睨,以示反抗。

董学隆大怒,厉声呵斥:

“杜钢百,你这块臭肉,给我站好!”

杜钢百斜瞥一眼,不予理睬。董学隆怒吼:“来人,把这块臭肉拖出去!”咬牙切齿,“这块臭肉!”

吴宓瞪着主席台,起立又坐下,坐下又起立。

会散。这晚,吴宓又是彻夜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早,他径直去找董学隆。

“我叫吴宓……”

“哦,你就是吴宓!外语系的那个吴宓嘛,我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并不叫吴宓坐。

“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昨天在大会上再三喝骂杜钢百是一块臭肉。杜钢百为人如何,姑不置论,他总是个教授。你骂他是块臭肉,太过分了,教授是块臭肉?……”

“我骂了的,又怎么样呢?”

“这不是骂他一个人,是对所有教授的侮辱。”

“哦!你的尾巴翘得挺高哩!”

吴宓声音平和而坚定:“董学隆同志,你太粗野,简直不像个共产党员!”

“对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臭货,就是这个样儿,要知道,你们的反动政权——蒋匪帮已经垮了,这是人民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吴宓:“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些教授,俘虏不如?”

“当然。俘虏是缴了械,放下武器的。而你们还拿着武器,我们只是遵照毛主席的政策,宽大又宽大,才姑且让你们当教授。……”

吴宓平和地说：“你就可以骂臭肉？”

董学隆斩钉截铁：“这是客观存在。……”

吴宓字字铿锵：

“董学隆同志：我十分惊讶，共产党会有你这样的党员，还是工作组长！完全不讲政策，……你是封建时代的征服者吗？……”

董学隆：“住嘴！”

吴宓：“我们到邓小平那里去说。和你两个，讲不清楚！”

董：“哼！你配？正告你，夹起尾巴！我会叫你认识共产党的！出去！”

吴宓也哼了一声，徐徐拉开房门，踱了出来。

原来，这天天一蒙亮，我就听见吴宓那边履声蒲蒲。洗罢脸，正想过去看看，却从窗口瞥见吴宓已在小溪石桥上朝院领导及工作组住的区域走去。我担心吴宓又发牛性，便飞奔下楼，尾随其后。他进了董学隆的房间，我便趑过去，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内容。

吴宓出来，朝学校大门走去，我急忙赶上他，硬挽住他往宿舍走，边走边劝。直到进了他的房间，他还对我的劝告毫不考虑。我试从另一角度说：你也不想想，邓小平有多忙。西南局好比管几个法国，几个英国，要管多少大事？你认为了不起，可比起他要处理的公务，简直是鸡毛蒜皮。你这样三天两头去找他，烦以细务，人家不厌烦？你也不觉内疚？

这下生效了。他怔了好一阵，喃喃地说：“这话有理。那，我给程部长写信诉说之。辱骂教授为一块臭肉，侮辱其人格，这事系属违背统战政策，该统战部管。”

早饭后又开大会，杜钢百竟然没有来。董学隆大怒，喝令：“给我拖了来！”

有两个学生积极分子闻声而动,真的把杜钢百倒拖着拉来了。幸亏是冬天,老杜身穿棉衣,只是衣服颇有挂损,却是未伤皮肉。拎着双腿或一条腿倒拖着拽走,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是司空见惯,不过是很轻微的体罚。但当时是1951年末三反运动初期。上面派来工作组凌驾学校领导之上也是初次见到。倒拖一学者,师生自然惊讶。当杜钢百入场时,全场鸦雀无声,男女老少瞠目呆视。也许是早上吴宓的唐突引起了思考,也许是现场师生的表情给了启示,在大会将终,宣布揪出的贪污分子单房禁闭反省时,董学隆竟先朝杜钢百大喝了一声:

“滚下去,这块臭肉!”

杜钢百就此没当老虎,免去了几十天的监禁之苦,也可说是受小祸而免大难了。散会后,我心情沉甸,慢步挪往职工食堂。董学隆却从后面赶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

嗨,这个人有点马大哈。他同我谈过3次话了,却还不认识我。

“张紫葛——弓长张,紫红色的紫,诸葛亮的葛。”

“哦,外语系的教授。耶,你胆子不小呀,竟敢明目张胆破坏三反运动!……”

“我破坏了什么?”

“唆使吴宓找我,无理取闹。不是破坏是什么?……你还抵赖?我亲眼看到你躲在窗子后面,吴宓走时,你又撵了上去!——你皮子收紧点儿,看我好好收拾你!”

我如实对他说了当时情况。他顿了一小会儿,问:

“他认识邓书记?”

“大概认识吧!不久前他去过邓小平同志那儿的,还在那里吃

了晚饭,坐西南局轿车回来的!”

董学隆态度立即冲和了:“你要好好开导吴宓。毛主席早就教导过: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

吴宓不论写什么,总是毛笔楷书,给程子健部长写信更不可草率。学校又天天开会,因而写了好几天,给程部长的信还没写起。

而董学隆却忽然离开了。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此后再未见到他在西师露面。

董学隆走了,工作组还在。三反扎扎实实地前进:分师生员工为若干打虎队,每队专责打某一、二或三个“老虎”。查帐,外调,核实“老虎”交代的贪污事实,根据内查外调,适时拉出“老虎”,本队斗、审、追、逼。至于“老虎”本人,全都单房禁闭。由精壮男生组成的专组分岗看守。不论家属、亲友,一概不准接近。各打虎队争交请战书,提出了攻坚指标。因而求胜心切,提斗“老虎”时,火力十分猛烈。

我和吴宓亲自参加的打虎队所分“老虎”的头一名,就是柴有恒。柴有恒这个有名的“苦行僧”,即使在盛行西装革履的30、40年代,留学归来的他,也是布衣布鞋,一件麻布大衣穿了10余年,补了几个补丁。夫人则装束有如农家妇女。他本来清瘦,这一长期禁闭,更是刮瘦晦霉,步履踉跄。

“跪起!”有人喝令。

柴有恒吃力地跪下。工作组的同志交待政策:“柴有恒,你要好好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

柴有恒躬躯匍伏:“我愿意老实交代,求得党的宽大。我已经详细交代了,恳求宽大,开恩……”

我按工作组的指示,翻开卷宗,提问:“修建科学馆的经费——黄谷6千担,都到哪里去了?”

柴：建了科学馆那栋楼房嘛！工程是公开招标，一切手续，以及支付款项都由总务长负责，会计主任、出纳主任审核签章嘛，这些人都还在嘛，我并未插手嘛。

有人大喝：“你狡辩！他们都是你的私人，串通作弊，你坐地分赃。”

柴：“我没有得赃款，请求党和政府明察。”

工作组同志骂：“你真是景阳岗的老虎！”

便有人立马撮来炭花，倒在柴有恒面前：“不加温你是不得招的！跪到炭花上去！”

众人大喝：“跪上去！”

柴有恒只穿了一条长裤，跪到炭花上，膝头疼痛胜于刀割。他禁不住两手抵在地板上，呻吟哀求：

“恳求共产党宽大，请求，——哎哟哟，我受不了，恳求施格外之恩，请你们给我出个主意，说是怎么贪污的，贪了多少，我都承认，我招，我招！”

人们都无动于衷，冷冷地说：“要宽大容易，自己交代！”

回到宿舍，吴宓面色惨淡，语似哀求：

“紫葛，我实在受不了，我总感到，跪在炭花上呻吟的不是柴有恒，而是我！皇天在上，柴有恒确实是个极其廉洁俭朴的好人呐！……我头晕目眩，心痛背惫，差点当场栽倒了！……”

最后他自己想到一个法子：请病假。但是，请病假要有医生证明，学校的三个校医全是关圈的“老虎”。吴宓并没病，他们如何敢开证明？

苦思良久，他一拍桌子：“来个苦肉计吧！”他叫我去给他买几两巴豆，吃了泻肚子。

巴豆是峻下之品，服下一、二钱就会大泻不止，六旬老翁如何

承受得起？且这玩意儿是管制药品，无医疗单位的处方是买不到的。

他说：这有何难？你懂中医嘛，给我开个别的处方，反正叫我肚泻就行。

假是请准了，但他既然痛得不能出席开会，就不可再自去食堂用餐，厨房打开水。我不得不充当他的临时护理。幸亏第四天邹兰芳来了。

“这是我的责任！”她说。邹兰芳就留在这里，照料吴宓。吴宓再三辞谢：“我只不过要拿三次饭，打一次开水，麻烦紫葛就行了！”

邹兰芳则义行于色：“这是什么话？夫子待我亲于骨肉，你病了，撂下不管，我算个啥子人？狼心狗肺吗？”

晚上她不走了，我只好让她到我房间里过夜，我则到吴宓房里睡地板。

此计虽妙，可惜校医化验诊断，他只是泄泻，并不是细菌性痢疾，一个人总不能长期泄泻，百药罔效。“病”了两个星期，吴宓只好销假参加学习了。却又正好赶上大斗“老虎”的全院通宵斗争大会。

“老虎”全部出场了。在主席台前站了两排，一个个枯瘦腊黄，蓬头垢面。

到了下半夜，不知谁出的主意，喝令“老虎”们脱下大衣或上褂，顶在头上，将两手伸入衣袖中，然后半举双臂，使衣袖在前面搭拉一截，状如老虎伸爪扑食，再令他们跪在条凳上，排列整齐，一一作老虎扑人之状。

斗争会内容丰富，各打虎队汇报战果，工作组交待政策，积极分子揭发、控诉，叫某“老虎”上台交代，主持人宣布：要战通宵，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时正三九隆冬,五更气温再降,全场师生员工个个背凉脚冷,有的不免寒战时作。而“老虎”们却因躬跪条凳,双臂久举,体力支付过度,反而由冷转温,由温转热,继之蒸发大汗,终至热气透过顶在头上的衣服,蒸腾上升,有如上了大气的饭甑。两排冒气的饭甑,抖抖索索,蔚为奇观。

吴宓突然起立举手:“报告,我要拉肚!我请假上厕所!”说罢,他不再关心那边的答复,就出了会场,“粪遁”而去。

过了三天,又该分队斗“老虎”了。同时,每队派一、二人去西南艺术学院(现在的四川美术学院)参观取经。吴宓极力争取去参观,意在逃避本队的斗“老虎”会。可是,晚上他却来对我说:

“命不可违。我在西艺还是叫分派参加分队斗争会,那边更猛烈,一个30多岁的女会计,叫反缚吊起,没穿长裤,精光的腿,耷拉在半空里……”

他叹息说:“由此观之,此非一校一地之偏差。……”

又过了几天,逢星期日,两个到市上参加五反工作的女学生来看望我们,兴高采烈地叙述五反工作队如何对付那些五毒俱全的资本家:关黑房子,拷打,反绑倒吊……

女学生走了,吴宓说:对那些黑心不法资本家,施此暴虐,似不为过。彼辈以假药及毒变之食物卖与志愿军,实不啻谋害前线士兵。杀人不见血,宜受此报。

下午,又有外语系调到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的熊灿霞等几个女生回校串门。她们说,军区各机关搞三反,也是吊打俱全,后勤部竟把一个沦为斗争对象的军官的腿打断了。事为邓小平获悉,大怒。下令追查打手及斗争会主持人的刑事责任,严令各部不准再搞逼供信,违者严惩不贷。从那以后,军区和部队的三反运动纳入正轨,绝不打人了。邓小平又指示:不准搞普遍怀疑,吹毛求疵;

凡是拷打逼出来的、虚套胡诌的交代概不作数。结果，原来打出来的“老虎”，十个有九个是冤枉的。

吴宓抚掌赞叹：“贤哉邓公！圣哉邓公！王元吉教授等有救了！”

果然，不久大会宣布：三反“揪出”的王元吉等“老虎”免于处分，却不提他们所“交代”的巨额贪污等问题了。

红学讲稿被骗

1952年春暖花开。三反激浪刚过，紧接上学习第一部《婚姻法》。这个学习气氛祥和，心情宽松。学过法律条文，读了参考文件，继而小组讨论，联系实际。号召每个人联系自己的恋爱婚姻观，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爱情、婚姻观。事非政治，谈又何碍？虽有学生代表参加，反能活跃会场。

中老年教授们一个个从自己的初恋说起，年轻教师和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惟有吴宓三言两语，说得十分简单，青年们再怎么追问，他仍是那么几句，这实在太煞风景了。有位丁女生，原是中等厂主的小姐，见闻颇广，含笑问吴老师：

“你和毛彦文的恋爱传奇曾经轰动一时，今天怎么只字不提呢？”

吴宓敛容正色：“只是一般相识，随即不再往来。外间所传，纯系误会，甚或好事者乱加穿凿耳！”

丁女生不便追问，转而一本正经：“那么，吴老师向称红学专家，时作专题讲演《红楼梦》，在昆明，有一次讲演开头说：‘昨天我又哭了，想起林妹妹，我不得不哭。’……你今天怎么毫不联系呢？”

吴宓说：“什么‘我又哭了’，全属子虚乌有，都是报痞文人、无聊小报胡乱编造，我当时就一再申明否认过的。”

J女生轻松一笑：“反正你是红学专家。谈红学总要涉及爱情观点，婚姻观点。……”

吴宓：“我自来坚决否认我是红学专家之说。我讲过《红楼梦》，只是茶余饭后闲谈。意在驳斥那些给《石头记》妄加主旨之邪说，比如有人说：《红楼梦》中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浊物等，乃指汉、满民族之争云云。”

“我坦率言之，宓平生勤勤恳恳，治学谨严，虽无特殊成就，但对经史子集及西方诸学派总还略有涉猎。舍此不论，而谓我为红学专家，实乃对我之莫大侮辱。”

小组会不欢而散。J女生与女助教M且走且诉：这吴宓确实顽固而自高自大。……

M：你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苦恋之中，——婚外恋已达白热化，情绪失衡。

J：和谁？……说详细点！

“他和邹兰芳……去年，他装病，邹假称来护理他……已经同居……”

“太不成话！”J女生怒形于色，“这简直是对我们全系同学的侮辱，我要反映！斗争！……”

《婚姻法》学习又继续了两星期。学习组上再未遇到障碍。教授们微微摇晃着斑白的脑袋，绘声绘影联系自己的恋爱史，说到紧要处配以表情、手势。大家，尤其年轻人，听得乐呵呵的，颈子伸得鸭脖子似的。

吴宓回房，对我摇头叹息：“这些先生们，一个个低级趣味。”

正说着，J女生来了。她满面堆笑，好像会上根本不曾那么粗

鲁地对待吴宓。

“吴老，你生我的气了吗？”

吴宓：学习，开展批评，是好事儿，怎么会生气呢？

J：这就好。人生总是这样，当严肃的地方不能不煞有介事。而严肃过了，就要生动活泼，趣味化，人性化。……

吴宓很不耐烦：“你找我有何事？我这里正请了张老师来帮我熟悉苏联文学。”

J只顾哼自己的唱本儿：我也是《红楼梦》爱好者，初中起，到日今已看了十几遍了。很景仰研究《红楼梦》的前辈们。其中首先是吴老。不知为何，我一提到您是红学专家，您就那么发恼！

我站起来要走，吴宓伸手拉住我：“你走哪儿去？坐下，帮我熟悉苏联文学！”语气异常坚决，我只有坐下。

J女生继续罗嗦：“……我是把红学看得很神圣的。……”

吴宓：“可你会上发言并不是这样，截然不同！……”

J女生笑容可掬。

我插话：吴老师是有点儿生气。你把红学和婚姻法联系起来，又妄断他和毛彦文恋爱，措辞欠严肃。总之，吴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只把他归结为红学专家，未免明褒暗贬。我也很不赞成。

J：这只怪我年轻，见识太浅，只知道吴老师是红学专家，闻名全国。……

吴宓耐不住了：张老师也没说到我的心坎上。确有不快，而其最紧要的是：J同学，你居然无中生有，说我那次讲演的开场白是：“昨天我又哭了！为了林妹妹”，是何言也？我何时何地这么讲过《红楼梦》？诚然，我长期研究红学，而其根本之宗旨，乃在于，以《红楼梦》为代表，倡明我中华文学成就远超英美德法诸国，并以此进而弘扬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之国际地位。……“故此，余每

次讲《红楼梦》必举欧美文学巨著与之比较，而论其优劣。论其诗词曲赋，则举拜伦、雪莱、普希金、歌德……；论其情节、技巧、对话，以及文学意境，则举果戈里、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诸大家；论其戏剧手法，则举莎士比亚等等。纵横论列，引世界文学理论以评比之，得出雄辩之结论：《红楼梦》此一中华文学杰作，远远高于世界任何一国之文学名著。……”

老先生说得性起，掀开箱子，拿出两厚本精装皮面英文抄本，放到桌上：“请J同学过目，此宓历年讲演《红楼梦》之讲稿。宓平生治学谨严，讲学更谨严。授课必有讲稿，然并不携带讲稿走上讲坛。讲演亦如之。然皆按照讲稿，不乱词章，绝不妄加增损，更无游心窜句……”

J女生也不答话，只是喜笑颜开，凑上去翻看讲稿。两厚册，全用毛笔直行书写。英、法引文则转过抄本，横行书写。汉字一律楷书工整，英、法文则大半是印刷体字母连缀，未依抄本原印之横格，却行列笔直。

J女生不由曼声赞叹：“好整齐的讲稿啊！”她从第一本第一面看起。

第一篇：

“《〈红楼梦〉新谈》

凡例

1919年，民国八年，岁次己未，讲演于美国波士顿中国留美同学会。”

J女生坐了下来，逐字逐句往下看，却不看那些外文引文。神情专注，目不旁瞬。俨然旁若无人，潜心钻研。这倒叫两个老师无计可施，只有呆坐一边，等她去看。

传来钟声，这是吃晚饭的号铃。我借此提出：“J同学，我们都

该吃饭了,你先回去吧,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她头也不抬,边看边答:“两位老师别忙,一会儿我们到磁器口饭馆,我请客。”

无可奈何,我们继续坐下。又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吴宓站起来催道:“那就上磁器口吧!我作东。宓一向主张,作息有定,到时候就该吃饭。”

“对!”我立即附和,“走,吃饭了,我饿得很啦!”同时伸手去收抄本。

“好,那就走吧!”她抢前合上抄本,塞进了她的书包。

我说:“你怎么把吴老师的讲稿装到你书包里呢?”

她似嗔似媚地一笑:“哎呀,张老师,又不是你的讲稿,你这么吝啬干啥?暂时带上,吃饭时顺便瞧瞧嘛!瞧,吴老师都没吭声哩!”

可是吃饭过程中,她根本没去摸书包里的皮面抄本。

这是磁器口金蓉正街最大的一家餐馆。彼时饭馆的营业还是解放前的格式。J女生不声不响给柜上塞了几张钞票,交代这桌饭菜她来结帐,不得另收。她点了很多菜,还要吃酒。

“这是我的拜师酒,敬请吴公雨僧夫子,我要敬拜吴老为红学宗师,我要做吴老的私塾弟子,……”

吴宓慌忙站起:“这不行!这是违法的。回头交代不清楚!我告辞,告辞!”他拔腿往外走。

J女生跳上去挽住他:“我又不是美蒋间谍特务,您怕什么?”

“不!”吴宓挣扎要走,“我们本属同学师生,你本是我的弟子,还拜个什么?别叫人误作反动会道门……”

“哎呀呀!”J女生死命拖他坐下,“您别怕,F书记都同我在这儿吃过饭的。有三个同学作陪。我拜他作我的私塾老师,我跟他

学新诗。他不是诗人吗？”

那年月，西师学生贫富悬殊颇大。多数学生穷得很，靠助学金过日子，完全没有零花钱，往往衣破履穿，女大学生赤脚草鞋并不罕见。个别民族资本家的子女则腰缠颇丰，拉上老师、同学上馆子大吃大喝，时恒有之。却也没听说谁叫揭发、挨批评。倒是吴宓和她这么拉扯嚷嚷，容易引起雅座外的人们及服务员的疑窦，以讹传讹。

我便劝吴宓：“算了，别客气，坐着吃饭吧！实在饿了哩！急什么，她不过说个客气话罢了。回头我会帐，不要她请客。”

吴宓也委实拉扯不过这位女生。听我这么说，只有坐下。推开酒杯：“绝对不能吃酒，师生一起上馆子，喝酒，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吃饭了。吴宓据案进食，一言不发。我和这位女生也无谈天兴趣。结果就她一人边吃边唧唧；她初中二年级就开始“淘气”，什么杂书都看，而最爱读《红楼梦》。到高中，知道有位红学专家吴宓，万分仰慕，“如仰高山，如望北斗”。心想：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位了不起的红学家呢？想不到不知不觉，一下子作了吴夫子的学生……

吃完饭，吴宓掏出钱包，叫服务员会帐。服务员答：“这位女同志已经给了。”

“不行不行！”吴宓大声嚷，“不能收她的钱！这儿，收这个。”

服务员不理，自顾和了女生结算。

“不行，我给！”吴宓大声说。我说：“算了吧，帐都结了。”

“什么？”吴宓火了，竟至忘了他再三叮嘱别暴露我俩原是要害问题的要害问题，直呼我的名字，“紫葛，你这是什么态度？来，”他把他的钱包放到我的面前，“还她的钱，或是到柜上去另外算帐，叫柜上

还她的钱!”

我不答他的话,一边送回他的钱包,一边对J女生说:“吴老师不肯接受你的招待。我来折衷:我还你的钱,算我请客。”

吴宓大怒。又顿手杖,又拍桌子:“一定要我出钱!紫葛,你再执拗,我和你绝交,一定绝交,坚决绝交,永远绝交!”

我无可奈何,拿过吴宓的钱包,边取钱,边对J女生说:“你千万别再闹了,来,还你的钱。你收了,当是你请了我一百次。”

J女生大笑,接了我递过去的钞票:“好吧,这算是《红楼梦》第一百二十一回,回目是:吴夫子定要会帐,J生员勉强白吃!”

我们三个走出餐馆,J女生扶住吴宓,见他愠色未退,不便打话。三人默默慢行,出街过桥时,吴宓才冒了一句,似自语,又似对我两个说的:这仍极为不妥。倘或端到学习会上,仍可给我们扣上大帽子;三人一起,吃吃喝喝;我吴雨僧请客吃饭,拉拢学生JXX,免得她提意见。

J:哎呀呀,我的夫子!除了我们三个,谁知道?我向您人格担保,张老师为证,往后不论来了什么运动,哪怕把你打成老顽固,我给你提一百条意见,扣二百顶大帽子,也绝对只字不提和你一起吃过饭。……

吴宓很无好气:“我相信你的担保。可是我很惊奇:你这么点年纪,就这么……复杂!”

J女生甜甜一笑:“我请问您:宝钗简单吗?她又有多大年纪呢?”

因为这扯闹推嚷,我和吴宓完全忘了那两个英文抄本——吴宓的红学讲稿。过了桥,便是学校的小操场。时已夜晚,J女生用俄语和我们说了声“晚安”,就快步转过岔路走了。

回到房里,吴宓才惊“呀”一声:“呀!——我的讲稿!”

次日,遇到了女生,吴宓讨要讲稿。

她表情轻松,细语呢喃:“您借给我几天,让我好好学习学习。放心,我会好好保管的。”

隔几天再要,表情如旧,语言稍异:“太丰富了,得好好儿慢慢儿学习,钻研……”

一直拖了两个月,反正她不归还。吴宓叫我替他问。这回可讨到了真话直说:

“你别管这事!”女生嘴几乎捂到我的耳壳边,“我,好歹不会还给他的。”她告诉我:她视这两个抄本有千金、拱璧之贵,已专程送回家中,密封珍藏。

原因是:考察现实,运动不绝,料定大学四年学不到什么本事。只能捞个文凭,捞个政治资本。而真本事——真才实学,就靠这两个抄本。将来,她稍下功夫,就吴宓之论稍加调整,找出中国的其他文学作品,诸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厢记》等等以代吴稿中的《红楼梦》之言情、结构、意境等等,选些唐宋名家的诗、词名篇警句,替换吴稿中的《红楼梦》诗、词、曲等,则可成为洋洋大观、渊博浩瀚之中外比较文学专著。彼时,她就自然是专家、大师了。最后,她对我说:“中国总不会永远运动下去,总有一天,大学会正规化,学术化,总要讲究真才实学。……”

我很生气,脱口斥责她:“你这是剽窃!……”

她竟振振有词:“什么剽窃?过二百年也不能否认吴宓任西师外语系教授之时,我JXX是外语系的学生。我是他的真传弟子。我以一次得他的讲稿,代替了逐月逐年听他授课。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得其真传。我完全可以堂皇宣称:这一论断是我的老师吴宓传授的!有何剽窃之可言!……”

我把这些话全部如实告诉了吴宓。他呆若木偶,半晌才长叹

一声,说:

“孤之过也。我想驱除她对我的误解,转毁为誉,亦即激于毁誉之愤,自炫讲稿,竟至上此大当。错,错,错!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宓早在壮年即能戒之于得。然不过戒了荣华富贵之得耳。今乃豁然贯通:戒之在得者,亦有毁誉之得失也。今我之失,盖于惧毁求誉,故求美誉之得,乃至自贻伊戚也!”又说:今日后,当铭记孔子之言,“着重戒之求令誉之得也!”

20

逼牯牛喝水

时序已入暮春。重庆暮春来得早，单衣已经出笼。邹兰芳突然来找我：“张老师，你和雨僧先生情同手足。天下的教授教天下的大学生。我也算是你的弟子，希望你能关心你的异姓兄长，也关心我这弟子！”

“这话怎讲？”

“我和雨僧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自来思想进步，这回却封建起来，阻止他和我好……”她淌下了眼泪。

“这话从何说起？你们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雨僧说，他前年就告诉了你的，你不赞成！”

不论我怎么辩解，她都一口咬定：我反对他们恋爱。因此，吴宓在我的督促下，对她寡情之至。

邹小姐又激动起来：“不论你怎么骂我，野鸳鸯也好，乱七八糟也好，总之，我们的爱情早已成熟，已是夫妻似的，他负担我一家……”

我去问吴宓是怎么回事，他却以为我是要促进他们：“我怎么能接受她的爱情？我这大年纪，尤其是，我资助她养活侄儿侄女

们,设或我竟同她恋爱,岂不是资助乃成利诱、购买爱情?我不义实莫大焉!你何不谅察至此?快为我出个良策,脱我于苦恼!”

谁知院领导派了两位女生来找我了解此事。我答不知道。而那时的大学生颇能开展批评,两女生当即尖锐抨击:

“张老师,你太不叫话,他和邹兰芳乱搞,完全是在你的掩护之下进行的。你不但向领导汇报反映,反而包庇到底,对抗组织。你对《婚姻法》是怎么学的?边学边犯!”

我力辩确实不知。两位女生火了,声称她们已和邹兰芳谈过。

问:“你和吴宓是谁主动?”

邹答:“我很崇拜他,他很喜欢我!”

问:“你们已经同居了?”

答:“没有公开同居。”

问:“你们恋爱有哪些人知道?”

答:“张紫葛老师最先知道。”

两女生一齐斥责我:“你听见吗?她自己说的,你最先知道!”

我瞠目结舌。

这件事不胫而走。过了两天,刘尊一来找我,约我到她家午饭。她说:没有请外客,只我两姐弟,吃便饭,说说闲话。“不是生日,只是有点小喜事,和你聊聊。”

前面说过,刘尊一住的是自家私房,座落在重庆大学校外右首不远,而朝沙磁马路,距路边数十公尺,一派石砌梯坎,直登门庭。虽是一层独幢,却是坚固壮观,条石基脚足有两米高才是正墙。墙壁一律青砖,么五镶砌,地板即楼板,总面积不下300平米,卫生设备齐全。我随刘尊一到家后,时已正午,刘尊一亲自下厨烹调。饭后,我俩到她书房聊天。

算来我和刘尊一相识,迄今已有14年了。她比我大10余岁,

称我“小张”，自称刘大姐。我尊重她是个学者，又知其廉洁勤恳，所以也很尊敬她，诚心尊以大姐。去年镇反运动，她遇到极大麻烦：交代历史。苦哉苦哉！一个是她曾为中共党员，被捕“脱党”，要重点交代。好在此事党内早有存案，材料齐全。她并未给敌人当特务。其后参加民革，内战时全在教书，并在任教期间一直保持民主党派的立场，追随共产党，拥护学生运动。麻烦的是她和宋美龄的关系。她到登记处登记之后，小组公开交代检查，群众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到底你和宋美龄什么关系？她那样信任你？”

她怎么辩解也不中用，过不了关，来找我说：“那时，你是宋美龄的秘书，你是知道的，我和宋美龄确无特殊关系，你替我证明一下吧！”

我的证明如何能生效？况且，我自己并未交代当过宋美龄的秘书。交代了，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那——，我怎么办呢？你帮我出个主意吧！”她语音哽咽。

我答应替她想想。实际我是心中无数，就去找吴宓讨主意。吴宓沉思良久，问：“她既然认识宋美龄，也该认识宋庆龄吧？”

“当然认识的，”我说，“宋庆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理事长（亦称名誉会长）。”

“那好办，”吴宓说：现在宋美龄很臭，可她姐姐宋庆龄却很香。你叫刘尊一马上给宋庆龄写封信，问好，致敬，略道自己的近况，请求宋副主席教诲。如能得宋庆龄回信，则诸症悉除矣！

刘尊一依计而行，果然很快得到了宋庆龄的回信，叫她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于是刘尊一名正言顺交代说：当保育院院长是宋庆龄举荐的。不仅解了交代历史的死结，而且她俨然成了西师的第三个头面人物。

刘尊一非常感激我。我告诉她，这是吴宓的锦囊妙计。此刻

坐进书房,我便问她:是不是宋庆龄又来信了?不然何以如此高兴呢?

“不,她没来信。”原来是:她为了表示进步,在西师建校之初,就打报告请求将她的这幢私有房屋,即刻交公。报告中写道:我在旧社会是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每一份财产都是剥削来的。所以,我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人民的血汗,应该归还给人民。……报告送出之后,迄无回音。三反运动中,已有人检举,说她这房子是赃物,她应是大老虎。她也自己检查,说她早已认识,情同贪污,所以一年半前就上书请求交公。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总算靠她有先见之明,写了那个报告,没有正式被打成“老虎”。

“昨天领导通知我,”刘尊一喜形于色,“党接受了我的请求,批准把我这幢房子还给人民。……这是对我的全面肯定:我是民主人士,进步教授。……”

我完全知道,刘尊一自来居家节约,虽然一人拖了几个孩子,仅靠薪俸过活,仍每月必有节余。点滴积蓄,到内战时,物价腾涨,她便倾其所有,买了这幢房子。

刘尊一是一是这么高兴,以致重三叠四:“唔,党到底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太高兴了,你应该为我庆祝!”

“对,”我端起茶杯,“祝贺你,成了彻彻底底的无产者!”

我要告辞了,她才猛省说:我差点儿忘了,去年,多亏吴宓的锦囊妙计,保我度过了难关。日今,我也该关心他了!“关心什么?你还不知道?……已经满城风雨啦!”

“我知道,邹兰芳的事情嘛!”

她一挥手:“那已是旧闻了!……这是新闻,懂吗?新闻,新的!……你果真坐在鼓里?哎呀,你真是个大马哈,这是Z的事!”

Z是此时西师学院的一个奇特人物,大学毕业时,年仅21岁,嗣后为一小外交官百计追求,结为夫妻,已生三子。局势速变,恰其夫在驻印使馆工作未归,乃有传闻说他逃去了台湾。这可苦了Z,她被怀疑是留下的特务。幸亏共产党实事求是,查无实证,未作结论。却也保持警惕,不让她搞教学,安排作图书馆员,不接触师生群众。经过镇反运动,她安然旧我,不免考虑终身大事。这么年轻,又有几分姿色,如何能独身到老?可是,以她的政治处境,又能找谁结婚呢?冷眼观察,她选中了吴宓。老夫子是本院的头面人物,做了他的夫人,可得统战之荫蔽;他是高级教授,工资高,物质生活也可以大大改善;老教授为人善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且有红学专家之称,待妻子必然温良体贴,且而这种学究易于诱导定情。

主意已定,正苦无门可入,忽见吴宓来图书馆借书,她立即出来迎接,替他查目录,找书,填借书证。提到书后,又持书扶他回去,一路亲切交谈:

“我叫Z,是您的忠实崇拜者。以后,您要什么书,给我说一声,我给您借了送来。”

“你知道我?”

“哪能不知道您?我读大学时……”

哦,大学毕业生!难怪谈吐不俗。一直送进吴宓房里,她进一步表示关怀:哎呀,您这屋子该做做清洁了。……这难怪,青年单身汉也难免马马虎虎,何况您这样有点年纪的人!我午饭后来给您清扫清扫。

中午,她果然来了。给他洗地板,擦门窗、桌凳、床榻,并且拆洗了被子。做得极快极仔细,忙得满头大汗。吴宓再三辞谢阻止,她却大义凛然:能为当代著名的大学者服点小务,是她莫大的幸

福。

自此,至多隔一天,Z就要来看望吴宓。问寒问暖,借书还书,洗涤衣服,尽奔走之劳。其间自然要谈谈闲话。吴宓发现,她很读了些中西古今文艺作品,尤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名家之作。纵横论说,颇多创见。低回进退,尤能善解人意。

如此三个星期,已是春花烂漫,在学《婚姻法》了。这天,吴宓在小组会上否认红学专家之说,而丁女生指词无礼,后又被骗去红学讲稿,他气得不行,在宿舍兀自冒火。

刚好Z照例来访,问知情由,大表愤慨:把您这样贯中西、通古今,名噪世界的大学者说成是红学专家,简直是极大侮辱。……

吴宓听了很受用。她又转而劝慰他:别和这些无知无识的人生气,我请您进城去看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经他再三怂恿,吴宓同意了:“那么,约张紫葛老师一块儿去。”

“那当然好!”她转而顾虑,“不过,张老师太年轻了,我得避点嫌疑!”

经不住Z连劝带拉,吴宓终于随她进了城,坐进了人民剧场的甲座。剧终已是午夜,出城的公共汽车早已收班。他们来到旅馆,她要了一个上等房间。“您睡床上,我在这沙发上将就过夜。”Z说。

“不行,绝对不行。……我再老,总是男的。”

“那么,我另外要个房间。……好,晚安。”

她走了。吴宓觉得这话剧虽无莎士比亚之妙,也足以遣怀散心。舒展登榻,速即入寐。一觉醒来,红日当窗。却见Z卧睡在沙发上,仅着汗衫短裤。

她醒了,急忙穿衣说:只三楼才有空房,太不安全,我哪敢入睡?只有下来。

说得有理,且而有礼有节,善哉!

又过了一天,体育系举行表演晚会。Z来约吴宓,扶他前排入座。这是广场活动,横空成排特大灯泡,炽耀胜于白昼。Z短袖紧衫,始终挽住吴宓的胳膊。众目睽睽,精彩的体育表演吸引了吴宓,而学校讲究照顾老人,女生及女助教挽扶年老教师并不少见,所以他并未介意。然而,在场师生却是同有所悟。于是众口铄金:吴宓又有新的罗曼史了。

只有我,并未注意到这个情况。刘尊一说我装蒜,“要知道,”刘尊一加重语气,“人们说的是,他和Z一接近就发生了关系。两星期来,每天中午、晚上——上半夜……甚至到城里公开住旅馆。……同时轧两个姘头,肆无忌惮乱搞男女关系,典型的资产阶级,道德败坏!……领导已经在理麻了,你不帮助他谁帮助他?”

我问:“我怎么帮助?”

“既要给吴雨僧作思想工作,叫他猛省,不要再陷在这里面了!又要给他出主意,帮助他摆脱她们,——吴雨僧是个书呆子,你不帮他,他是摆脱不了的。……”

我从来不会帮这种忙,也不愿意介入朋友的这类纠纷。刘尊一嘟哝说:“随你便吧,我不过,去年通过你得到了吴雨僧的帮助,现在也就通过你表示我的关心。……”

我却总鼓不起勇气介入朋友的这类事。

又过了两天,学校通知,我和吴宓住的这幢楼要立即拆掉,重建教室大楼。叫我们马上搬到坎下那幢夹壁小楼上去,并有系上几个男生来帮我们搬。新居仍是我和吴宓邻室并列。我们的东西不多,学生走了三几趟就搬完了。我关上门,理书铺床。房子是单笆墙,即一层竹编两面糊上泥巴石灰。因此邻室说话清晰可闻。隔壁传来两个女人的对话:

“我们早已好了，有了性关系！”

“我们也有了！”

“我在先，你应该走开！”

“我更需要他，你该让开！”

“你得头脑清醒点，你政治面貌不清，组织上理麻起来，只怕不大方便！”

“你打谅我不知道？你未必比我高级？我，不过丈夫跑了，你呢？大地主的小姐，两个哥哥又是反动军官，镇压了——吃了卫生丸子！……”

“你太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

邹兰芳敲着墙：“张老师，请你过来一下，评评这个理！”

我坐下不动，也不应声。邹兰芳继续擂着墙壁叫：

“张老师，张教授！”

这却惊动了那边的邻居。那是小楼上的原住教师——地理系的C讲师。当下他“咚”一声推开门，气呼呼问：“你们闹个什么东西？”邹兰芳连忙站起：“C老师！”C老师问：“吴宓呢？”邹：“领导叫去了！”

Z还一直大咧咧地坐着。C老师转瞪着她：“你跑到这儿来搞啥？”

Z：“我和吴宓耍朋友（注：四川时下方言，即恋爱），和她起了矛盾。”

C老师认真上了火：“耍朋友？！你是个什么东西？待查敌特分子，有什么资格恋爱？”

“你怎么这样乱说？领导也没有说过我是待查敌特，我还是图书馆馆员嘛！”

“说了又怎样！滚出去！”同时飞来一巴掌，重重打在 Z 的脸上。接着，C 老师一手抓住她的胳膊，一手揉她的腰、背，喝斥：“滚出去！滚！”

她含泪下楼去了。

吴宓是被李源澄以副教务长身份叫去了的。

到了李源澄家，老李燃起旱烟，郑重开言：“雨僧兄，领导要理麻你。我看在多年友谊，讨的这份差事，找你谈谈，情况是很紧急的……”

邹兰芳的事情，领导不能不过问了。再加上近几日关于 Z 的反映，看样子，吴宓要栽筋斗了。

吴宓却说，他和两个女人都毫无暧昧，源源本本讲了实际情况。

“你，老兄台，万万不能坚持这种说法。”李源澄说：那只能激怒领导，大张挞伐。“要知道，两个女人都承认已和你私通，而且不止三数目……”

吴宓：“事实如此，我岂可自诬？宓头可断，血可流，自诬、诬人的事坚决不为！”

李源澄叹息：“冤哉夫子！瓜田而纳履，李下偏整冠，乃欲白口不认，岂不谬哉！岂不谬哉！”

李踌躇了好久，命他的女儿来叫了我去。老李说了全部情况以及吴宓的态度。

“须知”，李源澄说：“女方承认，群众尽知，如其领导拉下脸来，是可以动法律的。”而今审案全靠党的文件，据我所知，现时政策，凡乱搞男女关系者，类分两论，一口政治问题，女的（间或亦有男的）腐蚀干部，打糖衣炮弹，是为反革命罪行，处重刑；一口道德败坏，通奸，男女都得处刑，而男方独重。吴公乃有妇之夫，身为教

授,年在花甲,且又屡生问题——不止一人,对方一为弟子,一为年尚20多岁之女职员,告之法院,其糟可知。“而吴公竟然玩忽如此,我实束手无策。你来商量商量,何计以施?”

吴宓:“李公朋友之情,宓深领,铭之肺腑。然而事实事实,要在事之实也。怎可违背事实,胡说一通。领导可以作主观之论断,置宓于不测之祸,宓绝不欺妄以供。”

如此扯了几个回合,我建议:李源澄先回复领导,说已向吴宓谈过,做了启发,拟待他反省后再谈。这里让吴宓好好思考思考,我们两个作朋友的也开动脑筋,想想有无解救之策。李源澄无可奈何:“好嘛,暂作缓兵之计吧!”

我知道,吴宓这人最忌朋友开导劝说。从李源澄那里出来,我就不再理他,由他去闷想。我只是找到邹兰芳,告诫她:现时的法律、政策,非配偶发生性关系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叫她切切不可乱说。

李源澄几次找我商量解救之道,却也一筹莫展,干着急。我想起刘尊一曾找我谈及此事,她是学院的民革负责人,系主任,院务委员,也许有些路数。便去找她商量。她早已成竹在胸,说:“我有一个办法,你去劝劝吴宓,承认邹兰芳,否认Z。就说发妻分居已久,感情淡化,和邹确有爱情,并非乱搞,也未曾乱搞,今决心检讨认错,和发妻办妥离婚手续后,与邹兰芳结婚。——如要一概否定,是万万办不到的,只能走到绝路。”

李源澄认为此计大妙,并主张,不管吴宓是否同意,我们就这么办。“中华古道,救朋友于水火,以身任之,不能拘泥。”

岂料此计不通。李源澄以灵活词句汇报后,领导大不为然:“他吴宓休想抵赖半点。惟有老实交代,深入检讨,才可能从宽发落。”

又过了三天,上午,我上罢课,步出教室大楼,刘尊一喜形于色:“吴雨僧的事,大有转机了。——Z和某教授乱搞,被人现场撞见。而且,她向领导承认,她只和某教授有这种关系。前此,她说曾和吴宓私通云云,全系胡诌,意思是造成舆论,逼使吴宓和她结婚。”

我说:“这不过可望推翻Z一节,而邹兰芳之事仍在。”刘尊一小声说:“你怎么懵了?某教授是F公的同学好友,F公必然要设法为他大事化小,吴宓不就可以搭这个便车吗?总不能同事异论,一个从宽发落,一个严惩不贷嘛!何况,某教授的情节远比吴雨僧严重呢?”

认真说,某教授是个老好人,只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有点二浑。他身高1米7余,仪表端正,本可早配良缘,无奈他立志要找绝顶美人为婚。可从解放前找到解放后,一直未能如意。40未娶,而其志不改。

这天Z挨了C讲师一耳光,冤气填胸,恍恍惚惚走向大校门,眼里转着泪花,却似两眼水汪汪,更显西施捧腹之美。正巧与某教授迎面相遇,他情不自禁,迎了上去:“Z同志!”

居然有人称我同志了?她拭目细看。“认识我吗?”他凑过去问。

“啊唷唷,X先生,谁不认识!”

“哪去?上沙坪坝?进城?”他转过身,和她并肩走出校门。他们就这样到了城里。那以后,难免在宿舍里幽会。左邻右舍因而报告了领导。

刘尊一约我马上去找李源澄,商量如何使吴宓搭上某教授的“便车”。民盟西师支部的负责人黎涤玄副教授正在李源澄那里。这时,西师有两个民主党派成立支部:民革与民盟。两个支部的负

责人刘尊一和黎涤玄,都是院务委员。

黎涤玄,湖南人,梁漱溟的侄女婿。为人热心积极,动辄在大会上继F公之后讲话,也仿领导人口吻:“盟,是党的忠实助手,我代表盟……”

今天,他就是来和李源澄磋商吴宓之事的。“吴宓是我院重要统战对象,民主人士。盟不能坐视他沉沦!……”黎涤玄说。

李、黎都同意刘尊一的主意,问我能不能叫吴宓和邹兰芳一刀两断,永不来往。这当然办不到。吴宓可以不再和邹兰芳见面,但他一定要负担她那几个侄儿侄女的生活费。他认为,一诺千金,他答应帮邹兰芳抚养侄儿侄女,就一定要全始全终。

李源澄:“把吴雨僧叫来,我们四个朋友一条心,估遍这条牯牛喝水。……”再由他们代表民主党派和教务处,向领导说情,恳求批准吴宓和邹兰芳的结婚申请。黎涤玄说:现在的关键在领导那头。只要领导同意从宽发落,吴雨僧还要执拗,我们几个臭骂他一顿,甚至代拆代行就是了。他主张,找领导不能是替吴宓讨情的态度。一是连某教授的问题一起谈,一是取公事公办态度,代表两民主党派和教务方面,向党支部反映教师群众对这两事的思想;怕公开出来教师们脸上都不好看,影响太坏;且觉两人之事亦情有可原,希望领导能从宽处理;三则提出处理建议:承认两人均属正常恋爱,发生关系查无实据,责成两人尽快结婚。……

刘尊一赞成黎涤玄的主张,并补充说:也可以齐头并进,我们三个去找领导,老张去找吴雨僧,代表我们四个,告知利害,要求他务必接受我们的方案。

黎涤玄的方略非常奏效,F公当场表示同意,并立即要求这三个在教师群众中多做工作。倒是吴宓这里执意不干,他说:

“我负担了小邹一家九口的生活,就娶她为妻,成什么话?买

她吗？前此一诺千金之仗义行为竟成狼子野心矣！且我再婚须与发妻离婚，离而弃之，于心何忍？天下知我之师友、弟子如何评价我？更何况还有三个女儿，……骨肉离散，其何以堪？……”

我们四个左说右说，他仍坚持己见。李源澄气了，涨红了脸，说：吴老夫子，你学贯古今，通中外，平时知人论事，远非我辈所可比拟。而临到自己，这么极其普通的道理，你竟然糊涂，不可晓喻。真正是当局者迷吗？这道理万分简单，如不接受我们拼全力争取来的这条路子，你就得身败名裂，蹬劳改，你的夫人和三个女儿要做犯人家属，——刑事犯之女儿罗！同时与两个年轻女子通奸之刑事犯的女儿罗！父亲老年犯奸污罪哟！做女儿的脸往哪儿搁？自古文人讲究封妻荫子，你则适得其反，扪心自问，能不愧煞？……

我们三个又附和其说，把李源澄讲的道理重复几遍，吴宓终于蔫了。

李源澄说：“好了，好了，朱熹夫子说得对，义者，事之宜也。今日义之所在，我们四个朋友应该替你代拆代行。”他对我们三个说：“得给他夫人寄点钱，办事也非得有钱不可。我们都知道吴雨僧年来负担邹家一家子生活，还资助别的人，毫无积蓄，我们来给他凑点钱。”他当即拿出自己的存折，“计有 700 余元，我全数贡献出来。”

我说，我的积蓄只比李源澄少 20 元，也全部贡献。

刘尊一说，她凑 200 元，黎涤玄也说凑 100 元。

吴宓坚不接受大家的资助。李源澄跳了起来：“你到底把圣贤书读通了没有？中华古道，朋友有通财之义，你还把我们当朋友么？”

吴宓还要争辩，黎涤玄说：“同他扯个什么呢？老张，你陪他回

去,督促他给夫人、女儿写信。我们好抓紧时间给他办事。”

邹兰芳来了。我把事情原委和她说了一遍。她迳到吴宓面前,双膝跪下,声泪俱下:“雨僧,师长,我,……我,累赘你了!——我……要给你夫人写信,说明,我,薄命女子,承你的厚恩,只是作你的姬妾,不管法律上怎么个形式,我总把你的夫人当嫡主母事奉。……”

吴宓惊诧久之,双手扶起邹兰芳:“起来起来,不要悲伤!唉,此天意也!……”

经过吴宓和原配夫人陈心一办理离婚手续的反复周折,延至学院迁到北碚之后,吴、邹正式结婚了。西师也给邹安排了工作。但邹刚出学校,工资很低,那么多侄儿侄女,全赖吴宓的薪俸,因而吴宓的经济一直入不敷出。我和李源澄按月赞助一点,却是悄悄支给邹兰芳,不让吴宓知道。其后,邹长期患病,吴宓朝夕照顾,接便洗脏,必自躬亲而不假手于雇用之陪伴。但邹因结核发展,不到两年,香消玉殒了。邹死后,吴宓如常,抚养她的子侄。我因环境变迁,终止了给吴宓的经济资助。而李源澄仍按月分出工资的一部分,送给吴宓。又两年,李源澄被划为右派,气极冤极而精神错乱,被送往精神病院,凄凉死去。这才结束了对吴宓的资助。凡此,均属后话。

21

思想改造运动

在磁器口,吴宓的“花边”新闻只在教师中流传了极短的几天,思想改造运动来了。这可是更大的风浪。人们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关系自己命运的运动中去了。

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了庞大的工作组,组长是西南局宣传部的秘书长张非垢。

动员大会开始,工作组庄严入场。张非垢作动员报告,宣读他的讲稿,在关键的地方抬起头,环视全场,离开讲稿,发挥几句。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采语气:“你们洗脑筋——帝国主义反动派这样诬蔑我们。是的,你们说对了,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洗脑筋,洗掉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装上无产阶级思想……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观点,改造整个世界,改造全人类……”

宣布了运动内容和程序。听大报告,座谈,学习文件,反复讨论,吃透文件精神,交代个人的政治历史,深入批判各自的“反动历史”,深挖“反动思想”。划分了学习组:学生按班级,教师按系科,职工按科室。外语系、中文系和图博科(图书馆、博物馆专科)编成

一个学习组,除工作组派同志下组指导外,每学习组有4至6名学生代表参加。

晚上,吴宓和我悄语:你看清气势了吗?根本之根本是清查个人历史,看架式是要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天啊!镇反运动那么清查折腾,还不够,还要交代。我不知道毛公是怎么想的。取得了政权,大一统了,给百姓一点休养生息之机嘛!着手建设嘛!赶快发展科学文化嘛!却不,偏偏不,翻来复去折腾;就这么翻来复去运动,批判,交代,能够跻国家于富强,能够与西方列强争雄于世界吗?……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皈依,要听命由其主宰吗?

他说:古代奉天为上帝,惟天命是听,天不可违也。然而,每于天道违常之际,人们仍不得不怨之尤之,呼而吁之曰:“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我今之论,实不过吁而求之。……

明天上午就要小组讨论了,要准备发言稿。

吴宓叮嘱:交代务必慎重,凡讨论文件,就谈体会;展开批评时,你对我尽可慷慨陈词,大、小帽子齐上,不吝抨击。而交代历史时务必少说过去,就说,我俩从前素不相识,合校后才初次认识。……此外,对这次运动,不存任何得失心理,再凶不会人头落地;再积极,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即入正册。须知,“如切如磋者,方兴未艾也!”……

重庆不愧是火炉,四月流火,五月铄金,气温不断上升,运动的气氛也正是这样。每天上、下午各四小时集中学习,有时晚上还要加班,会外还有个别帮助,工作组叫去谈话。准备发言稿就得熬夜苦战了。听大报告,讨论,小组座谈,犹如登高山更有高山,出云海复有云海,终于艰辛地迈到了关键阶段——交代历史。再经过小组表态,会内外启发,写书面交代等的辛苦跋涉,终于到了最后之

关键——会上交代、批判过关。

第一个上场的是图博科的教授孙海波。他是民主人士，著名的档案学专家，没有“反动”政治历史。大家都估计，他会顺利过关。他的书面交代检查万有余言，文字简洁，内容丰富，父族、母族、妻族的祖宗三代，童、少、青年时代的详细经历，社会关系，师、友、生一应俱全。念过之后，大家发言，多是分析、批判，没有提实质问题。搞了一天，下午5点多了，学习组组长问工作组同志，是否可以结束。这时，F公举手发言，说孙海波抗日战争初期在沦陷区呆过，“连民族立场也没站稳，何况阶级立场！……”

晚饭后加班开会。学生代表首先出击，痛斥孙海波隐瞒“汉奸”历史，妄图蒙混过关。“连蒋介石也被迫口称抗战，而你孙海波却居然认贼作父，丧心病狂！”

夜10时休会，决定：孙海波重写书面，再排轮子到会上交代。

孙海波遵照规定记录众人意见，一面振笔疾书，一面狠命抽烟，两颊直到脖子，涨成了猪肝色。散会后，人们迅速离去。吴宓徐徐起立，动作迟缓，盯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孙海波有高血压发作的危险，叫我扶他一扶。我回看一眼，表示明白，当即挎上书包，快步迈过去扶孙海波。果然，他那胖胖的身体起立维艰，步出会场高一步，低一步，这是高血压超过警戒线的标志。我扶着他缓缓前进。到了小溪边，干脆架着他，让他吹风乘凉。约半小时，才慢慢扶回他的宿舍，再给他作了穴位冷敷及按摩，切脉确信血压已渐平复，我才告辞回房。

吴宓在我房里端坐相候。他朝我摇了摇手，起来把手捂在我耳边，悄语：礼应如此。你不扶持，他今晚必然暴死，“头可断，血可流，斯文同骨肉之义不可废也！”要以孙海波为戒，务须有这点修养：“猝然骂之而不惊，无故辱之而不怪！辱骂任尔辱骂，正义我自

有之，人格我自存之！”他又轻声叹息：这个海波，血压如此之高，却又如此敏感，还能搓磨几时，实难预料！

他不幸而言中。孙海波熬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并经多方联系，调出西师，到了华东。但1957年却被划为右派，发配监督劳动，不久就死于河南某地了。

吴宓出场了。他的书面交代毛笔楷书，极为工整，可是很短。他极慢极慢地念，不到半小时就念完了，实在出人意料。人们先是面面相觑，好一阵才有教师发言，语气温和：内容尚可取，只是过于简短。继而学生开炮了，而且一炮猛似一炮。有两个学生甚至跳起脚戟指痛斥：

“这是儿戏交代，抵触伟大严肃的思想改造运动！……”

“你对抗运动！……”

“你把党的亲切教育当作耳边风……”

“无视党的仁至义尽的教育！……”

“你是个极端少见的顽固堡垒！……”

大轰大嗡之后，又继之以和风细雨的启发、分析、说理，详细论证他这种态度就是抵触、抗拒，……。上午完了下午接上，直到晚上，搞了一整天，才宣布：吴宓重写书而之后，再定时间会上见分晓。

散会后，我和吴宓走在一道，在去宿舍与饭堂的岔道口，我往饭厅走，他却说：“我得先回房洗洗脸。群鸦乱噪，我的耳朵污秽太甚，得先洗一洗。”

晚饭后，工作组的同志来启发他，叫他写详细一点，认真对待。吴宓却说：“其实，我已写得很详细了。认真说，我的交代检查只须两小段。”他说，一段曰：我是爱中华、爱祖国的，最强有力的事实就是，我没有在美、英、法等国定居。第二小段：我真心拥护中国共产

党,愿在其领导下服务于高等教育。有雄辩之事实:我并没有跟蒋匪帮跑到台湾,而留在了大陆。

工作组的同志也没有生气,再耐心解释:不能那么简单。

最后,吴宓欣然答复:我听同志们的开导,另写,写长些。这容易办,自古写长文易,写短文难。

院内有一位N老师,此人系四川教育学院合来的讲师。为求交代详细,争取进步,在小组会上羞羞答答地交了他的极不道德行为——曾于解放前先后同两个男子搞同性恋,又同两妇女私通,且因同性恋养成恶习,以至同妻子和那两妇女都鸡奸。

但人们仍觉未足,指责他交代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学生代表中有一位女生还再三追问:“你同那两个人搞同性恋,到底是你鸡奸别人还是别人鸡奸你,或者是换水养鱼?……”

教师们谁也不知何谓“换水养鱼”,不免面露疑虑。那位未婚的女生竟然原原本本,剖析分明。在场的工作组女干部似不赞赏,接话示意:运动要求交代的主要是政治历史,生活作风不是重点。能交代当然好,却不必多谈。“N老师的交代暂且告一段落,关于这个作风问题,以后不必再嘀咕了。”

但张非垢听了汇报,却大感兴趣,认为让他作一次大会典型交代,以推进运动:N老师历史简单,童年至今,基本在这个地方,川教院毕业后留校工作,没有政历问题,放他过关,绝不会出毛病。隐私事小,而人们最为讳莫如深。以此树立典型,带动其他人交代,最为有力。

典型交代大会准时召开,N老师面色惨白,按照布置,把鸡奸、通奸等事实原原本本在台上仔细道来。他的妻子就是本校职员,当然也在场。她一如泥塑木雕,两眼直视,脸色比丈夫更难看十倍。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在这绘声绘影的特异叙述而活跃神动。人们的表情几乎完全一样,似冷漠,又似凛冽。

吴宓开会回来,发现我没去,惊问:“你何以不去?”

“侮辱人格,……”

“你呀,大违古训!”吴宓说:张耳、陈余一起逃亡,为城门吏所执,笞陈余。陈几番欲起杀吏,张耳蹶之以足,令伏地受笞。何也?——你拒不到会,这才是真正以行动抗议领导之布置。他说:大会主持人坐在台上,不停巡视会场,直至N老师讲完,领导才起立表态,郑重宣布:肯定“N同志”能如此坦白交代,是大大的进步。说时,还在盯外语系这一组的席位。“很清楚,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你没去。……”

我说:奇了,那天你交代,会上,他们反复指摘你抗拒、抵触,你若无其事。我不过没去当听众,你就这么害怕!

他叹道:你才奇了!这也不明白,交代、检查不大胆,不彻底,这是常有的,不足为怪。他们在会上轰闹,说我“抵触”云云,不过是拿大帽子吓吓我。而你不去开会,是以实际行动抗议之抵触。且而,公开指摘你,不过指摘指摘而已。可怕的是悄悄给你记上一笔,装进档案。因为,人们总是根据这些不和你见面的阴帐对待你,收拾你的。

吴宓把我教训了一顿之后,却又感慨说:“当然,这个大会确实缺德。我敢预料,此事将有余殃!”

他料得很准。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N老师夫妇一直霉头霉脑。而个别油滑男子竟然以这事吃他妻子的豆腐:“喂,把你们的好经验传授传授嘛!”“教教我如何?”

一天,忽听N老师所住的宿舍区人声喧闹。原来,他妻子不知何病,突然死了。N老师跳跃颠顿,嚎陶大哭:

“我害了你呀！害了你呀！……”

几个孩子——1岁、3岁、5岁、7岁，跟着嚎哭。吴宓挤进围观的人群，看了一眼，回身就奔上楼来，反复写着两行字：

“荒唐之中演大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吴宓接受帮助，第二次会上交代时，足足念了一个半小时。天太热，念得一身大汗。但提意见的火力比头次更为猛烈。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生活、治学、对人、对事，全是“资产阶级加封建贵族的杂拌”，“表面布衣布服，古色古香，道貌岸然，骨子里不堪言状”，……。还是学生打头阵，教师们不过附会其辞。往天是四个学生，今天翻了一番：八个。那位J女生始终居于领唱地位。

下午转为集中轰击“学衡”。吴宓是《学衡》的创始人和主编，曾带领一批知名学者，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又要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成分，汇为民族的新文化。

学生们首先论定：学衡即吴宓，吴宓即学衡。正是吴宓树起学衡的大旗，反对五四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对垒。学生们声色俱厉：“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肯定，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而你偏偏拼死命反对鲁迅。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死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而你坚决反对这个运动，也就是拼死命反对中国共产党！……”

“学衡派的全部主张，就是捍卫封建主义，推崇资本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总而言之，你是蒋匪帮那个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政权的吹鼓手，卫道士，是蒋匪帮的鹰犬。……”

J女生甚至轻蔑地结论：“你吴宓先生到底有什么学问？拆穿了，不过是封建买办的糟粕加资产阶级的洋破烂。……”

吴宓神色恬淡,从容记录。J女生凑过去看,原来他把人们的发言译成了文言文,几个字就概括了一大段。她吼道:“你看你这个反动派,作记录都在搞复古主义,搞封建复辟!”

吴宓从容答复:“文言文简捷些嘛,我只有这样,才能写字少,而记录全。”

支部书记F公也在座,他始终没有发言,面带微笑,好似在欣赏话剧。

散会了,吴宓叫住我:“我们到街上去小酌,稍作快谈,何如?”

“街上——磁器口上馆子?我看,不如到我家里去。……”

此时,我母亲和我那年方六岁的大女儿正住在西师柑园家属一区,邻居是黎澍玄和另一好友——中文系的副教授王鲁雨。那里说话比街上饭馆里安全得多。我母亲带孙女儿散凉去了,我和吴宓便挥扇品茗,对坐谈天。

“太有趣了,”吴宓说,“真是莎士比亚也创作不出的好剧。”他说:当年《学衡》和鲁迅的论战,是鲁迅找上门的,而且,他指责的只是第一期上面邵祖平的一些旧诗词。我也看不起那些东西,我当时就对朋友们说过,鲁迅指责得对。何况,《学衡》第一期是胡先骕组稿,第二期起才由我主编。我不曾和鲁迅论战,怎么说我反对鲁迅?然而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是在此事的20年后,如何我能在20年前就“处心积虑”、“明目张胆”以反对伟大领袖为宗旨?……《学衡》是否反对了五四运动,姑且不论,单说五四运动起于1919年,其中坚分子多为后居国民党要津之人物,如陈立夫辈;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诸生乃谓五四系中共所发起领导,进而断言,我正面反对共产党,乃共产党之死敌。你说可笑不可笑!……

接着,他把刚才会上那些意见,一一择要评说。他说:我主持

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了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教授,这也罪大恶极,其根据为王国维蓄辫子、穿马蹄袖。诚然,男人喜发辫,穿马蹄袖衣,是清朝的服式,但这总不是清朝的官品顶戴吧!“倘或二、三子之论成立,则今日六十左右之人均有罪也!因这些人均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均拖过发辫,穿过马蹄袖!”……

我说:学生们年轻,从前的事能知多少?比如说,《学衡》的内容,连我也未透彻了解。

他说:“早在1939年我们订交之初,我就对你说过嘛!”学衡,简而言之,不外主张: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传统,国粹不可弃,中华传统道德不可弃;西方之科学文化应该学习,但不可拜倒在列强脚下做洋奴,不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好。……

他说:还有一件趣闻,他们说,我在清华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反动透顶的为蒋匪帮竭尽犬马之劳的买办学者,列举了“高亨”、“高诱”之外,“还有一个‘高俄’,你听见了吗?”

我说:“听到的。只是我有点模糊,高亨、高诱,我看到过他们的著作,就是没见到高俄的!”

他笑了:“你怎么懵到这等程度!他们说的高鹗,我看过J女生的发言提纲,是高鹗,续写《红楼梦》的那个高鹗。……”

我忍不住大笑。他说:“奇怪的是,F公是诗人,文化名将,诸生信口开河,他应该明白,何以竟然微笑听之,不作一语以校正之!”

我说:这有何怪?运动之中,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他怎么能给群众泼冷水呢?他说:哦,是了!“如戏,如剧,挑兮拈兮,在高等学府兮。好吧,我就再写第三稿,看他们怎么批评吧!”

吴宓把自己的第三次交代稿标题为《补充检查》,针对第二次交代会上的主要意见,一一扼要辩解说明。交代材料的篇幅比第

二次多了,念了近两个小时。大家既肯定他态度认真,又重炮轰击了他针对群众意见一一“狡辩”的部分,说是“变相地宣扬他那发霉的学衡派臭观点。”学生们的批判也不像第二次那么声色俱厉,也减了一些特大的帽子,例如“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死敌”之类。

然而却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吴宓没有交代与美帝国主义的不可告人的关系。

下午会议将终时,F公发言,说了几分钟。“吴宓先生(这是定性词,等于说吴宓是资产阶级老爷)经过群众帮助,还是有些提高,但这是很不够的。以吴宓先生的具体情况,这个年龄,不可能操之过急。……不过,我们是善于等待的。”他指出吴宓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思想反动,顽固;二是和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吴先生珍惜群众的帮助,继续努力,交代和美帝的关系,批判反动思想。”

工作组同志重复了F公的发言,宣布“吴先生”的交代“暂时摆一摆”,“等待他的提高”。

散会了,吴宓约我到街上吃饭。“我过关了,我们庆祝庆祝!”我说:“哪是过关?不是明明说,摆起吗?”

他笑了笑:措辞有别,不可不察。摆起,不是挂起,这是姑予过关,不发凭照也。“我要这个凭照做什么?反正琢磨知识界之龙恩方兴未艾,过了初一还有十五。”……

果然,后来孙海波三评之后,结论是:不能通过,挂起。责成孙海波继续考虑,深入检查。而到了我三评之后,则宣布:交代、检查都很不够,小组不通过,承报上级,请示处理。

22

1952年7月8日的《新华日报》

吴宓的总结未获通过“摆起”之后，F公来看他了。情知事属非常，吴宓却决心顽固到底。静坐相对，一言不发，看F公作何言语。F公似乎并不计较，冷场不久，就亲切自然地说话了：

“近来身体怎样？”

“粗安。”

接上说了几句闲话，就直接引入正题：

“你的总结，两次小组没有通过。你没背包袱吧？想必你吴公是能够理解的。组上的老师们随大流，学生打主力。青年学生缺乏历史知识，学术水平也有限，全凭热情，难免宁左勿右。我也好，工作组的同志也好，都不便给群众泼冷水……反正小组的决议并不就是组织上的结论。”

“小组决议是正确的。老朽落后如宓者，思想改造之总结，岂可随便通过？”

“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党是重视吴老的。一不认为你老朽，二不认为你落后……”

吴宓心想：去年，你不是亲自当面指着我的鼻子说：西师教师

中,论思想反动,我最冒尖吗?岂止落后而已哉!

“以我个人说,”F公语态更为亲切,“是把你当作前辈的。本来是前辈嘛!”他说: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你在清华任教授之时,我们极慕你的大名,深恨不能作你的学生。……

可是,对这样的推崇,吴宓却感到不能怡然受之。他说:F公过谦。你是我的基层领导,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都得从你这里发脉、开头。如有须得教育帮助之处,敬请不要顾虑,我是能够接受的。

F公迟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是说的肺腑之言。外语系的教授,无一例外,都是你的学生及再传弟子辈。正是这样,我们党组织,工作队的领导,都认为你是外语系教师中的一面旗帜,也是整个西师有数的高级统战对象。你,不仅不能倒,还得树一树。有一个好办法:把你的总结斟酌斟酌,写一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体会——一篇文章,拿给我,通过组织,由西南局宣传部转给《新华日报》刊登出来,你就成了这次各大学思想改造运动中突出的好典型了。……

F公进而提示:《人民日报》刊登的那些著名学者如冯友兰等人的文章,就是这种性质,也正起了这种作用。一经见报,他们在新社会的政治地位就提高了、巩固了。

吴宓当然明白,这是对他的极大照顾和优待。他说:感谢党的照顾、关怀。但恐宓思想水平太低,写得不像样子。……

F公:不用顾虑。你先拉个草稿,或有提法表达稍欠,把握不准之处,我们可以作你的顾问,帮你斟酌。

夜里,吴宓和我商量说,他很想不想写这个文章,“什么顾问、斟酌,不过是他们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说:“你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样的旷世恩典,你

竟不识好歹到了这等程度！……”

吴宓说：“好，你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吧！我这里，两个吴宓在争吵。”一个说，人家拔你于批判鞭笞之下，举之于头面人物之列，你应知恩感德，积极配合。另一个吴宓却说：写此文章，不外痛切自责，认罪求名，迹近献媚阿谀，岂不丢人？……

我说：你的踌躇是很自然的。我看，只有想想你自己多次说过的话，得共产党使中华富强，你个人“肝脑涂地也甘心”。“现在只要你写个心得体会，影响天下书生……你却踟躇不前，肝脑涂地之说将作何解？且你弟子满天下……”

不待我再说下去，他站起说：“行了！我豁然贯通了，我马上动手，写……”

F公以极大的耐心，花了不少时间，帮助吴宓三易其稿。第三稿才基本合拍。可是吴宓却在尾上写了一大段话：他虽然思想有所进步，但仍有三点保留：

一曰：中华传统道德不可废，孔子之书还须读。经史子集等古籍不可一概斥为封建。

二曰：文字改革他不赞成。汉字简化，尤其拼音化万不可行。例如：繁体汉字皆据六书之学构成，手戈为“我”，水可为“河”，音、义有凭，便于理解记忆，笔画虽稍多，而学习掌握事半功倍。简化汉字废六书而成机械之无义笔画，只能机械记忆，掌握反而不易。

三曰：外语教学不能仅限俄语。他列举当今世界各种语言覆盖之地区、人数，断言：不论友好抑或斗争，我中华必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这就必须“通晓彼邦语文”。（按：当时中学外语课一律只教俄语，也有小道消息说，大学的英语专业即将一律取消。果然，1953年底，即吴宓写此“检查”的第二年，即通令大学的英语专业及公共英语一律取消。所有英语教师专设教师班，由俄语专业教

师教他们,让他们改学俄语后转为俄语教员。而英语专业学生一律改为俄语专业。)

吴宓把三次写的“检查”稿都拿给我看过,并说,他之所以拿给我看,主要是要求我以“畏友”之精神,替他考察一下,他的检讨有无“吹嘘自己、文过饰非、奴颜婢膝、言不由衷”之处。他说:你务必“严格衡量,定要此文合于我的实际情况,无损我为人之标准。”

两次返工,F公给他提了些什么意见,他也对我说了。

我觉得,F公这次帮助吴宓写这篇文章,表现了难能可贵的与人为善之诚。这时,F公已是整个西师学院的领导人。公务极其忙碌。但从布置吴宓写文章,到前后定稿,都是他亲自来找吴宓。提意见的态度也很温和,显得特别耐心。措辞尤其委婉:“最好……”,“……就更好……”,“……就更好了。”“还有美中不足之处……。”

1952年7月8日清早,我路遇F公,他叫住我:“托你去看看吴宓。他的思想检查今天见报了。没有按原稿全文登载,节略了他的三条保留意见。可能他会闹情绪。你要好好劝劝他,能这样在《新华日报》出台亮相,很不容易,我们西师有几个人得到这种荣誉的?闹情绪就不好了。他那保留的三条意见,我们并未拒绝接受。……我们已经切实地、郑重地、原封不动地向党反映了,以备参酌。也就是实际、明确、不言而喻地认可了,他有保留这三条意见的自由。……”

《新华日报》到了。我去看吴宓,他已把自己的文章读了一遍。

“发表了?”我问。

“发表了。”

“砍掉了三条保留意见?”

“当然要砍掉的,”他说:我本来就准备他们砍掉的。但我必须

写上,表明我思想上确有这三条保留,不写出来,隐瞒自己的观点,“是懦夫,也是太不光明正大,是小人也!”

我把F公的话对他复述了一遍。他详细询问了我和F公相遇的情形,思忖了一下说:他是凑巧遇见你,托你转话。不是专程找你,“没有怀疑我们俩人有特殊关系。”又说:“F公这次态度之好,真是难得。……”

现将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时为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1954年8月31日停刊)第三版所刊吴宓的文章照录如下。

《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

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教授 吴宓

此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之时,我认识到,对我个人说来,完全是立场与标准之取得与个人态度之转变问题。即是要抛弃或脱离以前我所遵从的“普遍标准”或可称之曰“无标准”,如所谓“人类之公性”、“惟是为归,惟善是从”“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及“超党派”、“超阶级”等,而接受服从我昔所未见未知的新的真理,正确而高尚的标准:即是(一)唯物论(二)无产阶级思想与领导(三)为人民的利益而生存、而动作。我个人之态度,须照此标准完全转变(虽然是逐步渐进地),即是:要舍弃或改正我前此五十余年曾有之旧思想、旧感情、旧行为、旧习惯,而按照新标准来造成我今后所要有的新思想、新感情、新行为、新习惯,以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人民教师。这是我目前应当作而且极愿作的事情。

在听了动员启发报告,又和工作同志谈话之后,我便很快地坦白地说出了我心中的三种顾虑:(一)我怕被特别表明出来作为顽固的旧文人旧学者之典型;(二)怕在大会上说话,受群众的叱责凌

辱；(三)我去年冬天曾作旧诗，对个别地主及反动军官表示同情，误解了政府的主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政策；虽我早已悔悟并已经检讨过，但怕此次结合起来施行处分。现在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所以我感觉心中十分轻松愉快，便无忧无虑地专心学习改造。

我在学习改造中，细心检查我过去的生活、职业、著作，慢慢地发现了我的主导思想。

(一)

我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多年浸润在旧礼教旧生活中，所以我有极深的封建思想。而我自幼喜读旧书，自四书五经至小说笔记，所读极多。这都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法规与生活写照，我却极端地迷恋、向往、憧憬着。我自幼未历贫苦，“不辨菽麦”，虽七岁以前长汪乡间，七岁即旅行由陕至沪，而丝毫不知观察农民以及舟车负贩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情形；社会中的人情世故我亦不留心，只是沾在书中，走入一个空虚的理想世界，完全脱离了现实。而且我将中国旧书所明白掲載的中国封建的历史文化的暴乱残酷丑恶方面，故意不去注意，“眼不见为净”。只要看着、想着其中我所喜爱的那一部分，譬如尧舜禹汤以至孔子孟子，我认为全是真的最好的人物模范，下而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等，虽是小说虚造，亦认为比真的人物更完美，更值得欣赏爱慕。类比，我把周礼(周官)一书，认为是中国古代所曾经实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写真，可以说是纲举目张，对人民福利关下的无微不至。这样，我以虚幻的想象，造作的感情，唯心论的主观，把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与文化，完全理想化了。我只倾心注目于我所造为图画影片，而不知不看中国古来以及现今的实际情形，自

然更无所谓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与阶级观点。在具体的事物中,我最爱中国文字之美,我亦爱中国的山水画人物画,却亦爱街市商店中所陈列的手工制造的物品,认为都是中国历史的遗产,中国文化的结晶,这些都应当珍贵、爱护、保存,并且继续发展。但不知这都是数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与劳动的结晶。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阶级统治、任何现实情况之下,去努力保存并发展中国文化之好的部分,好的方面(用不着摧毁反动统治),至于那坏的部分坏的方面,自然会消灭的,不劳我们去注意的。我甚至假定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我又说:大多数人都落于实际,喜作政治活动,只有极少数人才知宝爱理想的文化,愿为文化尽力,我便是其中之一人了。以上是我的封建思想的国粹主义。这由于我的地主家庭出身,亦由于我所饱读的旧书全是中國数千年封建统治制度的产物。这种封建思想的国粹主义,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是我一生最主要的思想。我后来在我所主编的七十九期学衡杂志中,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他处所表现的,全不外乎此。学衡杂志在五四运动后,提倡文言文与旧诗,并主张要尽可能的保存旧礼教旧道德,在当时确曾阻碍了革命与进步,为顽固派保守派张目吐气,间接庇护着那时的封建统治。大公报本系官僚资产阶级吴鼎昌等所创办,该报标榜言论自由独立,实则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利用,终于强迫收买。我为之主编副刊,自然亦是提倡封建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了。此外,我作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亦极力发挥我的国粹主义,反对琐细事物的考证研究,虽未能畅行其志,不久便被迫辞职。

(二)

我所受的教育,是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我在清华学校肄业六年,毕业后在美国留学四年,后来又在英国留学一年。在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连西南联大时期)近二十年。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办,而间接受美国人管理的学校。我作学生时,校中师生讲的全是英语,唱的是美国歌,美国史和美国公民学列为正课。举此可知清华师生所受崇美思想熏染之深了。我在美国,追随“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先生,认为他的学说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他并且明白斥责当时的美国政治是“颓废无力的帝国主义”而将趋于衰亡。但实际是因为白璧德教授的学说,提倡“人类之公性”;表明“人性”与“物性”不同,尊崇希腊的唯心哲学,兼取中国的儒教与印度的佛教;强调古典主义文学之道德与纪律等等,都与我的好古保守,唯心理想的倾向相合,都与我原有的封建思想国粹主义水乳交融,所以我热烈的接受了。这样,我在留学时期所吸收来的,是西洋的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现代欧美资产阶级维护他们的残酷的剥削与统治所凭藉的学说,亦即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所利用的文化宣传资料。此外还有一般的英美式政治社会思想,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改良主义,我都饱吸满载而归。归国后,便在我所主编的学衡杂志中,大公报文学副刊中,作了多年的发挥与宣传。这样,我虽自命为一贯超然与中立,以为我来曾加入任何党派,学衡杂志未收取过分文稿费或津贴,而且自己曾捐薪水作经费,实则,在工作与思想上,我多年很用力地为中西反动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服务,为唯心哲学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作宣传,阻碍了进步与革命。所以我的地主阶级出身,与我的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是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两方面有同样

的恶果,而更加重了我的责任与罪过。因为,很多读我的文章的人,认为我是学贯中西,知此知彼,既然亚里士多德同孔子都主张中庸,既然英法古典文学亦注重“君子”人格的模仿,岂不是论语礼记以及人谱类记五种遗规等书更应当熟诵而实践么?我曾被誉为“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又曾被人作剧本嘲笑为“新学究”。此等事正可说明我曾挂着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招牌,在制造着贩卖着双料加二的思想毒素,比那漂亮时髦的“新人物”,比那迂腐呻吟的老学究,种下了更深远更广大的恶影响。请只看两件事:第一,在我所编的刊物中,登载有各时各地那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欢欣地表示赞许与同情,这些人自愿地都成为我们的同道知己,无形中构成了一个宗派,代表着一种风气。第二,我在清华和联大任教授近二十年,在外文系毕业,在我班中上课,或同我接近的那许多学生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或多年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的人,这不是我罪过的铁证吗?

我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年,可怜我全不知道)回国,在东南、东北、清华、西南联大、川大、武大等国立大学,不断地作了三十年教授,又在许多大学兼课或短期讲学。所教的是西洋文学。在我的职业中,我犯了纯技术观点与雇佣观点的错误。我自以为我很能勤苦负责,以劳力换得薪水,而且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从不营商投资图获利润,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亦无宗派主义。这样,我可算是自食其力的清高学者,不愧不作的了。但试问:所谓国立大学是谁所立?经费何来?我究竟为谁服务?我真是“超政治”的吗?现在我明白了:这三十年中的中国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走狗的买办阶级联合而建立的反动统治政权。所谓国立大学,便是他们所设立的机关。我在里面任教授,便是为以上各反动统治阶级忠实地

服务,甘心作他们的帮凶和奴隶。我所领得的月薪及研究费,便是他们压榨剥削劳苦人民工农大众而得的馊余。而且我教课的方法与内容,全是抄袭欧、美(尤其美国)大学的成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教材与教法,改良主义的思想。我鼓励学生多多读书,成为“博雅之士”,我曾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的论文,注重琐细事物的考证。我喜爱“天才”的学生,而轻视成绩中等下等的学生。更常说中国古代和西洋中世纪如何地美好,英法德美等国学术文化如何的渊深并称赞英国政治上的思想自由,社会中的合理秩序等等,用这些伪说妄谈,麻醉了青年的心目,助长了反动统治政权的声威。特别是我个人,在教课中提倡人文主义,讲授超政治的世界文学史,事实材料极为详备,而毫无思想与批判。我又时常表现出,我喜爱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和平改革运动,而厌恶那激烈的流血革命斗争,即是,我一贯提倡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即是英美式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抗战前,我在清华对学生运动,不参加亦不反对,对当时所谓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我一律平视,又曾在教授会中发言,自许为中立,不偏不倚地支持张奚若亦同情张申府,我又最喜谈雪莱式与托尔斯泰式罗曼罗兰式的博爱与人道与儒家的仁德,佛教的慈悲结合,于是主张止杀与息争,无标准地反战、主和。甚至到了一九四九年春,我还赞成那种划长江为界,让国共南北分立,和平竞赛的荒谬主张(实是国民党缓兵之计,苟且求存的一种策略)。像我这样愚蠢的错误,完全不能认明敌我,划清界限,都是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所给我的病毒。现在检讨起来真觉得不寒而栗了。

(三)

我出身封建地主阶级,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然而我的性情与我的生活方式却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对事对人,喜用感情,缺

乏理智的判断与意志的坚持。我充分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动摇性,毫无斗争心。早年清华闹风潮,我作学生代表,被开除。当时,如吴芳吉先生等掉臂自去,而我却与几个代表俯首乞怜,上书悔过,竟蒙校长准许回校,卒得毕业出洋。上段所说我的旧民主主义的主张惯走中间路线,并来自同一的根源。我深深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在我的生活史中处处都可看到。抗战前,我在北京,在号称世外桃源的清华园中“藤影荷声之馆”,一住安住了十几年,过着那西洋式的享乐卫生又加上中国士大夫的清闲安逸的生活,这生活完全是效法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当时中国各省的兵灾旱灾,劳动人民的痛苦呻吟,我只在报章中循例阅读,诗词随意歌咏。至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解放战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与其内容的真理,我更几乎是“耳无闻目无见”的。同时我还有一种毛病,我注重文学与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我喜谈恋爱。这其中有三种错误的,虚幻的,乃至不健康的思想成份。第一是中国风花雪月的旧诗词与才子佳人式的旧小说。第二是西洋浪漫主义文学如歌德、雪莱、缪塞等诗人之爱情观,加上中世纪骑士文学所产生的吉诃德先生精神。第三是英美通行的男女交际及当时所谓新家庭新人物之礼俗习尚,例如认为太太必须能说英语法语,能与外国人交际应酬等。总之,这些思想成份,都是有闲阶级的,都是虚幻不合现实,恶劣、乃至十分可耻的,而其发展之终极,直到资产阶级的高度奢侈享乐腐化生活,与利用势力霸占,强取豪夺,视女子为美丽的商品,而许多所谓交际花,名媛闺秀,亦甘为“花瓶”“玩偶”而不自惜。这样的生活,这类的人物,若与现今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战斗英雄,新中国社会的劳动模范以及共产党辛勤廉洁的工作同志和供给制干部比较起来,其清浊美恶,真有天渊之别了。且说我在这种氛

围中,与一九二九年和我的太太离了婚(本书作者按:实际上,这只是吴宓从此和陈心一分居。到他和邹兰芳论婚时,才依法办理离婚手续。),所追求的女士,与我将合复散,以后又和若干位女友女生往来多年,结局只感觉到厌倦、空虚、烦闷,我于是想归依佛教,以宗教麻醉自己,解慰自己。现在回头正视那时的生活及心情,更痛悔我浪掷了宝贵的时间、金钱、精力于无用之地,实在愧对人民!仅仅能够体验出认识了那种小资产阶级生活之无聊,与那一类唯情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之毒害而已。我这种生活涉历,有两个实际的结果。第一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吴宓诗集》,这是一部旧诗集,我的文学传记。当然以象牙之塔中的我自己为中心,分析情感,抒写性灵,整齐的韵律,美丽的词华,然而全是违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以工农兵为题材与对象的人民文学。现在看来,自应拉杂摧烧,不敢示人。然在出版后多年中,诵读并欣赏甚至摹仿《吴宓诗集》的青年亦有人在。我在思想上毒害了这些青年,自应在此坦白地承认不讳。第二是我在昆明、成都、武汉等地,屡次为人讲说红楼梦。虽未售票敛钱,有时亦隐寓道德之教训,暗指时政之得失,然而正当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将成功的时候,我却作此演讲,以娱乐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结果是把许多来听讲的男女贵年,引离革命的现实而趋向于享乐腐化。这种麻醉青年的举动,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是有利的。

综合以上所叙述,解放前许多年中,我有极深的封建思想与国粹主义,又有欧美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雇佣观点及改良主义,又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爱好浪漫文学、唯美艺术等癖性。解放后回头检查自己,真觉得今是而昨非了。一九四八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

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写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一九五零年起,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大体了解,无多心得。但用我的旧眼光,看出了人民政府之丰功伟绩:(一)一年内全国解放平定;(二)半世纪所未有之全国(连西藏)统一,且人民志愿军出援朝鲜;(三)百政具举,人民生活有关各事无不改良尽善,且能细密配合;(四)政令可推行至穷乡僻壤,真成家喻户晓;(五)共产党人之忠勤廉勇,具有干大业、排大难之救世精神;(六)各地各界男女人民,悉受了教育感化,转眼之间,移风易俗,已成了道德改革之功,今几于路不拾遗,人不敢伪言(以上都是中国旧日儒生所期望者);(七)绘画、音乐、舞蹈各艺术均能善用旧形式入新材料,艺术家与人民中潜伏之天才及精力,由此全得发挥出来,而其所表现之格调又皆正大宏深,一洗昔日之靡靡之音与薄弱贫乏之态。这类的观察,都使我衷心感佩,极愿归附新中国与人民政府,自然我对于唯物论的新学说,以及各种政策设施之本意,还是未能认识的。到了一九五一年经过参加各种运动及学习,尤其是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又得李源澄先生之一贯督促(由与中国旧学之比较而推动新思想,并力劝多读新书),方敬先生之随机启发(如指明维吉尔死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又希腊某某两神活可解释为劳动创造世界及人民智慧等),我的思想方才渐渐地转变,提高了不少。我发现我的情形是如此:在事实与行动方面,我能很容易(而且很快)明白地认识,诚心地服从,并负责地实行。但一到虚空抽象概括的

理论方面,我便多疑惑,便多困难。例如:(一)我不相信“地主之中,没有一个人好人”;(二)对唯心唯物的根本问题,我还以为:昔之所见未必全非,今之所言未必全是,“要在知其全,观其通,取其宜而已”。关于(一)类的问题我迅速的得到了解答及纠正,我已明白相信了。而关于(二)类的问题,我仍不断地思考,总想望把旧思想与新思想,唯心论与唯物论,融合成一个全体而解除其中所有的矛盾。我这样辛苦了好久,毫无成绩,直到一九五一年秋,我读了金岳霖教授《学习了实践论》那篇文章,得了启发,知道“缘木求鱼”终是无益。我决计仿照金先生的办法,不再努力去融合缔造,而立刻“一刀两断”把旧思想旧哲学整个包封起来,锁在箱中,不留在我的心底,只当没有他或完全忘记了一般。反过来,我从今作始,只用新思想新哲学方法去处理一切问题,等到一切全通之后,我原有的疑难便自然都已解决了。好了,好了。我决定这样做。我要忘记一切旧的哲学,我暂不多读旧的文学作品,等到我大体识解了新哲学之后,再去结合旧哲学的思想,再去阅读旧文学的作品,那时我可办到对旧哲学毫无干格,对旧文学亦可实行“批判地接受”了。我这个决心,当时在学习《武训传》的第三小组会上曾讲过,但因我忙且懒,又想自修一点俄文,所以此决心未能实行,所读的新哲学书籍实极少极少,只有以后自己努力。另一方面,我对旧文学的爱好,对旧社会旧事物的感情,依然存在,譬如戒酒的人,有时又独酌一两杯,或梦想着酒的旨味。于是我便有一九五一年一月作出旧诗,同情个别的地主与反动军官之死,不了解政府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之事。这一个重大的错误,我很快地检讨了。当时我总以为我思想上极能了解这问题的一切一切,只是感情的出轨与妄动而已。现在我进一步地明白了:这感情上所犯的过失,正是由于我思想的不明确。是的,以后我要加强我的思想学习与

训练。如果我思想真能明确无误,那时我的一切感情便都纯正,而决不至出轨,到了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应当是如何的快乐,如何的坦然自适呀!

今年六月五日,我在第三小组学习会中作了自我检查,大体与以上所叙的相同(原来事实较详,今则批判略进),承蒙本组的各位先生给我提出许多条正确而中肯的意见与批评。这许多条意见,可归纳为三点。我即就此三点,作出书面的答复。我很明白,这三点是我过去生活历史中最主要的缺点。我现在想:这三点亦就是今后我思想与工作上所应改进,所当努力的方向。我下了决心,一定要由这三点去做,以勉为新中国的一个人民教师。

(一)我今后定要多读理论书籍,学习唯物论的新哲学,追求惟一的真理,深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以使我更能深刻地批判我的过去,知道我从前错误之所以然,今后可以改正,不再犯。又就我教书的工作来说,同学们的意见,是我讲授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总嫌事实材料太多,思想批判太少。是的。以前我因为所读的新书太少,未能用社会发展史,阶级观点,去说明文学史中的一个一个历史事实,作者生活,作品内容是如何造成的,又觉得同学们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比我高,便依靠他们自己去加批判,这是错误的态度。这是我未尽教师的责任。以后我学习有得,定要每件事都能加以批判。并且要寻求苏联出版的世界文学史一类的书籍,以供参考,可免错误(最近我讲莎士比亚,已经是这样做了)。

(二)我今后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由阶级观点去看人看事。政治上要认明敌我,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不再纵任个人的感情,造成思想与行动上的错误。政治经济固然有阶级对立,文学思想亦各有阶级的基础,所以不但抗美援朝、反细菌战等事要站稳立场,

即在教课中,讲授文学史时,一事的解释,一语的评判,亦须详细辨别,不可丧失了或迷糊了阶级立场。

(三)我今后定要加强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遇事必须坚持原则,不再依违两可,或调和并存,走中间路线。如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必非,我应当根据(一)马列主义;(二)无产阶级思想;(三)人民利益,三者辨明是非之后,从善如流,疾恶如仇,方为合理。

除以上个人之收获及我所要努力改进之三重点以外,我再表明我一般的态度和今后的决心: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人民教师。我要认明敌我,划清界限。在思想上,学习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而铲除唯心论的哲学,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舍弃其他之各种反动学说,确立无产阶级思想而排斥资产阶级思想。在行动上,服从代表工人阶级之共产党的领导,遵依人民政府的政令和毛主席的训示,亲苏反美,并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之改良主义,而赞成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彻底改造世界,由社会主义进至共产主义,以底真正大同而造成全世界人民幸福。在我个人之职业及生活中,当处处以人民利益为归宿,用我有限余生之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更结合实际;具体来说,即是我愿在西南师范学院及重庆大学将我所担任之课程教好,改正从前的错误,要能以正确之思想批判与明显之政治立场,领导学生,联系群众,而在此目的及条件下,过渡我个人正当而愉快之生活。

23

李源澄的“绝密消息”

1952年8月初的一天,我从大校门进来,刚到图书馆前,后面来了一辆轿车,“嘎”一声停在我左边,车门打开,传来叫声:“老张,张紫葛同志!”竟是带领工作队主持西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张非垢。接着又从车里出来一个人——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

“哦唷,两位首长,”我说,“找F书记吗?”

“不,”张非垢说,“我们找你。”

我大为疑惑。便领了两位跨进了我那单笆墙的二楼蜗居。一坐下,张非垢就说:“记得学习期间,你找我谈过,你和我们部长的友谊……”

“是的。”我说。

那是我的总结通不过,学生们提意见,说我交代历史“不老实”,政治面貌“不清”,我办的新疆联合省政府机关报《新疆日报》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反动”,云云。我急了,便去找张非垢,说了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和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等一百多人被盛世才关在新疆监狱,1945年,我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狱中的共产党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我多次冒着危险,给他们送去吃的、穿

的,交李宗林转给大家。1946年,张治中去新疆组织联合省政府,谋求释放这些共产党员,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指示新疆军统人员尽快把狱中级别较高的干部全数杀害,然后报称病故。张治中料到这一着,却无计可施。我乃以《大公报》记者进监采访,弄清了狱中中共人员的姓名、健康状况及监押牢房,造装成册,交给张治中。张治中叫来军统新疆负责人胡国振,亮出这个名单,说:这是《大公报》记者给我的,我和报社各有底册,你们别想在这些人身上动脑筋,“少一名我惟你是问。”这就保证了狱内人员的安全。后来,张治中报经蒋介石批准,于1946年6月释放了这批中共人员,并派车队及武装将他们护送回延安。出发之日,我去送行,和张子意等人一一握手话别。这些情景,张子意应该还记得。因此,我对张非垢说:我的政治立场,“你们部长张子意同志最清楚。”我请他找张子意和李宗林了解。张非垢当时答复我:“你只管老老实实交代。至于了解、对证,是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相信党!……”

今天张非垢突然这么客气,我实在不知所云,只能囫囵答说:“是的。”

张非垢接着说:“当时,正在运动中,纪律要求,不便多谈个人友谊。运动过后,我见到张子意同志,就汇报了你的情况。他很记得你,说是吃了你送的不少面包、饼干、马肠子(香肠)。关于你那时的进步表现,他已向组织反映过了。他因为事情忙,又不熟悉这里的地理位置,就托我替他专程来看望看望你。顺便介绍程部长和你认识认识!……”

程子健接了一句:

“我主要是来拜访吴宓教授,同时看望李源澄、周邦式和你。”

我明白了,便领他们到隔壁吴宓房里。吴宓和我一样,屋里除了两张藤椅,再无椅凳。有第三个人就得坐在床上。现在有四个

人,得有两人坐床沿。张非垢知道李源澄住的家属宿舍,有个宽敞的客厅,便提议干脆一块儿到李家去说话。

主客六人坐定,程子健开言。语态庄重,仿佛在开会:

“这次高等学校民主改革运动,整个西南同时铺开,大大小小几十所院校,也就是几十个工作队。由于工作量很大,我们统战部人手不足,以致顾此失彼,很多应该关照的民主党派,失于关照。因而小有偏差,在西南师范学院,失误特别大。像吴老——吴宓教授这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学者,总结都没有通过。群众起来了,热情高涨,我们关照不到,他们就没个轻重,对你们几位的批评都有些过火言词。”他说:我作为西南统战工作的负责人,深以为憾。今天特来拜访,向各位,首先是向吴宓教授表示歉意。……

张非垢接上说:“这主要是我的工作不够扎实,陷于事务,没有深入。……”

李源澄抢着说:“两位领导同志这样谦逊,令我又鼓舞又惭愧。我觉得西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谈不到什么偏差。如有些小小不足之处,只能说是我们配合不够。比如我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又是副教务长,运动期间就向非垢同志反映情况不够。”

吴宓则说:“宓敬向两位首长汇报。以宓个人感受而言,运动发展正常。群众虽对我提了一些意见,均属动机良好,治病救人。宓实获益非浅。”他说:今两位首长又亲来慰勉,希望我辈进步,以勉为人民教师之苦心孤诣,实旷古所未有。宓之感受与决心,已在上月8日《新华日报》所刊之芜文中陈之详矣。“全文句句皆宓由衷之言,今后宓定当见诸实践,决不辜负共产党之盛德美意。”

程子健:“吴老那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给广大高级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也对中、青年知识分子起了带头作用。”他又把删去三条保留意见的问题一如F公说的那样解释了一遍。吴宓也

像答复 F 公那样表白了。一下。

程子健又问周邦式：“邦式同志，还有什么要我转呈毛主席的吗？”

周邦式：“敬请转呈毛主席，我得到破格照顾，一切都好，没有什么请求。”他说：今后，邦式惟有为人民服务，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来报答毛主席共产党的天高地厚之恩。

程子健说：“很好很好，还是我多次说过的，你有什么困难，什么需要，就随时告诉我。也可以向 F 同志说。他会及时告诉我的。”

张非垢问李源澄：“你们下学期的课程、任课教师，都作了安排吗？”

李源澄：“绝大部分都安排了。还有很小一部分还在研究之中。”

张非垢：“那些总结没有通过的人情绪怎样？”

李源澄瞄了我一眼，说：“情绪都很好。”

我不得不补上一句：“这个问题非垢同志在总结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嘛！通过这次运动，每人都有提高。”我说：只不过发展有差距，有的进步得快，有的收获较少；收获大的不要骄傲自满，收获小的不要灰心丧气，每个人都要继续学习，继续检查自己的历史。
……

大概觉得我说得太罗嗦，程子健点了点头，说：“李源澄同志，你们民主党派，负责人，学校行政，都要多作点工作，特别要让那些个别学习总结没通过的同志懂得：没通过并不等于全面否定他们。只不过是有的政治历史尚未搞清楚，有的批判学习认识后进一步。”他说：还没清楚，不等于永远弄不清楚，更不等于已经认定他

的政历问题大,要把他排斥于人民之外;后进也不等于永远后进,加一把劲就可以变后进为先进的。总而言之,要相信党。……

这样漫谈了个把小时,两位首长起身告辞。李源澄再三恳留他们午饭,他们说另有要事,坚持要走。大家便送他们登车而去。

目送汽车开出了大校门,周邦式就告辞回去了。这里李源澄拉住我和吴宓:“别走!就在我家吃饭。事非小可,得庆祝一下。”

吴宓也很高兴:“那么,把尊一、涤玄也叫来。”

五个人坐到桌边,李源澄拿出茅台土罐:“托雨僧兄的大福,程部长、张秘书长亲来拜访。可谓蓬荜增辉,不可不干上几杯,以示庆祝。”

他给每人酌上酒,端起酒杯:“来,干杯!”

刘尊一:“说清楚,为什么干杯?”

李源澄再把酒杯举高一点:“为吴雨僧的扬眉吐气嘛!”

吴宓:“此话不妥,不妥!”

但谁也没理他的话,叠声说:“对,对!”纷纷干了杯。吴宓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李源澄又酌上酒,刘尊一抢先端起酒杯:“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为普天下的知识分子从此了清历史功过,轻装前进,报效祖国,做出贡献,干杯!”

李源澄伸手提酒壶,却叫黎涤玄抢先抓住了。他给每人酒杯斟了酒,说:“光荣归于中国共产党,归于毛主席。我们要为中国共产党,为毛主席,干杯!”

大家齐声应和。老李和黎涤玄一仰脖子干了。我们三个都只喝了一口。黎涤玄劲头来了:“你三个,不行!欢呼中国共产党,欢呼毛主席,可不一般。得干杯,喝!干!”

吴宓则说:“喝酒可不能强求一律。心诚为敬,意正乃恪。大

家喝得烂醉有何意思？依我说，都别喝了，尤其老李，别引发了高血压。”他建议：实在要喝，代之以醋。

我笑了：“好呀，《镜花缘》里的话：‘醋贵之，酒贱之’……”

吴宓一脸严肃：“你莫说笑！今天之聚，意义重大。……”

李源澄微微摇晃他那胖胖的脑袋：“愿闻高论，请夫子详为言之。”

吴宓给每人酒杯里换上醋，然后坐正身子，说：

“宓平生息谒王侯，见大人则藐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故，前此总结不获通过，我无所憾。今兹芜文见于党报，亦无所喜也。”他说：然而，今天两位大员来访，“我心则悦。”因为，见微知著，于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毛公之政策，确如日丽中天，“光照遐迩，不遗侧陋”。“圣人出而黄河清，行见中华振兴，富强甲于世界。身为炎黄子孙，能不悦乎。”他说：“请为我神州大地国富兵强之指日可待干杯！”

众声齐应。大家起立，隆重干杯。

尽兴席散，客人告辞。黎涤玄、刘尊一有事要找 F 公，过小溪往西岗去了。我正扶着吴宓出门，李源澄却关上门，说：

“我在琢磨，两公之来有特殊之内情。”

吴宓扶杖站定：“你在想什么？”

李源澄：“莫忙，等我打听打听再说。我有个内线。”

一晃就是 1952 年的 8 月下旬，正忙着开学，我在石桥上迎面遇见李源澄。

“我正要找你们，”他边走边说，“你叫上吴雨僧，到我家午饭，有要言相告。”

一见面，吴宓就问：“有何要言相告？”

李源澄故作神秘：“吃了饭再说。”

吃罢饭,已是午后一点,正是午睡时间。烈日炎炎,人籁稀微。三人来到书房,促膝品茗。李源澄微举胖胖的手掌:“听着:绝密——”

以下是他的叙述。

在各高校思想改造运动即将结束之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的宣传、统战等负责干部,及各大学工作队的负责人,听取汇报。张子意谈了总的情况,再由各校工作队的带头人汇报。张非垢汇报西师的情况完了,邓小平忽然问:

“西南师范学院有个老教授吴宓怎么样?”

张非垢想了想,“吴宓?外文系的老教授。”他说:他比较顽固,群众提了许多意见,效果很差,最后,总结没有通过。……

邓小平问:没有通过?他有些什么大问题?

张非垢翻拣材料,且看且说:此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16岁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留学生,是哈佛派……

邓小平:你拣主要的说,他有些什么问题?

张非垢:主要问题,第一,反对五四运动,从那时起就坚决反共。第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动的学术思想流派《学衡》派的领袖。第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第四,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主张复古。……

邓小平语气平和:一共有多少条?

张非垢似有所感:据群众所提,也就是这些。

邓小平:群众提了这么四大问题,你们作领导的怎么论断呢?

张非垢说不上来。

邓小平转问张子意:你看呢?

张子意:学校太多,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分析。

邓小平:我也没有分析。且按常识来看看这四大问题吧。又

问张非垢：你看看材料，1919年五四运动时吴宓在哪里？

张非垢翻后答：他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求学。

邓小平：好像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上没有提过，五四运动之时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留美学生出来反对五四运动。这一条罪状不能成立。《学衡》派，你们不知道？我是亲自看过《学衡》的。断断续续，大概看到十多期。它是月刊，中华书局出的，吴宓是主编，不是主将。我那时的印象，它是综合性刊物，偏重文学，诗、词、小说都有。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它介绍西方文学，好像并不像胡适、林语堂他们那么崇洋媚外，它使用梁启超式的文言文，我的印象好像也并不倡导复古。至于反对鲁迅，《学衡》出了几十期，我并未遍读，不敢断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学衡》出版发行于20年代，而鲁迅在我们党长期影响之下，到左翼文联时期才成为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那么，20年代《学衡》，即使严重反对了鲁迅，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他那时就反对了无产阶级、反对了我们党。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讲究时间、空间，脱离或混淆时间、空间，就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评价吴宓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我们党还没有成立，吴宓远在美国，却要论断吴宓那时就同我们党对着干，岂不是脱离了时间、空间？……我看哪，可以说吴宓思想落后，却不能把他论为顽固分子。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实，吴宓进步的具体表现：他坚决留在大陆。要知道，以他的声望、社会关系，他完全有资格及早飞到台湾去的。还有，他是很信任我们党、靠近我们党的。

邓小平转问程子健：不是你陪他来见我，反映过重要问题的吗？

程子健点头：是的，是的！

邓小平：我看，你们给吴宓下的结论不大正确。

他转问张子意：你觉得怎么样？

张子意、程子健、任白戈(时任西南文教部党组负责人)首先称是,全场参差应和。

邓小平又说：这次在高等学校搞民主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充分考虑到高等学校的特点，知识分子的特点，要和风细雨，多推动、鼓励，要多树立自觉追求进步的人士，少抓落后典型。像吴宓这样的学者，是文科领域里的李四光。早在20年代，他就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就他的实际表现，并不落后，本来该树他为靠拢党、追求进步的好典型，你们却搞反了，把他当顽固分子。把他树起来就可鼓舞一大片，而踏下去，则会挫伤许多人的积极性。还有，有国际影响的问题。要让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文史哲的老牌学者专家们也一样热烈拥护我们，自觉改造思想，并得到我们的信任和重视。北京是怎么做的？像冯友兰这样的人，他的声望、资历、国际知名度，并不比吴宓高一——，早就见报了！……

张子意、程子健、张非垢等都争着发言检讨。

邓小平：不必忙着检讨，还是这天把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打个补丁吧！

李源澄的“绝密消息”讲到这里。

“后来的过场我没打听到，反正补丁已经打了又打：F书记奔走，文章见报，统战部长和工作组领导登门致歉。还有，”李源澄故意顿了一顿，朝吴宓说：“你少不得要当省政协委员了。”

吴宓：“我说呢，F公这回怎么这等耐烦，这等客气！原来有邓公的重要指示。”他说：共产党确实了不起，中央政策恰切妥善，方面大员深体民瘼；而各级干部如此服膺中央，听从指挥，闻风而动，如臂使指。这样的政党，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善哉！从今

而后,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将进而虔诚寅敬矣!”

李源澄:“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既皈依而虔诚矣,何得称人民领袖为毛公陛下?”

吴宓:足下徒知咬文嚼字,思维殊欠条理。“既可山呼万岁,何不可颂以‘陛下’?君不闻流行之革命歌曲有曰:‘人民领袖坐江山’?我称毛公陛下者,褒也,颂也!岂有不敬之意哉?!”

李源澄本来很高兴,今天又喝了几杯,且属莫逆之交,不免信口开河:“善哉,我辈文人视富贵如浮云,却斤斤于自尊,拒厚币而重礼遇。德高如吴公雨僧者也不例外。两位领导来访,执礼恭谨,并未送半个钱的礼物,我们雨公就感慰之至,以至皈依毛公之虔诚有加了……”

话未完,吴宓大怒:“源澄,你说个什么?胡说八道,视宓为何如人?我赞颂共产党,赞颂毛公,完全出于高瞻远瞩,预见海宴河清,为中华民族之振兴有望,乃仰毛公之雄才大略也。岂为个人之利钝得失哉?”他说:1940年蒋介石的文官长陈布雷来于右任私邸拜访我,执弟子礼,我避而未见。1947年,蒋介石大宴社会贤达,先托于右任致意,复三次专车相迎,我没有去。其事其情,我早告诉你,紫葛在此也可证实。“何以拒蒋介石之深?就痛恨他庸碌鄙吝,唯知仰洋人之鼻息,朝政腐败,……”

李源澄慌了,连连作揖:“老兄息怒,老兄息怒!我实在有点醉了,语无伦次,表达紊乱。我对吾兄绝无丝毫失敬之意。”他说:你适才所说赞颂共产党、毛主席,我百分之百赞成。只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爱富贵爱礼遇。我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心情表白。“引起你的误解,弟之过也,万望海涵。”

我也多方解释,力白李源澄喝醉了,又很高兴,不免有点童心来复。

好一阵,吴宓才渐渐气消。

李源澄想改个话题:“那么说,程子健陪你去向邓公反映了重要情况,这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打算作答。

吴宓赶紧摆手制止:“莫说,莫说!他这人三杯下肚就信口开河,所以我不曾对他说。”

我便转对李源澄说:“还是把酒戒了吧!”

“是是,我以后,不,从即日,今天下午起,戒酒,坚决戒酒!”

经李源澄再三保证,吴宓自己对他说了那次去见邓小平的事情。却没有谈及他预料30年间邓小平当建移星转斗之功的话。

李源澄抚掌赞叹,并申以评论:自古民情上达为政通人和之前提。故《尚书》有“天听自我民听”之论。他现在体会日深:我辈知识分子拥戴共产党应双管齐下——一为勤勤恳恳工作,贡献所长;二为向共产党忠实反映情况,使下情上达。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允许党员越级上报的规定也适用于党外。他举了一例,说他无数次发现,F公对文教部驻西师联络员(师生习惯称他为军代表)李志刚不合作,甚至做小动作排斥。F公对党外师生说:“你也可以向李志刚同志反映情况。他虽然只是文教部的科长,却也是共产党员,马上就要转正了……”云云。并且将“转正”等词重读。李源澄且叙且议:谁都听得明白,这是貌似称赞,实则贬低。犹如在说:他李志刚不过是一般干部,还是预备党员,而我的党龄都有十好几年了。大学教授,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你相信谁?该向谁反映情况?你想想看!

于是李源澄谈,他认为,本院领导——党支部书记,和西南文教部的驻校联络员生矛盾,违反共产党的原则精神。他就去文教部向任白戈同志一五一十反映了。任白戈当即表扬他反映得好,

再三嘱他以后随时到部里反映学院各方面的情况。

吴宓对李源澄的议论未置可否。却说：我对 F 公的不足之处很能理解，并且常常提醒自己，以 F 公为镜子，勤照自己。因为，他的不足之处，正是我辈知识分子难免之短处。至于李志刚同志，实赞佩于心。……

他接着详谈了他和李志刚的交往。简单说：李志刚同前军代表张一夫拟拜访吴宓，见了吴门上“恕不见客”的字条，就废然而返。以后同楼邻居，却相遇不打招呼。某日吴宓从图书馆出来，抱了十来本书，挟持欠妥，滑落地上。恰李志刚路过，抢前拾起，坚持抱着书送吴宓回房。进房放书案上，即彬彬告退。吴宓恳表感谢，他只说了：“我也是陕西人，非常仰慕您这位乡前辈。请以同乡后生待我，我就住在这楼上。以后您要借书或其他奔走小事，都可以叫我代劳。”

以后，不时在饭后回房路上相遇，李志刚总是执乡后生礼。从不高谈大道理，作启发、教育之状。这样近一个月了，他才问吴宓：“您看报吗？我订了《新华日报》，您看不看？”

吴宓本想订报，但因教工订报，要自己到传达室去取，便作罢了。

“这好办，”李志刚说：或者您订一份，我拿报时一并捎回来，或者共用我那份。我看了送给您，或者您先看。

以后李志刚按日准时给吴宓拿报来，且总是在午饭后、回房时，在走廊里交给他，很少进房打扰。吴宓很喜欢这位谨讷诚朴的同乡青年，并据论定：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谦谦君子，确能为人民服务，真正象人民公仆。

于是我们畅谈解放三年来的好人好事，各抒所见，竞相补充。小至行人让路，公共汽车让座，农民扫盲；大至成渝铁路、荆江分洪

工程的进展迅速。……

吃晚饭了,吴宓执箸在手,且不下箸,却侃侃而谈:“我要申明:我并不认为目前一切尽善尽美。比如,有几件事,我很不以为然:提倡臭骂自己之自我批评,肆意攻击他人之开展批评;动辄停课搞运动,青年学生以进步自居,妄断老教师为反动、顽固。”他说:这两个月,我看了些马列,学而思之,天下初定,不能不作《多方》、《多士》、《洛诰》。读《左派幼稚病》,乃想到《尚书·无逸》中周公所言:“丕则侮厥父母,口‘昔之人无闻知。’”那时的年轻人就已随时侮谩父兄长辈,“你们这些老人无知无识。”吴宓说:“这左派幼稚病,中国国粹也!”

晚饭后又闲聊了一会儿,我和吴宓告辞了,李源澄却突然拍拍自己的脑袋:“你看我,差点忘了一件要事:黄稚荃来了。她由西南文教部安排工作,指定在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室作研究员。昨天来报到了。……”

吴宓急问:“她住在哪里?明天,紫葛,我们去看看她。”

李源澄说:黄稚荃住在磁器口街上,我们学校才买的一栋民房里。人多,有点杂,你去拜访她不大适宜。不如明天我请她来吃饭,大家聚一聚。

24

尊重妇女,同情弱者

黄稚荃,抗战初期就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女才子。工诗词,善国画,尤精书法。年刚过30,就在公立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颀长丰盈,明眸皓齿,少艾丧夫,一宁馨儿矢不再婚,常年素装宫髻,好事者乃称之为“古装美人”。虽无志青云,而三老四少争为揄扬。乃于1947年举为立法委员。本属点缀角色,国民党兵败大陆时,就没有接她到台湾。她也无意奔逃,乃于成都家居迎接解放。而共产党入城接管时,她除“立法委员”这一头衔外,并未侧身文教工商职位,更没有民主党派身份。

这样一个身处街巷之“伪职”人员,解放后未在历次大逮捕中将她列籍捕判,已属幸运了。本来,解放之初,即三年恢复时期,特别是1950年—51年,有文化的人只要不是敌特分子,要找个工作也很容易,只要求得一个在职干部,或民主党派成员,写一个介绍信,说:“兹介绍某某同志,历史清白,请考虑安排工作”云云,由此转介政府机关即可获得安排。至多跑两趟,三日之内即可办妥。黄稚荃有不少朋友是民革的活跃分子,也还认识一二个政府中、高级干部。她只要出门奔走奔走,早在1950年就可获得工作。奈何

她过于孤芳自赏,耻于登门求人,一直窝在家里,坐待花开。所以蹉跎了两年多宝贵岁月。可这蹉跎过程委实痛苦。待至里巷渐安,居民组织趋于健全,贩夫老嫗也要弄清政治面貌,何况一个国民党立法委员?清查询问,居民小组的学习交代,群众追究、监督,岂容你孤芳高洁?况且她不是神仙,母子俩要吃要穿。邻里蔑视,亲戚白眼。进而两个本来感情极深的妹妹也避她如忌污秽。那两个妹妹——幼荃、小荃,一个是历史学教授,一个是中医医师,各有公职,经历各次运动,都为有这个姐姐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深受其累,自然要和她划清界限。

山穷水尽,黄稚荃再也清高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女友张平江。张是民革四川省委的重要成员,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对于黄稚荃这样一个旧社会的朋友,不敢迳自负责介绍,便将黄与她在旧社会如何相识,黄的政治历史略况及黄来求她介绍等情,写成汇报材料,送给了川西行署党委统战部,后转到西南局统战部。程子健部长批转西南文教部,西南文教部便把她安排到了西南师范学院,指派在教育研究室做研究人员,暂不定工资级别,月支生活费五十元。若论钱数,五十元的工资与助教差不多,和一般公职人员相比,已属丰富。那时有些产业工人如纱厂挡车工,月工资一般不到四十元,黄稚荃母子两人的生活绰绰有余了。更重要的是,她有了公职,较之夹在街道里巷居民中的“伪官吏”身份的人,已是身价百倍了。

我和吴宓来到李源澄家,黄稚荃已经先到了。大体形象仍是那个“古装美人”,还是当年样式的黑绸长摆旗袍,只是面容憔悴。我和她前此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7年。只过了五年,她却已丧失了南京华灯下的风采。

她和我们亲切握手,低声叫:“雨僧兄长!紫葛老弟!”嗓音圆

润清脆不减当年,只是音态略显沉郁。

而吴宓则惆怅感慨:“啊,稚荃,久违了!”

坐定之后,吴宓仔细审视她,徐徐吐词:“身体不及从前了吧?怎么这会才参加工作?还作诗、画画、写字吗?我很想知道你的一切,越详细越好。”

“雨僧兄长!”黄稚荃语音婉曼,“这真是旧时尺牍的套语:乏善可陈!……”

她语言很欠流畅地叙述了解放以来的概况。谈到她和两个妹妹的关系,却是相当详细。历举两妹子如此等等和她划清界限。并说:她俩为了自己的进步,和她这个曾为反动派“装饰门面”的姐姐划清界限,她能理解也能谅解,但是,她们竟将她的信件、诗、画、写的条幅等等,全都当作反动物品上交了。尤其叫她伤心的是,她多年珍藏、使用的墨宝图章,也给销毁了。图章是书画家落款签题的重要物品,镌刻本身也是艺术。黄稚荃历年收藏、制作的各色图章,不下二十余枚,现在是连领取邮件的图章都没有一个了。她对此十分痛惜。“骨肉尚且如此,况外人乎?”唏嘘叹息,泫然欲泪。

吴宓寂然无声,视线直落在黄稚荃赤裸的双足之上。她今天穿了一双成色很旧的平底皮鞋,内套没有松紧口的短短袜套,她的旗袍下摆较长,行走时可达小腿肚;可是坐在沙发上,旗袍上缩,就一直裸露到膝盖了。吴宓直视她的下肢,并不是观赏她的造型美,而是确有所感。黄稚荃这人向有腊梅傲雪之操。我、吴宓和她认识,都有十年之久了。过去,不论何等炎热,即使在长江三大火炉城市重庆、南京,她总是长统丝袜,旗袍有袖。而今天,独异常态。吴宓立刻悟到:黄稚荃一向不善居积,花钱大手大脚,既不寅支卯粮,也无存款。这一下失业两年有半,又还抚养儿子,自然捉襟见肘,衣履不全。我从吴宓的视线及表情中,已经神会了他此刻在想

什么。一时三人无言。

这时,李源澄端来一大盘西瓜,殷勤让请客人。吃过西瓜,吴宓掏出手巾,以他惯有的姿势,仔细擦了嘴,吐词缓慢地说:“你迟了两年有半才参加工作,为此颇受其困。然而唯其如此,乃黄稚荃之为黄稚荃也。”他又说:受身体之苦,申狷介之操,“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亦无恨也!”古云:长兄如父,申其义则长姊亦应如母。你为长姊,不应与两妹论炎凉。她俩求己之进步,作保身之明智,是大好事。为父兄者,当引以为慰。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古时仕途尚且如此,况今日乎?……

李源澄插话:你迟两年参加工作也有好处,躲脱了一系列运动:批判《武训传》,三反,五反,民主评级,忠诚老实运动,思想改造。……“你要是早工作,去年,少不得也和老张一样,要与敌特分子一起,去公安局登记!……”

黄稚荃:“我和老张都是差这点,好歹涉足了官场。还是雨僧兄长有先见之明,绝不涉足政治,今天就高我们一等了!”

吴宓:“不然,不然!以进步之眼光观之,我与你们二人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思想。差别是有的,然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异耳。这次思想改造,给我提的意见,比给紫葛提的还多。……”他接上说了“二、三子隔靴抓痒”的笑话。说到他的“反动弟子”中还有高鸷时,李、黄两人都笑了。

黄稚荃问:“你生气吗?”

吴宓:“始觉可气,进觉可笑。不半月,就心安理得了。”他说:我这人,气量欠雅,但能反复思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很快就能有所悟而怡然泰然,理解他人,谅解他人。关于此事,“且不说马列著作毛公之教导,即以中华古训言之:孔子‘言必有中’,‘虽不中不远矣’!就是说,圣人如孔子也容许说得不准确,如何能要求这

些青年学子提的意见全都准确呢？”又说：即使是书记F公，我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他也还在童年，如何能要求他们把那时的事弄得一清二楚呢？“且而，古代的皇帝，除了个别昏君，也都不曾要求他的谏议大夫所谏之事绝无差误。难道我吴宓比皇帝还专横？”

黄稚荃：“呀！听兄长这一席话，令我鄙吝全消，心胸大为开阔，精神为之大爽！”因乘兴询问吴宓与邹兰芳的婚姻问题。

李源澄说了个梗概。黄稚荃觉得很有趣：“好，老李提头办了件大好事。能按吴雨僧这个犟牯牛喝水，快哉！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李答：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离婚手续尚未全妥。估计与邹的婚礼当三、五个月之后。

吃饭了。吴宓叫以醋代酒。黄稚荃却作主：她和我吃酒，那两个喝醋。席间，不免谈了程子健的来访。遵吴宓之嘱，老李和我都未提邓小平关心之事。尽管如此，黄稚荃仍大受感动。

“可喜可贺，有此一例，我这两年所受之诸般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她说：由此观之，共产党讲统战决非面子活路，确实比国民党民主、明德，值得拥护。“来，各位，我们敬赞中共之贤明，为它干杯！”

黄稚荃究竟是个诗人，容易兴奋。又抑郁了两年多，今日得与知友相聚，特别高兴。豪兴之下，连饮了三杯白酒，不免有些醉意，诗兴大发，即席口占七律二首。抒怀感时，而中心思想主要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黄稚荃薄醉之下，谈兴益增。饭后说话更多。一会儿说到她的青年时代，一会儿说到“糊里糊涂”做了国民党的花瓶——立法委员，“我才是个大事糊涂”。一会儿说到近两年的含辛茹苦，一会儿畅叙这次从成都来重庆的见闻。最后，仍流于伤感：她认为目前的这个工作只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饭碗”，实不过是“叨为食客”。

而自己年仅四十许,就成了白吃饭的废物,“能不伤心?”进而说到,她这几天见到的老朋友,大都同感: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我将抑郁以终!”

李源澄赞成“祖国前途光芒万丈”,反对“个人前途暗淡无光”的说法。他详举例证,说明从今以后,神州大地的每一公民都有光明前途。至于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倚重的对象。他谈了思想改造运动过后,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部署,以及准备秋季开学行课的计划。“搞运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从此高等学校步入正规,搞好教学要靠教师,首先是你我这些富有教学经验、又有学术根底的老教师。……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何得云‘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他说:此次院系调整,他打算以副教务长之职权,提请黄稚荃为中文系教授。

吴宓静听我们高谈阔论,末了,他才拍拍沙发扶手,说:祖国前途光芒万丈,我与你们所见相同,勿待论述矣。“至于我等之个人前途,宓意略有不同。”首要之首要,宓以为,前会古人,高瞻未来,都应有一根本精神:只要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但求中华民族振兴,登斯民于衽席,“则我辈子孙皆可享其福泽,也就是我辈个人之前途。……我们何必定要念念于个人之前途?”其次,具体说到我辈未来,宓意在于稚荃与源澄、紫葛之间。我深信,会器重我们,信任使用我们,“但宓更确信,提出我们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绝非说说而已,是要付诸行动的。”改成个什么思想呢?无产阶级献身共产主义之思想,为人民服务忘掉自己之思想。你看人家李志刚那种真正共产党员是怎样俭朴勤苦、忘我工作的?要与昨日之我斗,要彻底否认旧我。但旧我总还是我。那么,谈到我们的个人前途,就得勿忘个人之历史包袱,“不要妄想和政府主管干部平起平坐,切勿以才华自居,动辄汪洋恣肆,更不要想青云直上,名噪四海。而我

们这些人,要做到这几条,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宓乃谓:个人前途,恬淡便是光明。”

黄稚荃却说:雨僧兄长,你硬是进步得快,很善于谈大道理了。像你这样一位自尊心极强的老夫子,叫那些后生这么痛斥了,“还能心安理得,我实在想象不到……”

吴宓脸一沉:“稚荃,我吴宓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你简直喝多了,竟把我的肺腑之言说成‘谈大道理’——吹牛?”

黄稚荃:兄长,你莫发气!“这几年,我惟有向隅而泣。”见了你们,童心来复,不免有点放肆。“我才步入中年,个人前途,不能无介于心。我和许多朋友,历年都是吃国民党的饭,唱共产党的歌。日今共产党得了天下,却这么苛待我们,一派高压,我实闷闷于怀。你说的爱国大道,我完全赞成,只是头痛医脚,不能驱我心里的阴霾。……”

李源澄:“雨僧老兄,她是极缺温暖的人,你和她计较个啥子?”

吴宓愠色渐退:稚荃一向耽于诗词歌赋与书画,也不深研经史与诸子书,于世事之洞晓,难免功力不够。我试为汝筹之。此次思想改造,甚至此两年,我也颇多不悦。近两月,读了一些书,思而有得,故能心平气和。“综中外史实,任何一个政权,任何贤帝明君,必求江山永固,刚克为先,怀柔继之。……”

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李源澄女儿的声音:“F伯伯,您来了!……我爸爸在书房里。”

吴宓小声:“快,我们到里面去。”抓起手杖,端起茶杯。

黄稚荃和我也立刻跟上,进了卧室。黄稚荃随手关上卧室的纱门,我去关板门,她抓住我的胳膊,掀开了我的手。

而这时,F公已经同一个穿干部服的青年迈进了客厅。李源澄迎了上去。F公介绍:那个青年叫姚非,是西南文教部派来替换

李志刚的。F公从西南文教部开会回来,与姚非同行。因为明天一大早又要到区委去开会,就于返校进得大校门之后,顺便带姚来认识李源澄,也商量一些要事,以便李源澄主办教务时,不失经纬。

看来姚非和李志刚一样谨讷;和老李握手称呼后坐下,就一言不发,旁听F公和老李谈话。

F公说:文教部在西南全境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全局性的院系调整方案已经确定。等他从区上开会回来,就要分别向党支部、院委会、院中级以上负责人传达。为了工作需要,今晚给李源澄说说最紧要的、直接关系我们的、必须立即知道的内容:重庆大学调为工业专科大学,它的医学院调到华西大学,而华西大学调为医学院;它的中文、教育诸科系调入西南师院,重大的文、法诸科调入四川大学。重庆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调入西师,私立相辉学院、重华学院的师生拨进西师。还有一个“川东师范学院”(由“乡村建设学院”改名而来),可能全部并入西师。“我们必须早作思想准备,接受这堆烂摊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要争取时间,连夜给李源澄通个气。

“不知道我进城开会这几天学校里的情况怎样?”F公最后说: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为了表现出民主改革的丰硕成果,必须在教师阵容、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教学秩序,以及行政的、总务的、财务的各个方面,面貌一新,朝气蓬勃……

老李安坐静听,叭嗒着旱烟,心里却在捉摸:他为什么一下车就领上这位新到任的文教部联络员,连夜赶到我这里,说这些?

“你看,”F公再问:“怎么样?”

李源澄磕了磕烟锅:“我本来只知道教务方面的事,遵照支部的指示,尽力在做。却是困难很多。现在又要进这么多人马,困难就更大……”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多数系科师生下乡参

加第二期土改去了,留校的系科师生又下工厂搞宣传、办文化补习班,他只能从留校的学生中了解到,学生们很拥护正规行课,对教师的希望很高。

“教师是关键。现在,各系负责人有何安排?”F公问。

问得奇怪,他进城开会前就看到了各系计划任课教师的名单,今天复作此问?

“各系的报告在办公室,我这里有抄下的底子。”老李拿出记事本,翻开来挨次念各系建议开课的教师名单。念到中文系,内附有两条建议:1、拟请调吴宓到中文系,教高年级专业课;2、可否考虑新到教育研究室的黄稚荃到中文系开《诗词研究》。

F公插问:“他们要这两个人?你的意见如何?”

“你说吴宓和黄稚荃?……这两个人?我只听说业务很棒。”

“只听说?你和他们不熟?”

“吴宓是这儿的老同事,当然认得,却未深交。至于黄稚荃,从前常听说,却未见过面。她到这儿来了?……教育研究室?哎呀,这一向文教部不断往这研究室派人,我根本没来得及看那名单。反正它不该教务处管……”

“教务处要管的。”F公转问姚非:“是不是给他交个底?”

姚非点了点头。

F公:“吴宓这个人,思想改造表现并不算好,我们也在党报上刊了他的检讨,为的是显示党的政策使得顽石也点了头。也树个标志,带动为数不少的老顽固接受改造。论书本知识,他当然有一些。中文系的课政治性很强,他是否能够胜任,得慎重。……至于黄稚荃,她懂个什么?解放前谁不知道?她以姿色取媚国民党反动派,什么伪立法委员,就是当花瓶……”

“哦,这个,这个,我没见过这个人,赖以庄说她才貌双绝,是四

川的女才子,拿了她的诗、画、书法给我看了。诗优于词,书优于画,总之,诗词书画都还不错。”

“这个赖以庄,是个老废物,大概从前同黄稚荃很有暧昧,这阵这么热心替她游说!”

“我明白了,”老李说,“安排教师,严格掌握以德统才。凡是政治上差劲,思想上没劲的人,一概不让上阵。”

F公:“这是基本原则。不过,要灵活运用。还是要每系选个把差劲、没劲的人上课……”

“你一再指示过,我记得的。”

F公点头,又续谈各系呈送的任课教师名单,完了又谈了些别的。直到夜12点,才起身告辞。

李源澄送客回来,表情万分尴尬。吴宓抢先说:“夜深了,我们赶快散了吧!紫葛,数你少壮,烦你送稚荃回磁器口,我自个儿回去。”

老李:“我来陪雨僧兄长回房。”

外面已经行人绝迹。却是月明风清,凉爽宜人。正要过大石桥,黄稚荃却站着不走了。她先仰望蝉娟,如懵如痴,继而低头垂泪,终于抽噎啜泣,悲痛欲绝。我完全明白,她何以如此伤心,却是想不出怎么劝慰她。惟有默默扶持着她,以防她倒入烂泥河里。

次日早饭后,吴宓到我房里,问:“你明白昨晚F公的旨意吗?”

“不外是:让姚非亲见他没有架子,深入群众,夙兴夜寐;向李源澄炫示,他把李志刚排挤掉了。并且让老李当面对诸般问题表态,以此定板,后此老李不便向姚作反映。”

“我亦作如是观。不过,只怕文教部调换联络员,不光是F公排挤获胜。而李源澄应对得法,也不见得能与F公长保友好。宓

海浮沉,大非易事。所以我已两次劝源澄不要再干这副教务长。……”他又问:“昨夜稚荃一路有无伤感表现?……没有?这是你粗心,未作观察。……不要说她,任何一女子听了F公那些话,都会伤心万状的!”

然后他又说:他确信,黄稚荃已穷到了“出入无完裙”的程度。他非常同情,急想尽些朋友之义,却是自己都在用朋友的钱。“奈何奈何?我为此彻夜未眠。”

我告诉他:要解脱F公那番话给她的刺激之苦,我束手无策;要救一救她眼前的穷乏,却是小事一件。

“你吹什么牛?借钱?……你打算向J女生借?绝对不行,绝对不可!取不义之财以济友,而构无穷之后患!……”

“你昏了?我会是那种人?”

“然则计将安出?”

我告诉他:确悉,人民政府考虑群众利益,决定从没收的官僚资本中拨出专款,代为偿付解放前百姓在伪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存款。各地人民银行已在积极准备,开年即可兑付。现在先照顾银行职工。我有一个1945年的交通银行的存折,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兑换率,至少可兑400多元人民币。我有个好友在市人民银行工作,托他内部兑取,很快可以得到现金。

吴宓很高兴。却又忧虑如何送给黄稚荃。“以她的性格,随便说是我们哪位送她的,她都绝对不会接受。”

我说:这个不用你担心。我和李源澄去办,自有妥善万全之法。

几天后,黄稚荃到我房里来了。我马上把吴宓叫了过来。因为我的房子在最档头,隔壁就是吴宓。黄稚荃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上午,李源澄去找她,受“西南文教部委托”,送给她“困难补助

费”400元。

“这不是个小数,抵我8个月工薪哩!”她说:重要的还不在于钱,而是,这说明,共产党真正把她当个统战对象,F公那些污秽言辞,不能代表共产党!

吴宓也很高兴,说:共产党重视人才,明察秋毫。F公那天晚上,有些情绪反常。他的话,只是他个人一时随兴之谈,哪能代表共产党?可不是吗?“他那晚糟蹋我的话还少吗?我都丝毫没有介意!……”

黄:“我要好好想想雨僧兄长那晚的教诲。……”

天大热,单笆墙的小楼窄房里,气温尤高。三人都汗出如渇。衣衫尽湿,胶贴在身上。黄稚荃却谈兴甚旺,嗓子越来越亮。吴宓急了:“不行,这楼上不是高谈阔论之所。后天清早,我两个陪你进城散散心,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找个凉快地方,畅谈畅谈。……往后,少到李源澄那里,免得叫F公撞见,也怕别人知道。”

黄稚荃走了,剩下我俩,小声交谈。我说:“兄长,约同黄稚荃进城,大为不妥。首先,你别忘了,去年公安有令,我不得擅自外出……”

他打断我的话:“不然不然!……”

他嘲笑我越来越迟钝,竟然到了糊涂的程度。他认为:1951年镇反运动之时,不知我的底细,为求万全以利审查,故令我不得外出。镇反运动终了,水清鱼见,你并非潜伏之敌特分子,得以人民之一分子投入思想改造运动。总结没有通过,只是表示:暂不对你的交代打包票,乃慎之又慎也。西南局宣传部长派其秘书长来看你,乃是又一慎之又慎。即慎重表示对你的适当信任。……共产党上下左右之间,犹如人体之四肢百骸,灵敏交感,牵一发而敏感全身,绝非国民党,部门互相隔阂,声息各绝。则可断言,宣传部

这一微细表示，便是解禁指示：尔可自由活动矣！

我说：就算这条不存在了，请想：黄稚荃虽非少妇，却也仍属徐娘，且素有古装美人之名。我俩同她进城逛文化宫，独不惧又闹桃色新闻乎？

他略一思索：汝言是也。又想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宓自来言而有信。”

经我重申利害，他才断然决定悔约。叫我明天上午去找黄稚荃说明，请她见谅。并叮咛她：鉴于老李向 F 公撒的那个谎，她务必不要轻易到老李家去。

晚饭后，我俩到后校外散步，到了田野间，他忽停步：“幸亏你极力阻挡，取消了约黄稚荃进城之一轻率举动。所以说，我俩互有裨益，不宜各自西东。”

接着，他颇有感慨，自审有三大毛病：

一曰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此点我已对你说过多次了。”

二曰性格偏激，不能守其中庸。“通常我很是温良恭谦，有时恭谦得近于柔弱，但有时却又暴戾，倔犟。”

我插话：“我并没发现你暴戾，这顶帽子太大了。”

他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这是我偏爱失察。并逐一说明，逐一列举实例，说明这些性格特征，分别来自祖母、生父、生母的遗传，嗣父仲旗公、继母等尊长的感染，以及童、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说他成年以来，深受此矛盾、复杂性格之危害，“平生偏离中庸之道而举措失当之事不胜枚举！”

三曰情令智昏。他自我衡量，平生未尝利令智昏，亦未色令智昏，但情令智昏则“时恒有之”。

他解释说：“情”含有五伦之情，——加上他个人所特有尊重女性之情与同情弱者、苦难者之情。

首重君臣之伦,其实质乃是国家(祖国)、民族与国民(黎民、百姓)。古谓君为社稷之主,社、稷,土地与五谷之神,实乃以之概括国家、民族与祖国之物产宝藏之总代表,古时称君,今称大总统、人民领袖,只不过词汇有异,说的都是国家的象征、统帅和代表,故“君臣之义,君臣之情,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爱祖国,爱民族”;他还认为,师生之情同属弟兄、朋友两伦。即同时具有弟兄手足之情与朋友之谊。他说:“情令智昏,人皆有之,唯各有偏废。”他的情令智昏,偏于夫妻、爱护妇女、同情苦难者与弱者。而于后两者尤甚。

我明白,他要我了解,他为什么产生过约黄稚荃进城这样的想法,并且觉得,他自我鉴定的这三大毛病,大半是正确的。只是认为他有关“情令智昏”的论说有些迂阔。但是,此时此地和他抬杠很不合适,便笼统表示赞同。说:你关心黄稚荃,不仅热心缓解她衣破履穿的困难,而且设想给她以朋友之深情,宽解她心情抑郁。我很能理解。但是我想,你昨、前两天对她的譬解谕诲,比什么都宝贵。我相信,她会深思,从你的教诲里找到精神食粮而逐渐心胸开阔。

他说:“我希望能这样。你年富力强,认识她还早于我,望你往后多关心她。”

25

乔迁之喜

高温渐退,1952年的9月来到。各系师生分组奔到车站码头,树起“西南师范学院”的大横幅,敲锣打鼓,欢迎新生。院系调整拨来的教师、学生,一起到达溪流石桥旁的两条山岗,人来人往,一片忙碌景象。各系任课教师已经基本排定。给吴宓排了个四年级的泛读课。思想改造运动总结未通过的教师基本上都安排了任务。教师们,不论是原来的还是新拨来的,人人喜形于色。

钟声响,大集合,F书记作大报告。他步履轻松,迈上主席台。

“同志们,同学们,老师们,今天,我是来传达喜讯,报告好消息的。”他笑容可掬,再靠近麦克风一点儿:“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就要马上抛弃这窄小的,朽烂的,常受洪汛威胁的老山岗,一举而得崭新的,宽敞的,楼台齐全的特大校址,一跃而为全国高等学校中校园最宽最美最幽静的大学……”

大家不知所云,反正喜从天降。会场活跃,许多人交头接耳。嘈杂了一阵,F公才继续说。

原来,进军大西南时,因为四川地大人多久乱,就把它暂分为四块:川南、川东、川西、川北,成立四个省级政府,四行署(重庆市

单独为直辖市)。四个省会分设于成都、泸州、南充、重庆的北碚。两年半来,各行署都建成了省级规模的党政机构。现在,中央决定,四署合一,仍统为四川省,省会设在成都原川西行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指示:其余三行署的房产,移交给教育部门,用来办三个大学:川北行署办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南充师范学院,九十年代又改为四川师范学院);川南行署办一所四川化工学院;川东行署则交给西南师范学院,让它即日迁入新址上课。

F公介绍:北碚地处重庆远郊,是有名的风景区,被国民党时期建为特区,设北碚管理局。现在,大重庆的建设规划,北碚将成为文化区。川东行署(负责人为后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建首脑机关于此,北碚街道大有发展,而行署本身建设可称四大行署之冠。它的党委和行署机关占有原“兼善农场”的广阔地址,长约九公里,宽约四公里,全是崭新的楼房。道路纵横,林木葱茏。

F公继续说:川东行署基建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不论是区党委的办公大楼,还是组织部、工业部、农业部、宣传部……,及行署的办公厅、人事厅、工业厅、农业厅、教育厅、民政厅、公安厅,……所有的办公大楼,厅处各级干部宿舍,一切配套设施,全部交给我们西南师范学院了,包括一应家具、陈设。我们将要每一个系拥有一座大楼,……我们几个职工住一间宿舍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了!……

全场热烈鼓掌,欢声雷动。然后F公发出号令:立刻行动起来,学生打前阵,紧急搬迁。搬好了新址再行课。一切工作给搬家让路。

为了利于搬迁,教师们的私人家具全部折价交公,到达新址另行分配新家具。学生工作组到各家去登记私有家具并当面估价。教师们只需将自己的行李、衣物、书报包装成捆(还有学生来协助

包装),交给学生工作组,自己扶老携幼,迈上学校包租的小火轮,溯嘉陵江而上,到北碚登岸,自有汽车接运到学校新址。你的行李、什物就已在分配给你的新宿舍供你验收开用。

教师们纷纷表示,私有家具交公算了,不能再要学校付钱。院领导坚决不允:政策如此,不能白交。于是学生们登门议价。每个老师都很振奋,诚心诚意只象征性地领取一点价款,学生绝不还价,你说多少便多少。不过,他们背后仍要议论的。一位老教授的全套红木家具报价80元,学生们背后说:这个人还是资产阶级思想,要这么多钱。

我有私有家具:杂木挖方档板装的大综绷宽床四乘,沙发大小五件,写字台两张,桌、凳、椅等大小数件,大、小立柜各一。共报价20元。学生无议论。吴宓有藤绷床、立柜各一个,报价2元。学生们当面称赞:“吴老师的确思想进步得快!”

吴宓悄对我说:“我们失于考虑。你应该报5元,我呢,5角,至多1元。”

就在这忙碌纷繁之中,F公却挤出时间来拜访吴宓了。寒暄几句,就说正题:

“你年纪大,坐船时间太久。学校准备找一辆小轿车(那时各大学很少拥有轿车,西师连大卡车也没有),叫两个学生照顾,扶你和谢立惠(九三学社成员,时为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后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直达北碚。”

“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坐船的。领导的关怀,我心领了。”

“你不要过谦,这也得服从组织安排嘛!”

接着F公再提一件事。到那边的宿舍,院方决定:将原川东行署一位厅长住的一套房子分给吴宓,计有大小四间,设备齐全。

“太多了,太多了!”吴宓站起身,“宓仅一人,结了婚也才两人,

要不了这么多房子。”

推之再三，F公乃明说：此乃上级打了招呼，院党支部研究过的。

吴宓想了想，提出折衷方案。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成九，三反时当“老虎”，关了两月，老婆上吊死了。运动结束时，未宣布处理，仍供原职，但无任何照顾。吴宓建议，将拟分给他的这套房子隔作两段，拿一段给蒋成九，以示鼓励。

吴宓最后说：我同这位蒋君向无来往。此建议，纯为拾遗补网，帮助党贯彻政策，有利于人民教育事业。

F公答应把他的意见带回支部，研究决定。（后来采纳了吴宓的意见，把那套房子分了一半给蒋成九。）

我问吴宓：何以作如此画蛇添足之举？

他只说了八个字：

“居高则危，俸优招嫉。”

在搬家的忙乱中，一天上午，9时许，院办公室干部来通知，叫我准上午10时，到F公办公室接电话。我于9点50分到达F公办公室门外等候。准10时，电话来了，竟是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讲了几句怀旧表友谊的话，他便告诉我：西南文教部决定，在磁器口西师旧址设立“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供教授们轮流“进修马列主义”，定期大概是一年。计划通过这一进修，让这些教授们“自我改造”，“思想提高了，从量变到质变”，改造成为“红色教授”。“择优首轮培养”，准备将西师的两个重要统战对象周邦式和我也调去参加第一期进修。

他问我有何意见。我答：这样好的安排，我还能有什么意见？我谨向党保证，一定利用这难得的短短时间，潜心钻研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

张子意接上说：他今天给我打电话，主要是和我叙叙旧。进修部的事不过是顺便提到。还有一件事：前不久，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了杨之华。她知道我在西南，特托张子意向我转达她的问候。张子意问我，要不要杨之华的地址，如觉需要，可以给她写信。我知道，高级干部的住址、电话都是保密的，便答：“我依靠基层党组织，没有什么事情求助杨之华同志。”并请他代我转致对之华同志的问候。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和张子意、李宗林他们一起被盛世才关进了新疆监狱。本书前面提到过，张治中为谋求释放这批中共干部时，我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多次探监，进行配合，并自掏腰包，给他们送去了不少药品、食物、衣服。每次探监，必见李宗林、杨之华，也有两次直接和张子意联系。护送他们赴延安的车队启程那天，我去送行，和李宗林、张子意、杨之华三人谈了一阵，随后又同杨之华谈了许久，直至在汽车隆隆声中才挥手分别。……

我刚放下听筒，F公进来了，问我：“外语系俄语课教师奇缺，马上还要开办教师俄语班，学生们很欢迎你回来教课。你如果不愿到进修部，就仍回外语系，好吗？”

我说，我极力争取到进修部。

F公说：进修部的教授们除了进修马列，还有一个任务——学俄语。那里打算成立一个俄语辅导组，由你负责，给进修教授们上俄语课。“你，一身而二任焉：进修教授，教授的教授。”

我说：“F书记，你是知道的，我向来教中文。俄语实非所长。服从需要，其实是客串，不称职。希望就此结束客串，回归本来的专业。……”

F公尴尬一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先决、根本的一条是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你要胸襟开阔些。”

离开办公大楼,我立刻奔吴宓那里,如实说了全部情况。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又当局者迷了。对F公之言,纯属画蛇添足,不,简直自批其逆鳞。”他说:进修部这个事情,源澄对我说过:进修时仍属原单位的人,进修毕还是要回来的。你所谓不能胜任云云,不啻在讽刺他前年做小动作驱使学生罢你的课这一举动的彻底失败。“听了你这番话,他必有旁白:好小子,得到张子意部长一个电话,你就翘尾巴了!”

他就这个问题仔细告诫了我一番。又说:教师进修部实为审查政治历史。这是大好事,专门审查,可尽快得出结论,利于早日解除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张子意的电话,包括杨子华的问候,透露了重要政治信息:“共产党记得你当年的进步表现,至少不会难为你。”同时,已经初步认定,你无大的政历问题,至少不是潜伏敌特。所以张部长敢于派秘书长致候于前,亲自打电话寒暄于后。但是,你的政历还在审查之中;张部长虽念旧好,却不敢召见或约你到他家里作客,更不敢亲自来拜访你。……

最后,吴宓自语:“周邦式也去进修部?!……我得表个态。”他起身出门,去找F公,开门见山:他请求调进修部进修。

“你不能去。这,不能考虑!”F公说。

“为什么呢?”

F公亲切地捧住吴宓的双肩,笑容满面:“你,是我们西师老教授的旗帜,必须树在西师,不能移动。”

“F书记,你知道我多么需要进修马列主义啊!”

“那很简单,你精通英语,也懂法语、德语,你就在家里读马列的书,联系实际……”

搬到北碚后,我和吴宓各住一处,颇有距离。校内交通只能依

仗两条腿,当然我们的来往就全得我去看他。这天晚上,我到他那儿,他把和F公的谈话详细告诉了我,幽默地加上了一句:“顽石点头功效大矣哉!”

趁他高兴,我便问吴宓:住一套房子也算“居高则危”了?你却好歹谦辞,还要越位言事,叫蒋成九来分住那半边。

他说:这道理很简单,住要好邻,何况我们又处此特殊时代。蒋成九是学理科(化学)的,去年三反被打成“老虎”,关了很久,老婆吊死了。他虽得放了出来,照旧工作,但没给恢复名誉。本人自然心灰意懒,至少不会拿别人垫背,以图青云直上。而他在教师、职工及学生眼里,是“霉得很”的角色,谁也不会常来亲近他。住在这里,他必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样一位老先生作邻居,是再好没有的事。同时吴宓知道,F公和蒋成九关系较好,略有交往。三反时蒋受冲击,F公不无怜惜之情。日今在住房等问题上照顾一下,F公是愿意的。只是过于忙碌,不及想过。吴宓的建议,实则提醒了他,F公绝不会恼的。

我不觉笑说:“兄长,何思之深也!能不能给你扣一顶帽子:工于心计?”

他说:“学而不思则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绝不是李林甫之类的心计。以你我辈,处今日之时,稍稍深思练达以明哲保身,良有益也。愿吾弟留意焉。”

我表示领会,他却认为尚有必要和我多说几句。“不要说你我这种情况,便是古代的许多贤相名将,功成身退,为求平安终老,也得用点心计。”他随举了几则史实:就中比较详细地讲了买田宅自污的肖何,“好赌”的郭子仪等。

吴宓说:凡此种种,你能扣他个大帽子——工于心计?可你不能说,他们思之不深。圣人教诲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联系到现在的实际,比方说,你的政治历史还没得到结论,此乃当局尚不知。你不用背包袱——“不愠”。然而,圣人之言必须面面观之。当其人不知时,你就该深思深思,以求其知。“工一点心计,有何不可呢?”

搬家之事进行顺利,就在这一学期,西师便在新校址上课了。

26

秘密家奠

1953年6月20日,吴宓要我给他办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购买几样物品:老式红烛一对,神香一把,纸钱四封,茅台老酒一瓦罐,老式瓷的(最好是江西景德镇瓷)酒杯四支,酒壶一把。并且嘱咐我,务必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已是解放后的第四年了。老老少少的觉悟大大提高,烧香拜佛的事早已绝迹,哪里去找这些东西?我花了几天时间,在重庆市中区、沙坪坝、磁器口、北碚以及北碚去合川县的沿途小镇,找了又找,只买到了酒杯、酒壶、罐装茅台酒。其余各物,无法获得。不得已,找了个窍门:自己加工仿制,将照明烛涂上红色代替红烛,以熏香代神香,购得金、银色锡箔制为冥锭和金、银元宝。

好容易交了差。吴宓不满意,叹了口气:

“好吧,聊胜于无!……还有要事相烦。准明日晨,卯时,请你来帮我一点小忙。务请准时,素服,布鞋。”

我大体领会到他的意图,说:“行,我沐浴更衣,素服布履,准卯时到这儿。”

6月25日晨,我准时到达,他和邹兰芳都早已起床,并已将书

房挪成了一个小小的“堂屋”。面对南窗的墙下放了一张方桌，铺以白布，整齐地摆了三支瓷盘，内放“三牲”（小鱼一条，猪肉一块，鸡腿一对）供品；盘前罗列酒杯，旁有酒壶，盘后左右分列红烛。靠墙则是黄纸裱糊的亡灵牌位，毛笔楷书：

“故恩深嗣考吴公仲旗讳建常之灵位”

我这才想起，他的老太爷仲旗公的忌辰到了。

吴宓情态肃穆，语音低沉：

“圣人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慈父逝世，我未能亲视克尽孝道，深以为憾。今日是他忌辰，我家祭一下，以表慎终追远之意。望你勿以我为迂腐守旧。烦你相赞，不可能全依古礼，但仿其意耳！”

我们三言两语，商定仪礼程序。邹兰芳退出，室内只我两人。他亲手明烛燃香，焚了金、银冥锭。捧起酒壶，往四个酒杯里布了酒。然后倒立一旁，立于赞礼位置。吴宓面对灵位，垂手肃立。我开始赞礼：

“祭礼开始。”

“孝子就位。”——吴宓后退一步，微微躬身肃立。

“揖！”——他长揖。

“跪！”——他下跪。

“拜！”

“稽首！”——他叩头。

“稽顙！”——他叩响前额。

“匍伏！”

“祭——奠！”

他跪在地上，伏拱上身，捧读祭文，声音低沉哀痛：

“维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三年，岁在癸亥。不肖嗣男——陀曼，

谨以馨香素酒恭祭于故恩深嗣考吴公仲旗讳建常之灵前而哭之曰：呜呼……”

祭文文字简朴，却很长。内容很丰富，把仲旗公一生的事情，西至新疆，东至上海，纵横四方，慷慨好义等事迹一一缕叙；又将他们父子聚散的骨肉深情源源忆述。念得很有感情，也就进度很慢，好容易才到了“伏维尚飨！”

我提起酒壶，向地上奠酒，颂：

“在世为哲，在天为灵！魂兮归来，惟格惟飨！”

颂毕，朝吴宓，赞：

“再拜！”

“稽首！”

“稽颡！”

“起！”

“揖！”

吴宓跪拜如仪，站起来。我以为祭礼已毕，正要迈往客厅，他却拦住我：“等一等！”

我忽有所悟，改口说：

“不！我也得向仲旗公行个礼！”

继续移步，迈到正对灵位处，祝曰：

“仲旗公：小子张紫葛，十五年前，常聆教诲，承你不弃，命我与陀曼兄长结为异姓手足。十五年来，我们情谊日深。近四、五年，两人相依为命，兄长陀曼对我教诲良多，俾我得以避险就安，日有寸进。饮水思源，皆大人之赐也。兹谨借兄长祭奠之机，泥首谢恩，聊申慎终追远之义于万一！英灵在迩，尚祈俯察！”

我随即行了三拜九叩之礼。在第三次下拜时，吴宓却与我并立同拜，同时礼祝：“男谨遵大人庭谕，视紫葛一如十四弟！……”

起立后,他却叫我把香、烛都给换一换。

我另燃香、烛之际,他从内室又捧来一尊灵位,上书:

“故恩深显考吴公芷敬讳建寅之灵位”

“谨依古礼,”他来到供桌边,“敬请爹、父序长少就昭穆之位!”

古礼:左长右少;左昭右穆。他将仲旗公的灵位往右移了一点儿,将芷敬公的灵位放在左边。两位并列。

然后,他将酒杯的酒换了。转对我说:

“请你在旁为我赞礼!”

我执壶作了斟酒状,旁立赞礼。三拜九叩已毕,我正要赞“起——”,却见吴宓葡伏低声诉说:

“我爹我父英灵在上,不孝男敬向你们呈情告罪……”

他叙述了自己如何与邹兰芳相识,并无杂念;只因涉嫌瓜田李下,如此这般,不得不与发妻陈心一离婚而与邹氏结婚的大体过程。“情虽有异,礼实难容。男弃糟糠之妻而另娶少艾,黜诸子(指女儿)于不顾而自为琴瑟之好,实大违我爹、我父之庭训,悖祖宗相传之家训,心中切怛,莫此为甚。然而事出无奈,不可他求。儿实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碌碌一世,老而无成,反倒做出这般事来!愧对我爹我父呀!儿——实在是个不孝之子,不成才的不肖之子呀!……”他伏地痛哭起来。

我正要上去劝解,却见邹兰芳快步抢了进来,跪在吴宓右侧稍后处,连连叩了三个响头,哭诉:

“两位老爷听禀:都是薄命女子邹氏兰芳累了陀曼公子呀!小女子敬禀老爷们:我绝对不敢称作陀曼公子的妻!我只是他的贱妾,他和陈心一夫人离婚,乃是现在法律规定,不能不遵呀!我心目中反正陈心一夫人仍然在位,她是嫡主母,我是她的侍妾。我但愿能为你们生下一个男孩,续了陀曼公子的子嗣,报答吴府的大恩

大德！……”

她还要说下去，吴宓也一直伏在地上啜泣。我不得不赶紧上前劝他们：

“好了好了！快8点半了，外面四处是人，叫别人听见了，反映上去，误会讹传，说我们在搞‘一贯道’，那就麻烦了！”

我火急抱起吴宓，再拉邹兰芳站了起来。然后挽住吴宓，一起到了客厅坐下。

我俩各坐一方，一言不发。他呆望窗外，似有所思。我则盯着他，惊叹于心：

我这位兄长的传统道德竟是如此醇厚。看来，他和邹兰芳的婚姻只不过给他加上了双重的心理负担：家者枷也，他要谨履职责，如荷如界；而与此同时，他又念念家训，想女儿，刻刻自责，自认负心亏行，愧咎良深。哀哉！

“道牯牛喝水”之事，实在是导演了一场大大的悲剧。

沉默了很久，邹兰芳来叫吃饭。我们仍是默默走到饭桌边，无言，各吃早点。饭罢，他忽然对我说：

“去年，思想改造运动，我们交的那些反动证件，到底反动到什么程度呢？”

老兄长今天有点思路不清了吗？竟然想到这么个问题！

去年，思想改造运动逐一过关期间，号召交出“反动证件”，并且说明，凡是与“反动历史”有关的文字、资料，都是“反动证件”。我交出了于右任历年给我写的条幅等，都是尚未裱制的宣纸原件。在场的中文系老教授围上来鉴赏，这当然是于右任的真实手迹，行家们自然赞不绝口。吴毓江教授一时兴起，讲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都各地就有文化商人，专门贩卖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售价一般都达一张条幅一老担黄谷。

赖以庄教授接上说：市上有赝品，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是行家识别不出来。

我和吴宓都知道；于右任家里有个秘书，是个大黑胡子老陕，专仿于右任书法。请托于右任题写的人太多，于右任无暇操觚，凡属勉强应付的，就叫黑胡子代写。这事自非外人可知，我和吴宓自然不会多嘴泄露这个秘密。

那天在场的老先生们谁也没想到于右任的书法会被认为是反动证件，就随意品评。

赖以庄：“真品，真品！不可多得。”

吴毓江：“不出 20 年，于右任亲笔条幅，至少每幅可抵黄金一两。”

杜钢百：“不止，不止！起码三两以上，与毕加索的画卷等价！”

F 公盯了他们一眼：“于右任是什么东西？国民党的监察院长！”再盯我一眼，“他给你写这么多条幅，足见你和他反动关系之深。这当然是反动证件，该交！”

交“反动证件”，是与反动派决裂的实际行动，谁也不甘落后。孙海波这位档案学专家无可为计，找了几本封面发黄的中、外《档案学》书来，问：“这算不算反动证件？”工作组的一位穿军服的男干部瞟了一眼：“《档案学》？那是反动派绝密档案方面的学问，中华民国出的？英、美帝国主义出的？反动，反动！……”

不等他说完，F 公说：“好，交了吧！”

这当然启发了吴宓，忙问：“那么，我还藏有杜威、罗素、尼采、叔本华的原本书，……”

F 公忙问：“还有谁的？”

“我的老师白璧德的著作。”

F 公：“杜威等人，都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恶

棍。文学理论？那是文学的灵魂，白璧德反动透顶……”

吴宓赶忙说“是，是！我马上去拿来，交！”

吴宓回房，抱了一大叠英文本的书籍，来到中、外文系教师的学习小组会场，交给F公。F公一本一本过目，念念有词，逐一念了各书的英文书名。完了问吴宓：

“我好像在你书架上看到一本《英国百家名诗选》，那内容如何？”

“我去拿来，请您过目。”

他又奔回宿舍一趟，捧了那本诗选来。F公翻了翻目录，掂了掂：“还是交了吧，都是些反动诗哩！”

“是，是，当然交了！”

那天晚上，吴宓却非常烦躁，恨恨然，愤愤然，对我说：“宓平生最爱者，书也！”他说：历游欧美，讲学京都，抗日战争辗转流离，每有播迁，必先妥运藏书。那年从武汉到重庆，衣物尽弃，惟这些珍版藏书都百计携带之。“今竟举而上交，呜呼哀哉！”

那以后，他再未和我提到那些书。现在却凭空提起，我只有傻呼呼地望着他。却想起那天交书的情况，我也没有看清那些书，尤其英国诗选，只听F公念书名为《百年诗选》，随后F公说话时又称作《百家诗选》。想到这里，不觉脱口而出，问：“那本英国诗选，到底是百年还是百人？”

吴宓很没好气：“荒唐，荒唐！简直荒唐！是《英语百年诗选》！英语，用英语写的，英语地区诗人写的，英语地区哪能只是英国？企鹅公司出版的呀！我还逐词逐字母校勘了的，随身携带了几十年的呀！”他嚯地站起：“我去问他要。”拔腿就走。

我也急忙站起：“莫去，莫去，莫自找烦恼。”

他已来到大门边，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我说了什么，边开大门边

回头对我说：

“你在这儿等着，我要到了，你就去讨回于右任的条幅。”

不到一小时，他空着手回来了。“他态度很好，客客气气。却说，思想改造的东西，一古脑儿上交给西南局宣传部了！不好去讨。”

我只有陪着他，品茗呆坐。过了 10 多分钟，他平和了些了，才说：“把灵堂撤了吧！万一叫人发现，少不了惹些无谓的麻烦。”

他跟我来到书房，捧起两个灵牌，放在化冥锭的搪瓷盆里烧了。在我收拾酒杯、酒壶、三牲瓷盘的当儿，他将蜡烛塞进了煤灶炉膛。一时蜡臭气弥漫全屋。吴宓慌了手脚，叫我和邹兰芳快快打开各房窗户，他却趑到外面屋后，窥视邻居动静。蒋成九的各房窗户全敞，室内阒无一人。他四处张望，好一阵才发现，在后面叫做桃园的山上，——中、外文系的学生宿舍区，蒋成九独在远离宿舍的小路上彳亍徘徊。我们已经收拾妥善，书屋还了原貌，吴宓吩咐关上窗户，说：“你看，我这芳邻不是挺好吗？换那些不省油的灯，今天就会出大麻烦！”

我正要告辞，却来了外语系的 J 女生。

“热烈祝贺吴老师洞房花烛！”J 女生向挎包里伸手。

吴宓紧张地问：“你干什么？”

J 女生笑吟吟地：“祝贺嘛！得送点儿礼物嘛！”

吴宓沉下脸：“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什么不行？教务长（指 F 公，这时 F 公已任正教务长之职）乔迁之喜我都送了礼物的。”

“我不是 F 教务长，我绝对不接受！”

J 女生笑得眉毛弯成了月牙：“吴老师呀！我这个礼物你非接受不可！”手又伸进挎包，捏着露出挎包尺来长的纸卷儿一抽，现出

两尺来长的纸卷儿，扯开封皮纸，只一抖，现出了一张毛泽东画像，五彩精印，金色金属镶边，“送你一张伟大领袖的挂像，你也要拒绝？你不愿悬挂领袖像？”

吴宓立刻转愠为喜，拱了拱手：“接受，接受！接受你这份极为隆重的厚礼！我就缺一张领袖像，去北碚新华书店看过，没有。我正要专门进城去请一张。”

J女生要亲自给挂上。要求我协助，帮搬方桌垫脚。我站在房子中间目测指挥，以保证挂像端正。像挂好了，吴宓夫妇，J女生和我排列整齐，朝画像恭恭敬敬鞠躬。隆重的挂像仪式完成。

吴宓说：J同学，你为我请来毛主席像，我，怎么办？还你钱？似乎亵渎伟大领袖。我得送你点儿什么吧？

J女生笑咪咪地：“您不是已经送了我两本《红楼梦》讲稿吗？……”

吴宓愕然不知所对。

J女生却迅速转换词锋：“愿我们师徒在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迅速进步，你成为红色教授，我在明年成为红色助教！”然而她又忽有所感，“哦，我能当个什么助教？我的恩师，把您渊博的学识随便给我一丁点儿吧！我太空虚了！你看，你们两位老师可证：我进大学一晃满三年了，却是运动了三年，只在运动间隙零零星星上过几天课；三年加起来，上课不到一年。而且一下课仍是政治表现，活动！既不复习，更不预习。学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学到！”她又叨叨：时间只一年了，能学到什么？毕了业能助个什么教？当干部吗？必须入党，我这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入党很难！还是您吴老师传给我一点儿学识吧！

吴宓颇为动容，说：我很愿意帮助你，你说个办法、方向。

J：“每星期一、三、五晚上，您教我一小时古文。”

我问：“你怎么想到学古文呢？”

J：“瞧这趋势，再过十来年，我们这国家里，能讲《古文观止》的就是专家了。我决定走这个冷门。”

吴宓答应从下个星期开始教。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一个，上课只教识字，串讲词句，概不谈文章的思想内容、人物评价。一个是上课之外，不说任何闲话。

J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埋怨吴宓：“她这么油滑，你还给她补习功课！”

吴宓略现惊愕：“她再油滑，总没做过贼嘛！孔子有教无类，我拒绝她殷殷上进之心，何以对先圣先贤！”又说：我自1921年献身教育，就抱定宗旨，为中华培育英才。凡有利于后生之进取者，必鞠躬尽瘁。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J生之油滑，绝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她的老师们言传身教适得其反之过耳。

我又说：你一向谨慎，这回却这么大而化之。也不考虑单独和她接近，引起无谓麻烦？

他说：“男女之嫌？我有年轻的妻子在旁。其他麻烦？我和她讲了两个条件，可防一切。总之，但能有利于该生之成长，我愿挨批挨斗有如三反之‘老虎’！”

我来到人世是尽义务的

1953年4月,西南文教部高教处长陈孟汀叫我去他那里,面示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俄语辅导组的工作重点。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因为来进修的教授们,无论是何专业的,都要学习苏联。而其中少数教师的专业政治性强,要求他们掌握俄语后改教俄语。所以进修部的俄语教学必须抓紧。因学员是教授(只个别是讲师),为示尊重,将俄语教研室称为辅导组。辅导组里有一位苏侨皮萨洛夫。

我从西南文教部陈孟汀办公室出来,经过人事科长余润南办公室前(余是四川人,女,后此一直作高教行政工作,至1984年在四川省高教局副局长任内离休),被她叫住,说是有两个天津来的男女要找吴宓,初次到重庆,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到北碚。既是吴宓的远客,我自然乐于服务。想起吴宓原说这两天借邹兰芳游北温泉,准备在那里住两三天,为防吃闭门羹,我就使用余润南的电话打到西师教务处,请李源澄告诉吴宓在家等着。通话已毕,余润南便叫来一青年男干部领我到会客室接待天津来客。

原来是朱姓兄妹。时近中午,我便邀他们去冠生园午饭。略

一攀谈才知,这位朱姓小姐就是抗战初期日军侵占北平后,与吴宓装作夫妇,夜车逃往天津的那位学生。吴宓有一首写他离开北平的诗中称为“红袖”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应届毕业生。其兄朱先生则是陪同吴宓乘英国海轮自天津南下,辗转到长沙寻找西南联大的那个青年。其事其人,早在1939年吴宓就给我详细叙述过。时日既久,我竟淡忘了。(目今忆记此事,仍想不起他们兄妹的名字。)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守卫芦沟桥的中国部队29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开始了。清华大学宁静如旧,照例举行应届毕业生典礼。继而传闻纷至,29军被迫撤退,日本侵略军进了北平。清华校园已闻枪炮声。学校当局宣布紧急措施,提前发给本月薪俸。师生纷纷离校。吴宓与好友陈寅恪等教授急速收拾书籍衣物,赶进城里暂避。很快,日本侵略军占了北平,并清理各大学。通知陈寅恪、吴宓等不得擅自行动,在家听候起用。

大祸临头,决不能入日寇囊中。大家商定:赶快南逃。这时得到清华校方自长沙来电,叫他们南下到长沙报到。朋友们分批起程。陈寅恪一家大小连夜上火车奔了天津。吴宓与另一教授同时起程。吴宓虽无私眷,书籍却多。这么浩浩荡荡,必为日军所注意。这几年,他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兼课,那里应届毕业生朱XX等多人都是天津人。朱家小姐等女生也要回天津,便另约了几个别校的男生,或装夫妻,或扮情侣。将吴宓的书籍改换包装为一般行李,分属于那十数个青年。各自提携扛托,朱小姐与吴宓扮作夫妻,相偕而行,由她操天津口音应对,免得吴宓暴露陕西腔调。如此这般,混过了日本侵略军的岗哨,到了天津,迳住朱小姐家。朱家乃天津富户,人手众多。当即代吴宓购买了英国客轮的船票到青岛,朱小姐又虑吴宓书籍、行李太多,乃让其兄朱XX先

生护送吴宓。陪他到青岛搭火车至郑州转车到汉口，再乘粤汉铁路的客车至长沙。找到了清华大学的报到处，朱先生才辞别北返，回天津而去。

吴宓回忆说，如果没有朱小姐等十几个青年乔装掩护，他一个人雇搬运工搬运那么多书籍上车，一定会被日寇的军哨发现，罹不测之祸。

……

从重庆市中心到北碚颇有距离。转车，候车，直到下午6时许才到吴宓那儿。一路难免交谈，乃知朱先生送了吴宓返回天津后，举家南逃未果，窝在天津度过了抗战八年。朱小姐隐作家庭妇女，深居简出，朱先生开百货店，与其妹的同学结婚，妻亦隐为灶下妇。抗日胜利，朱小姐任中学英文教师。解放后改教数学，今已38岁，仍然未婚。朱家乃殷实商户，是好几家私营工厂的股东。解放后划属民族资本家。

见到客人，吴宓惊叫一声：“呀！”伸出颤抖的双手，同时和朱氏兄妹握手，“别来十有六年矣！欢迎，欢迎！”坐下献茶之际，吴宓又首先说话：“十六年来，十分想念你们两位，多次去信，或原函退回，批曰‘查无此人’，或竟石沉大海。……”

朱先生说，1938年冬住家的地址就变动了。他们也曾于抗战胜利后多方打听吴宓的去向，最近才间接听说他在西南某大学。详址仍不甚了了。所以他们来了重庆，迳到西南文教部去查问。

晚饭后，吴宓和朱小姐叙旧，我和朱先生闲谈，邹兰芳收拾碗盏后，坐在一边看报，后来干脆进房去睡了。

夜10时许，客人第三次告辞，吴宓还要恳留，我知道，吴宓房子虽宽，卧具却只有两套。我家也住在西师校内，但估计客人不会到我家寄宿。便提议送贵客去北碚第一公寓住宿。这是原北碚管

理局特建的高级宾馆，清静宽敞。吴宓便要我替他陪同客人到公寓下榻，约定明天吴宓夫妇和我们三个在车站会齐，同游北温泉。

吴宓很高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提议大家一齐在北温泉盘桓两天。车到北温泉，首先在新近落成的招待所订了四个房间。上上下下转了一圈，钻罢乳花洞，朱小姐要求游泳，而朱先生则要一品四川茶馆之妙，邹兰芳又称困盹，于是吴宓要求我陪朱小姐进游泳池，而他们三个坐茶馆聊天。

第二天上午，我代表主人陪导贵客登缙云山，游缙云寺。吴氏夫妇在招待所歇息。下午则兵分两路：游泳池和茶馆。北温泉位于嘉陵江畔，每一行动都得跋涉石级梯坎，自然很累。晚饭后吴宓夫妇就急于活动，朱先生虽在壮年，却体丰善睡，不到9点钟就上床入梦了。而朱小姐则精力饱满，邀我夜游温泉公园。灯火点点，松风轻拂，朱小姐赞叹如在画中。由闲话进而谈心。

她表示，三日来，她已默察确信，我是吴雨僧的好友。故乃与我布其腹心。

“他是怎么弄上了这么一个夫人的？”朱小姐单刀直入，“真是林黛玉。而吴雨僧现在是什么年纪？他需要人照顾，哪能当怡红公子兼紫鹃丫头？”

我不知如何答复。她又进逼一句：

“我怀疑这位邹女士是T·B(注：肺结核)患者。喂，你作为他的莫逆之交，也不保护他，让他掉进潇湘馆去受罪！……我是吴雨僧的好朋友和学生，望你推诚相见，告诉我实情。”

“我们谈个别的吧！”我说，“他木已成舟，……”

“那么，我来说吧！我，不远千里，跑这一趟，闷了十六、七年的心里话，不能对吴雨僧说，就对他的好友说了吧！……”

她说：我是1937届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的学生，吴老师

在我们那儿兼课,我为之倾倒,暗自心许,却知道他早是有妇之夫,并已是三个女儿的爸爸。我只有千言万语闷在心里,不曾向他吐露半点。别来转瞬十六年,既心有所钟,复遭时不造,行年38岁,仍然独身。两月前忽听间接传说,他正和妻子离婚。托人打听,确有其事。我们的同学都知道,他们夫妻自来不太和谐。而吴师一向谨慎,估计不是另有所欢。故乃抱定满腔希望,贸然来访。谁知却是这个局面。……

我不得已,把吴宓与邹兰芳结合的始末如实告诉了她。

她低头沉思,我俩默默徐步。过了好久,她顿住脚,发出恨恨之声:

“她并不爱他! 诡计, 诡计! 这个冒牌林黛玉! 她利用他, 欺骗他。看准他的高尚情操, 看准他极富于同情心, 就利用这一点, 套住他, 为她作奴隶。你们这些教授, 全是书呆子, 全在她的魔法之中, 好心办坏事。让他作牛作马, 养活她一大家子! 逼吴雨僧上吊! ……”

“小姐, 你要注意, 邹兰芳最初给吴雨僧写情书, 表爱情, 是在1949年的9月。那时, 她还是青年将官的妹妹……”

“1949年9月? 那是什么时候? 路人皆知, 蒋介石覆灭捷于燃眉。她是大学生, 能不知道? 共产党来了, 要土改, 要打倒国民党的大小官僚。她的一切财富、势力, 马上就要化为乌有。而她自己又害了肺结核, 最好的办法就是捞到吴宓这样一个极有声望的教授, 保她优游养病, 保她全家丰衣足食, 延续邹家香火! ……”

回到招待所, 朱小姐仍无睡意。她来到我的房间, 给我看两张历史照片。

一张: 八位春装小姐围着吴宓的半身照。紧挨吴宓左右的, 是朱小姐和她的嫂嫂。

一张：九位小姐一字横排的全身照。一律身着白纺绸紧腰长摆小半截袖管白旗袍。朱小姐站在左首第一个。

这张九人的全身照，和前面那张半身照相比，多了一位小姐，没有吴宓。

她告诉我：前一张摄于1937年春天，她们邀请吴宓春游后所摄。后一张则是她们毕业考试前摄，时为1937年6月。大家推她将这两张照片送给吴宓。吴宓从天津上船南下时，匆促间，将照片夹在一本书里，遗忘在她家了。在日寇侵占天津的八年岁月中，她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两张照片。

朱氏兄妹辞别时，将这两张照片，当着邹兰芳郑重赠送给了吴宓。并用流利的英语说：

“亲爱的老师：希望它们时刻在您身边。就是说，您这九个女弟子，九颗热爱您的少女的心，时刻伴着您，保您心情舒畅，健康长寿！”

吴宓捧接照片，双手颤抖，眼里转着泪花，也用英语缓慢流畅地说：

“谢谢，谢谢！我一定让它们时刻在我身边，时刻在我身边。让你们九位少女的青春、才华，天天召唤我的青壮年时代，带我回到在清华、平大（注：即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学的时代。”

他左、右手各擎一张照片，进而对着窗子仔细辨看，一边用英语说：

“是啊，那时，你们都是少女。九个勤奋向学的少女，九个满怀壮志、才华出众的少女。可是，十六年了，你们，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却没有一个人实现了少女时代的抱负！这，是谁的过错呢？”

三天中，他们师徒话旧谈天，吴宓备细知道了九个女弟子别后遭遇和目前境况。确是没有一个人实现了学生时代“造福人群”的

抱负。

吴宓确如所言,非常珍惜这两张照片。文革抄家风刚起,他就将这两张照片分别缝在枕心底胎和夹袍袖口里。不料在挨批斗“把吴宓揪出来”的吼声中,揪他的小伙子抓扯失手,扯烂了他夹袍左袖边口一截,恰好就是那张照片所藏之处。小伙子顺手扔开了袖口烂片,再去抓吴宓的胳膊,吴宓当然抢救不能,就此失掉了那张照片。而缝在枕心衬垫中的这一张却躲过了十年浩劫。

1976年夏,我在吴宓那里看到了那张照片。它被仔细粘贴在吴宓那本约大32开的抄本封里上。几位身著白纺绸紧腰长摆短袖旗袍的小姐整齐站成一排,手挽着手,似在齐步前进。

1953年北温泉之游的第三天,我们清早离开北温泉招待所,搭车奔到合川与重庆交界处的澄江镇。在那儿吃了江团。随即又回到北温泉招待所,让吴宓午休一下,朱先生也有午睡习惯。然后搭下午一点合川到重庆的客车去重庆市中区。朱小姐悄声对吴宓说:她带了点钱和金首饰,想赠给老师,改善生活。吴宓严词拒绝。并说:这简直是对他的轻慢不敬。身为教授,岂能用学生的钱?

朱小姐无奈,转身拉了邹兰芳悄语:“我们都是吴老的学生,即有同学之谊。我家经济状况很好,富有余钱。当是你我同学间有无相济,我留点钱给你,以便你们生活过得宽裕些。往后,你如有困难,可随时来信告诉我,千万别让老师受穷!……”

邹兰芳略一迟疑,就爽快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愿意接受你的好意。”

朱小姐塞给她一个小包儿:“千万别对老师说。”

后来,邹兰芳因为要我替她将黄金兑换成人民币(那时,兑换黄金只能在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并需有单位证明),就悄悄告诉我,那个小包里,有现钞人民币二千元,(这在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了。

例如,当时西师在磁器口金蓉正街103号,买了一幢约800余平米的楼房,售价才一千元。)黄金首饰金镯子、金戒指各一对,总重二两有余。邹兰芳叮嘱我“不要告诉雨僧”。

吴宓坚持要亲送朱氏兄妹上船。于是邹兰芳回了西师,我们四人直奔重庆朝天门码头售票处,买票上船。兄妹同住一间二等舱。船要明晨启航,直达武汉。我跟在朱先生后面迈到栏杆边话别。留下吴宓和朱小姐在房舱里。约过20分钟,吴宓出来,叫我上岸。这20分钟他俩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我和朱先生就站在房舱门外,门敞开着,我能望见,他们对面立谈,相距约50公分。

分别时,他俩握了握手。我扶着吴宓下船,踏上上岸的石梯时,吴宓朝船舷望了又望。夜幕中仿佛有人在船栏边向我们挥手,却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上了马路,坦途漫步,吴宓才轻轻叹了一口气,念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的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朱XX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我感叹者,我的多少弟子,男的、女的,勤劳辛苦,竟无人所成。哎,是谁之过?谁之过也?”

走了几步,他又拄杖立定,“朱家兄妹来看我的事,务希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源澄他们,以免引起猜疑讹传。我切望安静,少生烦恼。”

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安慰他,我重复了朱小姐教给我的谎言,说他们兄妹并不是专程来看吴宓,而是去泸州看了亲戚,顺便到文教部去问问,碰巧遇上了我。

这并未扭转他的思绪。他说:

“我平生主张,与曹操相反。我愿天下人负我,不使我负天下

人。也都这样做到了,偏偏对这朱家兄妹,对他们的深情厚谊,我却无毫厘之报。不论怎么说,我有负于他们!”声音异常低沉而枪楚。

三个月后,1953年的夏天。吴宓托我代他扶邹兰芳去医院看病。可邹兰芳好歹不愿上医院。吴宓火了:“你不医病,我就上吊!”

邹才勉强跟上我去了。考虑到她的思想状况,我特别给选了一位中年女医师。经过听诊、触诊,医师开了化验、照胸片的通知单。我缴了各项费用,办妥手续,邹兰芳好歹不肯照X光胸片。但是,医师看了化验报告,便百分之百肯定:她患的是肺结核。只是未经X光检查,不能确定病灶详情。复经产科检查,她已怀孕。

邹兰芳赖在候诊室不走,时已中午,医院午休,病号渐无。邹兰芳叫住我:

“我要和你说说心里话。你能原谅我,替我保守秘密,我就说,要不,我就死在这里!”

总候诊室就我两人。我作了承诺。她欲言又止,泪洒滂沱。好容易才哽哽咽咽说:

“我害了肺结核,1949年7月发现的,病灶在左肺……”

我大为惊讶,并不为突然听到她承认早患T·B,凭我的卫生常识,早已注意到她有肺结核体征。令我惊讶的是:那位朱小姐竟把邹兰芳的思想情感,把她自编自导自演的与吴宓构成婚姻的这场悲剧的主体思想和剧情发展,判断得这么准确。好厉害的朱小姐!

邹兰芳坦率承认:当她发现自己身患肺结核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开始进军大西南。她,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地主的小姐,一个惯常陪同两位将官哥哥与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诸大员谈宴应酬的小姐,当然懂得解放军进军西南之后会给她和她全家带来什

么。1949 盛夏,解放军攻占了宜昌,进攻四川的消息传遍山城,重庆的大官吏、大资本家地主们最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应变”。能往台湾、香港跑的急着尽快离开大陆;跑不了的,就百计谋求在新政权下的生存之道。邹兰芳的两个哥哥被他们的上级指令“留下来”,继续与人民为敌。邹兰芳虽未预见两个哥哥会被枪毙,却也料定他们前景不妙。她不禁问自己:我怎么办?天赐良缘,在重庆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见到了吴宓。这时,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大学的师生,不论你是什么政治观点,全都相信,共产党来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有资望的专家、学者、教授,将受到重视,优礼有加。那么,像吴宓这样的教授,岂不是一株可靠的遮荫树吗?她毫不犹豫,给吴宓写了第一封情书。……悲剧的进展,正如朱小姐所料。

“我,”邹兰芳渐趋冷静,不再哽咽了,“欺骗了吴雨僧,利用了他的正直善良,利用了他的同情心,来套着他,捕获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为我这个不值半文的女人,为我的侄儿侄女们,做牛做马,……我,是他的罪人!万幸而又万幸,你及时警告我:现在的政策,非配偶发生男女关系,要判刑的。我才紧急改了口。要不然,如果没有你,我会把吴雨僧送进劳改队,而我的——一切企图,目的,都会成为泡影。你是我的大恩人。……”

我打断她的话:“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要紧的是把握现在,争取将来。……”

“我有什么现在、将来?!我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我已没有什么挂念的,吴宓是道德夫子,我死了,他会忠实地抚养我的侄儿侄女们。邹家后代会昌盛的,我的心愿就全都了呐!现在,我只有一个最后希望:以我残存的生命力,给吴宓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报雨僧对我的大恩大德于万一,也略以减轻我欺骗他、利用他的罪

过于万一。……”

她又啜泣起来,说不下去了。

我扶回邹兰芳,吴宓曰上门,紧张地问我:“怎么样?什么病?”

我轻描淡写:“没什么,你又要做父亲了!”

我心里却很沉重:履行对邹兰芳的保证,就要欺骗吴宓。我该怎么办?我想不出好主意,去问李源澄。他立即表态:

“你这人,有时婆婆妈妈的,此乃少读史书而沉溺于文学作品之故也!就是要全盘告诉吴雨僧。免得他坐在鼓里,围着病人乱转。……要相信,吴雨僧是能正确对待的。”

他抽了几口旱烟,很无好气地说:“嘿嘿,我们这几个教授老爷——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岁的大老爷,竟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学生耍得这么溜溜转,猴孙儿演戏,溜溜转!真惭愧,真正惭愧!”

他默默地吸着烟,过了好久,却似颇有所悟:“哎呀,赶我们知道时,吴雨僧这档事已生得太绝了。我们做朋友的,我李源澄也罢,你张紫葛也罢,刘尊一也罢,黎涤玄也罢,哪怕我们都是诸葛亮,除了那办法,也别无妙计。……算了,莫再念这本烂经了。我们还要继续拉扯吴雨僧。这要多偏劳你,抓紧治疗邹兰芳的病,叫这位病西施加潇湘妃子病情稳定下来,人硬扎一点儿,免得吴老夫子衣不解带,侍奉汤药!……”

李源澄料得准确。吴宓得知邹兰芳的前述情况之后,一不惊诧,二不烦恼,竟是感慨说:

“哦!她——立意得远,用心良苦。我们竟然尽在鼓中矣!然亦不必恼恨也,倘以悲天悯人之心观之,则伊——情可悯!良可悯也!”

邹兰芳的病在家庭、学校都公开了。她是西师的助教,享受国家干部的公费医疗,正可抓紧治疗。她坦然就医,弄清了结核病灶

的确切情况。医院建议,她终止妊娠。她坚决不肯。医师只好对症下药,大量使用青、连霉素及其他抗痨药物。在这种情况下,她那腹中的胎儿自然难以正常孕育。结果是早产而十分孱弱。不几个月就夭折了。分娩后的邹兰芳病情更坏。拖了几个月也就生命终止了。

在她垂危回光返照时,泪水涟涟,对吴宓说:

“我害了你,累赘了你。没有半点报答。对你的大恩大德,来生图报!”

吴宓俯身温语:“……别这么说,你,半点不曾累赘我。你给了我机会,让我真正尽一尽丈夫的义务。我永远铭记你,感谢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侄儿侄女抚养成人……”

吴宓对我复述了这段对话之后说:

“我绝不是言不由衷来敷衍她。我确确实实抱定此种观点。我来到人世,是来尽义务,不是来接受他人服务的。……”又说:我虽然也结过婚,生过三个女儿,但是反躬自问,我没尽到做丈夫和父亲应尽的义务。“潜乎逝者不返,时不再来。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28

斯文同骨肉

邹兰芳病情公开了。她不再讳疾忌医,吴宓也心里有底,护持有个方向。可也有另一面:朋友们谁都害怕传染,不免来往之际有些戒备。而黄稚荃更是特别忌讳和邹兰芳接触。甚至在朋友中发议论,说邹隐瞒身患不治之症,与吴宓结婚,太不道德,“其人可鄙!”

黄稚荃也被调到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审查历史。她在重庆没有家,也别无亲戚。儿子黄怀昭就读于南开中学,过学校的集体生活。因此,每逢周末,黄稚荃大多回西师来,这里朋友很多,除了吴宓、李源澄和我,还有刘尊一、赖以庄和中文系的其他教授。

但自得知邹兰芳有肺结核病,黄稚荃就不在吴宓家里吃饭,亦不愿在吴宓家里多呆。即使在朋友家吃饭,如有邹兰芳,她就大声喳呼,叫人给邹拿公筷。甚至当众对吴宓说:“雨僧老兄:你该和她隔离,她这病是传染的!……”

邹兰芳自然很受刺激。以后她也就回避黄稚荃。

我也常于周末回西师看望母亲和大女儿笑星。黄稚荃与朋友们的聚会,我也多半在场。

大约是1953年的7月初,我同黄稚荃一道,经由西师校园主干大道往刘尊一家去吃午饭。迎面与F公相遇。我自然和他打招呼,F公态度和蔼,主动向黄稚荃点头,黄却视若无睹,迳自走了。F公有点不快,停下来和我说话:“你和她很熟?”

我答:“我们都在进修部,一块儿学习嘛!”

“你俩年纪谁大?”

“她大我几岁。”

接着,他问我,在那边教俄语,一星期上多少节课,教授们学俄语的效果如何等等。这当儿,黄稚荃却站在前面约50公尺处盯着这边,显然是在等我。F公注意到这状态,并且朝她那边瞄了几眼。

我和F公分手时,走向黄稚荃,她竟朗声埋怨我:“又没什么正事,站在马路上拉闲话!”

我没回答,到了刘尊一家也只字未提路上的事。

今天人很多,除了吴宓、李源澄、赖以庄和中文系的另一教授钟稚珺之外,还有教育系的罗容梓教授(注:罗容梓,清华毕业,外国教育史专家,1957年与从美国回来的西师教师董时光一起划为右派,被打为“董罗联盟”。董时光后来死于四川雷马屏劳改农场,罗容梓也于文革前在西师去世)。

除了我和吴宓,清一色的四川人,都是黄稚荃的老朋友,也都是蛮推重黄稚荃的。黄稚荃一时兴奋,叫:“今日群贤毕至,不可以无酒。”赖以庄也立即附和:说得是,李易安独自一人也要“东篱把酒”,何况我们是高朋满座,晤谈一室之内?

黄稚荃是那种闹酒而不能饮的人。喝了三几小杯,便醉眼朦胧,情趣陡增了。气温本来很高,再加酒力作用,她很觉炎热,便脱下了短袖白绸单坎肩。这是解放前名媛闺秀夏季常见的穿法:无

袖淡色旗袍之上套以短袖单绸白坎肩。今天大概是黄稚荃解放后第一次重穿旧装。觉热，又高兴了，就脱了下来。却又不知为何，又把坎肩披在肩上，像时下级别较高的干部将干部服披在肩上那样。然而，这单绸坎肩薄、紧、小、短，披在肩上，全无披上干部服上衣的风采，只罩了肩头。我小声问她：“要不要我给你把坎肩挂到衣架上去？”

她竟突然有点生气地说：“你这个老弟，这会儿这么献殷勤，刚才见了 F 公，就把老姐子撂在一边，和他絮絮叨叨，扯不完的空话。其实呢，阿谀逢迎……”

大家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叙述了刚才的情况。

李源澄：“稚荃，你又喝醉了吧？怎么讲起歪歪道理来？老张和 F 公不过相遇寒暄了几句，怎么就阿谀逢迎了呢？”

黄稚荃：“我头脑清楚得很，醉什么！”

吴宓：“稚荃，你真的没醉？”

“兄长，我何曾醉？才喝了指头大三杯！”

吴宓：“既然没醉，我就和你说句金石之言。”他说：像你刚才对 F 公这态度，很不好。你又不是小孩子，中年教授呐！哪能这样不讲礼貌？你进修完了，还得回西师任教的呀，太任性了！

黄：“兄长，我不能接受你这教诲！别人不知道你该知道。去年，那个晚上，在老李家里，你，我，老张，一起恭听了 F 公如何诬蔑、诽谤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还该对他客客气气？回西师又怎么样？我吃共产党的饭，没吃他 F 公的饭，绝不向他卑躬屈膝……”

李源澄：“稚荃，不能这么过分。”他说：那晚，F 公的话是不大妥当，不过他并不知道你们在里室，算是背后议论。哪个背后无人说？背后议论，哪能这么当真？“他不一样议论了吴雨僧吗？那话

也不轻呀!”

黄：“他说了吴雨僧什么？最重的话不过是‘顽石点头’，虽是顽石，毕竟点了头，贬中有褒。而对我，你想想，他是怎么栽诬的？……”

在座的人，除了我们四个，谁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刘尊一耐不住低声问我：“他栽诬了她些啥子？”

我说：“也没什么，不过是些一般不敬之词而已。”

我俩声音都很低，但黄稚荃耳朵很好，全听见了。接上：“你说什么？那样恶毒的栽诬，还说是一般的不敬之词？”

我说：“依你看，我该怎么说呢？”

“怎么说？照直奉告。这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有什么不能直说的？……”

她自己对大家说了那晚的事，并把F公指摘她的内容，一字不遗地复述了一遍。

赖、钟、罗、刘参差插言，说F公太不应该。

我说：我建议说个别的。莫扯这档子事情。“这些脏话不能当真的。当真了，俗话说的：越搅越臭。”

谁知这竟惹得黄稚荃大怒：“老张，你说个啥子？越搅越臭？我本来就臭吗？本来就臭，才越搅越臭！……”

我忙辩解：我哪能有这个意思？“我们相识十几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

刘尊一附了一句：“对的，老张对你是很好的。”

“好？好得很哩！”黄稚荃对着我喳呼：“那夜在桥上，我那么伤心，他半句也不劝我，漠不关心！……”

大家全掉进了闷葫芦，全不知道说的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凉了一阵，吴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表示不敢说，怕她又生气。

吴宓：“她自己都说了个头儿，你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便把那晚黄稚荃听了F公说的话后，在石桥边哽咽痛哭的事说了一遍。李源澄马上说：“啊唷，搞了半天，老张完全正确嘛！那么深更半夜，你哭他劝，越劝越哭，唧唧啾啾，呜呜咽咽，会惊动人的。叫巡夜的居民治安委员会发现，说你们个七长八短，你们怎么辩？辩得清？说不定扯到派出所，看你怎么么台（四川方言：了结之意）！”

众人纷纷附和，把老李的话分段析言，举例发挥。待大家争先恐后说了一阵，吴宓才郑重言之：“稚荃哪，你这人，就是感情太丰沛了。怎么能半夜三更在河边哭呢？再忍耐一会儿，回到房里，关上门，尽可以哭个通宵。”他说：汉光武打天下时，先在更始麾下，他哥哥叫更始杀了，光武谈笑自若，就寝后才挥泪哀悼，枕巾皆湿！……“紫葛做得对。照你这性格，他要是不搂住你，你会跳河自杀的。还有一桩，紫葛真君子也。他从来没透露这件事。快一年了，他对我都只字未提！”

刘尊一：“幸亏老张。我有经验，人真伤心痛哭，劝不得的，越劝越伤心。最好的办法是让她哭够，尽情哭……”

话犹未了，黄稚荃站了起来：“是，是！你们都对！就我不对！该叫F公那么骂我，栽诬我，唾面自干，恬不知耻！”她回身冲出房门走了。

谁也没想到她会这样。一个个木了。好一阵，吴宓才对我说：在座诸友，唯你少壮。偏劳你，快去把她找回来。“她是妇女，又比你年长几岁，别和她认真！”

我迟疑了一下，徐步出门，东两张望，概不见她人影。返身进房，告知如此。吴宓急忙起身摸手杖：“总到哪个朋友家里去了。我去挨家挨户找。”

哪能叫他去找？我赶紧动步，一路急行，跑遍了西师几处她可能去的地方，并无所获。正准备赶到汽车站去找，才有人告诉我，她巧遇便车，已经回磁器口了。

听到这个消息，六个人反应不一。有的叹息，有的笑，惟有吴宓一言不发。

刘尊一拎起黄稚荃的旅行包：“你们看，她房门上的钥匙还在这里面哩！回去，她进不了门的！”

罗容梓微笑：“不愧是诗人，即兴作诗，口占一绝。生活上也即兴随意，别出心裁！”

赖以庄却说，是他的不是，他大不该附和她，叫喊吃酒。“她硬是吃醉了！”

李源澄缓缓摇头：“她这人就有这毛病，感情主宰理智，而喜怒哀乐又无定则，往往出人意外，突发，突然发作！”他说：都是中年人，好端端浑闹一气，算个什么呢？

刘尊一：“我看呢，发点酒疯，问题不大，反正我们都是她的老朋友。可她对F公太出人情之常，还怪老张那夜没劝她，更是不近情理。”

吴宓说话了：你们都说得对。稚荃今天简直发神经，可恼！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其可取：一者，足见她童心犹存；二者，凡喜怒哀乐兴而即发之人，皆表里如一，绝无城府，可贵可交之义士也；三者，此亦足见，她把我们当手足弟兄，确有斯文骨肉之真忱。然而尤有要者：她命运多舛，早年居孀，前几年又深受失业之苦，目前还在争取使用之际。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这些朋友寄以深切之同情。何况她是妇女。我一向主张特别尊重妇女，爱护妇女。这，不单纯是效法西方之良好风俗，更有一根本原因——人，无分东西，地，不论南北，都有母亲。……“我请大家原谅她，理解她。”

大家告辞了。我陪吴宓回去。到了他家,他让我坐下,他要和我讲件“重要事情”。

“黄稚荃,比我小二十岁,比你大好几岁。斯文同骨肉,她就是我的妹妹,你的姐姐。我们一向也是这样待她的。”他说:你们刚才都评价得很对,她就是这么个人。在我们看来,她热情、善良、纯洁,很可爱,值得同情。可是,像她这模样,在进修部那个环境,——我估计,那里的人谁都心里有数,在接受审查,审查历史,争取表现,展开批评必然个个赛过那位丁女生。而稚荃,从批判《武训传》到思想改造,全没经历过,既不善于臭骂自己,更不习惯他人的尖锐批评。看来,从批《武训传》到思想改造,这些运动还是很有好处。……“黄稚荃到进修部那样一个尖锐的环境中,我很担心!担心她心理失去平衡。想来想去,惟有拜托于你。你务必加倍关心,算是我的拜托!你明白吗?”

我诚恳表示:理解他的话,珍重他的托付,一定尽心尽力关心她。

我心里却有旁白:老夫子简直有点杞人忧天。

然而万没想到,不多时,吴宓担忧的情况竟出现了。

进修部有一位教会培育成大学教师的先生,急于“进步”,左而又左,展开批评与监督,尖锐再尖锐。在一次例行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对黄稚荃猛烈批评,所用词句,大概稍有女性尊严的人,都接受不了。而他所举的“事实”,连捕风捉影都谈不到。

黄稚荃脸、耳,直到脖子,由红转紫,由紫转青,突然,她起立望了小组长一眼,就迈出了学习室,状似入厕。小组长叫那位先生稍停,等她回来再说。我却想起了吴宓的叮嘱,随即出去,追了上去,但见她急行了50来公尺,就朝宿舍方向狂奔。没跑百来公尺,便猝然栽倒休克了。我飞扑过去,把她托回寝室,急捏人中穴,她苏

醒了,却像发了疯,朝房柱、床架、桌子上乱碰乱撞:

“莫拉我!我死!我不活了!生不如死!”

我且拉且劝,她仍狂躁奔、碰。终于我急中生智,想到她的儿子。

“你死了,昭昭怎么办?”

昭昭是她的独生儿子黄怀昭。此时正在南开中学高中读书。她最爱自己的儿子,把他看作自己的未来和此生最高价值之所在。

这一下果然生效。她渐渐平静下来了。可是,她忽然惊叫呻吟,说是腹痛如割。——她爆发了崩症,来势凶猛,流血如注。不一刻,她就面色惨白,呼吸急促,脉搏每分钟超过了一百次。我慌了,飞奔报告领导。领导高度重视,立命医务室医生、护士将她送进医院。

我和另一位进修教授(和我同在俄语辅导组的汤钟琰)则协助抬、托病人。急诊住院,医生快速抢救。急需输血,我和汤钟琰各献血若干毫升(我比汤先生多输一百五十毫升,达到了个人献血的一次最高量)。(汤钟琰,安徽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精通英语、俄语,终身从事外语教学。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青海劳改多年。拨乱反正后,任青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1984年到河北师范学院任教。)

输血之后,黄稚荃脱离了危险。

汤钟琰回去了,我则留下来护理病人。这才电话李源澄,叫她将黄稚荃住院的事告诉吴宓。第二天,吴宓和刘尊一来医院探望黄稚荃。我避开黄,将她发病、住院的情况告诉了吴宓。他首先称赞我做对,对汤钟琰的见义勇为恳表敬意,随后却埋怨我没有立即告诉他。

他说:“我虽然不能为她做点什么,但可以告诉朋友们,轮流来

看看她,使她知道人间尚有温暖。……”

他又问我,为什么不通知黄稚荃的儿子。我答:孩子正在读书,照顾病人的能力不会比我强。耽误孩子的功课,并叫孩子操心,增加他心理上的负担。再说,误了孩子的功课,就会掉队,再也跟不上原班,对孩子前途影响太大了。

吴宓点点头:“你做得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之谓也。”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好好护理黄稚荃。“务必把她当作你自己的亲姐姐。——而且,必须多多陪她聊天,用各种方法多方譬解,消除意外刺激对她心理影响。我回头告诉朋友们,都装不知道那位先生‘提意见’对她的栽诬。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不得不如此。”

其后,李源澄、赖以庄、黎涤玄等都轮流来看了她。不久,黄稚荃逐渐痊愈了。

黄稚荃出院后,身体仍显虚弱,精神尤其忧郁。吴宓差不多每星期都要约了刘尊一来看她。而每星期见到我,必然再三叮咛,要我多多关心她。尤其要在精神上多多安慰她,鼓励她。

他那种深深关怀朋友、同情受损害者的感情,令我极为感动,同时我与黄稚荃本来是朋友,我也十分同情她。所以我总是刻刻在念,极力按吴宓的叮咛,尽力而为。恰巧我被分配住在黄稚荃的对门房间里,我确实尽心尽力,可以说做到了无微不至。我给她打开水、扫地、擦门窗,找来《青春之歌》、《新儿女英雄传》以及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的著作让她看,和她谈天,品评文学作品,引谈太史公书,借以扩大她的胸襟,平衡她的情绪。这些帮助似很一般,但在进修部那样一个环境里,却很不容易。

原因是:来此进修的教授们大多数是一个目的,两个认识,三

个行为准则。

一个目的：争取尽早获得良好的“政治鉴定”，回到教学岗位，努力工作。

两个认识：一是认识进修的实质是审查历史，改造思想。这得由组织来调查核对，自己只能配合：补充交代历史情节。二是认识“重在表现”，要尽一切努力，争取给上面一个“表现良好”的印象。

从而形成了三个行为准则：一是对“旧我”大加挞伐，彻底批判：从自己的祖宗三代起，深挖深批，哪怕只做过教员，也是为“蒋匪帮”政权效尽犬马之劳，继而深挖资产阶级思想，上纲上线，骂深骂透。二是对今日之我极力美化，尽可能之努力，表现此时此刻之新我，确已真心实意，坚贞不贰站到了人民立场，一心一意信仰马列主义，觉悟之高，信仰之坚，堪称党外布尔什维克。第三个行为准则（这是重点）：拍苍蝇捕老鼠，事无巨细，奋勇竭力，表现积极；最最要紧面见效端的，莫过于展开“批评”，用高倍显微镜看别的进修教师，尤其是同组的人；抓住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节，开会发言中的细微词误，断章取义，铁面无私，开展批评。在这个环境中，我照顾黄稚荃，就有被诬陷为“搞反革命小集团”的危险。……

如此这般，虽非领导布置，却弄得人人自危。处此种特殊人际环境，我照顾黄稚荃，自然困难很大。

吴宓筹之再三，给我定了两个方略：一曰：“必也正乎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二曰“寓亲于疏”。具体做法：向领导反映情况，汇报黄稚荃出院后体质甚差，生活自理有困难；“我”愿遵循毛主席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的教导，对同志满腔热忱，帮助她克服困难，打开水，必要时代取饭菜等等；在领导布置大搞清洁卫生时，“我”就自告奋勇：一花独香，不如群芳共艳。我年纪较轻，精力旺盛，愿包干老、弱同志的室内外清洁，以争取集体“清洁”的好成

绩。——如此二法，以化私助为公益。

我依计而行，果然得到领导嘉许，说这是我集体观念加强，乃学习马列著作有收获的具体表现。我于是堂而皇之，包干了80多岁的龙老夫子（原成都财经学院教授，名字我已忘记），年近80的金政老先生与重病出院之黄稚荃等三人的生活照顾及帮做清洁。帮他们早晚打开水，打扫寝室内外，擦洗门窗、床、桌、几、凳。有时还帮他们从食堂买回饭菜以及上街购买生活用品。星期天我尽量挤出时间，陪黄稚荃回西师各朋友家作客。黄稚荃深为感动，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都很快好转了。吴宓颇为高兴，几次赞道：

“你能如此，吾道不孤也。我之所以如此关心者，不仅是有裨益于个别朋友，而在于中华古道得于我辈中身体而力行之。”

但另一方面，吴宓仍观察到，黄稚荃不免抑郁于怀。并且认为，主要原因仍是她年富力强，“锥处囊中”。他便屡次与赖以庄、李源澄等朋友商量，想由他们向有关领导揄扬推荐，谋求调黄稚荃为重庆市文史馆馆员。谁知黄稚荃知道后，却泫然泪下，说：

“我才40岁，何至于就进文史馆那个古董箱？”

李源澄颇为不快，说黄稚荃过于自高自大。吴宓却说：“非也！此非自高自大。须知稚荃正属壮年，求展才华以造福人群，理所当然，亦旨趣之高也。我们做朋友的，应该嘉其情而励其志，奈何斥为自高自大？”

李说：我看稚荃是个面子问题，总觉得学习进修，大伤体面。她希望最好马上走上讲台，或者，先有个政治安排，究其实际，是虚荣心！

吴宓却认为此论有失厚道。“稚荃一想上课，二想当政协委员，我是看出来了的。”又问我看出来没有。我点了点头。

吴宓继续说：这两者都说不上虚荣心。想上课，是职业感情；

想当政协委员,是政治荣誉感。“只有我这老迈之辈,才没有这种荣誉感。哎,如何生个办法,将我这政协委员让给稚荃就好了!”

李源澄却笑他“一片婆心,令人起敬,而其异想天开竟如童子!”

吴宓却在心里不断琢磨此事,并在国庆前见之行动。

1953年国庆前夕,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宴请省级以上统战对象。吴宓、刘尊一、李源澄都应邀在座。程子健特别与吴宓叙话,问及工作、生活及学院情况。谈着谈着,吴宓恳切表示:政协委员名额有限,而须作政治安排之统战对象很多,他年老无能,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建议让贤,请把他这个省政协委员的名额腾出来安排另外的人。

程子健直接了当问他,还有哪些人须作政治安排。吴宓也就直接了当回答:有个黄稚荃,如此如此,年富力强,值得安排。

程子健先后问了刘尊一、李源澄及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黄稚荃这人是怎么个情况。

刘尊一背了黄稚荃的家庭出身、年龄、健康状况、学历、简历。

李源澄答:她是四川有名的女才子,工诗,擅词,会画,尤善书法。教学经验也较丰富。

夏仲实说:她虽不属国民党上层,但与民革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很多负责人过去交情较深,政治观点也很一致。解放后,她却不大与这些朋友来往。大概是“清高思想比较严重”。

程子健再问刘尊一:黄稚荃的社会影响如何。

刘尊一答:她在四川公立大学任教授十来年,学生分处各地;她又有“女才子”之名,当然社会影响很大。

程子健乃向吴宓表示:他能推荐黄稚荃,关心统战工作,很好。即此一端,已足说明,吴宓这个省政协委员大为重要,请他万万不

要辞让。

但是,一月复一月,并不见安排黄稚荃。吴宓闷在心里,暗自着急。足足过了一年多,突见报上发表:重庆市政协新增黄稚荃为特邀委员。

吴宓在国庆招待宴会上与程子健的谈话,他未向任何人泄露,对我也只字未提。可是李源澄、刘尊一却当即分别告诉了我。等到黄稚荃当了重庆市政协委员,吴宓很是高兴,对我说:

“这下好了!稚荃总算有了个政治安排。你应乘此时机,多鼓励她,相信不多时,她就会走上大学讲坛,展其才学。”

我说:她的安排,全得力于你。我原以为你那样向程子健谈,未免不妥。不想竟然奏效。

他惊问我何得而知。我据实以告。他始而埋怨李、刘“多嘴”,继而又说:“我是说了这话。不过,稚荃之获得安排,不见得是我推荐之功。她在四川朋友很多,各民主党派都可能推荐的……”

再不久,黄稚荃调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后改重庆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吴宓额手称庆:“善哉,斯人不樵悴矣!但愿她能诲人不倦,成其正果。”

我问他“正果”为何。他答:很难一言以概之,她,亦即我辈,但能传一技之长给青年,授点滴知识与后生,能让自己的言行,将我中华之传统道德传之于莘莘学子,为中华文化之发展尽其微末之力,便是成了正果。

29

谈《天仙配》

1953年元旦,西师在北碚新址庆祝新年。迁址后,学院领导也大大加强了,原来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行署调剂来的大批干部充实了各级领导。到1954年,全院不再只有一个支部,而是院党委下辖若干总支,再辖更多的支部。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清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原西师学院院长谢立惠任副院长,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王逐萍调来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原川东行署文教厅长姚大非任副院长,王公任教务长。

自英语专业停办后,吴宓调历史系教外国史;数年后又到中文系教外国文学。

这期间,1954年,在重庆创办西南政法学院,这是建国后建立的第一所法律高等学校。自然要学习苏联,引进苏联教材及各种法律参考资料。领导便要调我到这个西南政法学院去作教授,负责引进苏联教材。

吴宓惊诧:这不是个好事!你千万别去。道理很简单,政法学院是专政机关的最高学府,党校性质。“你是何等样人?到那里去作教授,太不门当户对了。……”

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并已向领导恳切表示:感谢党的高度信任,但我政治条件差,到政法高等学府,实在自惭形秽,极不称职。

领导大不以为然,批评我自外于人民。“这实际是党信任你,你却不信任党。我们把你当作党外布尔什维克,你却不愿意把立足点挪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像话吗?你说一遍,我们当你谦逊;再说一遍,就是坚持错误立场了……”

我把这个情况说了。吴宓紧锁双眉,说:此盖天意,不可违也。“好吧,我们内室品茗,算是我给你饯行。”

此时,邹兰芳去世不久,吴宓乃按古礼,立了邹兰芳的亡灵牌位,供于客厅上方。李源澄告诫他:你在客厅上方墙上悬挂毛主席肖像,而其下设亡妻灵位,岂非褻渎伟大领袖?

他猛省道:我真昏了,如此行径,倘被发现,岂非大逆不道!当即将邹的灵位搬进了卧室。此刻,他在隔灵位不远处摆上茶几,罗列中式糕点。待茶泡好,他先举杯奠于邹兰芳灵前,祝曰:

“兰,来格来亨——!今紫葛手足奉调政校,我为他饯行,愿你冥中有灵,保他此去诸事顺利,不受意外之顿挫,不遭非常之凌辱!吁!尚飨!”

祝罢,三揖。这才转身和我对坐,茶点相让。

稍候,他庄重开言:“齐大非偶,古有明训。此所以我力主你切勿奉调政法学院。今既回避不能,我只好郑重叮嘱三事。”他说:一曰戒之在得,切切不可有得失心理。立定主意,效劳争先,名利谨让。最好一报到就恳切谦辞:不敢当教授之任,请以译员相待足矣。二曰尚德惟谦。风闻此校生徒亦系共产党员、各级领导,自属革命之重要干部,卓有汗马功劳。汝应随时随地谦谦自处,鞠躬如也,徇徇如也,勿忘汝系前朝遗民,所谓资产阶级之知识分子,切切不可才华自恃,偶露楚狂之态。否则,必然贾祸!三曰兢兢业业,

惟敬惟忌。须知汝之工作,每一译句,每一言词,皆属政治、法律,务宜反复推敲,权衡斟酌,但图报效。

我表示一定谨遵兄长教诲。

1954年9月,电影《天仙配》(由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主演)上映,场场爆满。我去看吴宓,历史系和中文系几个男女学生正围着他,要他评《天仙配》。我也就坐下来听他谈。下面是所记得的吴宓当年关于《天仙配》的评论:

《天仙配》的主题是自古存在的社会现象。粗浅观之,《天仙配》的主题是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亦即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不用说,仅此一观,《天仙配》之主题决非一般电影所可比拟。

然而深入观之:《天仙配》所表现的,绝不仅仅限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与反封建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逻辑学的问题:用欧拉图表示,反封建包括争取婚姻自由,质言之,争取婚姻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方面。

我要说的是:《天仙配》涉及的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人权、价值与生存道路等等。

遍查中外历史,人类自进入男性中心社会之后,就不曾给妇女以基本人权,不去承认她们对人类、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直到现在,即使在侈谈男女平等的欧美各国,仍然如此。

人类迄今的五千年文明史,对于占人类二分之一的雌性极不公平,基本剥夺了她们的权利,不承认她们的社会价值,甚至不容许她们有自己的姓氏;使她们完全附属于男性。中国传统的伦理法则甚至明确规定:妇女必须三从——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宣告她们彻彻底底终身依附男性。然而社会却赋予女性以重大的责任和义务:她们要孕育、哺乳、襁褓、抚育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有些国家、民族、地区,还要求妇女在完成家务之外,

与男子并肩从事生产劳动。此外,她们还必须是男性的玩物:楚汉以降,流行细腰为美,以致强迫妇女们节饮食以求细腰,至有饿毙者。封建时代还迫使女性缠成小足,使其不良于行,以求摇摇晃晃,袅袅婷婷,增动态之美。男人有权三妻四妾,女人则要从一而终。如此等等,人类社会就以夫权为天经地义,男尊女卑极不公平、极不合理地得以绵延。

男性握有血腥镇压之武力,及蛮横钳制之伦理准则。中外各种朝廷都有各种各样无理压迫妇女之法律与不可数计之惩治妇女之条例。

不仅如此,妇女还要为男子受过,承担男子胡作非为致使生灵涂炭、乃至城陷国亡的罪责。桀无道亡国,史家评为祸由喜妹;商纣倒行逆施,罪由妲己;周幽王失国乃褒姒狐媚。赵飞燕婉转承欢以取悦汉成帝,本属色相事人,求作玩物以自存,而披香阁学士则恶毒咒骂曰:“灭火德(汉朝尚火德,火德象征汉朝政权)者必此祸水也。”……

这样一个置人类半数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比同奴隶、牛马的社会,何等违背公理,违背正义!天地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为重大、更可咒诅之事端吗?因此,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对这种现象的呐喊与嗟叹。有关女性之故事、传奇、小说,就是这种呐喊、嗟叹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关于文王母、孔母、孟母等等母德的历史故事,吕雉、武则天、慈禧,以及赵威后等太后的弄权,是这种呐喊的特殊表现。写妇女,大半取其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故事、传奇、小说、戏剧,这在世界各国都有,我们中国更是丰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仙女下凡,凡人遇仙女。《聊斋志异》及一些笔记、野史、神异小说,多有男性与具有女性美丽、善良品格的狐仙、妖精,相恋成婚的故事。……

而其精要在于：其恋爱、自主婚姻，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仙与仙，狐与狐，可爱的妖精与可爱的妖精之间，而是发生于人与仙、人与妖之间。总而言之，突破了品类——人类的境界，冲出了这个不公正、反正义的人类社会，引入了另一个世界的异性，搭配、缔造了崭新的、平等的两性结合。因而，这些故事、传奇，绝对不能简单视之为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是人类两性结构、关系状态的特殊构想，试验模式。

刘、阮上天台的故事，最足以说明这一论断。刘、阮两个人间凡夫平民，在天台山深处遇见了两个仙女，在两仙女的主动与支配下，结为两对爱侣，在“山中”仙府里至爱至敬地生活。这里，仙女是洞房的主人，家庭的主宰，却以平等待人间来的郎君。绝无人间男人(丈夫)对女人(妻子)的种种不公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两个仙、人结合的家庭，正是故事创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描绘。也就是创作者的主张：打破现存人类社会男女两性的结构状态，缔造一个两性完全平等、拥有同样人权的新社会。

根据古籍所载，类似仙女下凡的故事，春秋时即已出现。甚至可以说，有关女娲的故事就具有勾通仙、凡两个世界、推崇女性的思维。何以炼石补天的是女娲而不是男媧、总是仙女下凡而不见仙男下凡？就是要赋予女性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全权。这玄妙之门岂不是洞然可见吗？为女性增添仙气魔力，以平衡男女均势，构成理想的两性社会，这种倾向，在中外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

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少不了涉及美人。但，“美人”一词，各有所指。苏轼“望美人兮天一方”的“美人”，是政治性的象征词，人们解说不一，有的说指皇上，也有谓指朝廷，总之不是巧笑倩兮之“美人”。拜伦《哀希腊诗》中的“注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回”（本

书作者注：引文用的是胡适的译文），指的是印度的一般美人。真正的特殊美人，具有独能传之久远的莫大魅力。中国历史上美人特多，西施，赵飞燕，杨玉环等等，欧美也有他们自己的美人，海伦乃其出类拔萃者也。歌德的《浮士德》偏要引出海伦，其故安在？她是女性之魂，以她一人之魅力，足使君王如狼，武士如蚁，伏尸万千，流血成渠。这是女性支配整个社会的特殊表现，一种特殊形式的女性中心。在《浮士德》里，浮士德与魔鬼订契约，曲折迭荡，抒写正邪之争，烘托人性与良知良能，却推出海伦，让这个历史上的美人再现，升起新的光环。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戏剧性、浪漫性，而且突出了或者说暗示了女性应该左右人类社会的正义主张和理想。

《红楼梦》拥有中外各国大量红学专家，其研究、创见多矣。却有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为什么《红楼梦》作者专注于写女性。何以有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各十二人，而无金陵十二士？何以荣、宁两府炙手可热的总管主子是个女的，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辣子？尤其是，两府的最高权威——老祖宗，也是个女的，难道这都是偶合？绝对不是。综观《红楼梦》全书，完全可以肯定，作品全面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反对对女性荒谬不仁、无理悖义的男性中心。而主张女性能在两性构成的整个社会，有权支配她应该支配的一切，又能合情合理对待伦理秩序。作者唯恐读者“谁解其中味”，特别在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了暗示。警幻仙姑的谈话，警幻仙境的种种书卷画册、对联、扁额都有这种暗示。书中还让两府最高权力宝座上的男人全都死了——退了位，只留下一个女性贾母。当权少壮的一辈又是玉字派，玉，自来是女性的命名专用词，也常常用以形容女性如玉容，玉体，玉貌，香消玉陨……。凤姐又称“琏二奶奶”，特别耐人寻味。琏，连玉也，琏二，

以玉——女性居首联合男女二性,以为社会之总体。……这些还嫌不够,干脆再让宝玉男性女名,并在口头上频繁宣称:女性圣洁而男性污秽,情词恳恳地推崇女性,作贱男性。有人把这些特点生拉活扯解释为象征汉、满民族之争云云,我坚决反对这种连捕风捉影都够不上的妄断。

仙女下凡,是刘阮上天台的再度提高。传说:天上的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有九个女儿,九个仙女,概以次序命名。邵祖平作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在1922年写过一篇考证九位仙女的文章,相当长。要我在《学衡》上发表。我因稿子太挤,就没采用。……据他调查和研究,早在西汉时期,东方朔的《十洲记》以及《淮南子》就有类似仙女下凡的记载。而在汉张霸伪作的百篇《尚书》中的《尧典》,关于叔仲、叔和的记载部分说到了织女下凡与牧牛少年恋爱、结婚,复上天为织女、牵牛二星的事。

南北朝时代的北朝学者封述的遗稿中,提到玉皇大帝有九个女儿,一至九仙女。唐朝的佛门著名学者释神清(神清和尚)的杂记里说到了五仙女、六仙女,先后下凡自择佳婿。以后,从唐代贞观以降,各地先后出现了七仙女、八仙女、九仙女下凡恋爱的故事传奇。有些地方则称仙女为仙姑、“七仙姑”等等。元朝开始有(应该说,现在可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资料是元朝的)织女恋牛郎、五仙女、七仙女(仙姑)下凡的戏剧。邵祖平论断,实际应该更早,因为唐诗即有牵牛织女星的诗句。

未见到关于玉皇大帝居长的四位女儿下凡的故事。这就是说:我们所看之电影《天仙配》是个古老的题材,前人以此题材创作过很多戏曲等等。不过,以余之印象,前此作品中,仙女都是直接了当选择好对象,坦率表白爱情,两相情愿便成了眷属。比较前代作品,这个电影《天仙配》有几个特点:

1、对象董永深受阶级压迫，卖身葬父；而买他的主人，是个十分贪婪恶劣的老财，给董永提出了许多奇苛条件，以致仙女的众姊妹连夜下凡为之赶织锦绣。

2、董永好歹不愿，再三再四拒绝仙女的爱情，他简直是被迫成亲。

3、董永非常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抱定无媒无证万万不可。是个真正的封建卫道士。直至土地主婚，槐树为媒，他才勉强应允。

4、这场婚姻的终结是：玉帝大怒，屡派神兵天将，雷霆万钧，追捕七仙女。仙女屈服了，撇下董永，哭哭啼啼，回天上去了。——还是封建婚姻制度胜利了。

5、董永本来是不愿意接受仙女的爱情，坚持有媒有证，最终屈服，婚姻破灭。全剧应该看作有力地维护了封建婚姻制度。

不过，我还是认为，《天仙配》拍得很好。这还不包括黄梅戏独特美妙之唱腔。还有，此片中的董永之歌喉，实属无与伦比。其音色音态，独特苍凉，益以黄梅剧之唱腔，实能尽善尽美的表现此一角色之特点。诚能绕梁三日，沁人肺腑，百听不厌。……

30

规劝杜钢百

1956年1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栏广播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坦率、热情地阐述了知识分子政策。他郑重宣布,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动员所有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知识,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明确肯定:我们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热心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宝中之宝。恳切表示:党和政府热烈欢迎所有的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要尽一切努力,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号召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关心知识分子,尽一切努力为知识分子提供优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老老少少像越冬的小鸟迎接春光那样,从心底欢呼周恩来的讲话,欢呼党的恩德。各级党政领导人闻风而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安排工作,分给住房,配发家具,……。各方各面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重庆市粮食公司宣布,给高级知识分子月增供植物油一斤;公交公司宣布,高级知识分子乘车不排轮子,优先上车;卫生局也有新措施:高级知识分

子门诊,不排队挂号,随到随诊,优先住院……。各大学更是想方设法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我所在的西南政法学院吸收了教授到小灶食堂与院长、党委书记一起就餐。这种小灶实际是半供给制,享有相当比例的公费补贴。西南师范学院则办了规模颇大的享受公费补贴的食堂,吸收教授、讲师、助教搭伙。各大学还纷纷出台借阅图书优待办法:电话借书——教师给图书馆打个电话,图书馆即送书到位;给教授备了专门的资料员作助手。……

霉够了的知识分子顿然喜气洋洋,朝气蓬勃,夙兴夜寐,誓以百倍努力,最快最好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却也有些插曲。

四川外语学院的樊德芬教授深闭房门,在毛泽东像前排上供桌,焚香再拜,反复祝祷:

“毛泽东,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古有生祠之设,我今作生祠之奠。……今幸你天纵英明,开旷世皇恩,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你熟读经史,了解糜乱治平之道,……你应该相信,我中华之知识分子,自来爱国爱民,……凡属留在大陆之人,无不衷心拥护中共执政。……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从此以安人宁国为先,万勿庸人自扰,再置知识分子于水深火热之煎熬。……”

已调四川外语学院的柴有恒教授,与夫人面对毛泽东肖像,感激万千,跪地痛哭……

西南师范学院的杜钢百教授,则婉言谢绝一切照顾。各级干部前往劝说无效,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永清特专拜访,问杜教授有何思想障碍?杜钢百才说:

“院长,……落实我杜某的政策,简单得很,只须党的领导人,在像三反运动那样规模的大会上,宣布一声:我杜钢百不是‘一块臭肉’!……”

张永清心中颇为不快。不多日,市委文教部长陈孟汀下来检

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张永清告诉他,杜钢百如此这般。

陈孟汀原任西南文教部高教处长,执掌西南各高等学校,1954年被打为“分散主义分子”,报上公开批判后被下放农村做小学教师。这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作为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得豁免前咎,起用为市委文教部长。因而他既了解知识分子,又有顾惜之心,便亲自去拜访。杜钢百视陈孟汀为知己,便一吐为快,发泄了一通。陈孟汀觉得杜钢百的思想倾向太危险,就拜访吴宓,如实说了自己的看法,恳托吴宓劝劝杜钢百,务使老杜郁气得平,庶免继续出言无状,自讨没趣。

吴宓觉得,杜钢百确实悖谬,除了自贾大祸,别无任何意义。当今之势,不仅斯文同骨肉,而且斯文同祸福。设或老杜长此抵触,必将成为典型,进而引起当局以一概百,视天下之知识分子皆杜钢百也,势必震怒,则普天之知识分子皆将共受祸殃。——此事兹大,不可不全力矫正之。

他把杜钢百请到家里,促膝相劝:

“……你此举,实为悖谬,宓不禁万分惊诧。……”

杜钢百凄然对答:

“……弟亦察知悖俗乖舛,然心中愤愤,情不自己。当年三反运动大会上,董学隆一再骂我是一块臭肉,想必夫子也记忆犹新。我始终耿耿于怀:自古上可杀而不可辱。我何罪过,受此奇辱。每念及此,痛不欲生。现在又来倚张为幻(见《尚书·无逸》,意为“演把戏”、“欺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乃有意一吐为快耳!”

吴宓:“恕我剖切言之。你此举,岂止悖谬而已哉!实为糊涂昏庸,不知死活。”他说:快个什么?!贻误子孙而害天下斯文,犯言贾祸,殃及万千。……

“何至于此?”杜钢百霎了霎眼。

“迂哉!枉为经学大师之弟子,岂不知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怎样

挑起的？”吴宓说：不正是那个好事的周儒生狂言进谏，惹恼了秦始皇，龙颜大怒，随即下令坑杀咸阳所有儒生的吗？今天你正是在走那个周生的老路，立意激起坑儒惨祸。然而你要记取，今日一旦坑儒，则受祸者远远不止三五百人，而是三五十万乃至百万千万以上！你扪心自问，何忍于心？更不用说，一旦祸发，势必殃及子孙。——普天下斯文之子弟皆将入另册，受辱之深，磨难之甚，远胜于古代之收孥！……况且，你的要求，共产党已经办到了。……

杜钢百瞪目惊问：

“他们什么时候宣布过，说过，我杜钢百不是一块臭肉呢？从没说过！”

吴宓：

“……观周公恩来之长篇文告，情词恳恳。概其精要，仿占以譬，正似罪己之诏，曰：天下斯文，实乃民之精华，立国之宝；而比年以来，士子颇受冷遇，兼有弃置枉屈者。……方今百废正举，急需力矫斯弊。诏令天下州郡百官务须力补前失。即日起，补过救偏，礼遇斯文，崇而敬之。令下之日，闻风而动。”他说：这就是说，业已皇皇文告纠正前此不礼遇知识分子之言行，包括辱骂你为“一块臭肉”。复何耿耿之有？且夫本院最高领导亲自登门，温言慰藉，就是以实际表明，共产党没有把你当作一块臭肉。且当年之董学隆者，工作组之组长也。他骂你后不数日，即被当局召回，实亦明确表态，及时纠正。今张永清又登门礼贤，你还不释于怀，岂非过为已甚？……“你以经学名天下，何乃不辨是非，不谙礼仪进退如此？”又说：你台南钢百，百炼钢也；夫百炼之钢，宜达绕指之柔，而竟乃不识时务，翘悍如此，复何钢百之可言？……二十四史反复证明矣：天子一怒，大则伏尸万计，小则灭族灭乡。“你究竟是鬼迷心窍，把古人遗训忘得干干净净，还是存心要与天下斯文为难，务求致天下书生于肝脑涂地？……”

(注:本书作者于三十年后得知,董学隆从西师“三反”工作队调走之后,先任西南学联主席,后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平反后出任云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后因癌症去世。)

杜钢百终于慨然起立,拱手作揖:

“钢百泥古未化,冒大不讳而不自知,得夫子教诲,透晓利害,今后务请夫子耳提面命,匡我不逮!……”

他离开吴宓,迳到党委书记张永清面前:

“张院长,我来向您、向党委、向党,负荆请罪,检讨认错……”

张永清很满意,认为杜钢百的转变很大,这是党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收获,是院党委、包括他自己耐心落实政策,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使顽石点头的典型事例。为了保存这个典型,张永清长期对杜钢百顾恤有加,而杜钢百也一改故态,不仅绝不口出不逊之词,且在学习上不各自我批判,还隔一段时间亲自向党委执事或张永清本人“汇报思想”。

因而到1957年反右时,杜钢百这个不论怎么说都该当老右的角色,居然榜上无名,躲过了反右斗争这关。而上了“右派”榜的知识分子,很多上升成了“反革命”,锒铛入狱。真是毫厘之差,祸福迥异。杜钢百饮水思源,真心实意感激吴宓。

1958年,西南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或被押上警车,逮捕判刑;或背负简单行李,泣别妻儿家人,被投入劳教;或成群结队,到农村去接受监督改造。杜钢百百感交作,迳访吴宓跪拜叩首,垂泪曰:

“钢百能安然无恙,全赖夫子教诲!雨僧夫子,钢百永铭你的恩德!……”

31

上德维道

1956年的10月6日,本是金风瑟瑟,黄叶萧萧之季。而在火城重庆,则正是凉爽宜人、天朗气清之时。星期六,中午,我从西南政法学院到西南师范学院,看望母亲和大女儿。晚饭后,去看望吴宓,他很高兴,约我就在他那儿过夜,明天陪他清早进城,他要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总店买书。

我告诉他,星期天新华书店特别拥挤,不如星期一去。星期一我没有课,可以不回学院。从北碚到市中心区,路程相当遥远,我问他,是不是要西师给派一辆车?这时,各大学都有了自己的轿车房,轿车、卡车俱全。西南政法学院规模较小,只有两部轿车,西师和重庆大学则有轿车三、四部。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各大学都有多少不等的教授被学校定为可派用轿车的人员。吴宓和我们都获得了这种优待。所以我建议他要一部轿车进城。

他却说:“派轿车干嘛?我们是进城给自己买书,又不是开什么重要会议!即使去开会,我也不一个人坐一部轿车,太浪费。”

但这次是要去大城,长距离旅行。我担心他年纪大,不适应长途挤公共汽车,再三劝他考虑从需要出发,要求学校派个车子。

他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个人!我们贵为王侯了,不能坐公共

汽车了吗？先贤提倡安步当车，我们现在有公共汽车代步还不行？轿车与公共汽车进一趟城，所花汽油相差无几。公共汽车载乘客五、六十人，我们改乘专用轿车，不啻增耗汽油 25 倍。方今国初富而民尚贫，我们何故要讲这种排场，以耗费国家有限之财富呢？”

我忙解释：我在西南政法学院从未为个人需要请求派车。这次确实是考虑到路程远，你年纪大，才叫你派车。

“我有好老？才 62 岁。工农百姓像我这年纪的人谁不是坐公共汽车进城！”

一切照他的安排，明晚我来这儿过夜，后天星期一赶早乘公共汽车进城。

星期一，黎明。西师学院的起床广播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跳下床，迅速穿衣盥洗，却见吴宓已衣履整齐，在屋里踱着。

西南师范学院自从迁人这新校园，地域辽阔，摇铃、吹号无法号令。乃改用广播以覆盖全校。学校的各个区域，从学生宿舍桃园、李园、杏园……，到行政、教学、住宅各区——和平村、建设村、文化村……，各悬高音喇叭，齐敞歌喉。

“这是个什么乐曲？”吴宓问我。

“《骑兵进行曲》，人民解放军的《骑兵进行曲》。”

“善哉此曲！”他说：节奏鲜明，腾如跃如，令我有如亲见人民解放军骑兵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这是哪个作曲家作的？”

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他问是时乐濛，还是贺绿汀？我答：好像不是他们作的，现在新出名许多作曲家，一个强似一个，我记不得许多。

他又赞叹说：是啊，现在天下承平，人才倍出，后生可畏！多少奇才即将脱颖而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两句诗将被今日现实推翻啦！

因为是星期一的大清早，不少人回北碚度了周末，要赶早车进

城上班。车站乘客拥挤,买票窗口外的轮子排成了蜿蜒透迤的长龙。我们排在龙尾上,站了半个小时,前进了许多,后面又接上了一长串人,可我们仍望不见售票窗口。西师校园里的广播声随风飘来,清晰可闻:“现在是上午7点45分,预备上课了!”一连重复了两遍。音响清脆,有如碧波荡漾,悦耳沁心。

吴宓凝神倾听。对我说:我早年在欧美看了很多大学,象这种规模的很少,“我说的是气派!气派,泱泱大国之气派。好比古代世胄之家钟鸣鼎食!……”他说:现在缺的是教学之正规化,教师之专其职责,学术风气之兴起……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现在这样,稳步前进,蒸蒸日上……”

说话间,又传来西师广播:第一节课上课了。我们又前进了20来公尺。望见窗口了。但估计还得发三次车后,才会轮到我们。而那时不得早于8点半。我有点急了。前面有几个高级知识分子凭工作证插轮子优先买了票。我便对吴宓说:我们也去享受优待吧。

吴宓却认为不可:“此不得谓之当仁不让,我们不能以优待为理所当然。”他说:这么多工农老百姓都在排轮子,谁不急着赶时间?我们优先了就把他们压后了。不要说今日社会以工农为主体,就是古代,孟夫子也说过:民为贵。“我们何得自视高工农之民?”

结果,我们8点50分才上车。而且是这次车的第41、42名乘客。车上只空着标有“孕妇席”的两个座位了。我走向那里,吴宓却叫:“那是孕妇席!”

我赶紧收住脚步,转身扶他站在通道里,他一手拄杖,一手去攀吊杆。便有好几个中、青年乘客从座位上站起,说:“老同志,这边坐!”“这儿,请坐,请坐!”

捷足者扶吴宓坐进了前排座位。另有两个来拉我:“请坐!”

“谢谢,我不是老年人!”我推辞说,“我才30几岁。”

人们却坚持要让我坐:“不,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党的号召,有规定的,优待你们!不能叫你站着。”“刚才买票排轮子,我在前面听你们说的,你两个是高级知识分子!”

人们不由分说,把我按到吴宓身边坐下了。

后面又有几个老年人上车,也得到中、青年人让座。没有孕妇上车,那两个孕妇座位却一直空着。

车开了。车声隆隆,吴宓说:“汉光武兵入长安,百姓夹道欢迎,父老流泪曰:吾乃复睹汉家威仪!今日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叹曰:何幸如之?乃睹华夏大地重现礼仪之邦欤!幸何如之,幸何如之!”

书店里顾客很多。吴宓小声说:“星期一仍然这么多人,可见追求知识已是普遍要求。可喜!”

一个女店员上来:“老同志,选书吗?要哪一类?我来协助您!”

吴宓:谢谢,我们有两个人。

“这是我的工作。您年长。”年轻女店员扶着吴宓的左臂。

他选了很多书,除《毛泽东选集》之外,全是马、恩、列、斯的中译本。女店员接过去抱着,她抱不下了,才容我接拿。吴宓又到外文部选了一些马、恩、列、斯的英译本。总共不下40来本。店员们问:你们是否有轿车在外等着。我如实说了。

“那不行,”那店员说,“你们怎么拿得了这么多书?”她叫我们留下地址,让书店派人将书送去。

吴宓说:不行吧,我们在北碚,很远的。

女店员却说:“北碚?西师?西农?都不成问题。”她说:负责今下午,至迟明天上午就送到。“如果您不放心,可以暂不交钱,收到书时再交钱给我们送书的同志。”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儿

开购书专户,今后凡有新书,书店就通知或寄新书目录给我们。

“我们在每所大学都派了专人联络。也可以定时来和您们联系,……您要买什么书,说一声,就会送书上门。每月结帐一次。”

我俩空了手步出新华书店。吴宓说:“快哉!我们去吃饭,吃好一点,喝点儿上等葡萄酒。……”

我陪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完了一杯苏联红葡萄酒。而且,每呷一口,他都要举杯和我一碰,却并不说“为……干杯”。但我心领神会,他要为华夏复成礼仪之邦干杯。

吃完饭,才下午3点半。他要瞻仰市容。我们便在都邮街一带漫步。来到大什字,他伫足仰望重庆解放碑。高大的石碑上的大字标语,全是欢呼中共八大、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望了许久,他微微点头。我们继续朝大梁子方向漫步。

“你今天很高兴?”我问。

“是的,很高兴。……社会现况是日日新,又日新,能无所感?……”

我希望他说得更详细一点。

走了十多步,他才站定说:“闹市嘈杂,非谈古论今之地。我这两年时或写了点札记。回去我给你看看,或许能见到我之所思所感。”

我们回到北碚,在第一餐厅吃了晚饭,然后漫步回到他家里。一坐下,我就急于索阅他的札记。他把我领到书房,开锁翻箱,取出一个当时流行的纸糊硬面“金星”大笔记本。郑重递给我:

“就在这里看。如有客来,就将它放进抽屉,改看这本书。”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苏联亚历山大诺夫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译本,放在写字台横头。

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空白,第二页开始便是所写的内容。依格横书,繁体书法工整,一笔不苟,文言文,言极简而意极丰。不是

日记,也不是年谱、随笔,而是一事一则,各不相关;每则一个题目,文尾注明该则写完时间(年、月、日、时)。

从1953年6月24日起,至本年(1956年)10月4日止,总共不到三十则。全部文字只占了这个笔记本的二分之一。

第一则:陀曼忏悔录。记叙他离妻再婚之事。深自咎责。词意大致如他那年秘密祭奠仲旗公后,跪在生父、嗣父两灵位前哭诉的内容,只是措辞更为痛切。

第二则:我负天下人矣!——记叙与朱氏兄妹交往始末,及两兄妹来访情况,而后感慨系之,追忆往昔,诚受彼妹及乃兄之惠良多;慨夫烽火连年,久失音问于前,播迁不宁,务作新民,未暇探访于后。今得彼万里来访,却是晤谈未详,礼待大亏。抚今追昔,怅然于怀;“师生”纯洁高谊,竟铸离恨之天!感慨的基调大致是那天送别朱氏兄妹后,他对我说的。而此札记中痛为发挥,情辞并茂。文中还几次引了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文末两句颇为激切:“星月皎洁,难悉高山流水之隐曲;大江奔腾,难涤悲欢离合之创痛!”紧接着,连用了三个“悲夫”,以结束全文。

接下去二十余则,有些我印象不深,有些越时既久,淡忘殆尽。我印象较深,现犹了了于怀的有两则:1954年7月29日夜10时写的《苟不教,性乃迁》。1956年10月4日夜11时写完的《观且感》。现就回忆所及,记叙如下。力求存其原貌,分录于后。

《苟不教,性乃迁》

写吴宓为那个外语系J女生补习古文一事。

情况:自1953年6月最后一星期的星期三开始,至1954年7月中旬X日(星期五)止。每星期一、三、五晚自习时,补习两小时。——本来,一如前文所记,J女生自己只要求每次一小时。吴

宓认为每次一小时时间太短,教不了什么,主动改成了每次两小时。一年多里,学生从不迟到早退,也不请假、缺席,老师更不迟误时间,准时上下课。这期间,吴宓曾到成都开省政协会议,所误时间会后以星期二、四、六的晚自习时间补足了。如约,不说任何闲话,严格限于传授知识。上课的全部时间,吴宓的妻子邹兰芳大多在场。每次进行一至二课(串讲古文一至二篇)。不抽问、考核,也不进行问难质疑。但在最后一次上课,吴宓全用来了考查学生,抽问、串讲一小时,抽背(默写)一小时。学生竟然串讲全如老师所授,背诵如流,默写完全正确。吴宓不禁目瞪口呆。

教材用的是《古文观止》,三十年代上海铅印版。该女生把它用重磅道林纸包贴得四轮上线,精工题其封面(俄文印刷体)曰:《俄语教科书》。

问她何以要如此伪装一番?答:怕同学发现,说她重视封建糟粕,学习封建文化。要是出了那么个纰漏,三年努力追求进步的表现就会毁之于一旦。

吴宓又问:“你的俄语学得怎样?”

答:“一切功课,从《俄语讲读》到体育,政治,全部五分。”

——接下去便是“窃有感焉。”——

《古文观止》须以书有《俄语教科书》之包书纸以伪装之,则今兹此类古籍已成见不得人之品。以此观之,则数十年至多百年之后,四库书将在神州绝迹矣。彼时欲观中华古代之经史子集,只能求之于欧美诸国之图书馆,欲解读此类经史,只能求之于欧美之汉学家欤!岂不哀哉!今太学诸生竟视《古文观止》为封建糟粕,读此类书便是宣扬封建文化,视为错误之莫大焉。窃考马、列经典著作,未见有此种论断。毛远亦无之。且毛主席又屡屡昭示,对祖国之文化遗产当“批判继承”。即弃其糟粕,而吸收其精华。毛公还说,要以此推陈出新。到了太学诸生,就成了全是糟粕。太学诸生

尚且如此,则穷乡僻壤,走样到何等程度,更可想见矣! 那年土改,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某先生云,他在土改工作队看到,从地主绅士家中抄出之线装古籍,有许多珍版好书,均被视为封建坏品,一火而焚之,云云。对比太学诸生之风气,足见某先生言之不谬。夫政令下达,层层走样,以至良法竟成劣政。王荆公变法之失败,虽由于保守诸公之拼命反对,亦因推行新法之层层走样,良法酿为劣政以扰民。为政之道,不亦难哉?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固属至理。

但宓以为,此不过言为政者当以自身之优良品德为天下师,以取得万民之戴,率百官以勤政爱民耳。此盖为政之一面。而另一面则当为政令下达,贯彻到底,丝丝入扣,不差分毫。

此一年多之补习,宓乃渐见该女生之真实为人。彼实好学,深思,勤奋,诚恳而求上进。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见道之言也。前此,彼所观之油滑,实乃社会各界父兄、师长等等,以自身之油滑言行而使其近墨则黑耳。于此复证前贤所言之确切:“苟不教,性乃迁”!

然则,此女生敏悟、好学、诚实、勤奋于内,而油滑、欺诈、左派幼稚病于外,是其乃有二重性,为双重之人格欤? 宓以为,该女生以及与她类似诸生,一一考察,左派幼稚病之产生概源于追求进步,追求个人之前途。其动机不可谓之恶;乃断断不可苛求彼等,而斥之为二重性,双重人格云云。反之,应以满腔热忱待之。

职是之故,回想思想改造运动之际,宓对参加本组学习之该女生及诸同学所提意见,颇有不满,甚至揶揄为“二、三子隔靴搔痒”。为此不悻于怀者一月有奇。今日自省,殊觉非是。余以年逾花甲之饱学夫子,对于人之初性本善之诸生,如此不能体察,以至失于怨尤,能不自愧?!

抑有进者,余对该女生设巧取去余之《红楼梦》讲稿,曾殊为愤

愤。今乃泰然于怀矣。余之各项著述、讲稿,终极目的,不外传之后生,倡我中华文化。既然该女生如此诚恳向学,则余之《红楼梦》讲稿,即余对《红楼梦》之粗浅研究,得以举而授之,亦传之得人也,何憾之有?是余前此之不悻,实余气量之小与识见之浅也。

犹忆该女生求余为之补习古文时,余略有反感,几乎拒绝。幸忆圣人“有教无类”之德范,激励效法。不然,必失教英才于交臂之际矣!可不惧哉?可不慎哉?

经与该女生交往之实例鉴之思之,宓乃自订几项约法,自今而后,切实力行。

一曰:凡年稚于我之男女教师、职工、太学诸生,对我施以批评,不论其言词何等激烈,措辞如何不敬,所言事实何等出人,余均应静心听取,切切不可不悻于怀。更不可背后反唇相讥。

二曰:绝不忽略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是极为微小之机会,将自己之知识,传授与后生,俾益其上进。知识求之不易,岂可令其淹没不传而与草木同朽?凡遇传授知识之机会,务须勇往直前,不畏艰险。

三曰:更为坚信“人之初,性本善”。对领导、同志、诸生,概奉此一基本信念对待之。即将余平生待人信念——宁使天下人负我,勿使我负天下人之信念,扩而大之,推而广之。

《观且感》

1956年9月30日,上午,院办公室干部来访,送来请柬及邀请信,请我参加市委举行之国庆招待会,并于明日登上观礼台,观看国庆大游行。下午,此干部又来陪我至院办公大楼前登车进城。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永清站在车旁等候,和我亲切握手,一让再让,要我先上车。同车的还有他的夫人——西南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夫妇各掌一所大学,而两校又复毗邻,可谓美中之美,堪称杏

坛佳话。

市委的国庆招待会,富丽堂皇。陈设华贵,宴饌丰美。宴席连绵,琳琅满目。首尾宴桌之间,遥远难辨人貌。济济多士,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重庆原为西南首府,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除后,它降为四川省辖之市。一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

余曾屡次于电影新闻片中,看到中央国庆招待会及欢宴来访外国贵宾之宴会。对照以观,此市委招待会之布局、风范,实已仿佛中央之制。市委书记兼市长讲话,其宗旨大意及词藻语态,亦大体类似北京市长彭真。席间,外宾不少,市长讲话只作俄语翻译。凡此种种,实乃举国一致之确切体现。进而言之,亦足观国家大一统,已达亘古未有之高度。

西南农学院侯光炯教授与我接座。余与彼已多次集会相值。他是土壤学专家,近年颇有建树,大有贡献于农业增产,因而声誉雀起。余亦衷心钦佩。学因年进,识亦随岁月增长。余乃逐渐重视直接为工农业生产作贡献之学科专业。昔者余表兄留日习工程,尊长颇不为是,余虽不时慰劝尊长,陈说工程亦乃有价值之学问,而内心并未确认其重要性。近几年才真正改变观点。有时甚至想:假如当年余学理工,亦较研究文学为佳。理工诸科能服务于国计民生,而文学则不能。文学艺术虽能陶冶性情,提高精神境界,却不能生产任何生活资料,因而具有无可解脱之依赖性。……我与侯公相遇,总不免心起文不如理工医农之感。

从长远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必须有其独特高尚之精神文明,亦即必须求得文学、艺术之蓬勃发展。然而就当前实际言之,我中华当前首要之首要,必须迎头赶上欧美之物质文明。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实应举国上下,万众奋发,致力于科学技术之精进,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于此,余深愧除文学、

史学之外，一无所能。

遥见远处一席上有稚荃在座。她举止娴雅，似在高谈阔论。左右应接之间，颇现意气飞扬之慨。此人抑郁已久，稍见舒展，便尔才气恣肆，良有以也。

宴罢，接以盛大之舞会。接待干部导余入场。余辞以不能。他劝我何妨一观。姑应从之。小坐片刻，乃有两大发现：

一是场内如云之美女，衣履华丽美艳。有短裙半袜，亦有窄裙坦胸，花色繁多，争奇斗媚，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着脂，香气四溢。余乃大为快慰。绝非“寡人好色”，爱彼美目之盼，而是触景有感。前几年服装划一，惟蓝布是求。若非干部服，则欠革命，设或红袖绿裙，则讥为资产阶级。饮食起居，概讲工农化，而人们眼中之工农化，实为以前此工农贫穷落后之生活模式。彼时，余乃不无疑虑：似此文明返古，其将伊于胡底？今睹此现象，余之疑虑顿然冰释矣！见微知著，即此可以确信，我中华必将阔步前进，迅速跻于富强。

次为舞会之音乐：时下革命歌曲为主，间以苏联音乐，也有西方音乐如斯特劳斯辈之《我的玫瑰》等。于此可见：当局之政策，业已明确，政治上一面倒，只与苏联友好，坚决反对西方列强；而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则适时与西方交流，取其所长，扬其鄙劣，以丰富我中华文化和科学，促进其快速发展，从而迎头赶上并超过西方。

近两年，学院之课外活动日益活跃。每逢周末，院办公大楼，各系大办公楼，大阅览室，灯光球场，处处有舞会。衣服大体脱离了一片蓝、男女不分的干部服状态。女生多为半截袖、封领或小翻领白连衣裙。音乐则全是革命歌曲。故而，今天我乃大开眼界。

我被安排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住宿。甲级房间，衾枕清洁。次日——十月一日，用过丰盛的早餐后，九时许，那位接待干部如约

来接。我与另两位省政协委员同车驶往解放碑。汽车转过临江门，便望见了装饰一新的那座丰碑。这个地方，原是旧重庆最繁华的都邮街与苍平街交叉的狭窄的大什字。1939年5月3、4两日，侵华日军的空军疯狂轰炸，将这一带市街变成火海，狼烟冲天，闹市化为灰烬。却也推动重庆人重建都邮街时大大拓宽了马路，建设了广阔的街心花园。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当局在街心花园中间建造了一座高耸人云的碑柱，命名曰：“精神堡垒”。其名委实欠妥：建筑物并无内堡，何得以“堡垒”名之？精神云云，含糊之至，什么精神，不得而知。解放后更其名曰“解放碑”，甚当。因为，本来是碑，只能叫“碑”，以是纪念解放，含义明确。即此一端，亦大见高下。

庆祝国庆之主席台及观礼台，连绵而绕解放碑，遮没了半个街心花园，前沿直达马路边。特大红幅，横空高悬，红旗如林，彩带交错，主席台及观礼台装饰得极为华丽壮观。在主席台中央，耸立着人民领袖之巨幅画像。气象万千，此重庆之小天安门也！

登上观礼台不久，庆祝大会即开始。礼乐，礼炮，书记兼市长讲话后，游行开始。大队红旗前导，鼓乐先驱，游行队伍仍如1950年元旦游行——从临江门来，绕至主席台，转大梁子，趋小什字。以余之经验揣想，还是那年我等所经历之阵法：漏夜赶往指定之七星岗附近小街集结待命，游行开始后，遵指挥部之指挥，依次准时到民生路接龙。其组织之致密精确，令我深为佩服。但今日之游行队伍，即今是街道居民队伍，也较之1950年余参加其中之大学生队伍整齐多多。于此足见，这六年半来，各界组织能力及精神力量之突飞猛进矣。

浩浩荡荡之游行外，余最感兴趣者为解放军。1949年11月30日，余随诸生迎王师于陕西街（注：今称解放东路），彼时，行入城式之解放军确是威武豪壮。然可看出，其威武实以精神为主，

征服者的高度矜持,胜利者的特殊自豪感,使那些官兵迈着战无不胜的英勇阔步。然于兴奋豪迈之中,实有体力支付过度之痕迹。眉宇之间难免困顿疲乏之态。穿在身上的军服,掳自国民党,实为中外最粗劣之制服。而今日所见之解放军,则大异彼时。可以清楚看到,官兵体质极佳,自然容光焕发,表明其日常营养之良好。制服挺拔,徽章明亮。别说国民党那些营养极度不良、霉头霉脑之官兵,即是余早年在美国所见彼邦之队伍(他们乃是前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决胜作用者),也不像今日所见之解放军这样,每个官兵都如此健壮结实,青春年少,精力极其饱满。真我中华之常胜军也!则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在朝鲜战场抗击美国王牌部队,而将其压至三八线南,良有以也!余乃确信,西方列强再不敢轻犯中华了。列强动辄以坚甲利兵凌辱中国之时代确已一去不复返了!

工人队伍、农民队伍也给了我很大启示:从他们所举之宣传画、标语牌可见,工、农各业的生产正蒸蒸日上,我们确已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炎黄子孙已经迈上了富强康乐之道。

但愿不再出现离奇之运动,五亿同胞齐奋发,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列强,登斯民于衽席。

1956年10月4日夜11时写完。

有趣,我看到这里,也正是夜11时。转看吴宓,他正坐在写字台正面,修改他上课的讲稿。

“写得很好,”我合上笔记本说,“这样一来,你有三套珍贵自传资料了:日记、年谱、札记。”

他略想一想:“这个不能叫札记。因为记得少,议得多。应该叫作——”他手执毛笔,挪过笔记本,翻开空白扉页,迟疑思索:“直书‘札记’二字?太常见,也不甚切题。这样吧,”他濡墨振笔,直行楷书了四个核桃大的汉字:

“上德维道”

我理解,这是取《老子》“上德不德”之章,及“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但我不明白,这与此札记行文内容及体例有何关系。

他朝我看了许久,再叹嘘一口气:“是的,你理解不到。我的意思本来有点隐约。——它,只是我的祈求与愿望。我赞成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我拥护加强‘专政’,但我祈祷上苍,这专政的锋芒应该指向确已出现、确实存在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分子,而不要再像去年那样,漫无标准的肃反,整得全国百业停顿,……”他说:正是,我也看不准。谁能看得准呢?清清楚楚,举国上下,拥护政府,各行各业,勤勤恳恳,生产建设,热气腾腾,社会道德风尚,真正是汎爱众而亲仁,入则孝,出则悌,不折不扣的礼仪之邦。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奋勇建设之大好时机。而于此时,却如此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会不会失之暴虐呢?我实在担心!……“还是我上次对你说的,祈求上苍——上德维道。……”

整整二十年后,吴宓告诉我,他的这本札记随后断断续续又写过好几篇。本子只剩十来面未写了。文革起,他认为此地所记问题不大,迟于转移,被抄走了。却并未据以追究。70年代,“发还”他被抄各物时,没有这本《上德维道》。他也不敢清问。反正,未发还的还多着哩!

“物质不灭,”他说,“反正它应该还在。不过我无法找回罢了。”

1956年的10月21日,我回西师,去访李源澄。恰值刘尊一、黄稚荃、赖以庄已在那里,源澄便叫他女儿志勉去请来吴宓,大家午餐一聚。饭后闲谈,说到了国庆观礼。吴宓简述了他在《上德维道》中所记的感想,就此谈到大家的国庆之乐。原来,各人参加国庆的情况各不相同。

黄稚荃是市政协委员,略逊于吴宓。参加了市委书记的国庆招待宴会,上了观礼台。不过,被安排在观礼台上距主席台较远的

一端。黄稚荃对此并无不快。她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在招待宴会上市委书记兼市长和她如何叙旧。详询她的近况,问她有无困难等。

“我当然回答说,一切很好,没什么困难。他们今天还能记得我这个人,给了工作,又作了政治安排,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还能再伸手?那就太不识相了。……”

接着,黄稚荃约略说了:市长任白戈在做地下工作时,她曾如何支持他。某次他夫妇去成都,就住在她那儿。她当时心里也明白,他们是共产党。她对刘尊一等人说:“我和你们一样,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活儿。……总算共产党还记得我。……”

吴宓插话:“宓郑重声明:那些年,我既未吃国民党的饭,也未干共产党的活儿。”

黄稚荃:“当然,当然,你老大哥一向真正清高,从未涉足政治。所以,你今天比我们的品位都高,在观礼台的位置都比我先进一等。……”

赖以庄深怕黄稚荃又发牢骚,赶紧岔开:“我认为,市长问你无困难,你应该据实说,就是身体不好,还得彻底治疗。烦市长批个条子,让我住高干病房。……”

黄稚荃:“哎呀,得过且过吧!”她说:反正现在有公费医疗证了,何况,住院手续已经办好,只等床位出缺就重进病房。该服什么药就服什么药,何必住高干病房?“还是知趣的好!我们是吃过国民党的饭的……”

刘尊一说她国庆观礼的规格又比黄稚荃略低一丁点儿,是在参观台参观。从1956年五一庆典起,重庆市委对观礼的安排有了创新。即把主席台对面十字街口的人行道收拾辟为“第一参观台”,主席台左右延伸出去的第一个街口人行道辟为“第二参观台”。用以容纳不够登上观礼台的统战对象,以便使更多的民主人士能观看国庆盛典,受到教育,增进团结。刘尊一到了第一参观

台。

刘尊一当然很高兴。能被邀请到参观台一样是莫大的礼遇和荣誉。她对盛会的每一情节,都感到兴趣。从中看到祖国的兴旺发达,感受到鼓舞,获得前进的动力。时过近一月了,她仍能准确描述游行队伍所举诸色标语牌坊的式样和制作特点;一一复述那些牌坊上所报导的生产指标:钢完成了年计划的百分之几;钢材生产 XXXX 吨;某某高级农业合作社水稻产量达到亩产 X 百斤;某某社油料作物比去年增产多少,等等。啧啧赞叹。

接下去各抒所见。李源澄在庆祝会的第二参观台;赖以庄登上了北碚区庆祝大会的观礼台。黎涤玄、罗容梓等,与学生一起,进入北碚区人民广场,参加了北碚区的庆祝大会,随后游行了北碚各条马路,高高兴兴回到学院。

吴宓聚精会神听大家叙述。他双手按膝,直起腰肢,说:“可谓各得其所,这个国庆过得很理想,很愉快。但愿明年,后年,再后年,……年年如是,普天同庆,皆大欢喜。”

“匈牙利事件”的消息

1956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兴奋,鼓舞,紧张,忙碌,喜笑颜开。

1956年10月28日,夕阳辉耀,我回西师看望母亲,在西师小校门,迎面碰见李源澄。“太好了!”他高兴地拉住我,约我明天到吴宓那里吃午饭,小作聚会,稍事快谈。并说,是他作东,还邀了刘尊一、黎涤玄、黄稚荃。

朋友六人,一齐动手,李源澄系上白围腰,操勺烧菜,俨然一个胖厨师。入座了,刘尊一叫:“坐这边,老张,莫坐成乌龟席。”四川习俗,六人一桌,如果刚好上下各一人,则是乌龟席。

吴宓笑道:“乌龟者,世之灵物也。祝寿之词,惯称龟鹤遐龄,乌龟席其实最好!”

李源澄举起酒杯:“托毛主席的福,唤来了永恒的春天。难得张、黄两位同时来西师,乃能有此小聚。……”

刘尊一笑着举杯:“我建议称黄、张,稚荃本来比老张年长,且张、黄音似张皇。”

李源澄:“对,对!前几年张皇够了,自今再不能张皇了!来,各位,共祝大治盛世之到来,共励殚精竭虑,为人民服务!”

黎澍玄举杯向我：“老张，干此一杯，我代表我的组织，敦请你参加民盟！”

刘尊一：老张应该参加民革！

黄稚荃：他现在身为政法学院之教授，眼看得参加中共，你们民主党派……

黎澍玄抢着说：“我们盟和党是可以交叉的。”他说：党员可以加入盟，盟也向党输送优秀党员……。

于是老黎长篇大论地谈论民盟作为党的重要助手的作用及目前的发展规划。把他近日在西师民盟宣传大会上的讲话全部搬了出来。“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民盟，最有利于有效地发挥所长，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不世之功勋！”

李源澄笑道：“我基本赞成老黎的意见，只有一小点，”他说：应把“建立不世之功勋”改为“做点切切实实的工作”。“我正打算辞掉副教务长，回到系上，专搞教学，而以主要力量进行学术研究。”

刘尊一也认为：凡是学有专长的人都不宜作行政工作，“那太浪费时间了。”

黄稚荃也赞成。

于是，李、刘、黄、黎争着表达自己的旨趣：欣逢盛世，正该展才奋进，有所作为。每人都有成竹在胸，专攻什么，该研究哪些课题，如何着手等。

准备吃饭了。黎澍玄却举杯嘱黄稚荃：“你是久负盛名的女书法家，今天得给我写一幅字。来，我敬此一杯，致敦聘之礼。”

黄：“算了，算了，我这手字，只配写黑板报。”

我明白，她的牢骚要来了。想起在进修部，我和她奉命编黑板报，领导指定，由她一人抄写，并用毛笔粉浆书写，使其珠润玉圆，脱出一张高级黑板报。黑板报平放在乒乓台上，她跪爬着写，我打杂——挪黑板、递粉浆、念稿子……。以她这般鼎鼎大名的书法家

来写黑板报,委实有点委屈。她艰难地写完,疲乏极了,转身伸腿坐在乒乓台沿,叹道:

“你说,我们这些人将会得个什么结局?可叹我在先父严厉督促之下,十年寒窗,苦练书法,却只能派个抄黑板报的用场,岂不哀哉?!……”

今天,我以为她又会发这种感慨,谁知她并不再说下去。黎涤玄拿定主意,不管黄稚荃怎么推辞,他兀自磨墨舒纸,扭着她提笔,并且一定要她写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黄稚荃拗他不过,只得写了。大家在围观,一致叫好,说她今天笔力特健,挥毫潇洒,别有一番气派。

吴宓也赞道:学因年进,稚荃的书法开始有刚劲雄浑之气了。年仅40,能有此气魄,可喜!

黎涤玄:俗话说,福至心灵,人逢喜事精神爽。目前形势大好,春满神州,我们的女书法家文采焕发,笔酣墨饱,自然刚劲……。

老黎收起那幅字,说是有事先走了。接着刘尊一也被人叫走了。这里只剩下我们四个。吴宓问:“你们看了这期《参考消息》吗?”

《参考消息》在80、90年代公开发行,但在50年代,它还是内部保密读物。所刊内容多是西方报刊的新闻摘要,起初是党内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传看,195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各大学党委挑选了一些党外教授、讲师列为传阅对象,并分编成组,每五至十人为一组,列了固定次序,一组一份,交由第一个人领阅,传阅到最后一个人交还党委,不得摘记抄录,更不得外传。我们四人都在各校入选得阅,但我与黄稚荃昨天就离校来了北碚,而李源澄名列小组榜尾,所以我们三个都未见到昨日的《参考消息》。

“有什么特别消息吗?”李问。

吴宓语态沉静:“匈牙利发生政治骚乱……”

黄稚荃：“东欧的事情，与我们什么相干？看你那神情！”

吴宓定定地看了她很久，说：“这才是一如十八、九岁小女子！东欧，匈牙利可是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也，那里发生政治骚乱……”

黄稚荃本是个诗人，微饮薄醉，更见潇洒，大言说：“你急什么？东欧各国都有苏联大军驻扎，再大的骚动也会在机枪大炮吼叫下灰飞烟灭！”

吴宓却说她这“正似少妇口吻”。他说：“……朱元璋是怎样触类旁通的？起五更早朝，他就慨叹：‘何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丈犹拥被’，随后便找了个借口，尽治江南富家翁。今日匈牙利动乱，岂能不有所思？……”

李源澄认为吴宓“说得透彻”。

不久，匈牙利事件公开见之报端，苏联红军出马，很快平息了。再不久，中央布置，全国性学习《人民日报》两篇重要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语气磅礴，雷霆万钧，一言以蔽之，要百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批配合学两论的文件明白昭示，两论都是毛泽东亲自执笔，这次学习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黄稚荃住医院了，我去看她。优待市政协委员，她住的单间病房。

“两论太吓人了！”她悄声对我说：吴雨僧真是未卜先知。……你去替我问问老先生，何以教我？我希望，我这病不好不坏，长期住院，住他个十年八年！“我，神经衰弱，实在不能经受……”

两论的学习持续了半年。却与以往不同，一未停课，二不搞人人过关，只是要你反复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百倍加强。风平浪静，不见嵯峨。

直到1957年4月，突然宣布：开门整风，动员民主党派及一切

党外人士给各级党组织及领导人提意见,帮助他们“整风”,称为“大鸣大放”。报纸、刊物、广播,万籁俱作。每个机关、学校、厂矿的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时,还把他讲话的记录文字,印交党外人士传阅,——定时看完,准时交回,不准摘录、抄缮。毛泽东的讲话是那样恳切,指斥各级领导人的毛病,举出具体数字,说明当前知识分子太少,远远不能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而极为宝贵,要全力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干部要克服缺点,做好工作;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动辄批斗。情词恳恳,颇多风趣。与此同时,各大学党委,包括我所在的西南政法学院的领导也连续大会动员,恳请教师、职工给党委成员提意见。

这天夜里,一位好友的夫人来对我说,吴宓捎来口信,说他病了,希望我去看看他。

次日我去西师,吴宓并未病。他关上大门,引我入寝室,促膝对坐在屋角,问我近来工作情况。我把忙忙碌碌接待苏联专家的情节略提了提,他当即指摘我忘了他为我饯行时的谆谆告诫,在陪同领导接待苏联专家时,有恃才失谦、与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毛病。

“特别重要的是,”他说:当领导人在给你酌酒、布水果等等时,你应该避席,虽不能如古代离席匍伏在地,却必须起立躬身,恳称“不敢当”,而自己抢过酒瓶、果盘,为宾主斟酒布果。要知道,当领导人给你酌酒布水果时,他心里是有旁白的:他妈的,老子枪林弹雨打了天下,却来给你这些阶级异己分子酌酒……!他说:“这旁白就是怨毒,怨毒如此,一旦运动来临,你岂能免乎?!”

我不禁毛骨悚然!

接着,他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我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宓叹息,“你简直利碌在心而思虑俱蔽。”他说:这也

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言甘而币厚，其心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我惶恐问计，吴宓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他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我认为，拒绝发言，只怕也办不到。

他说：正是，有这么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记牢，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曾做和尚，剃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我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他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他说：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还是我那年说的，报定皈依，听天而由命，尽人事而听人命，谨之又谨，慎之又慎，尽人事也；在劫难逃，听天命也！”

1957年5月初,我的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连日分别到我办公室,又再一起到我宿舍拜访我,动员我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我仍未发言。刘佑东乃邀我到他家吃茶,朋首密谈。

“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我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无病呻吟嘛!

他痛心疾首:“什么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有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我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我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我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言不如此。我气得不行,去找刘佑东书记。谁知他

却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法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

“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张紫葛！”

我去问刘佑东：凭什么要把我定成右派分子？

刘佑东很坦率：“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月初，我看到一点苗头，便启发你写文章反驳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连夜给你寄到《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我是有心保你的，无奈……”

我再辩解。他干脆说：“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反右斗争会开始了。采取传统战术，先扫清次、小、外围，最后进攻堡垒。学校停课了，会场林立，分斗中、小右派。我们几个头号右派暂且逍遥家中，也尚未建立监督制度，趁此尚存自由之日，我且溜到北碚去西师看看母亲他们。

西师反右战火之激烈，并不比西南政法学院逊色。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的许多熟人都已榜上有名。其中有李源澄和黎涤玄。

“李源澄是个最顽固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揪出李源澄这条毒蛇！……”

“撕下李源澄的画皮！”

“黎涤玄是条大鲨鱼！”

“拔掉黎涤玄的毒牙!”……

楼台相属,斗争会的口号声、叱咤声处处可闻。

我情不自禁来到了吴宓家。他拉开门,一见到我,大吃一惊,随即小声说:“好吧,快进来!”

来到寝室,关好重门,墙角促膝坐下,他问:“你划右派了?”

“你知道了?”

“估计当如此。”他转而安慰我: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他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党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蒲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他叫我“赶快离去,善自保重!”和我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愤气填膺,已经疯了!”

李源澄疯了!我不假思索,来到李源澄家。房门敞开,一大伙人围看着李源澄。老李蓬头垢面,旧蓝布长衫撕开了一条口子,一支袖管撈到了肘弯,他指天划地:

“什么话?我是右派?天下还有左派吗?啥子?明天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我当然参加!来,来,啦啦!啦啦!蒋介石王擦擦(四川方言,意为极其蹩脚),看到看到就要垮!垮!垮!

垮！……我要上北京！毛主席，毛主席！……”

人们有的劝，有的斥责：“你清醒点！这么闹就能下台吗？”“李源澄，正告你，装疯卖傻过不了关！……”“你惟有缴械投降，老实交代，才能获得党的宽恕！……”

我打算挤进去和李源澄说话，一支手拉住了我。原来是我在西师时的高才生，前述那个独自在罢课教室里等我的G女生。她当时就是团支部书记，毕业留校作干部，为人秀外慧中，通情达理，功课也极好。她把我一迳拉到校内干道，挽住我朝水岚垭小校门走去：

“你偷跑回来的吗？”

“你知道我划了右派？”

“当然知道。那边已经来人搜集你的材料了！”

原来，她在西师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此刻，各校是反右领导小组当事。如此这般，她还和我说话，并肩行走。可见她对我的师生之情何等深厚。我便问她：

“这右派要整到什么程度？”

“谁也不知道，反正是敌我矛盾。现在是要斗深斗透斗垮斗臭！”

“还会增加右派指标吗？”

“没听说。不过，那年揪贪污老虎也不是一次就揪够数的。”

我忧心忡忡，问：“吴宓不要紧吧？”

“他是保护对象！”

“哦，”我省悟到，“他是省政协委员！”

“那倒不一定，该揪的，什么委员也不顶事！……你赶快回学校去，不要再溜回来，以免连累你母亲。”

我回到政法学院，人们正在找我。当下通知我：逐出小灶食堂，即日起到大灶食堂搭伙。我的正在上高干幼儿园的二女儿张

莉星,被取消了上幼儿园的资格,责令即时领回。办公大楼张贴了斗争我的特大海报:“明日上午8时,在大礼堂召开斗争大右派分子张紫葛的斗争大会。……”

从此,我被押上了烘烤炉。大会,小会,疲劳斗争,夜里再“个别帮助”——逼问、严刑拷打。三打两打,我被打瞎了右眼,打聋了左耳。

“什么瞎了?聋了?你诬赖,反攻倒算!哼,真的又怎样?打死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死条狗!充其量老子们两个写张检讨!”对我进行严刑逼供、打瞎我眼睛的两个先生骂道。

是啊!难道我的这条命只换这两个人的一张检讨?吴宓叮嘱过:好汉不吃眼前亏者,留有用之躯以利国利民也!

我表示招供:我是右派。

但这并不能了事。接上是无穷无尽的交代、批判、再交代、再批判。例如,无中生有地要我自诬,强迫我承认我说了:教务长孙孝实有官僚主义;然后强迫我承认:这是“攻击党官僚主义”。进一步交代:诬蔑了共产党官僚主义;批判:这是反对党的领导。再进一步交代:我坚决反对共产党领导,把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漆黑一团。再交代:我亲口说过:反对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漆黑一团。

如此等等,再专人口授,监视我手抄这类书面交代材料,详细拟撰反党思想活动,连篇累牍,都数十万言。

昼以继夜,历半年之久。到1958年的元月十五日,我既无行动自由,又无在自己家里开窗开门之权。1月17日上午,专责监督我的讲师蒋仁峰(注:拨乱反正后,蒋任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现今的四川师范学院副教务长,现已去世),来到我的窗前,大声叫:

“张紫葛,过来!我教育你!”

我站到窗边,拨开封窗的大字报,探出脸来。他一脸严肃,说:“你要好好坐着反省罪恶!”接着小声说:“最近,康生来学院视

察过,指示:所有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铁扫帚扫掉。……你,恐怕要进监狱!记住:我这个南昌起义的老兵,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对你说:目前这套,不是我们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总有一天要纠正的。你务必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熬过监狱里的种种苦难,活着回来。听好,我是说的活着回来,回到这西南政法学院来!……”

他的声音放得更低了:“这,不是三、四年能回来的,你的老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你明天溜回西师去看看她。……明天,天一麻麻亮,你就打我的前门进,后门出,经我屋后的灌木丛,直飞马路上,奔童家桥上车。黎明时进西师,至黄昏时分搭车回来,依原路打我后门进,前门出。……白天,我专责监视,守在门前,不论谁来查找,我自有法对付。……”

这时,反右斗争一再扩大战果。我那在西师外语系作助教的弟弟也被划了右派。我躲在妈妈的房里,和母亲、弟弟、大女儿笑星,度过了难忘的一天。黄昏时分悄悄分别,我快步趑出西师,走捷径奔公共汽车站。刚到捷路中段,一个人迎面扑来,猛拉我的胳膊:

“我是吴宓!”

“哦!兄长!”我火急停步。

“清早,我望见你来了,料定必是这个时分,打这条路奔车站,持在此等候!……”

“兄长!”我喉哽不知所云。

“看形势,你难免有纍纍之灾。”他靠拢来,“我要郑重送行并恳切叮咛:务学司马迁,勿学屈原。以钢铁意志,战胜水深火热,活着回来!活——着——回来!你还年轻,能活到二十一世纪。那时,把我们这两代知识分子所受之苦难笔之于书,传之后世,使千秋万代知道。嗨!……以天下书生为草芥,……而使中华文化江河日下,愈益落后于西方列强!我剩下的寿命不过二十年了,但愿我们

还能再见,却也说不定此刻之生离即是死别。望你铭记此刻,更铭记我之叮嘱!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吴宓老泪横流,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我悲愤中烧,再三哽咽,才说出:“兄长放心,我一定照你的话切实做到。我坚信,我们还能再见。望你保重!”

“好!那就好!”他伸双手捧了捧我的双肩,再重重拍了我一下,就转身走了!

果然,第三天,1958年的1月20日,我被捕了。

34

他一步一跛，拐进我的小屋说：“我是吴宓！”

投荒千里，苦难万重，很多与我同时罹难的由右派上升为“反革命”的博士、教授们，都先先后后饮恨九泉，而我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了。1973年，我服完了15年的有期徒刑，再以“反革命”罪继续戴帽“改造”，后又被送到重庆北碚西师我妈妈那里，接受“群众管制”。这时，我母亲还健在，我住在她这里。“群众专政”规定我不得出门行走，每天强制劳动，义务打扫一大段道路坡坎，随时有“群众专政”小组的人上门对我进行罚站、训斥；同时，我还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极端困难。

1974年初的一天，像往常一样，我做完“群众专政”规定的“义务劳动”，已是下午两点。我弟弟上班去了，母亲在室外选煤核，我静坐在小屋里。门，按“群众专政小组”的规定敞开着，随时准备革命群众进来检查、训斥。

突然，在我未睹却已视力极差的左眼视线里，仿佛看到一个人进门了。这当然不是来专政的“群众”，他们不会这般斯文，而是如虎入山，一飙而来。

确实进来了一个人，一步一跛，拐进了我的小屋，又慢慢拐到了我的身边。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我是吴宓！紫葛！我是吴宓！”

我下意识跳起身，搂住他：

“兄长！雨僧兄长！雨僧！”但我突然意识到危险，“不行，他们发现了要打你的！”

“怕什么！不是没挨过打！而且，我是已解除了反省、准予自由行动的人，谁来了，我就说，我来找你弟弟，要资料。”

我们一条板凳，面朝房门坐下，他捏着我的右手，轻快地说：

“看，我们到底再见了！这就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胜利！……”

我说：“可惜我已经看不清晰你的面部表情了。”

“我也视力昏花，看不清晰了。但这又何碍？本来灵犀可通，聚首更能神、气相属。……我把别来 15 年的遭遇给你说个梗概，让你带到 21 世纪，垂而为文，传之千秋后世。……哦，别忙，先把这个给你。”他取出一叠钞票，“三百元，你先对付对付生活。……”

我说：“这是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花你的钱？”

“什么时候？异性手足共患难的时候。五十年代，我花了你多少钱？第一次就是七百几，那时的七百几当现时七千不得少……”

我再推迟。他恼了：“李源澄的话：你到底把圣贤之书读通了没有？中华古道，朋友有通财之义，你到底还把我当不当朋友？……”

我只好收下钱。

他急促地讲述这 15 年来他的情况。我现在把它记叙如下。

（以下至“牛棚友谊”一章，都是吴宓这次对我讲述的内容。）

西师也和别的学校一样，1958 年春开始处理右派分子，有的押上警车，投入监狱；有的送去劳教，有的集中到农村劳动改造。

数以百计的“阶级敌人”从师生中消失了。但运动并未终结，接上是思想消毒，人人过关；再接下去是内部肃反，拔“白旗”，插红

旗,逐一梭篦,白的拔掉,清除出教师、干部、学生队伍。吴宓局促如也,自定白旗。领导照顾,虽认定他确是“白旗”,不过不予拔出。再接下去是继续停课大炼钢铁。吴宓以老弱免役。

大浮夸继之而来。到处是虚报浮夸之风:

我们亩产万斤!

我们亩产二万斤!

亩产三万斤!

亩产七万斤! ……

说大话也随之跃进。

吴宓也跃进了。学会了重述报纸上的虚夸、说大话,而且是那样诚挚。他平时沉默寡言,只在学习发言时简要陈词,情态恳切:我深信,亩产七、八万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仔细研究了报纸报导的材料,确认无疑:五年之内,我们定能赶上美帝,超过英国。我们必将一如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十五年或者再短的时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

他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好评。恰逢大学招生也跃进,而大学师资经反右、内部肃反、拔白旗,大大减员,以至任课教师极为短缺。领导乃决定,破格起用吴宓,叫他在中文系讲古代汉语(古文)。这一意外信任,令吴宓惶恐万状。责任重大,不能不兢兢业业。他细心备课,一词一字都细心斟酌,反面、正面、侧面,倒想、正想,有没有可能滋生怀疑,出现政治问题。反复推敲讲的内容。

这时,三年特大饥馑已经来临,干部(含教师)每月粮食定量为21市斤,副食每季度菜油2两,猪肉半斤。蔬菜则是红苕藤子之类,而且只能配得少许。营养所需,全靠每日几两粮食,备课到深夜,饥肠漉漉,吴宓咽两口开水,继续伏案备课。……

学生们早已仰慕吴老教授,加之他的讲授质量又如此之高,态度谨严,板书行段皆中绳墨,一律楷书工整,因而课堂秩序极佳,学

生精神振奋。

也许是吴宓过于鼓舞，抖擞之中小有疏忽，竟然出了个纰漏。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再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

吴宓未加思索，举例说：

“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

他马上警觉到不妥，却已驷马难追。

当晚，中文系总支书记来访：“你在课堂上……”

吴宓当即承认错误，深自检讨。

总支书记说：你平时十分谨小慎微，怎么会在课堂上出现这么大的纰漏？这是你思想的真实反应，自然流露。你对粮食定量供应政策不满，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

他被通知暂停授课，让他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事情很清楚：“想想”就是反省。就得写检讨，交代思想，批判、认识。但是，吴宓打定主意，绝不臭骂自己。错了认错就是，绝不给自己乱扣大帽子。主意拿定，且在家里安坐以待。两个星期后，领导来了。问他想得怎样了？

吴宓说：“宓深入检查，并无复杂之不良思想。”他说：连续两年特大自然灾害，我和同志们一样，月定量21斤，每天7两粮食。国家这么困难，我们还有粮食度荒，哪能还抵触粮食政策？不过，吃不饱肚子，“言为心声”，我就冲口而出说了“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愿受处分，并无怨言。事情简单明了，我也就没有写书面检讨材料。……

大出意料，领导的态度非常和善：党欢迎你这样朴素、诚实的态度。党委作了全面了解，你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这回虽违

反原则,却只是偶然一次。说清楚就行了。望你今后注意,不要信口开河。更重要的是,发挥积极性,搞好工作。

吴宓仍继续教课。

1961年来了。它虽然是第三个特大灾害的最后一年,饥馑仍残酷地肆虐于神州大地。吴宓这时的心情却较好。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睹景生情,倍思友朋。特别怀念老友陈寅恪及陈序经等人。他们都在广州中山大学。近期陈寅恪来信,他已久未开课。如此饱学之士,为何闲置?吴宓深为惦念。

1961年8月中下旬,暑假期中,吴宓便决定南下广州,北上北京,并回陕西原籍看看。经几次写信与陈寅恪商询旅事及注意事项,并与武汉大学的好友刘永济联系好,约定于1961年8月下旬,动身到武汉转广州。

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说:“行千里者三月聚粮。”吴宓从1961年4月起,再紧裤带,每月节约粮食一斤。加上预领的下一个月的全部定量口粮,共有粮票25斤。报经学院领导批准,将重庆市粮票换为全国粮票,旅行所需口粮妥善了。

35

难忘一九五六年

购得次日登船后天启航的重庆至武汉的长航船票,吴宓定于8月22日清晨,从学院出发,开始他的广州之行。

有三个朋友知道他的计划和行期。其中有熊正伦、刘尊一。(注:熊正伦是比吴宓稍晚的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生,后赴美国学商科。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由重庆大学调到西师任西师外语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

几位朋友赶来送行。各有所赠:熊正伦赠全国粮票五斤;另一朋友赠“高级饼子”10个(实际不过是红苕加少许玉米粉烹制而成,每个计粮一两);刘尊一赠重500克的牛肉罐头一个。就在那个年月,全都是贵重之至。在每月总共21斤口粮中,省下五斤粮食,其艰难可想而知。而牛肉罐头也十分珍贵。吴宓再三谦辞,朋友们则不由分说给他塞进了旅行包。四人一起来到北碚公共汽车站,公推刘尊一陪送吴宓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吴宓推辞,说他不用护送。熊正伦等人说:你年近古稀,眼睛又不太好,这么远的汽车,还要过跳板上船,没人照应还行?

吴宓还是不接受。

车站秩序大非昔比。售票窗口前虽然有购票的队列,却不断

有年轻人在前面恃强插轮。排轮子的队列也不时推推拥拥，只有刘尊一才有气力勉强守得住轮子。吴宓和熊正伦等只好站在一边等候。足足过了个把钟头，刘尊一才满头大汗，拿了车票过来。

吴宓接过车票，背起旅行包，一手拄杖，叫他们回去，说他“自己上车”。

车门前拥挤混乱，根本没个轮次。吴宓好不容易接近车门，却被捷足者胳膊一伸，凤凰闪翅，把他搽到一边去了。就这样，一连发了两班车，他都没上得了。幸亏刘尊一认识一个站员，小伙子连拔带推，才把吴宓塞进第三班车。车厢里空位较多，吴宓坐进了孕妇席后面那排的靠窗座位上。不一刻，车已满载，汽车开动了。从白庙子起，逐站下上乘客，车厢里一直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双碑站，下的多，上的少，车厢里才乘客大减。走道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站着。车行不久，吴宓听到呕吐之声。转头看到，走道上有个孕妇，一手拉住吊杆上的皮带，摇晃踉跄，边窜头边呕吐。呕出物喷在通道上，清清楚楚：咀嚼得不太细碎的红苕藤，夹以稀少的饭粒。看来她进食不久就来赶车了。

吴宓敲敲前排青年乘客的肩头，青年回转头：“啥子事？”

“你坐的是孕妇席，”吴宓说：你看，那孕妇好难受！你该让让她！

青年瞪了他一眼：“干你迷事！”回过头去不再理睬。

吴宓决定自己让座位。但他右边那位中年乘客伏在前面座位靠背横杠上打瞌睡，挡住他出不去。他轻轻触那匍伏在横杠上的胳膊。

中年人扭过头来：“哪个？”

“请让一下，”吴宓作起立之状，说：我要出去，让位子给那孕妇。

中年人大没好气：个老头子硬是吃胀了！你安份一点儿行不

行!

吴宓只得耐着性子坐下来。万幸,车到小龙坎,邻座这位中年汉子下车了,吴宓赶紧招呼那孕妇这儿坐。孕妇知道刚才吴宓两次关心她,心里感激,坐下便和他攀谈:“老人家,您真好!……”

她说她是双碑特钢厂的工人家属,父母是市中区的街道居民。母亲病了,她回去探望。

吴宓动问她的情况。

“特大自然灾害嘛,当然有些困难。经济并不紧张,就是粮食不足……”

“你母亲害的什么病?”

“水肿!”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疾病。原因是饥饿过甚,营养不良。吴宓不须再问。过了一阵,才对那孕妇说:

“……你现在怀孕,需要吃好一点。你去看妈妈的病,也得带点东西。我这里有五斤粮票,几个饼子,一个小罐头,诚心诚意送给你。希望你不要见外。……”

孕妇有点吃惊:“平白无故的,哪个受你这么多东西?……有钱都买不到的呀!”

“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有什么!我只是为了你肚里的小生命,为了你的健康,……你千万别怀疑。我没有别的意思。来,收下!”

他一样样掏了出来,塞了过去。

孕妇盯住这一件件珍贵之品,眼睛发亮。表情却似惊似喜,似疑似惧。然而两支手却情不自禁地接住了递过来的东西。

到了牛角沱公共汽车总站,全车乘客都下车了。孕妇结结巴巴:“老人家,您,哎!我该怎样谢您呢?您叫什么?哪个单位的?二天我来谢您!”

“不值得提。我不能扶你，你自个儿好好下车吧。”

吴宓站起身，背包拄杖，蹙向车门。孕妇回过头问：“要不要我扶您？”

“不用，我能行。”

却有一双手把住了他的左臂。一看，竟是刘尊一。

“你也上车了？”

“我不上车还行？……”

“你坐在哪儿？我怎么没见？”

“我从后车门上的，只最后还有一个座位。”

吴宓心里很不安稳。不用说，刘尊一当然看到了他把三位朋友送给他的珍贵物品一古脑儿拿给了一个陌生妇女。太不珍重朋友的友谊。她会生气的。

两人默默下车，安步来到上清寺，再搭上电车到朝天门码头。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委实有点尴尬。

市面上已经进入了“理想社会”，各条街商店的门大都关着，原来的商店铺面都变成了居民住房。一般餐馆是绝对没有的了。时过中午，两人饥肠辘辘。来到重庆港的海员俱乐部餐厅，经过交涉，交出一斤全国粮票和若干人民币，买了一斤饭，一份“大众菜汤”。餐桌打挤，要候轮子。等了好一阵，才得到了一个座位。刘尊一叫吴宓坐在座位上占着阵地，她去窗口取饭菜。

两人开始用膳。吴宓伸汤勺往汤碗里捞了又捞，什么也没有。

“不用捞，”刘尊一说，“这只不过是盐开水，相当从前馆子里的‘和汤’。”

“唔，又叫‘神仙汤’。”吴宓舀了一勺尝了尝，“不错，盐味挺重的。”

吃完饭，赶去上船。却见乘客们排着长蛇阵站在码头上。原来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次上船。

看看已是下午5点,还不见验票的执事来临。吴宓叫刘尊一回去,迟了往北碚的汽车就收班了。刘尊一坚持把他送上船。说她回头到两路口市教育工会招待所去住宿,明日再回北碚。

7点了,开始验票上船。下码头梯坎,踏跳板往屯船上走。跳板窄长,行人很多,脚步杂沓,跳板便大幅度弹跳摇晃。吴宓在刘尊一扶持下,拄杖趑行,摇摇晃晃。

一个年轻人性急毛躁:“快走,快走!挡着我们了!”

刘尊一:“请原谅,同志们!他是老年人,眼又不太好!”

一青年:“老,就别出来跑!”

另一青年叫声“让!”伸右臂朝刘尊一一肘了一下,挤到前面去了。可这一肘,直把刘尊一搯得立足不稳,她踉跄了一步,吴宓便窜出跳板倒了。幸亏跳板两侧设有防护网,把他兜托着了,没有掉进江去。只是他的手杖掉入江中去了。刘尊一拉扯不动,来了一个中年乘客,才把吴宓扶起。好不容易上了轮船,才知还有一道手续:到船上服务处,凭船票换取舱位号牌,然后才能住进自己的舱位。

验罢船票,船员扔过一个号牌,却被后面一个年轻乘客伸手捞过去了。吴宓和他理论,那青年指指船员再扔过来的号牌:“那个是你的!”吴宓拾起那支号牌,来到客舱才明白:那青年眼尖,看到他的号牌是下铺,便抢了过去。吴宓要爬上铺,如何能行?

刘尊一上去交涉:“同志,你拿了这位老同志的牌子,你应该是这个,请调换一下。”

那人眼一瞪:“想得美!”

刘:“我看到的,你眼明手快,抢了他的下铺号牌!……”

“放屁!”

刘尊一耐着性子:“他年纪大,攀不了上铺,就当你照顾他了,把下铺让给他吧!”

“让不了那么多!”

有几个乘客好言相劝:“算了,让他一下吧,他那么大年纪,哪能爬上铺!”

“你们不要做东郭先生!年纪大就该照顾?谁知他是什么人?假如是个地主分子……”

吴宓取出工作证和介绍信,说:请看这个,我是教授。

好几个乘客挤过来看。有位20多岁戴眼镜的年轻妇女还把盖有西师学院大印的介绍信拿过来念了一遍。一位50出头的男子把吴宓看了又看:

“哦,你就是吴宓教授!”

但那位强占下铺的先生仍不让步:“教授又怎么样,不过是漏网右派!”

“不能这样说,”戴眼镜的妇女说,“他有国家单位的介绍信,有工作证,是人民!……”

青年:“人民还分左、中、右呢,他这个年纪,又是教授,肯定是地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哼,对这种人绝不能客气!”

刘尊一:“同志,他好歹是个高级统战对象……”

“高级统战对象?不坐飞机?不坐头等舱?……”

戴眼镜妇女:“算了,别和他扯了。吴教授,你用我这个下铺吧,我和你对调!”

那位50来岁的男子:“不行,你是女同志,行李又多,睡上铺有困难。我和他对调吧。来,吴教授这儿来。”

这铺位和戴眼镜的妇女连铺,与那横不讲理的年轻人成对错角。吴宓还想讲客气,刘尊一小声说:别书呆子气了,我们是扯不赢那年轻人的,就算你能爬上铺,和那样的人上下铺,也太不安全。

经这一天折腾,吴宓十分疲乏,往铺上一躺,分外舒展。闭目养神一会儿,他睁开眼,对坐在床沿的刘尊一说:“我不禁想起了

1956年10月,那天,我和紫葛进城买书的情况。”

他详细叙述了那天所遇礼仪之邦的风气种种,以及到餐厅罗列丰盛肴馔,品饮苏联红葡萄酒的情况。然后重重叹息:曾几何时,高尚风气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这般不讲情理的蛮横后生。而饥馑严重到堂堂海员俱乐部只有唯一佳肴——盐汤开水。

难忘的1956年!难忘的1956年啊!多好的形势啊!

刘尊一小声安慰他:我相信,新的1956年会到来的。……到底还是好人占多数,……饥馑会很快过去的。……

刘尊一走了。船舱里渐渐沉静,继而鼾声此起彼落。舱外水浪之声清晰可闻。翻腾久之,吴宓终于入睡了。却只睡了三个小时就蓦地醒来了:他要小便。戴好眼镜,下床站定,东张西望,不知去厕所该朝哪儿走。抚着上铺床沿,欲行又止。迟疑良久,内逼急迫。焦急万状之际,邻铺的那位戴眼镜妇女下床过来小声问:

“你要去厕所?……来,我扶你去。……别客气,你一个人胡乱摸索,会掉到江里去的。”

她扶他出了舱房。没走多远,发现他步履缓慢,便悄声叫他就靠在栏杆边朝江里尿。她细心扶他而江靠近栏杆,然后站在他身后扶持住他。

往回走了。她仍扶着他。吴宓由衷感激:“太感激你哪!你还是位年轻女同志呀!”

“没有什么,你大概比我父亲还年长哩!”

刚刚破晓,刘尊一就来了。手持一根手杖:“你不能没有这个。”

刘尊一昨夜赶到教育工会招待所,办好住宿手续,却担心吴宓手杖丢了,怎么办?筹思再四,快步赶到上清寺春森路民革市委。那里也有一位老同志使用手杖。她要他先把他的这根送给吴宓,“明天白天,我一定给你另买一根。”

为了必须赶在轮船启航之前把手杖送到吴宓手中,她等不得公共汽车早班开班,起五更从两路口跑到朝天门。

吴宓很激动,攥住刘尊一的手:“尊一,你,我的胞妹须曼她们待我也不过如此!你真正做到了斯文同骨肉!……”

“我,只是十余年来,你无数行动,言传身教,有了一点斯文同骨肉的感。比起你对朋友,比如对稚荃,差得太远太远了!”

吴宓急述了昨夜邻铺女乘客扶他小便的情况。刘尊一很高兴,急趋与那位妇女攀谈。原来她也是个知识分子,姓秦。刘尊一恳致敬意,殷切拜托她路上照顾吴宓。

传来轮船启锚的声音。刘尊一匆匆走了。

秦女士确实热心照顾吴宓。白天不能在船栏边撒尿,她就邀请那位让出下铺的男子扶吴宓入厕。而夜里小便仍是她扶持。洗脸,刷牙,上餐厅吃饭,无不用心扶持。买饭,取饭,找座位,取筷、勺,照料细致。饭厅的旅客们还以为她是他的女儿。

到了武汉,武大的刘永济教授派他的女婿到码头迎接吴宓。吴宓正拟盛词感谢秦女士,她却匆匆招了招手:“再会!”便自走了。

吴宓追悔莫及:糊涂!怎么就忘了问清她的职业、地址,以后好登门致谢呢?

但他却也极为宽慰。因为她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华道德,斯文同骨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万世绵延,于此可证。

36

淡淡的悲凉

此次南游羊城北历京都和故乡,吴宓得到一点小小经验:老年人独自旅行,火车远优于轮船。因为火车场地紧凑,车厢布置严密,规范性强。入厕、盥洗,均可扶杖摩依床、门,来往自如。只要上、下车有人送、接,独自旅行基本无困难。

到了武大刘永济教授家中,吴宓颇感耳目一新。不知是中南的自然灾害小于西南,物资供应优于四川,还是刘教授为了迎接老友,长期谋划积蓄,刘教授家吃饭仍循旧规:锅里添饭,桌上菜肴荤素俱全,柿椒肉丝、小白菜、韭菜炒鸡蛋各一小盘,还有番茄菠菜汤。这在重庆,简直是不可估价的盛饕。而且,吴宓按重庆习惯,取出粮票,照交自己的口粮。主妇恳切谢绝:我们有粮食。招待你短期绝无问题。

离开武大十二年多了。昔日老友,大半还在,纷纷来访,应接交谈之余,吴宓得到几点类似感觉。相见欢,旧情浓,却是岁月不饶人,韶华易逝;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旧友苍老得多了。而且,握手言欢之际,绝不谈及政治,不谈感想,叙旧情,谈往事,措辞都很谨慎。往昔那种书生豪放,恣肆纵横之气,几乎都随大江东去。

各地友朋中,惟有两个入完全例外:陈寅恪和刘节。

吴宓由刘永济送上火车，到达广州已是深夜。陈寅恪的二女儿、女婿及三女儿到车站迎接。大雨滂沱中到达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宅。陈寅恪尚在坐候。一见面，陈寅恪紧握吴宓的手，朗声说：

“望断巴蜀路，终于盼到你来了！……少年朋友，垂暮相逢，不容易呀！……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后天，……详叙别后春秋，痛抒积悃！……”

刘节是吴宓和陈寅恪的学生。这时已是资深教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也较有名气。原因为：一是他学识渊博，被认为在中山大学文科教师中，仅次于陈寅恪；一是他桀傲耿介。见到吴宓，坦率话旧。他说，他与陈寅恪师一致，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绝不作违心之论。

其次是陈序经。他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岭南大学校长，现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还是那样热情、诚挚，在吴宓留住中山大学的四天中，多次偕夫人来访，恳邀吴宓到他家中叙旧。他向吴宓详陈了十年来的情况，其中谈到被批判的情节，娓娓相告，却是无所怨尤，也无得失之心。谈到今后，既不颓伤，也不矜诩，唯愿勤恳工作，做国家的螺丝钉，做黎民百姓的老黄牛。“总而言之，不失为胸怀坦荡之君子”，“堪称高士”。吴宓说。

吴宓的广州四日，皆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

陈寅恪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观其食，似乎广州的副食品供应远非重庆可比。甚至可以说，特大自然灾害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尤其留穗的最后一天，两次正餐都在陈家。陈夫人唐筮做了许多菜，鸡、鱼、肉俱全。这在重庆，是不可想象的。这情况，当是广东并未遭受“自然灾害”；要不然，就是陈寅恪得到了特殊优厚的照顾。

中山大学办公室以陈寅恪的名义，设宴款待吴宓，并邀陈寅恪的好友、南方著名女学者冼玉清教授及刘节夫妇等作陪。像这样，

学校当局设宴招待本校教授的来客,在重庆也未听说过。

吴宓后来说:宓乃深悔当年未就聘岭南大学,痛失良枝之栖。

尤令吴宓感慨系之的是:刘节如此桀傲,竟然未被划为右派分子;科学院邀陈寅恪任所长,陈竟提出条件谓:他主持研究所不学马列主义,并要毛公、刘公给他写一允许不学马列的书面批语,“以作挡箭牌”。如此这般,仍然对陈照顾有加。历次运动,陈寅恪概未参加“学习”。也未写过历史交代材料与思想检查。迄今为止,仅有前党委副书记龙潜在陈不在场的情况下斥他为“反动”等语;红专大辩论时,贴过他的一些大字报,其中最严重的内容不过指斥陈寅恪为“老古董”、“老顽固”等,而领导随即又对此作了纠偏,龙潜副书记还曾亲自登门道歉。“凡此种种,均宓在四川所未见未闻。”“宓乃深信张劲公不能窝在四川之说确有道理。”

吴宓的长女吴学淑在广州工作,闻父南来,连日趋侍膝下,颇有舐犊之情。吴宓想到业与夫人陈心一离婚,“殊觉内心不安”。因此,陈寅恪及夫人两次劝他与陈心一复婚,他都点头称是。内心也确作此想。可惜后来的发展不是他所能独定,以至破镜未能重圆。

羊城小住,和陈寅恪长谈了三次。情词恳切,畅叙别后情况。两人意见一致的是:

都希望神州大地像 1956 年那样发展下去。

中华文化传统必须坚持。一切正直之学人都应当为此献身。

为此,经学、史学不可废;孔孟之书不可废;汉字不可简化,至少不可废弃繁体字。汉语拉丁化不可行,也绝对行不通。

陈寅恪还送给吴宓一本他的近著《论〈再生缘〉》。吴宓连夜细读后,向陈谈了自己的看法,基本同意陈著所论。

却也小有分歧:

吴宓将他带来的 1952 年 7 月 8 日重庆《新华日报》所载他的

文章,念给陈寅恪听了。陈安静地听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询问:

“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无造作之词?”

“是的。”

“秉笔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将刊之报端乎?”

“当然知道的。”

沉默。吴宓折叠收拾好文章,陈寅恪才说:

“他们没叫我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如果叫我写,我也是不会写的。这一点,你比我强。”

吴宓默然,未置一词。内心却对陈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赞成。但他未对任何人说过。

直到1974年吴宓在本书作者的那间小屋里和作者叙述这段往事时,才一一引举如下:

陈寅恪所提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很欠明智”。“既考虑就任其所长而提出其根本不可能接受之条件,此种作法实在费解。明知其绝对不可能接受,居然提了出来,实为特殊之拒绝方式。只可能解释为故意激恼对方。……”

红专大辩论,大字报贴到陈寅恪家门外,语多不敬。陈寅恪很生气,向领导询问,又提出他要辞职,搬出中山大学。吴宓说:“假令中山大学之领导竟然批准其要求辞职,搬出大学,则陈公一家大小将如之何?于此可见,陈兄对新中国之现实一无所知。全然不知道处今日之中国,组织关系乃不可须臾离也。没了组织关系,就无存身之地。……”

这么几条不以为然,却是秘而不宣,这岂不是腹非?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非,大非朋友之道。别后,吴宓越想越觉不爽。自1963年暑假起,多次计划再访陈寅恪,俾得坦率直陈,讨论讨论这些不以为然之处。无奈陈夫人回信:暑假太热,建议推迟行期。随后又因教师进修班人员从农村劳动回校了,吴宓要上课。到1964

年,他带的研究生因“婚外恋”,追查思想根源,说是“受了吴宓的影响”。累及吴宓检查“批判”。继而文革兴起,他再访陈寅恪的计划就落空了。

文革浩劫,音讯阻绝。吴宓在被斗之中仍念念记挂老友陈寅恪。1971年,他不顾自身处境如何,迳函中山大学革委会询问陈寅恪的消息。其时,陈寅恪夫妇早已逝世三年了。

再说1961年,吴宓辞别陈寅恪后,来到了北京。贺麟热情欢迎了他。陪他畅游饱览故都新颜。不用说,北京比从前大多了,也繁华多了。吴宓却为古城墙被拆掉而感到美中不足。

参观清华大学令他感触尤深。清华这个老地方,却远远不是旧时面貌。新建了许多高大楼房,旧清华的老房子夹在这些新建的大楼中,显得矮小陈旧。校园格局大变,昔日清华,若有若无。而来来往往,绝无吴宓熟悉的面孔。这位陌生的老人走进了完全陌生的高等学府。回首当年的清华生活,暖然如在梦中。

贺麟告诉他,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周扬很关心他。曾说:可把吴宓调到北京来,主持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具体单位,可根据吴宓的愿望,落在北京大学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贺麟问:你是不是去拜访一下周扬?如去,我可以去联系并陪你同往。

吴宓考虑到三个原因,决定不去。

一个:在广州听陈寅恪说,1959年周扬赴广州公干,专程拜访过陈寅恪。先叫陈序经去约定时间,陈寅恪拒绝接待。经陈序经反复劝说,才勉强答应,约了时间。到陈序经陪同周扬来访,周态度谦逊,而陈寅恪却很为矜持。并且主动问难,说有关领导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周扬耐心解释,陈寅恪却一再责难。然而周扬始终彬彬有礼。

陈寅恪以周扬来访,矜态相见。吴宓上访周扬,还请贺麟先

容。我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学问虽自愧弗如，品格历来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扬名下高下差别如此？两相比较，能不自愧？

一个：我与周扬，在二十年代就认识，也算是个朋友，现今他官居朝中大员，我就去上访，且有求调北京之目的。这正是有所求而干谒。宓平生自爱，未尝干谒权贵，何乃暮年不顾操守？

一个：宦海浮沉，古今皆然。高岗、饶漱石垮台于前，彭德怀沉冤于后。周扬能否长保富贵，殊难预卜。我犯不着为调北京之一区区小事而和他粘上关系。为芥蒂小利而冒大风险。

吴宓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还是和贺麟畅叙别情，也会到了一些老朋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的这两句诗，可为吴宓还乡探亲之写照。重回陕西泾阳县安吴堡，胞妹须曼招待热情，陪他寻亲访友，追寻童年踪迹。可惜的是，街巷依稀，人物大非。童年伴侣，十九难寻。又时值第三个特大灾害之年，庶民饥馑，闾里萧条。老屋还在，不过庭院颇觉破落。而且，多户分居，条块断隔。睹景思昔，不禁惆怅。

最是心胆俱裂莫过于会场的雷鸣吼叫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起初,文革的波涛只在吴宓所住小房之外激荡,他主要从报纸、广播上感受到这一新运动的非凡气势。

浪涛终于冲进了他的房子。一群红卫兵闯了进来,直入寝室,掀开布幔,大骂:“他妈的,果然不错!你这封建堡垒,竟敢大搞封建迷信!”七手八脚,抓起别有邹兰芳照片的《吴宓诗集》,因为诗集竖立于茶几之上,照片旁写了《亡室邹兰芳》。他们说,这是给死人供牌位。便把书和照片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力践踏。一个红卫兵指着吴宓大叫:

“你这个封建堡垒,为什么搞这一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刷地一耳光扇过来,吴宓眼冒金星,两耳嗡嗡,幸亏两臂早已被人扭得死紧,没有栽倒。另一红卫兵追问:“有什么政治目的?说!”同时,又扇来一耳光。人们揪着他的两耳,把他提拉到客厅,一迤来到悬挂毛泽东肖像的墙前,人们喝叫:“跪下,给毛主席请罪!你个杂种,只把伟大领袖的像随随便便贴在墙上,却把你那死了十几年的臭老婆香案供奉!该当何罪?”

吴宓没有依令跪下，一个红卫兵在他后腿弯猛踢一脚，喝声：“跪下！”他扑通跪倒在地上，左右揪他耳朵的红卫兵却并不松手，一直紧拧他的耳朵，拎住他直挺挺地跪着。几个红卫兵七嘴八舌地骂：“跪好！向毛主席悔过请罪！”“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变相侮辱人民领袖！”“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他后脑勺着了一巴掌。

吴宓但觉两耳欲断，痛人心肝。脑子里火辣辣，乱糟糟，糊里糊涂，不知说什么。由于两耳疼痛难当，似闻责骂喝斥，却也不甚了了。久之，忽觉背上被猛踢了一脚，他扑地伏倒昏糊。渐渐痛定清醒，屋内再无他人了，他挣扎起来，关上门，静坐思考：文革革到我的头上了，得准备他们再来。最要紧的是将自己的日记、文稿、著述，以及重要书籍转移一个安全地方。可是，眼下又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自己交游久绝，现尚联系的二、三朋友说不定也自身难保。急不暇择，姑且托几个偶尔来访的在校中文系学生，每人托付几样，他们都表示深爱吴夫子，极愿尽力，一定设法珍藏。

但刚刚开始转移，抄家的来了。将他屋里全部写的、印的书、稿、本本，悉数抄走了！再不几天，吴宓便被吆进了牛棚。恰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拎起两条棉絮，离开了自己的家。

牛棚“闲散”不久，吴宓就被单独隔离了。迁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除一张单人小木床之外，别无他物。屋里地面积水2寸有余，床脚立于水中。经请求，允许他去室外找到几块断砖，叠成踏墩，他可以踩墩来往，上下床亦即进出房门。工资取消了，月发给他生活费15元，还须扣这小房的房租及那盏5瓦电灯的电费。加上吴芳吉大儿子等人的接济（注：吴宓曾长期接济吴芳吉的子嗣。文革中，吴宓极困难时，吴芳吉的大儿子吴汉骧曾每月给吴宓寄5元钱），他也只能在大食堂买咸菜下馒头。内衣脏了，自己拿到水管冲一下，晾在门扇上，阴干再穿，外面的中山装就谈不到洗换了。虽然如此，活命却也无大问题。要紧的并不是能否活着，而是要随

时挨斗。究竟斗了多少场，吴宓记不清了。总之是两种斗法：一是集体挨斗，大半是他与若干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充当陪斗角色；一种则是吴宓单场演出。斗争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格局：

大会集合，革命歌声气壮山河；宣布开会，简短动员；斗争会开场，全场怒吼，揪出斗争对象，把他置于主席台下，立正、屈膝、躬腰、低头，双臂前探，状如喷气式飞机；然后是喝令交代，揭发，批判，追问，围上来拉、扯、踢、打，口号震天动地，吼声如雷。

吴宓的罪名很多：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蒋介石的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等等。经过头几场斗争大会后，吴宓得出了结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俎上之鱼，怎么着也得挨刀。无论怎么交代，反正少不了揪、打、踢、骂，不如省点精神，支吾一、二句后就不吭声，横下一条心，由他辱骂殴打。熬过这半天就了却一场戏，又可以苟延残喘三、五日。“总之，我第三个二十八年的寿命短不了！我要熬到亲见……！也为了孩子们……”

当他在我那小屋里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叙述被斗情况时，说：“辱骂吼叫我已司空见惯，揪扯踢打虽然痛切肌肤，久了也就多少习惯了些，喷气式确实极乏极累，咬咬牙也还能死命支撑过去。我最惊恐者莫过于开会之初，先将我置于会场左近不远角落，但听得会场震天动地雷鸣怒吼：‘把吴宓揪出来！’迎面有两个壮汉奔来，各舒一手，抓起我的左右臂，风掣电驰奔向会场，待我脚不点地、运足不及之际，他们‘刷’地甩开手，我就猝不及防，扑倒在地，冲力大，跌得重，脑轰、躯裂，四体散架，其痛苦殊难言语形容；还不待我呻吟，他们又以无比之大力，如抓鸡拎鸭，拎起我飞进会场！所以每闻那声‘把吴宓揪出来！’我就心胆俱裂。……看，我这腿，就是这样摔断的……”

吴宓生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讶。这时他已年过古稀，那么摔

下去,却跌断了髌骨,伤了膝关节,而股骨颈竟然无恙。尤其可怪者,跌断后不仅未获医治,还继续挨斗。后来居然错位愈合,能跛瘸行走。

吴宓这样一个上课不多的老教授,却被翻来复去地大会斗争。哪来这多斗争内容?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事属创举,自多发明。专场大会斗争的内容亦然,以斗吴宓的斗争会而言,大别三类:

一曰抓住所谓“钢鞭材料”,揪牢几条,穷追猛打,挖掘“罪恶”。

吴宓有三条“现行罪状”:1、供臭老婆的亡灵牌位;2、课堂放毒,说“三两尚且不够,况二两乎?”3、肆意宣传帝国主义文化。

每个罪状立几个专题,若干子题,随便揪一个子题也要斗好几场。

今天斗吴宓腐蚀所培养的进修教师而大搞反革命文化活动的罪恶目的……

明天要吴宓交代紧锣密鼓进行上述活动的罪恶勾当……

后天要穷追吴宓在上述活动中和走资派的勾结……

二曰打开人事档案,信手拈来。这个取材最为广阔。留学美国,与美帝勾结,什么政治背景去美国?在美期间和美帝密谋,回国时接受了帝国主义哪些指使?承担了何种反革命任务?回国后历年为美帝效了哪些犬马之劳?年纪轻轻主持清华研究院,是什么间谍、特务力量支持的?与鲁迅为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方面……等等。

三曰即兴命题,专场斗争。

今天专打吴宓的态度……

吴宓一贯标榜他热爱祖国,今天就来专场斗争,撕开他的这张画皮。

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吴宓,交代你最大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人们怒吼,追问,渐露端倪——原来是要吴宓交代他参加 P 所组织的反革命政党!

这时,已在全国夺了走资派的权,西师党委书记张永清也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西师造反派组织办的小报、大字报等都大声疾呼:“彻底清算张永清的滔天罪行!”号召张永清当权时的一切“黑干将”、“小喽罗”反戈一击,揭发张永清,立功受奖。有个民革成员、历史系讲师 L 吃斗不过,极想不择一切手段,解除斗争之苦,便响应号召,说他曾做张永清的黑干将 P 的小喽罗,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他上下串联,收揽人心。人们据此穷追,加以启发诱逼, L 顺竿爬,捏造交代,很快形成了完整的交代揭发材料,说是在文革前,张永清掌权时代,以 P 为首,组织了一个旨在取代中共政权的政党——某某革命党,骨干成员有 L 本人、地理系教师陈平章等等。并开了若干次会,某次在某处,某人坐何方,讨论通过了党章、政治纲领;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开会,通过了党中央的人事安排;某年某日在某处开会,通过了发展组织的计划,并商定了发展对象,其中有吴宓,由 P 负责介绍,并确认这是重点发展对象,因为吴宓有国际声誉,在美国影响大,可以通过他取得美国支持。……

造反派大喜:这是特大捷报,要乘胜猛追。所有入了 L 交代材料的人员全部关进黑房子,昼夜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于是,对吴宓的斗争陡然升温。他那水漫小床的黑屋子门前,有专班红卫兵看守,一切全如单身牢房,吴宓早已见惯这类无中生有,也炼就了适应这种荒唐斗争的能力,不论怎么问、斥责、吼叫,他依然平心静气,在追逼不过时答上一句:“纯属捏造!”“绝无其事!”“我和他们根本不认识!”行动不自由,且又跌坏了腿,行走艰难,就尽量少动,一天上一次食堂,吃一碗稀饭,带回两个馒头和一瓶开水,供午晚两餐之用。一天上一次厕所,其余时间有尿撒在脸盆里,甚至干脆尿在积水数寸的地上。无力洗衣服,

采取轮换干洗法,若干天换一次,换下的挂在墙上,过几天取下再穿,保证不生虱子就行。

38

还是活够这第三个二十八年

吴宓很久没洗澡了，周身皮肤干燥奇痒，极为难受。这天，值班看守的红卫兵换了一高个子，宽肩窄腰，身材匀称，估计是个好心人。试试运气吧。

“红卫兵小将，能不能准我洗个澡？”吴宓试探着问。

“你要洗澡？”红卫兵迈进屋来。这可叫吴宓颇为吃惊。小伙子脸型竟与身材极不协调，浓眉、扁鼻、尖腮，眼神尖刻。“好！”他表情奇特，“你等着，老反革命分子，我就来侍候你！”

一会儿，他叫来一个黑蛮红卫兵，并抬了一桶冷水来。“下来，扒光衣服！”他命令吴宓。“我们来刷洗你这个豺狼！”

“不敢麻烦你们！”吴宓哀求，“让我自己洗一下就行！”

那两个不由分说，将吴宓扒光了，拉下床，立在泥水地里，高个子一手拎着吴宓胳膊，一手挥动刷大字报的棕毛大浆刷，那黑蛮小伙子用搪瓷饭盆朝吴宓泼冷水，高个子用棕毛刷子就着水势乱刷一阵。时正乍暖还寒初春季节，冷水沁凉。

“哎呀，哎呀！”吴宓打着寒噤叫唤，“谢谢，谢谢！饶了我，饶了我！我受不了！冷，痛！……”

但两青年置若罔闻，继续操作，还兴趣盎然地边操作边对话。

“如何,有趣不?”

“有趣得很,高级游戏!”

“不行,要上网上线。”

“对,对,正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教导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我们这是冲洗污泥浊水!来,朝背脊梁淋一下!”

“给他一个醍醐灌顶!你这老家伙,叫唤个什么?想当年,你在美帝那里,高车驷马,我们有资格和你说话吗?”

高个子且刷且唱《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另一个也边淋水边唱《毛主席语录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吴宓越叫越厉害:“哎呀,受不了呀!救命哪!救命!……”

高个子气了:“个龟儿子,不识好歹!”猛一松手,吴宓跌坐在泥水地里。另一青年提起水桶,朝吴宓劈头盖脸倒下来。“哈哈,冲掉你的反革命气焰!”

吴宓打着寒噤,脱口而出:“你们太黑良心了,这样整我!”

高个子:“这样侍候你叫整你?你看见过‘整’没有?那是要‘下零件’的!”

黑蛮:“你懂吗?‘下零件’就是要把你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老混蛋,这不过是和你戏耍戏耍!”说着,他们两个跳出了小房,

吴宓虽是冷得不行,却也并未冻僵,只是坐在泥水地里,屁股、腿、脚全糊满了泥浆。他拿衣服胡乱擦了一把,急忙爬上床,捂着被子哆嗦。渐渐身暖脉活,脑子里却万马奔腾:这文化大革命太折磨人了,体罚,百般侮辱,肆意践踏人格!我为什么忍受这些?活得太卑贱,太屈辱!中午、晚上,他没啃冷馒头,也没喝水。第二天

早上,高个子来带他去吃饭。

“谢谢!我不吃饭!”他答。一连两天不吃不喝。高个子发现问题,哼了一声:“哦,你绝食了?绝食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

两个钟头后,来了几个男女红卫兵,七手八脚,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进一根胶管,然后动作极其粗鲁地灌进了-一大碗泔水饭菜混合物,再加了一些水,把他的胃填得鼓鼓胀胀的。

吴宓从未吃得这般鼓胀,直撑得五脏憋闷。加上泔水腐秽怪臭,薰得他脑酸泪流,说不出的痛苦。他禁不住起坐转侧,捧腹呻吟。死!只想快死,却是无法能死。裤带、袜带,一切可以用来自缢的东西都早没收了,何况门前有人监视。碰墙,触电?墙是篾笆泥糊,地是泥水稀浆,撞不破脑袋的!

高个子盯着吴宓,讽骂间作:“哪个?难受?这叫鼻饲,有点味道的!你猖狂反扑,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对付你,叫你知道革命派的威力!……你唯有俯首投降,彻底交代,认罪悔过,才是光明前途!……”

吴宓一连叫鼻饲了四天,而且鼻饲的总量逐日加多,鼻饲物中的泔水含量也逐日递增。痛苦有增无已!

白班看守的红卫兵换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青年。他来到吴宓床前,好言劝告:“……你是个国际知名的学者,这点也不明白吗?……自杀,是弱者的表现,是对革命人民的威胁手段,是自绝于人民!而且,绝对死不掉,不能得逞,白白自找痛苦。……”

是呀,死不掉!这年头,死也是没有自由的!大概是天意?我必须活够这第三个二十八年!吴宓认真思索:活下去!继续忍受这特殊屈辱地活下去!为什么忍辱苟活?唔,《汤誓》曰:“时日曷丧……”我忍辱活下去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传之后世,

使千秋万代引为殷鉴……

小青年似有所觉：“行了！听我劝告，我给他们说，明天起，停止鼻饲。我给你买饭菜来吃！”迟疑一下，小声说：“你不要顾虑了，眼下，大概不准备开你的斗争会了，你也用不着绝食了。”

原来，L编造的那个“反革命集团”案有了新的论断。经过连月苦战，“黑干将”们一个个按L的交代供认了。唯有那个被L指为该“反革命政党”宣传部长的陈平章坚决否认。

陈平章，湖南湘乡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在西师地理系任教。其人英俊诚讷，治学谨严，谦虚对人，却很少交往。学生来访，答疑解惑之外，不作寒暄。工作极为勤奋，每次讲稿必要修改重写三四遍；知识渊博，教学极受学生欢迎，领导好评。他自被L指供后，即被重点禁闭。他却顽强不认，斗争因而日益加温，长期反绑两手，昼夜悬在梁上。每隔8小时放低悬挂，至芭蕾舞式的脚尖点在地板上为度，以缓解儿十分钟。每日给两碗稀粥，将粥碗置地上，将他放倒反绑俯卧在地板上，如猪就槽食泔，吸完稀粥，就再悬挂起来。每四小时换班轮流审讯，且审且打，皮带，棍棒，军用厚底皮靴重踢，逼他招供。他却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回答：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认识这伙人！……我根本和L无来往！……打死我也要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

后来，审问的人耐不住了，直接提出L交代、其他“干将”承认的事实逐条审问陈平章，陈当即指出：L所说的“反革命集团”开会时间，正是陈平章在上课的时候。“上课的系、年级、班次，教室地点，都可以查对，我没有分身术……”

看看陈平章悬绑日久，手脚、腿、臂尽肿，丝毫不屈，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绝不招认，人们决定姑且松绑禁闭。

审来审去，内查外调，终于发现，L所说的反革命集团第一次开会通过党章及政治领袖的那一个星期，P根本不在学院，他在北

京开会,而所说确定吴宓为重点发展对象、P去动员他的那次会议,那天P正在市里开会。L之捏造交代,被完全证实了。

拨乱反正时,西师学院领导曾在大会上严厉批评L胡乱编造,制造混乱;同时高度评价了陈平章严刑之下坚持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陈平章却谦虚如故,勤奋有加。由于“文革”中这一冤案的非刑拷打,他的心、肾、肺脏都受了严重损伤,健康日益恶化,他却带病坚持,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还出版了《怎样认识星座》等译作。文革过后,多次评定职称,他都没有申请,但因他德才有口皆碑,西师和四川高教主管部门主动给他评了教授职称。1989年5月,他终于重病不起,心肾衰竭而去世。鉴于他在“文革”中所表现出的可贵品质,许多和他来往很少、甚至从无来往的干部、教师、职工,都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在挽联和祭幛挽词中盛词赞扬他的气节、品德、真才实学和教学贡献。这种情况,在西师前此的追悼会上很为罕见。——这些都是后话。

且说当时,由于陈平章的坚持,揭穿了L先生的胡乱捏造,冤案大白。被冤的人都松了绑,被“挂了起来”。

吴宓被允许可由红卫兵陪同,到食堂买饭、打开水。他意外地发现,经过四天绝食、四天鼻饲,加上严厉禁闭二十几天,他那跌断的腿竟然能跛行不痛了!

39

黑旗队杂俎

吴宓终于熬过了大会斗争的苦难日月。文革的巨浪仍不断拍起惊涛骇浪,席卷神州。全国一片混乱,枪林弹雨,动辄千军万马的大武斗,烟尘滚滚,碉堡林立,批斗校内的牛鬼蛇神已是末务。且把他们挂起,重又编成黑旗队,就地劳改。

原来在“造反派”分裂成两个阵营之前,西师成立了庞大的黑旗队,就牛鬼蛇神中指定一人为队长,另有几个红卫兵监督管理之。这个队的牛鬼蛇神,含院党委书记等“走资派”,还有文革前刚刚到校的新任院长徐方庭。徐方庭五十年代曾是西南文教部的副部长,大区撤消后调国家教育部任普教司司长。徐在文革前被派到西师任院长,刚刚到任,就在这里当了“走资派”,分在黑旗队外语系支队;吴宓则编在中文系支队。

造反派两派互斗之后,原来的黑旗队基本解散。又把一些未摘帽的“分子”以及吴宓、F公等人编成了一个不属任何系科的黑旗队。

黑旗队全日出工,上午集体挖土担泥等等,下午出工后分段清扫校园。一律有出工、收工程序:整队清点人数,齐唱《毛主席语录歌》,唱罢高呼:“向毛主席请罪!”随即一齐低头躬身作90度深度

鞠躬服罪状,值班红卫兵即对之指点辱骂,以至挥舞棍棒、皮带,随意乱打,最后喝令:“滚!”这才出工或收工。吴宓在向我叙述这一情节时赘以庆幸之词说:

“简言之,每天法定挨打四次。但这比斗争会好,不是前后左右乱打,而是只打后面,且系深度鞠躬,棍鞭自然多着于臀部。臀部耐受力最大,伤害危险最小……所以,我们这些老弱,还庆幸此种体罚制度!……”

还有,吴宓想不到,竟与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同作黑旗队员,深感荣幸。

“他们都作了牛鬼蛇神,何辱之有?何况,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头号走资派,牛鬼蛇神之大者也。然则我吴雨僧与刘公少奇同榜捷于南宫而登进士第矣,何幸如之,何幸如之!……”

于是,吴宓向我讲述了一些两届黑旗队的杂俎。

(一)淫威

某天上午,烈日当空,黑旗队正在奋力挖土,F公也在挥汗劳作。一红卫兵突然喝斥:

“F,你狗日的,怎么不展劲?”

F公且挖且答:“报告!我是展劲的。”

红卫兵小伙子:“你个龟儿子,还敢顶嘴!不收拾还行?”

他迈到F公身边,抽出腰刀,搁在他的脖子上:“我宰了你!”

刀刃切在皮上,欲破未破。“你个狗日的走资派,我宰了你!割下你这狗头!”

小青年紧摇刀柄,恰似千钧一发,就要人头落地。F公这位西师学院创立之初的最高领导人,吓得面无人色,躬身挥锄的姿势凝面如塑,身颈悚立,小声请求:“我接受教育,请红卫兵小将宽大,宽大!莫下刀,莫,……莫!请求……”

红卫兵侧转刀刃,将刀片子在F公伸长的脖子上掙来掙去,快活地骂:

“你狗日的也怕死吗?好吧,饶你这一遭儿!”

刀片重重地在F公脖子上拍了两下,喜剧收场了!

有一段时间,吴宓下午打扫的区域,在办公大楼附近。这天下午,他正在努力清扫,忽见一个红卫兵吆着党委书记张永清走了过来。到得大楼门前,那红卫兵命令张永清:

“在这儿等着,叫你,就上来!”

“是!”张永清恭谦地回答,同时立正躬身。

红卫兵上楼去了。张永清面对办公大楼,立正伫候,却是周身哆嗦,双手抖得厉害,头上汗出如沛,脸上肌肉还不时微微抽动。吴宓深为同情,假作扫地,扫至张永清身边,小声说:

“张院长(注:徐方庭来后,他是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那边有长椅空着的,他们又不在,你去坐着歇会儿,……”

“不……”张永清答不出声,语言在哆嗦中不成词句。

吴宓:“你怕个什么?大不了他们打你几下!太阳这么烈,你这么站久了,可能高血压发作,那就更危险了。坐吧!四下没人……”

“不,不!”张永清语音更颤抖得厉害了。

吴宓在心里旁白:时移势异,那么令出风行的大干部竟尔如此,运动的威力一至于此!党委书记总是忠于党的干部,却被百般作贱至此,究竟要干什么呢?

三层楼上的窗口伸出了那个红卫兵的头:

“张永清,上来!”

“是!”张永清火速迈开颤抖的双腿,踉踉跄跄奔向楼梯。紧接着,双手抱着扶栏,挣扎着上楼而去。

(二)捉癞哈蟆

这一天,看押黑旗队的红卫兵随意提走了十多个老弱黑旗队员去拔草。内中有吴宓和刘尊一。拔草本是轻活儿,但拔来却格外吃力。杂草丛生,根深蒂固,地面干硬,又没有任何工具,徒手操作,却要连根拔除,不留残根。刨扯拔挖,全力以赴。不多久,人们就腕酸腰痛,指甲磨损,指头渗血。刘尊一尤其困乏。她早已年过花甲,有高血压,四肢腰脊屈伸不利。扯马鞭草都感气力不及,拔除高大的臭蒿就更吃力了。偏又遇到一簇特别粗大的臭蒿,她双手抓紧蒿杆,用尽全身之力,摇拉拔扯,不仅未能动摇分毫,却因用力过度,腿颤腰软,猝地跌跪在蒿杆旁边了。哪敢就此松手?她只得就势跪在地上,抱抓拉拔。脸红气喘,汗流滴哒。两个红卫兵却在一旁指点取笑:

“你看,你看,这才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却从另一臭蒿旁的草丛中窜出一支癞哈蟆。那红卫兵便打住话头,命令刘尊一:“快,捉住!捉住这癞哈蟆!”

刘尊一撂下臭蒿,来不及站起,膝行快追,扑向癞哈蟆。却是扑了个空。另一个红卫兵大喝:

“这么笨!快,追上去,捉住!再敢怠慢,叫你吃皮带!”他提起腰皮带,做欲打之势。

刘尊一慌忙跪爬追赶。癞哈蟆偏有这么恶劣,只一跳就闪开了,然后,蹲在远处朝她睁眼哈嘴,似在嘲笑她的无能。

刘尊一来不及直腰伸腿,掌膝并用,犬行前扑。红卫兵仍嫌她不展劲儿,“刷,刷”,朝刘尊一痛抽了儿皮带。她只得拼尽全身之力,加快速度,在草丛中急趴追赶。两个红卫兵乐得哈哈大笑。

吴宓目睹这副惨状,站起身要发话抗议。却在这时,“啵啵”一声,好大一块方板从天而降,砸在刘尊一身上。原来是横跨上空的特大方板组成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思”字垮落下来了。

刘尊一吓痛并甚，瘫伏在地上了。

吴宓赶紧抢过去，鼓足气力，掀开了那张三公尺见方的“思”字大木板，刘尊一看到了“思”字，又抬头望了望上空。一目了然，特大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变成了“毛泽东想万岁”。她吓坏了，下意识跳起身：

“红卫兵小将们！这是大事，得马上把‘思’字挂上去，……”

一个红卫兵漫不经心地问：

“干什么吓成这模样！”

刘尊一：“这，这，你们看，伟大的口号变成什么？变成了‘毛……’”

吴宓敏感到，刘尊一要说出“毛泽东想万岁”。这可不是小事，按“文革”常规，不论什么原因，不管上下文，只要从你嘴里嚷出了可以上纲的字眼，就是你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行。他深恐朋友掉进陷阱，慌了。立即跳过去，猛朝刘尊一大喝：

“快！速癞哈蟆！”

刘尊一的话被打断了。红卫兵却大怒：

“吴宓，你个狗入的，有你指手划脚，大喝小叫的？……”

另一个红卫兵：“别和他废话，打！”

拳、脚，皮带，雨点般朝吴宓打来。

吴宓在殴打中窜窜跌跌，栽倒了又站起来。好几分钟，他突然来了个主意，大叫：

“你们是什么红卫兵？这么伟大的革命口号叫风吹坏了，你们不赶快挂好，却来打人。我要检举你们！我誓死捍卫革命口号！”

果然生效了。红卫兵们撂下这群牛鬼蛇神，张罗挂好口号去了。

直到出了黑旗队，刘尊一才有机会向吴宓表白，那次，她简直吓懵了，差点自投罗网，说出“毛泽东想万岁”。幸亏吴宓紧急措

施,打断了她的话头。

“可是你却为我挨了那么一顿好打。兄长深情,令我永世难忘。”

吴宓却问:“想不到你会慌乱到那种程度。尤其奇怪的,你为什么甘愿四脚着地,牛行狗走,供他们嘲笑取乐?”

刘尊一说:我在土改队看惯了戏耍地主,三九天喝令下冬水田捉泥鳅,摸蚌壳……。

吴宓:但是,你那次,是作畜牲,作牛马,四脚行走啊!……

“哎呀,雨僧兄长!”刘尊一说:那么多大、小报告,大课,大会,小会,耳提面命,千万遍说过,要我们知识分子别翘尾巴,“又翘尾巴了!”什么东西有尾巴?四支脚走跑的动物才有尾巴呀!“我们早就是‘四支脚’啦!”

吴宓:然而,你那次是形象地做了四支脚的动物!“自尊如此!士可杀不可辱嘛!”

刘尊一凄然欲泪:

“兄长!我并不怕死。其所以甘愿自尊,乞求苟活,只因为害怕孩子们作血仇子女。我死何足惜?孩子们就会子子孙孙永入另册……”

吴宓有如挨了闷棍。冷了半晌,才沮丧地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古入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那只是逼口供罢了。而这株连之法,才真是何求而不得!……”

(三)烂草帽

几天后,黑旗队紧急集合,押往北碚广场开大会。原来近日游斗大走资派,今天游斗到了北碚。

偌大的广场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锣鼓喧天,红旗盖地,革命歌声、口号声震动山岳。

重要斗争对象揪出来了：

第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第二个：四川省委第二书记廖志高。

第三个：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任白戈。

接下去是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几个书记们。

主席台下，面向群众，站着比他们级别低的“走资派”。台上台下的走资派一律衣服绉折、污秽，满脸晦气，蓬头乱发。每人脖子上套着系挂黑名牌的钢丝。黑牌系钢板特制，横在胸前，上书黑色大字，曰：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XXX”。

李井泉胸前的钢板似乎更大一点，他那几乎全白的头发乱如鸡窝，眼睑浮肿，深蜷腰肢，撑持着喷气式的姿势。李井泉一个劲儿承认自己是“罪恶滔天”的走资派，愿意低头认罪，请求革命群众宽大。但是，群众并不饶恕他。揭发、控诉，咬牙切齿，要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最高规格的斗争会，各大学院校的牛鬼蛇神还不够资格陪斗。只是押着他们来观看，“接受教育”。……

散会了，黑旗队须待革命群众散尽后才得押解出场。一个红卫兵抓起一顶揉叠垫坐地上的烂草帽，朝吴宓头上重重一扣：

“牛鬼蛇神就得有个牛鬼蛇神的扮象！给我戴上这个！”

吴宓不敢反抗，他看得清，这就是那天割 F 公脖子的那个小伙子。

谁知，这伙黑旗队被押着出广场侧门时，途经两辆卡车中间的间隙，有一个红卫兵叉立在两车栏板之上，让牛鬼蛇神单行鱼贯，出其胯下。而且出口外又有两个红卫兵左右分立，举棒以待，每过一人，就当头赏给一棒，伴以语态轻快的嚷喝：

“滚!”“爬!”“今天太便宜你们了!”“也让你们小痛一痛!”“看打!”

这当头棒可不轻巧。吃打的,个个头上起了疙瘩。秃顶的先生们大都皮破血流。只有吴宓头上顶了那折叠的烂草帽,有如软性头盔,虽也有些疼痛,却是秃顶无恙,不曾伤损。他想:原来,那位给他扣上烂草帽的红卫兵竟是有意保护他。貌似凶狠,前天那么戏弄F公,吓坏了F公,今天却这么保护我。不管这文革如何横扫一切,就在红卫兵之中,仍有传统道德焉。先贤昭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四维之德不绝如缕,则中华民族之未来,大可乐观。

不可辜负此青年爱我恤我之雅惠,且而估计,此种迎头一棒之虐,既已开头,很可能习以为常,不可不常为之备。吴宓将那草帽的烂边撕扯整齐些个,每天出工都顶在头上,却也多次减轻了当头一棒的疼痛程度,也大可缓解烈日暴晒之苦。

碰巧这天劳动时又是那个红卫兵值班监督,他站在吴宓附近。吴宓情不自禁,向小青年恳表谢忱:

“……我心领你的照顾,更欣喜你富有中华传统之美德……”

岂料,那红卫兵大怒:

“妈的!你诬蔑我!我会同情黑五类?你反攻倒算!……”

伸手扯下吴宓头上的烂草帽,就便捏起草帽,扇了他几耳光。

40

牛棚友谊

那位前西南文教部的副部长徐方庭,江苏人,早年以中学教师身份加入地下党,后到延安;再转战南北,作为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高级政工干部,进军西南,到了重庆。文革开始时,他刚好由中央派到西师任院长。谁知这次运动刀法不依古格,风云变幻,红卫兵、造反派崛起,这位新到院长被定为“走资派”,成了牛鬼蛇神,七斗八斗之后,也被编进了黑旗队接受“专政”。却又与众不同,他还得随时被揪出队外去批斗。每日定时批斗早、中、晚三场:早上到黑旗队报到之前一场,午饭之后一场,晚上收工后一场。不定时的则是院内外召开大走资派斗争大会时,也把他押去一锅炒——一齐斗,或叫他去陪斗。每次一斗完,就迳直押回黑旗队劳动,不得休息将养。

院长阁下虽不魁伟健壮,而沦为牛鬼蛇神仍不失乐观加达观。劳动积极,服从安排:“别照顾我!什么院长?这会儿不提这个了。……没事的,我自幼劳动,到部队久经锻炼,比你们都强。……我才50多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儿,……什么劳改不劳改,毛主席给我的锻炼,给我一个提高的机会。……”他经历过延安整风,认为运动过后,还会平反。

他有时和吴宓一起劳动,挖土方,清除垃圾堆。他叫吴宓装筐,他挑。吴宓劳动无力,到徐方庭挑回程时,鸳鸯里只装了一点,他抓过吴宓的锄头,三五几下装满两鸳鸯,再挑起飞奔。他打扫清洁时若与吴宓“接壤”,总是抢着把吴宓的范围清扫一大半。吴宓非常不安。

“别客气!”院长说,“我这也是反省、悔过。这会儿受了教育才明白,我当权的时候,对待知识分子——不公平,不尊重!……”

这时,吴宓早已年过古稀,瘦得皮包骨,腿又跛了,每次出工、收工请罪挨打很是受不了。他并未叫苦,徐院长却已看在眼里;常常在躬身请罪时,故意鞠臀尽力后突,大大突过了排在他旁边的吴宓,以至造反派朝吴宓挥舞过来的棍棒、皮带,很多都落在了徐院长的身上。

对此,吴宓很是感动。也很难过,多次请求哀恳:“院长,你怎么能替我挨打?……”

“这有什么呢?你这么大年纪,又瘦成这个样子,怎么吃得消?再打断骨头怎么办?我年轻,身体棒,多吃几下没关系。——我从前在位时没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这会儿来落实落实!……”

有次工间休息,徐方庭和吴宓对坐谈天:

“我这回当走资派,收获太大了;到黑旗队进步更快……,我们这些老干部已经在当官做老爷了,就是该这么整一整,……冷静下来,透透彻彻反省,明白了许多道理。……我管知识分子工作多年,直到现在才真正了解了知识分子。你看,你们这些老师,这么整,被整到了这步田地,没一个人有怨言,还那么积极争取。噢,我们的知识分子多么爱国,多么热爱科学事业,可爱呀,我们的知识分子!……”

徐院长每次被揪斗回来,走进黑旗队说:“我出场回来了!……”

他竟是犹如讲述战斗经历,叙说他出场的情状。

“……现刻斗争会升级了!喷气式早已淘汰,采取大扎。我们这一伙一进会场就被大扎起来,直到大会终结。……大扎就是五花大绑嘛!叫大扎,是说,五花大绑的形式,绳子收得很紧,紧得反绑活捆的双手一直叫拉到了后颈窝。好家伙!我算体验到了这法门的厉害!不到十分钟,就心慌心跳,五脏俱裂,豆大的汗珠直淌,好像就要断气了!……”

吴宓感到非常心痛:这么好个干部,平白无故叫如此大扎!这以后,每遇徐院长挨斗回来,吴宓总要战抖于心地小声问:“又大扎了?”

“那还少得了?”徐院长若无其事。

过了不久,徐院长挨斗回来,颇为高兴,悄对吴宓说:“吴老,你别替我担心了!大扎,我已经过关!……怎么的?开动脑筋呗。我忽然想到猫斗蛇——蛇狠命缠猫,猫立定鼓气,肚子都涨大了;等蛇缠了又缠,蛇缠得没劲了,猫就猛地一松气,肚子一瘪,呼地一下就从蛇缠绕的圈套中彪走了!我就学习猫的这一套,他们来大扎,我就鼓筋提气,极力鼓起胳膊肘臂的肌肉。等他们扎好了,我缓缓舒出气,松弛肌肉,扎在身上的绳子就大大松了,再也不心跳心慌,头上出汗了。一场斗下来,全无所苦!……”

吴宓由衷地赞叹:“院长!我读过许许多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却是不记得有哪部作品描写过像你这样乐观的人物!……”

徐方庭:“……我说过多少遍,别叫我院长,叫我老徐!——我认为,最可爱的还是你们这些教师。你们只有两个目标:追求知识;把获得的知识传授给青年!——真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一天,在西师和平村柑园山下挖土方。维时造反派的派性斗争正日益激烈,西师暂时由重庆“反到底”派掌权。大概在集中力量搞派性武斗,“造反派”们只是在黑旗队出工、收工时到场来监

督他们请罪,劳动时间中不再临场监视,但规定了劳动定额,要考核工效。上工不久,黑旗队队长就小声提醒大家:注意,头上——两山之间有两个造反派在鼓噪对骂,势将开战。果然,不久,步枪声大作,子弹在上空呼啸。因为规定的劳动定额高,黑旗队不敢停工,好在是两山头互战,黑旗队是在沟里劳动。吴宓只担心干得太少,累了院长,一个劲儿拼力挥锄,但觉汗流脑轰,视力昏花,听不见头上的子弹呼啸。突然,院长大叫“快!”撂下扁担箢箕,抱过吴宓,就地朝沟底飞滚,只一忽闪,就滚进了沟底的水里。

就在这时,一枚土制手榴弹恰好落在吴宓刚才挖土的地方开花了。弹片四溅,差点儿没有穿进下滚的吴、徐二人身躯。接着,又是几个土炸弹落在黑旗队的工地上。再接着,校园上方的那队向对岸发起冲锋,对方撤退,战斗越过了山沟,枪声渐响渐远。牛鬼蛇神这才惊魂甫定,擦洗身上的泥土水渍,寻找衣服。吴宓挂在树上的衣服安然无恙,只是拉掉的布鞋裂了大嘴,眼镜脚又掉了,而且掉下的那截不知去向。这两年,他的老年白内障发展很快,近视、闪光都有增进,离了眼镜简直不能迈步。

“别急!”院长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卷棉线,给吴宓的眼镜挂了一条白线腿,套在耳朵上,居然一样戴上了眼镜儿。徐院长又把吴宓的破鞋翻来复去看了一阵,说:“破得太厉害。补?难!”

“可我再没第二双鞋了!”吴宓说。他确实只这双布鞋。每月生活费15元,仅够吃饭,不可能添置任何东西。赤脚?他没这本事。

“有办法!”院长说。他扯了几根柳条,刮刷、揉搓一阵,搓了根绳,“来,我给你穿上。”他给吴宓套上烂鞋,拿柳条绳拴绑,鞋子服贴地裹在了脚上。“走走看,行吗?”吴宓迈步来回试走,很妥贴。“行,行,史载庄子——庄周用麻绳拴着破鞋去见魏王,大概就是这模样儿!……”

徐院长指指吴宓挂在树上的衬衣,问:“你这衣服多久没洗了?”

“洗的,也可以说没洗。”他介绍了自己的风晾干洗法。

院长没有笑,说:“我来替你洗一洗。”他跑到水沟边,胡乱搓洗了一阵,拧干,提来晾在树上,继续干活。到收工时,衬衣基本干了。院长不无歉意地说:“没使肥皂,洗得不太干净。”吴宓边穿边说:“干净,很干净,与风晾干洗大不一样。”“明天换上那一件衬衣,把剩下的脏衣服穿上带来,我给你洗。……”

“这办法很好!不过,我得自己来,不能老麻烦你。”

“这不行的,你的腿不方便,要跌进水沟。再说,你年纪大,动作慢,视力也差,要花很多时间,不行的!”

“麻烦你给我做这些事,我心里不安!”

“别那么想……”

“我又不能给你做什么……。帮助,应该是互相的。”

“你可以教我学问嘛!”

“教个什么?!我脑子里只有封、资……”

“我不那么看。你可以教我庄子,莎士比亚,《易经》……”

吴宓瞠目,半晌才说:“我没那么大的胆子!”

一连三天都有太阳,吴宓“干洗”日久的衣服全都水洗了一遍。工间休息,俩人对坐,吴宓坐在锄头把上,院长则把扁担当板凳,他掏出“经济牌”香烟燃起来,吞云吐雾。这是“文革”期中百物匮乏、应时而生的香烟代用品,裹在香烟里的主要是葵花籽壳、辣椒叶、茄子叶梗,仍然定量供应,不能随便买,但价钱很便宜,八分钱一包,烟气闷臭难当。吴宓不禁叹息:“身为院长,抽这种香烟!”“到哪山,唱哪山的歌!”院长神态自然,“长期在部队,就有这长处,再穷,再富,都一样,什么日子都能过。大中华抽久了,抽抽经济牌,倒也新鲜!”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该向你们工农干部学习!”吴宓话刚出口,又有点儿后悔。吴宓觉得自己和这个人的感情不是这类时髦语言所能表达的。

院长好像已经明白吴宓的意思,说:“……我搞宣传文教多年了,天天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直到进了黑旗队,才算明白:所谓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这种分类,不是很恰当的。我们三野司令员陈毅,二野政委邓小平,还有聂荣臻,都是法国留学生,还能不算知识分子?周恩来是全国工农干部的头儿,他是工农出身吗?他也是法国留学生。干部要工农化?周恩来他们……”他咽住了下面的话。“你那柳条带子要断了,”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根麻绳,“看,我给你搓了根麻绳。换上这个。”他凑过去给吴宓解下脚上的柳条绳,换上麻绳,“这么拴,绕过来,再一绞,就这样拴,跟草鞋一样。每天穿脱如草鞋,省事,快当。……”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粗暴、野蛮地凌辱了这些人,却在他们之间缔造了高度文明的牛棚友谊!

41

昔日朋友大半已登鬼录

在经过 1971 年——1972 年西师搬梁平、又搬回来的折腾之后，吴宓终于结束了劳动改造的生活。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告诉他：经领导研究，给他从宽安排，改善生活，恢复工资，希望他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不要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天高地厚之恩。

吴宓得以搬进了西师文化村第一宿舍二楼的一间小房，面积虽小，却是白壁光洁，油漆地板，门前长廊宽绰，住了许久牛棚，得此顿如上了天堂。还配了半新红漆家具：小床一张，三抽桌一台，藤椅一个，小书架、茶几各一。迈出房门，倚栏前眺，视野开阔。可惜他的视力已大减，连百米之外文化村二、六宿舍大楼与其间的游泳池都如在云雾中。低回久之，颇为怅然。一转身，却发现右边的邻居正是刘尊一。两位老友，黑旗队同学，竟迁居比邻，真是幸何如之！“这很好！”刘尊一说，“雨僧兄长，你比我年长，腿又残废了，眼也不好。邻室而居，我正好照顾你。”

第二个月，俩人都领得了全额工资。好大一叠钞票！真是叫化子拾黄金。怎么用呢？吴宓首先去买了双布鞋，换下了那双破鞋，连同拴在鞋上的那根由徐院长搓成的麻绳，布幅包好，珍藏留

作纪念。他想急需几件衣服,可是没有布票,只能望衣兴叹。

刘尊一扶着吴宓去逛百货商店,这也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们已很久没有受用这种自由了,何况他俩都急于购买牙刷牙膏,实在想尽快恢复刷牙。谁知牙膏也不能随便购买,它除了需要每月配给的购物号数票以外,还要交旧牙膏皮。没有牙膏皮?恕不供应。到底还是刘尊一有办法,三天后,她以相当十支牙膏皮的代价,买到了二支牙膏。喜悦之余,刘尊一说出了一个想法:向革委会申请发还抄家搜去的书籍、文稿等物。“你说,”刘尊一心怀惴惴,“会不会说我们猖狂反扑,又揪去斗?”

吴宓苦笑一下:“斗又怎么办呢?反正我们已是久经沙场的了!只不过,我们得分别报告,绝对不可联名。”

三个月后,书、文发还了一些。吴宓不禁哑然失笑。

例如,抄去的像片三大本,发还的却只有几张吴宓的单人照。抄去的日记、笔记十几大本,发还了一个小记事本,是听大报告、学习讨论用的记事小本儿。至于抄去的其他衣物,概无下落,更不要说朋友信札了。不过,吴宓的情绪很快就平衡了。一则,他的很大一部分重要文稿早在抄家之前就转移了,分别寄放在朋友及学生处,总有一些可以逃过劫难保存下来。二则,经过“七斗八斗”,牛棚生涯,他已经把一切看得很淡很淡了。大劫之后,心如死灰,只是支身远离故土,不时泛起思乡和怀念女儿们的思绪。……

当吴宓和我一条板凳,坐在我那小屋里,叙述别后往事,正说完他和刘尊一买牙膏、衣服一幕时,远处的火车汽笛响了。吴宓站起身说:“5点了,我得走,免得遇到那些混蛋。”

“你怎么知道5点了?”

“自从眼睛看不到表,我就以四周的特别声响为时钟。这阵火车叫,是下午5点!”

过了三个星期,又是下午这时间,他再次溜进了我的小屋,坐

到我的身边。

我急忙问：“你上次忘了告诉我，李源澄后来怎样呢？”

“他认真疯了。斗，骂，考察，最后认定，确属患了精神分裂症。就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可对外还是保密的。大概是1958年秋天，我才从一个干部那里——他原是李源澄的得意门生，得知的。然后又过了三年，我想去看看他，这位干部才凄然地小声说：‘他早死了！’当然是死在精神病院。但直接的死因是肝破裂，气得太狠，肝脏肿胀，以致胀破了。再问埋在什么地方，他摆了摆手，叫我别问，他也不知道，谨防惹起麻烦。”

吴宓提议，我们起立，为李源澄默哀1分钟。

由于我俩个都视力微弱，谁也看不清对方垂泪悼念的模样。默哀过后好一阵，我才打破沉寂：“老李这个人太好了！他会长期活在朋友们心中的。不过你也不要过于悲痛。这个年代，斯文凋零，朋友生离死别者不可胜纪，即如我在政法学院的朋友彭望雍博士，吕瑾教授，划右分别处理后不久，不到一年，他们就先后结束了生命。还有些老朋友，比如熊集生，郭先彦等，都没耐多久便死了。至于我在监狱里见到的就更多了！……”

他取出手巾擦了擦眼睛，说：“看来，我比你脆弱，总免不了感伤。哦，那位和我结了牛棚友谊的徐方庭院长，在‘解放’之后，任重大校长不久，肝癌病发，不治身死了。这消息叫我难过了很久，每顿吃饭，我都要为他默哀。否则，我就不能下咽。”他叹了口气，“唉，其实，哪能默哀得许多？这些年，与世长辞的朋友太多了。……”

于是，他告诉我，黎涤玄也死了，他的夫人——梁漱溟先生的侄小姐情况如何，也不清楚。还有，前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陈东原教授划右后不久便死了。柴有恒教授熬到了文革，却赢得如火如荼的斗争，他吃斗不过，一天对妻子说：“我出去一下。”夫人见他

朝办公大楼方向走去,以为他去汇报思想。谁知下午造反派来揪他时,他还未回来!他失踪了。不知所终,——大半是投了嘉陵江!

“唔,”我叹道,“真可谓访旧半为鬼!”

“不是半,是大半!”吴宓说,“不过,我两个总算活着重逢了!岂非快事?哦,还有一件事堪称快哉!那个黄稚荃,自从1956年她因那疑难之症,一直住院,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病危通知,就这么,竟把诸般运动都躲过了,现在还活着,且有病情好转之势。她大难已过,将享耄耋之寿!……”

(注:黄稚荃后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她住在成都东珠市街时,1983年、1984年我多次去看过她。后来,她迁住成都枣子巷9号省政协宿舍。1993年去世。)

刚说到这里,他突然抓起手杖,急急忙忙往外跛,边走边说:“远处来了两个人,怕是群众专政的!”

他迈出了门,随即转身朝里站着,以手杖敲着门框,大声叫:“喂,里面坐的那位师傅!……”

来的正是群众专政的两个妇女,一个姓刘,无业之民;一个姓王,工人,都只有40岁左右。一见吴宓,立即冲上来。

刘问:“你是什么人?”

吴宓举左掌贴在左耳壳上,倾耳问:“师傅说什么?”

刘:“装聋卖哑!”大声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搞什么?”

吴宓:“我是西师的教授!……”

刘:“臭老九!放规矩点儿,谨防老娘扇你两耳光!”

王:“让他说吧!”

吴宓:“我上街逛了新华书店,回学校,他们说有条小路,打这么来,怎么一拐,就到西师的小校门,捷径多了。可我走到这儿,迷了路,找不到方向,连人都找不到,好容易见这家门开着,里面坐了

个师傅,我敲门框子喊他,问他,他就是不开腔,这师傅……”

刘:“放屁!他是什么师傅?他是……”

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称“师傅”即工人师傅,是对公民的荣誉称谓。

吴宓抢着问:“他不是师傅?是个什么?”

刘:“什么?反革命!管制分子!专政对象!……”

吴宓:“哎呀,哎呀!背时(四川方言:倒霉之意),问到了这么个人,哎,哎,背时!”转身欲走。

刘大喝:“站住!搞清楚,你是不是来找这反革命搞阴谋活动的?”

吴宓:“师傅说个什么?我偷东西?什么话!党和政府,哦,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每个月发给我200多元工资,我吃不完用不完,还偷东西?”

王问:“你有证件吗?”

“有的!”吴宓掏出工作证,还有一张工资发放清单,这个清单很重要,因为那时教授之类被关牛棚的还很多,能发放“工资”,证明此人不是被关对象。王看了一遍,还给他,摆摆手:“走!你走!”

“谢谢!”吴宓转身,欲步又止,转向王:“这个,还得麻烦两位师傅指点指点,到西师小校门,该怎么走?”

王指点:“朝这条路,对直走过去,过了那丛小树,就是水岚垭大马路,朝右拐,走几十步就是西师小校门了。”

吴宓拄着手杖,艰难而缓慢地一拐一拐走向水岚垭。

我遥望吴宓那十分龙钟的步履姿态,仿佛看到他在开心地微笑。想不到这位诚实敦厚的老学者,竟也学会了这套应付造反派的机警。

群众专政对我的日程规定为:每天清早7时起到下午1时多,做义务劳动,包干打扫一大段地面和阴沟;工具自备。下午2时以

后,隔几天到专政机关去听训半天,给他们做清洁半天;隔几天接受革命群众大会批斗一次。如果没有这后两个项目,则要求开门端坐在我那小屋里反省“罪恶”。夜里不定时有群众专政的男女踢门而入,进行查抄。

至于生活,由我自理。实际是我母亲把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挪出来养活我。而且,我还没有出门、上街的自由,吃的米、小菜,得由我 80 高龄的母亲拄着拐杖,肩挎网兜,象旧时上庙进香的老入那样,一步步挪动着缠足的小脚,从市上搬了回来。当我坐着“反省”时,反省得最多的是自己对不起老母亲,太拖累她了。要不然,就不免打磕睡,但又不该,谁知什么时候群众专政闯来,发现打磕睡,就会挨打。活得太累,太无意义了!吴宓来这两趟,谈了他的经历,倒是给我增加了一些生活的动力。很想他再来谈谈,却又觉得太危险,实际也是不可能的。

一过半年都无消息,我已绝望,大概再也见不到吴宓了。谁想 1974 年秋初,又分明见他跛进了我的小屋。他身旁还有一个人,是了,他们到了我面前,是吴宓和刘尊一。

“哎呀!”我惊跳起来,“这太危险了!”

“别慌,”吴宓说,“今天放心聊天,十分安全。”他说:有个中年受过刘尊一周济性命之恩的,和这群众专政的人很熟,从而得知他们今下午开会,绝不会来生事。他又说:“生活就是战斗,百事都得用兵法上前。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之谓也。”吴宓舒展地坐下。

刘尊一仔细端详了我许久,叹道:“天哪,这就是张紫葛老张呀!要是在街上遇见你,我万万想不到张紫葛就是你!”

我笑道:“这有何奇怪?可惜我视力不佳,如其还能审视详确,恐怕你也绝不象当年的刘尊一教授,更不能想象这就是当年宋美龄称之为米上刘的那位黄发少妇了!至于我,岂止你认不出?连

我的母亲也想不到这便是他的儿子!”

于是我告诉他们,1973年7月,我来投母亲,她一见我立即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上前一步说:“妈呀,我是你的大儿子张紫葛呀!”母亲大惊:“声音还像,……哦,我的儿,怎么成了这模样!……”

吴宓语气似笑说:“善哉,无量寿福,这就叫时代的烙印!不然,我们的生活就太缺乏戏剧性了!……”

刘尊一讲述了她别来这16年的经历。吴宓接上说:“上次正谈到访旧多为鬼,还没来得及说一个重要朋友,你知道周邦式的结局吗?……不知道?我来告诉你……”

上下皆知周邦式是毛主席的微时旧友,划右时他是保护对象;拔白旗时他虽被定为“白旗”,却也保护未拔,一直在重庆师范学院享受教授待遇。文革巨浪卷到夺走资派的权,他虽还未被抄家,却感到难以继续坐托毛主席的洪福了。这时,他的女儿早已历任驻外使馆人员,回国供职于外交部。他赶到北京,住在女儿处,火急申请求见毛主席。不多日,他获得殊荣——毛主席召见。在中南海毛主席宽大的接见厅里和毛主席对坐谈话。毛似颇有兴趣,和他谈些当年相识的老友情况,并问他阔别以来的经历。言谈提及李达,毛问:

“你知道李达的情况吗?”

大概是毛主席隆盛的情殊恩,使周邦式过于激动,他竟不假思索地答:

“知道的,他在武汉大学被斗得很受不了,禁闭中有一看守值班之红卫兵很同情他,他便写了一个条子托那红卫兵转交毛主席,条子写的是:‘毛主席,请救我一命。李达。’您想必见到过?”

但见坐在毛主席身后的秘书脸色大大不悦,并向周猛打手式,叫他别胡说。周惶恐之至,却喜毛主席并未听清,反问:

“李达说什么？说我什么？”

周邦式就势改口，说：“他说，感谢毛主席的天高地厚之恩，……”

秘书示意叫周邦式告退走得了。周即告辞。毛主席和他握手时间：

“你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要求吗？有就告诉我！……”

周邦式捧着毛的手，躬身恳切道：“我只有一个请求，想到北京我女儿这里住，在毛主席脚下度过幸福的晚年！”

“可以嘛！”毛泽东说：反正你已退休，也用不着调动，叫重庆把你的工资转过来，叫外交部给你女儿分一套宽一点儿的房间就行了嘛！我马上叫他们办！

果然，很快都办到了。周邦式万分庆幸，舒展欣慰。谁知不几个月，重庆来了一队造反派，专来捉拿周邦式。

周邦式辩解：“我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按指示在这里住的！……”

造反派根本不买帐：

“毛主席安排的？拿毛主席的批示来看！”

他当然拿不出批示。人们不由分说，把他押回了重庆，打为牛鬼蛇神，大批大斗，交付磨房推磨。这本是毛驴挽动的大石磨，却要周邦式这个年近80的老人来代替毛驴扶杠推转。有值班的造反派专责在旁边监督，走慢了就打。周邦式没奈何，只得双手把杠，上身全扑在杠上，极力挣扎着摇动石磨。气喘摇摆，涕汗滴答。这天，推着推着，不动了。造反派大呼：

“推！磨洋工吗？”

没有反应。造反派大怒，上去猛扫一棒：“我叫你磨洋工！”

周邦式顺着挽磨横杠滑了下去，掉在地上。他死了！

听完吴宓的叙述,我问:“重庆哪个造反派有这么大胆子?毛主席亲自安排的,他们敢去抓了回来!”

吴宓:“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除了江青,谁能有那么大的胆子!江青的指示嘛!”

我惊问:“江青为啥这么恼周邦式?非要置他于死地?”

刘尊一:“周邦式早年和江青打过交道,你竟不知道?”

吴宓:“他哪能不知道?我知道的这个情节还是他告诉我的哩!”

哦,我想起来了。江青打算去延安,意尚未决。有人鼓励她说,她去了,有希望做毛泽东夫人。她疑虑未定。恰巧偶遇周邦式,听说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便向他打听毛泽东当年在北大的各种情景,渐而问他毛的私生活。

江青,时名蓝苹,对周邦式的话颇感可信,便问:“我想改名江青,你看可否?”

周答:“很好。不过,‘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只怕结局不太圆满。另外,从姓名笔画学看,江六笔,青八笔,上六下八,图形不佳。”

蓝苹反复比拟笔画,不得要领。周邦式说:“你把六字的那一横按篆书写法弯下来。”

她省悟道:“哦,是个乌龟!女人是乌龟?没关系的!”

这个情节,我,吴宓,刘尊一,都知道。对于江青要整周邦式我也就不奇怪了。刘尊一叹息:“周邦式也是,干脆在重庆师院稳起,或者在北京女儿那里住起不声张,依旧像1950年那样,把毛泽东的信亮一亮,也许还能躲过。偏要去见毛主席,让江青知道了,遭此杀身惨祸!”

吴宓以手杖叩地,说:“江青这个女人,狠毒阴险,所有她认识

的故旧,不论恩怨,一概置之死地而后快。她自比吕雉,正可谓有自知之明。……”

接着,我们纵谈古今。中间,刘尊一告诉我,从找她外调的情况看,当年抗战时的儿童保育会的中共人士,如赵君陶、曹孟君(王昆仑夫人)等,都在文革中被整得七死八活,无一幸免。

42

笑得比哭还惨

三人叹息一阵，刘尊一打破沉默，问我：

“你遇见过黄永亮吗？他也是被逮捕了的。”

“啊！黄永亮？……”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脑子里晃荡着两个黄永亮。一个，昔日相交的好友：衣冠楚楚，标准英国绅士风度，挺拔潇洒，和蔼可亲。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却是七分像鬼，完全是个会说话的木乃伊……

吴宓见我不说话，急了：

“耶，怎么的？你真是隔世之人了，把黄永亮都给忘了？那个，英国留学生，重庆大学的教授，重庆解放那天，我们在他家通宵狂欢，庆祝解放的呐！”

我哪能把黄永亮忘了？

黄永亮在英伦学成回国时，取道苏联。虽是走马观花，却也收获不小，印证了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觉得苏联各方面先进，从此思想更加左倾。只是自己认为，不够格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便立志做党外布尔什维克，盼望共产党早点在中国执政。自国共内战以来，他天天偷听新华社的通讯，在课堂上公开转述解放军的战报：

“共军又打了个大胜仗……”

重庆解放了,他自然感到欢欣鼓舞,邀我们这些朋友,足“八仙过海”之数,在他家通宵狂欢。那夜,数他最为高兴,简直回到了少年时代。

自那以后,每一学习、批判,他都最为积极。对于党的任何措施,都真心拥护。1950年连续三次重庆全市大逮捕,他拍手称快,说:“这是非常必要的。不把残留在社会各方各面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们全部逮捕,革命政权就无法巩固。……”

1951年春,召开全市高等学校师生大会,公审了一批从各大学逮捕的“反革命”,枪毙了重大教授侯枫等人。接着号召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向公安局登记。黄水亮也得到通知,叫他去登记。他很快办了登记手续,并对朋友们说:

“这是完全必要的。无产阶级要建立铁桶江山,必须把每个人的政治历史查得清清楚楚。……社会一清见底,美蒋特务就无法藏身了!”

等到思想改造运动,他的交代也三评未获通过。最后,被集中到西南高等学校教师进修部审查历史。他带同夫人和女儿君展,到进修部报到,住进了进修部家属宿舍。随后贱卖了自己原有的紫檀木家具,把分给他的一间狭小住房布置得高雅洁净,一家三口都衣着整齐,他自己更是考究,皮鞋刷得锃亮,衣服烫得笔挺,笑吟吟地招呼每一个同事。

“这很好,又进修了马列主义,又审查了历史。然后回学校工作,轻装前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红色教授。”他说。

在太太的照顾下,他生活得很舒展,仍然保持了他长期的生活习惯:餐桌台布至多三天洗一次;进餐时使用大、小两个餐巾,按英国绅士规矩,据桌而食,细嚼慢咽。菜蔬搭配则按营养学的要求,

烹饪讲究保存“维他命”，还要尽可能十天半月吃一次西餐。参加周末舞会，一定遵着外交礼仪，邀请舞伴、进退旋转，都有规则和幅度。……

万没料到，直到反右运动，他的政治历史还未弄清楚，还没宣布审查结论。他虽然没有鸣放半句，却天经地义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很乐意接受这顶白色桂冠：

“我当然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凭我这生活习惯，就只能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的确，他的生活习惯一直没有工农化。漂亮的太太没有工作，专门照顾他父女俩；不论“学习”、审查多么紧张，他也一定要带上他的太太、女儿按时散步。所以，他很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本来是个资产阶级”，“划不划是一样”，但是，却以为这并不妨碍他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是有皇皇文告，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吗？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对自己被划为“右派”心安理得，并不着急。

然而，他太太在家属学习组挨斗，要她交代丈夫的罪恶；女儿君展在学校里被斗得更凶。母女俩关上房门，抱头痛哭：“我们还有生路吗？……我们都被打成人民的敌人了呀！”

黄永亮却泰然自若：

“急个什么！这不过是个教育过程。共产党的政策，向来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三反运动的那些‘老虎’关黑房子，斗成了那模样，处理时不是都无事大吉了吗？要紧的是积极投入运动，做个热忱响应号召的斗争对象。现在的关键是深入交代，缴械投诚！”

交代？交代什么呢？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反动思想”！可是，从1951年镇反运动算起，他黄永亮百事不干，已经交代了七

年了。反正就是那些,从祖宗三代说起,家公家婆,老表舅子,自己从发蒙识字,逐年细述。……“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应有尽有,是“蒋匪帮”的“孝子贤孙”,“英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这回却不行了。反右健将们斗志昂扬,穷追猛打,要他交代实实在在的反革命组织关系。

黄永亮就顺杆爬:

“是,是!我是蒋匪帮特务分子。啊,啊?我是中统,……唔,唔!是的,我也参加了军统。”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中统、军统是怎么回事。

反右健将们再追:“留学英国,在那里当然有组织关系。交代!”

“哦,唔!是,是!我交代!我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参加过英国特务组织——英国皇家中统,还有皇家军统!”

反正,他心里有数,不论怎么“交代”,终会无事大吉。三反的那些“老虎”,哪个不是“坦白”贪污了若干亿元,处理时不都是一风吹了吗?

以上这些还是反右初期的情况。随后,运动深入,我失去了自由,自己都水深火热,不可能,也无心了解别人的事。及至进了看守所的监房里,饿饭,饿水,饿阳光,饿空气,每一分钟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哪里还会想到朋友黄永亮?

1958年8月,长江火炉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41度,监房更是火炉里的八卦炉。中午是静坐“反省罪恶”的规定时间。几十个犯人,挤坐在监房的牢板上,空气奇缺,每一秒钟都象断气了。忽然,监房门响,飘进了一股新鲜空气(其实是巷道里的污浊空气)。我强睁困乏的眼帘,恍恍惚惚,看到从牢门缝塞进了一个蠕动着

髅。犯人组长把他插到了我的左边。

我重新闭上了眼帘,做“反省罪恶状”。其实是尽力节省机体内外运转的能量,以求延续残喘。

一个声音在我左耳畔细细缠绕:

“唔,唔!对了,你,我认出来了,张紫葛,唔,老兄,久违了!睁开眼看看,我是黄永亮,黄永亮!幸会,幸会!”

我不得不缓缓开目,微微侧头,我那被打瞎了的一支眼睛刚好在右边。我瞄到了一具奇异的面孔:

确确实实是皮包骨,因而额头、颧骨、下巴,都显得特别干枯、耸出,皮色犹如粪坑边沿上干枯的积垢。实在难以凭这模样确定他是黄永亮。这么一副嘴脸,却还微笑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难看、奇特的笑容,勉强比喻,活似脏黑的粪垢在抖动。天啦,这样的笑,实在比哭更惨,更令人五脏发抖。我不禁想起了雨果的名著《笑面人》……

“我是黄永亮!”他继续小声唧唧,还眨巴着眼皮:“喂,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完全变样儿了。我好看了·一阵,才把你认了出来。你背思想包袱了吗?要不,干嘛会憔悴成这模样呢?”

我只轻轻摇了摇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他却继续唠叨:

“思想要放开朗些。逮捕,也不过是个教育过程。不会杀我们的,也不会判刑劳改。我们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个一年半载,总会放我们回去的。这叫做‘教育释放’。相信共产党是伟大的,何必整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

我朝他咬咬牙:

“小心,住嘴!犯人相识,还交谈,就是反革命集团!……”

他住嘴了。

但晚上吹哨就寝，众犯挨挤倒下，在轻轻躁动的几分钟里，他又朝我唠叨了：

“我只想念我的君展，她是个好苗子，有培养前途。……你想孩子吗？你要愉快些，心情舒展些。老兄，斗争从严，处理从宽，逮捕关押，仍是个斗争过程，我们会得到宽大的！……”

我朝他捏了捏拳头，小声骂：

“你硬要搞成两人反革命集团拉出去枪毙吗？糊涂蛋！”

他又住嘴了，却更丑地笑了一下。随即按监规，和我头脚颠倒地侧身躺下了。狭窄挨挤，更感到他出奇的干瘪。他把干枯的脸皮贴放在我侧置的脚踝上，动作很轻，仿佛偎依。我明白，这是他对老朋友表示握手拥抱。为了礼尚往来，也为了照顾他，我让他的脚放在了我的脖子上。这并不违反监规，所有挨挤邻近的犯人都得这样头脚相压，不这样，睡不下去的。

我们同监房过了8天，他总是用那种难看的丑笑虐待我。我难受极了。万幸，第九天上午，监门开了一条缝，呼喊他的号头：

“出来！”

他边拾掇污秽的烂单子，边对我小声嘀咕：

“我教育释放了。我明天就去看你爱人，报导你的情况。……你千万宽心稍待。你也会教育释放的。……干嘛整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乐观，务必乐观！”

我真想放声大哭。

九死一生，熬到了1960年夏天。我正在四川省第二监狱重刑犯大队服刑劳改。要开晚饭了，押来了一批犯人，褴褛干瘦，一望而知，是老犯。原来是重庆歌乐山白宫馆松山劳改农场剔过来的重刑犯。一干部叫上我协助点收（替他填写“收监犯人登记表”）。

照例,押送犯人的干部将犯人名册交给点收干部,收方唱名,押送方监督犯人应点。点到的犯人高声应“有”,迈了过来。

“黄永亮!”点收干部唱。

无人应。我一看,对了,那儿站着黄永亮。比两年前同监房时的模样更难看了。七分像鬼吗?不,完完全全的木乃伊,不过能自个儿站着。而且,竟然还是两年前那幅丑笑。

点收干部再叫一声,仍无人应。押送干部抢上前去,刷了黄永亮一耳光:

“就是这家伙,他狗入的装疯卖傻!”搥击黄永亮,“滚过去!”

黄永亮顺从地迈往点收了的犯人队列,傻乎乎地丑笑着,嘴里嘀咕:

“斗争从严,处理从宽……何必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我的君展是个好苗子……”

解押过来的这批犯人还未吃午饭。管教干部照顾,通过总队部批准,向大厨房要来一大桶稀饭,算是给他们午晚两餐一起开,每人一铁勺。

稀饭内容很丰富:有相当多的红苕藤子,夹以较多的玉米碎粒。说它丰富,并不是讽刺。在那个年头,农村大片大片饿死人,很多地方,农村公社社员一天才有一两粮食;干部的副食品中能配给红苕藤子都算好的了。饥饿遍神州。囚犯能有这样内容的稀饭,确是很不错的了。原因是,这个四川省第二监狱的政委,是个非常淳朴的长征干部,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正是因为这样,不久,这个政委便在“反右倾”中受到了批判。

当下,稀饭冒着热气,众犯咽着唾沫,分发稀饭的炊事犯人手操长柄铁勺,给排队挨到桶边的囚犯每人一勺。领饭的犯人伸出

五花八门的餐具，上去接领稀饭。有大号搪瓷口盅，有破旧罐头盒，也有烂瓦钵。更多的人举起大小成色不等的搪瓷面盆。

黄永亮却什么也没有。

当然，黄永亮原来是有餐具的。逮捕那天，他太太收拾进监的衣服，唯恐用具不周全，裹了一大卷，除了褥子、卧单、枕头、被子、搪瓷面盆、江西景德镇出品的细瓷饭碗、象牙筷子、牙具、面巾、浴巾等等，还有一个他最喜爱的瑞典出品的咖啡杯，意思是给他作茶杯兼漱口杯。

她实在是太不了解情况了。这一大卷东西却成了黄永亮的累赘。在那么拥挤的监房里，哪里还有铺褥子、放枕头的隙地？结果，放置无处，丢弃无法；那个考究的咖啡杯，及细瓷饭碗、菜盘、汤勺和象牙筷子，一进看守所，就被看守人员检查剔除了。黄永亮只有将脸盆四合一：洗脸、漱口、喝水、吃饭。

判刑后，在松山劳改农场，转播之际，脸盆不翼而飞。在紧急危难时，有个刑事犯给他“帮忙”介绍：以一条九成新的凡呢丁下装，向另一个刑事犯调换了一支大号搪瓷口盅。这可非常得计，大搪瓷口盅便于挂在腰上，形影不离，不易丢失。既可洗脸，更可吃饭喝水。谁知，三个月前，一个犯人向干部报告：指认这支大搪瓷口盅是他的，硬说黄永亮偷了他的口盅。经干部审查，“坐实”了黄永亮的“偷窃”，物归“原主”，黄永亮反背了“偷窃”之名。背个臭名事小，没有吃饭喝水的工具事大。幸亏一个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犯”的知识分子同情他，偷偷送给了他一个缺损了一半的瓦钵。这瓦钵，他一直保存使用到今天调往这里。

不料，在清点人数、进这里的大监门时，一连三次报数，黄永亮都呆滞迟误，恼了押送的干部，踢了他一脚。他一踉跄，手里的瓦钵掉在地上，打得粉碎了。轮到这回发饭，他便赤手空拳了。

此时，黄永亮贪婪地盯一盯稀饭桶，又环顾四周，似在求救；双手在腰间乱摸，可是什么也摸不着。看看快挨到轮子了，他似乎急中生智，风快脱下了身上那件式样难分、颜色莫辨的烂单衣。选定完好的部分，折起来，捧在手里，权当饭碗，伸向分饭的铁勺，并向发饭的炊事犯人一个劲儿躬腰点头，做恳求之状。炊事犯人迟疑了一瞬，就将满勺滚烫的稀饭倒在了他捧起的烂布片中。黄永亮似乎并未觉得稀饭烫手，只注意到，捧起的布幅在两掌后部交接处有一低沟，稀饭正从那里往外淌。他闪电般低头撮嘴，去抢吸那流淌的汤汁。

这可挡了后面的轮子，到了轮子的犯人用手臂搯了他一下，他便影子般朝右窜了两步，刷地栽倒了。可是，他竟有这般机伶，膝、肘着地，捧着稀饭的双手却未稍改原姿。而且，膝肘着地的同时，伸颈撮唇，对准稀饭，猛吸赶吞，有如长鲸吞潮，顷刻便将全部稀饭吸光了。当然并未咀嚼，苔藓汤水一股脑儿迳入腹胃。再接着，又伸出舌头，快速舔吸脏布片沾染的汁水。直到舔之又舔，绝无余沥，才艰难地站立起来，徐徐套上烂衣，看了看膝肘上碰破皮的出血点，环顾四周，嘴里又嘟哝着他的陈词：

“干嘛要整知识分子呢？……斗争从严、处理从宽，……我的君展是个好苗子……”

犯人们忙着接饭，接饭到手的则蹲在地上缓缓慢慢地品尝。已经吃完了的，则伸长舌头，挨次仔细舔着他们的口盅、瓦钵、面盆上的稀饭汁水。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会儿也是知识分子的习气不改，动作斯文、细致而专注，谁也没有关心黄永亮在怎么着。只有那位劳改干部一直在仔细观察。这时，他迈过来，戟指怒斥：

“黄永亮，你个狗入的，花岗岩脑袋，死顽固，反改造反革命罪

犯,很会装疯卖傻!这下子露出狐狸尾巴了!见了饭你就不疯不傻,聪敏伶俐了!狗入的,到反省分队去反省!”

反省分队的犯人组长请示,将黄永亮发在哪一起?原来在这个监狱里,重刑犯大队的反省犯人是分级别的:最轻的,不加械具,如常劳动;二级,加手铐,这又分洋铐、土铐、正铐、反铐四个等级。

正铐、反铐中又都可加重为“捧铐”,即将两腕内贴铐紧。“洋手铐”,两铐中间有一个小链条,铐圈本身可以伸缩;而“土铐”没有这些,所以土铐比洋铐重。“正铐”是两手铐在前而;“反铐”则两手铐在背后。不言而喻,铐在前而,手臂还有一点活动余地,可勉强捧碗吃饭,扯裤排便;而“反铐”,双手锁在背后,手就完全失掉了活动能力,吃饭只能跪爬在地上,如猪狗就食。至于“土铐”,不论正反,都有两种铐法:双腕随意合拢铐上,手臂有如袖手相交,痛苦要轻些;而“捧铐”,则是掌、腕对合(捧起),将两腕铐死,这就大大减少了手臂可能活动的幅度,而且腕、掌麻木,很为痛苦。

再重一点的,改铐为镣。这又按镣之轻重分为若干级别,重的有:在镣的铁链中间,加上钢铁的“八脚盘”,可使全镣重达30斤。再重一级,镣铐齐全,其中又可按上述铐别、铐法以及脚镣轻重,分为很多级别。所有反省犯人一律吃“反省粮”,至多等于一般犯人粮食定量的一半。

管教干事略想了一想,吐出了四个字:

“土铐,捧铐!”

我不再叙说下去了。吴宓急问:

“后来呢?”

刘尊一也抢着问:“他死了没有?”

“在那种监狱生活中,我能知道他后来怎么了?而且,不多久,我就被押解到华莹山劳改去了。但是按我在那里的见闻,象黄永

亮这种情况,他能够再活上一年半载的可能性是极少极少的;也可以说,绝不可能。”

刘尊一转着泪花:“是啊,他哪里可能再活下去?也罢,早死早了,结束苦难!”

吴宓取下眼镜擦眼泪。我问:“你们两位多少有些行动自由,可不可以打听打听老黄的妻小,特别是他的女儿,那个天使般的姑娘!”

刘尊一:“文革开始前曾打听过的。其说不一:有的说,母女俩被押回家乡劳改去了;有的说,在江北拉板板车。最坏的说法是:君展叫送到成都龙泉驿少年教养队教养去了。”

我深知刘尊一这个人诚实敦厚,古道热肠。抗日战争初期,她辞去了好几所大学的敦聘,也牺牲了做官的机会,投身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刚刚成立、经费尚无着落时,她就自告奋勇,筹建“歌乐山儿童保育院”。惨淡经营,颇具规模了,却把院长让给了曹孟君,自己再筹办“歌乐山第二儿童保育院”;又颇具规模了,又将院长让给了赵君陶,进而协助赵君陶,筹办重庆江北土主场儿童保育院。只因赵君陶自愿到土主场,才经宋美龄决定,赵担任土主场的院长,刘尊一做“歌乐山第二保育院”院长。(曹、赵都是共产党员,曹是王昆仑的夫人,赵君陶为李鹏总理的太夫人。)

至于对朋友,刘尊一更是重感情,能托妻寄子。蒋经国的汉族夫人章亚若,本来和刘尊一等几个女友是结拜姊妹,自从章亚若与蒋经国苦恋,构成了三角家庭关系,那些姊妹都别有看法,有的骤然冷淡,个别的敬而远之,否认和章结过姊妹。唯有刘尊一却对章更加热情,不远千里,去探望章亚若,安慰、鼓励,不遗余力。章身体不好,在章亚若的一对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因为各种原因,一

度抚养困难时,刘尊一不顾各种冷言讽语,毅然接受章亚若的委托,做了两个孩子的干妈,并协助抚养这两个孩子;顾复周致,胜于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宋美龄知道了,曾经两次对她说:“不管怎样,孩子是蒋家的骨肉,我在经济上补偿补偿你吧!”刘尊一却婉言谢绝了,说:“我是孩子们的干妈,尽点儿力量,义不容辞。”除了知己朋友,她一概保守秘密,绝口不谈替蒋经国抚养孩子的事情。思想改造运动时,她同我商量交代历史问题。我问她:交不交代同蒋经国做干亲家的事?她语气坚决:“这个事情,只有拼死隐瞒!你千万不要给我泄露了。”她的意思,此事知道的人很少,容易隐瞒;而如果自己交代了,很难保全性命。再则,政治上的事,反复难知(那时已有小道消息,说是大陆因台湾问题在同蒋介石暗地接触,有可能“和”)。如果万一大陆对蒋家“谅解”了,刘尊一做过蒋经国的干亲家,又有“攀高枝”的嫌疑。

根据这些事实,我相信刘尊一是尽过最大努力,去找黄永亮的妻小的。我就不再问了。倒是刘尊一自己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我们太无能了!黄永亮,这样好一个朋友,我,对不起他!……”他们两人都再也忍不住,抽噎啜泣起来。

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43

做邓小平的“黑喽罗”光荣

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的女儿笑星和我的弟弟妹妹,都工资极低,各挤出十元养活我母亲。我来了,一碗稀饭两人喝,极为穷困。以至我做所谓“义务劳动”的工具也无钱购买,掏屎刨尿刮阴沟概用赤手。更有甚者,长期不能获准上户口,无户口即无粮食供应。时已文革晚期,物资极为匮乏,副食品尤其短缺。人人的营养都靠那点粮食定量;老老少少,莫不常苦粮食不足。

我根本无粮食供应,就得吃母亲的那点定量。不得已,女儿、弟、妹再勒紧裤带,匀一点粮食给我。这日子如何对付?我母亲坚毅过人,严词不准我再接受吴宓及任何朋友的周济,更不准要人家的粮食。“吃人家的粮食就是喝人家的血!”母亲说。

实在无法对付下去,我又不能出门行走,唯一的办法只能偷偷写信,让母亲替我投邮。先找原单位西南政法学院,可是这学校早已“彻底砸烂”,名存实亡了。想到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就认识周恩来,1949年屈武从北京回迪化(今乌鲁木齐),策划新疆起义,转达说,周恩来亲自点将,叫我去动员驻新疆国民党42军军长赵锡光率部起义。这说明周恩来还记得我这个人。但1950年以来,哪怕身人囹圄,我也不曾上书周公乞救。现在累及老母的残喘,也顾不

得许多了。我便贸然上书,说明情况,求他关怀准予入户口及得个自食其力的工作。谁知信投进邮筒,却到了群众专政手里。了得!现管反革命敢于上书国家领导人,分明是疯狂反扑。斗!群众大会,斗得我七死八活。

过后,吴宓告诉我:报上全国政协开会的消息中出现了“常委屈武”的字样。屈武是我的太夫子于右任的大女婿,与我自来交厚。1946年至1949年,他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我主持联合省政府机关报《新疆日报》时,我们交情很深。吴宓叫我给屈武写一信,由他附函寄去,因为吴宓和他也很熟。

屈武很快回了信,说他马上向中央统战部反映。可是其后并无结果。恰好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吴宓分析各种迹象,确认新到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邓小平的人,原来多年分管政法的四川省委书记赵苍璧(注:赵苍璧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的首任公安部部长)也出来管事了。赵紫阳我不认识,但赵苍璧曾管西南政法学院,我接触较多,并曾蒙他嘉许。估计写信给他,会得到结果的。

但是,如何能把信寄到他手里呢?首先就根本寄不出北碚邮局。吴宓问:“你知道他家的住址吗?那里有无一般街道门牌?”

“有的,还记得。成都多于巷23号。”

“有个办法,”吴宓说,“你用平信写‘寄多于巷23号赵书记收’,这些群众专政大概不会知道这多于巷23号竟是省委书记的宿舍。而姓赵的书记比比皆是,又是平信,再在寄信人栏上写上北碚某某工厂某班组某某,显系工人,准可混过邮局,寄到成都。”

我如法施行,信果然寄到了。赵苍璧看后立即批示:“请重庆市公安局会同市委统战部迅速予以解决。”签字后,犹觉未尽其意,便又批了一句:“我认为,总该给碗饭吃!”再签上了他的名字。

一封上访信，批了两道，而且语气愤愤，这在各级首长处理公文中实属罕见。

无奈，我时运乖舛，这个批示下达重庆不多日，‘四人帮’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接着是天安门追悼周恩来事件和继之而来的大批邓小平。恶浪滚滚，一直落在我们这些底层的“专政对象”身上。我的上访信和赵苍璧的批示，成了我的最大罪证。从此，天天挨斗。一到下午两点，我做完“义务劳动”，立即拉去斗争，直斗到晚上8、9点，甚至深夜11、12点。要我交代和邓小平在四川的“黑干将”二赵（赵紫阳、赵苍璧）的黑关系，我是怎样和赵苍璧联系的？说是赵苍璧的后一条批示是给我的黑指示，就是叫我抓住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这个大题目，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饭吃，大闹一场。我的总罪名是：“邓小平的黑喽罗”，“邓小平在上面叫，你在下面跳！”

这天挨斗回来，我照例被打得鼻青脸肿，周身疼痛。我刚进门，后面就跟进两个人——吴宓和刘尊一。他们迳站到我面前，吴宓附在我耳边急语：

“别急，别气，别颓丧！这是黎明前的晦暗。我算了又算，不出两年，邓小平要建移星转斗之功。神州将在他的运转下苏醒。到那时，现刻他们加给你的罪名——‘邓小平在上面叫，你在下面跳’，将是你的光荣史。鼓足勇气，你的霉运就要结束了！务必保为之躯，以为来日之用！”

刘尊一只拍了拍我的背，说了四个字：“务必坚强！”两人随即转身走了。

不久，毛泽东逝世了。

下半旗之后的第四天下午，吴宓和刘尊一从容来到我的小屋。

“今天绝对安全。我们从容一聚。”吴宓说。

聚谈中,刘尊一说:“……近20年,我估计,中国至少要比英美再落后50年。人家在飞跃前进,我们却在后退,自我破坏嘛!”

吴宓则以手杖叩地,说:“……这20年真是把中国整得民穷财尽,斯文零落殆尽!……”吴宓又说:文革之害,“厥为三端:一是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孝、悌、忠、信,概属异端,鼓励六亲不认,父子相残。不择手段,追求权、利;口是心非,习以为然。“一言以蔽之,摧毁了一切传统道德。”“二是彻底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孔、老、朱、墨,概属异端,历代之思想家概属反动透顶……,进而厉行诛心之论,创恶攻之罪,无中生有,诬人以异端信仰而凌虐诛戮,冤狱遍天下。”“三是彻底摧毁民族文化。名曰‘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野蛮大武斗,割鼻、剜眼、削耳朵,惨绝人寰。”凡是文化遗产,概属污泥浊水;现在更进步,公开提出踢开书本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把人类的全部文化知识,缩小得只有《老三篇》和最高指示了。“凡此三端,使神州大地一无道德,二无信仰,三无文化。这种无道德、无信仰、无文化之状,实乃中华民族膏肓之疾,必将毒及后世,使这个民族蹶顿难振。”吴宓说:“后之人主,无论如何雄才大略,亦将为之束手无策;非若干代之从根救治,难以达到民族精神之重新振作。……”

这之后,多日不见吴宓,我颇为想念。这天,我在群众专政那里听训完毕还早,我便利用回家的“自由”,抄捷道溜进了西师文化村。这是18年前常游之地,楼台依旧。我一迳来到一舍二楼,进了吴宓那间小房。

他正领了本月工资,在计划分配。钞票分成了一小叠一小叠,多少不等。其中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两叠:即伙食费60元,零用钱10元。其余九份,一份寄原配,两份补贴邹兰芳侄儿女中最困难户,六份是帮助朋友遍孤(包括李源澄的女儿)的生活用费。

我问：“你一个月只零花 10 元？不够吧！”

“够的！”他语气非常肯定，“又不添什么东西，更不吃零食，也买不到什么饮食！上个月的 10 元还没用完哩！”

“你太刻苦自己了！”我说。

“不，一点也不！你想，比如说，你现在全月的生活费也不到 10 元，也可以说，你一元也不元。又比如，我关牛棚时，全月的生活费才 15 元哩！”

我又问：“你这些补贴的人，每月多少是怎么确定的呢？”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再斟酌，略微减少三两元。”

“都实在吗？比方说，邹家这两个孩子，算来都 30 来岁了，又没管制，还不能养活自己？”

吴宓略怔一怔，突然说：“不，我不去过问这些。我，尽心耳矣！如果他们欺骗我，那是他们的过错。我，尽心就是！尽心可也！”

他把钞票一起一起用纸包好，依次放进抽屉里，等他们来取。然后叫我在小床床沿坐下，他和我促膝而谈。他正襟危坐地说：

“你来得正好，我要对你作最后之叮嘱。……”

我说：“我只是溜来看一看，不敢久呆。另择一天，刘大姐探好机会，再聚首细谈，如何？”

“那也好。但此刻先说一梗概。……我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所剩时日不多了。……我已屡次对你说过，你年轻得多，又比我长寿，务必记住我们身受百般凌辱，天下书生挨整之冤枉，四海苍生备受涂炭之实况，如实纪录，传之后世。使千秋万代知其备细。并非我们泄私愤，实为晓其得失以献后之当道，‘勿以水鉴，应以殷鉴’。务以今之失为戒，行道而治，力避前失。庶几中华有复兴之机，炎黄子孙不至沦为欧美之奴婢，也使后世青年学子与黎民百姓不至于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急于回家,怕别人发现,徐徐站起,说:

“20年来,你说过多次了。我记得的,记得的。不过,我看,世事茫茫,尚不可知。你看,华国锋天天念叨,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目前‘群众专政’一切照旧,仅只斗争会少了一点儿。前途如何,实难预卜。”

他也站起来:

“不,不!你要相信我的预言。不是预言,是科学论断。邓小平即将出山,必将出山。移星转斗之功,指日可待。你务必坚持这个信念,保全有用之躯。……”我也迈步说:“但愿如此!”

他抢前拉住我的手,用力握着,摇了两摇:“珍重,珍重!为国珍重,为民珍重,为子孙后代珍重!”

44

“聚餐”庆幸存

大约是1976年10月,专政机关基层加强对“五类分子”的教育,不时叫我去听训。又频繁叫这些人去给他们打扫清洁。每次听训、打扫清洁的时间长短不一。我只须走出家门及返家时,向左近的治安委员及负责监督我的“群众积极分子”报告:“叫我去听训(或叫我去打扫清洁)回来……”,其余来往路中则无人在旁管押。

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我又试着溜到吴宓宿舍去。成功了!其后,极想再去。这有两种心理:一是渴望和吴宓多相聚。而吴宓到我这儿来冒险更大,他行走困难,并且今年视力比过去更差了,必须刘尊一一道才行。二是,我很想进西师去走走。不管怎样,我是个有几十年教龄的教师,又是西师建校时的教师,现在虽被赶下了讲坛,却对学校——尤其是西师充满了感情。只要在学校里走一走,就觉说不出来的快慰,对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何况,吴宓住的那栋宿舍的底楼,是家属宿舍,我的母亲他们就曾在那儿住了三年。我于1958年1月18日得知即将被捕,溜回西师和母亲、女儿话别(心怀生离即可能死别之悲),就在这栋宿舍的一楼一号。来此一行,虽说犹如做贼,仍然可遣怀旧之深情。

于是,今天,我又按捺不住,在“听训”之后,一气溜到了吴宓那

里。

他非常高兴，拉我坐在床沿。告诉我，现时大搞向阳院，乃居民小组之下更小的组织细胞。十多户一个向阳院，互相监督，比商鞅的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的连坐之法更为严苛。因此，这样挨坐小语，可免走廊那头的人听到。

吴宓的房间靠近走廊尽头。他的左边还有一家，也是进过“黑旗队”的；右邻为刘尊一，再右三间之后才是楼梯口。

他首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个昨天听到的传闻。说是几天前，重庆市要在九龙坡区委（位于南岸李家沱）开个什么紧要会议。上午十时，许多工人聚集在区委大院门外，要求见邓小平同志。区委派干部出去说明，这里在开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并未来此。叫人们快快散去。可是，毫不见效，而且工人越聚越多，齐声啦啦叫喊，一定要见邓小平同志。区委书记亲自出来说明：这里并无邓小平。有几名工人上前，很没好气地说：他们亲自望见邓小平坐的那辆轿车到达这儿，下车进了区委大门。区委书记这才恍然大悟：工人把领导干部钱敏错认作邓小平了。钱敏的身材与邓小平相似，远远望其背影，误认作邓小平，是很可能的。

“你们错了，那是市委书记钱敏同志。”

“你莫哄我们，我们亲自望见，肯定是邓小平同志。”工人齐声呐喊：“我们要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出来，四川工人想念邓小平同志！”“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要看一眼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四川工人想念你！”

区委书记莫法，请了钱敏出来。钱书记笑容可掬：

“请同志们看看，是不是把我误看成了小平同志？”他转身让工人们看看他的背影和侧面，“同志们想念小平同志，我非常理解。我自己就很想念他。如果什么时候小平同志来了重庆，我一定请

求他和同志们见面。”

工人们这才快快散去。

讲完这个传闻,吴宓迈到门边,朝走廊左右张望了一阵,再回到床边坐下,说:“由此可见,人们何等盼望邓小平出山。这也反映出:连普普通通的工人都意识到,华国锋这位英明领袖难符众望。而其何以众望不归?我看,关键之关键是他那个‘按既定方针办’太不受欢迎!质而言之,人们要求千万莫按既定方针办。文革浩劫的‘既定方针’必须改变。再不改弦更张,只有亡党亡国。……由此观之,邓小平出山有日,我们的苦难快要结束了。神州大地的荒唐与苦难即将结束了!”

我认为他那消息不见得确切。他便叫我问刘尊一。说时敲了敲靠刘尊一的那堵墙。他说:“这是我们从革命小说《红岩》里学来的。”

果然,刘尊一过来了。她说,那个消息已经不脛而走,一日之内,她已听到五个人讲过。其中两人是系革委会委员。

刘尊一的孩子都不在这儿。她说:今天这儿很安全,本向阳院的四个积极分子都到重庆市中区去了,大概是搞他们的“派”活动去了。肯定得傍晚回来。机会难得,她叫吴宓留我在这儿吃饭,她去食堂买点儿饭菜,我们三人共进午餐,算是我们老友劫后重逢,略事庆祝。

吴宓这时的伙食是由住在附近的邹兰芳的侄儿邹开贵代办的。每日三顿,按时送来。吴宓按月将自己的伙食费加上给那侄儿的津贴,一次付给他。

十一时半,那侄儿——现在是一位高高大大的青年了,臂挽竹篮,送来了吴宓的午餐:米饭一小碗,炒莲花白菜一小盘,菠菜汤一小碗。吴宓拿筷子搅了搅汤,高兴地小声说:

“好！好！好运气！今天汤里有豆腐！……”

这时供应仍极匮乏，居民凭票供应豆腐，每月最多有豆腐四小块。这汤里即有豆腐四小块，约计不到二两，但这已是很难得的了。

刘尊一从食堂里买了好大一盅饭，一小碗莴笋，还有一小碟卤猪肉。

吴宓问刘尊一：“你买了这多饭？”

“只有六两粮。老张吃五两，我吃一两。没别的招待，让他吃一顿饱饭，也算我们对十余年苦难的慰劳。”

吴宓又问：“这卤肉几两？——三两？那，你这个月的肉食定量全用完了？”

刘尊一：“这么隆重的聚会，这么难得的机会，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

聚餐隆重开始。动作轻微，深恐碰响碗盏；小声悄语。无奈吴宓和我听力都差，吃饭时不可能紧挨并坐。刘尊一便时左时右，挨着我两个耳廓边，为我们转述补明。极为有趣。

吴宓把四块豆腐仔细捞了出来，分给我两块，他两个一人一块。我要推让，他就痛心疾首，恼我“多生枝节”。

刘尊一只从六两粮的米饭里拨了不过半两之谱，剩下全推给我，并一再解释：她现在食量很差，吃不完自己的定量，今天的招待，丝毫不影响她的生活。叫我千万别客气。又不断将切成小丝的卤猪肉朝我两个碗里夹。不用说，给我的远远多于吴宓。至于她自己，只吃一丝丝，做个样子而已。

吴宓又推说，他也吃不完这么“大”一碗米饭，硬给我拨了约莫三分之一。两个都不停地往我碗里夹小菜，也不准我推让。

他两个的每一动作，他们的上述对话，无一不令我五内酸楚。

因为这是秘密冒险聚会,所以我们吃得很快。饭罢,他俩各自收拾自己的碗筷,我才好容易冒出了一句话:

“此情此景,岂非语言所能表其万一。”

刘尊一:“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为美好难忘的一幕。昔日好友,只剩下我们三个和黄稚荃了。以后如果遇到稚荃,我要把今天的聚会详详细细讲给她听。”她把碗筷拿过去了,进来对我们说:她坐到门前走廊里看报,以便上下观察,为我们把风,叫我俩个再聊一聊。

于是,我俩个紧挨坐在小木床的床沿上,随兴所至,小声畅谈。其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以下这些。

吴宓说:正如《红楼梦》柳絮词所说:“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鸦片战争以来,夷狄交侵,中华板荡;好容易神州底定,却又运动相接,“矫扰自误”。“一如我吴陀曼蹉跎岁月,‘三春事业付东风’者,比比皆是。岁月虚度,转眼已是岁暮,唯叹‘明月梅花一梦’了。……韶华虚度,一无所成,可慨也夫!而尤可悲者,我中华本来落后于欧美列强,今又自扰自误,不知更落后几十年矣!……”

我宽慰他:目前百业荒废,物资匮乏已极,正是山穷水尽,中枢必有新猷。……

他同意我的乐观想法。却认为他们那一时代的学人已属强弩之末,承前启后,要靠我们这一年龄层次的学人了。他嘱咐我,异日嘉育后学,最要紧的是,培育中华传统的治学之道、为人之道——勤奋、谨严、敦朴、诚信等等。其次才是传授知识。前者为传道,后者为授业。为人师者,首重传道。因为治学之道(这又首先以为为人之道为基础),立则授业有方矣。因谈治学之道,他又提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范例,其中又再次谈到梁启超。

因称梁任公的谨严,吴宓便谈到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他不表推崇。

这时,刘尊一来说,快三点了。我急起告辞。吴宓也站了起来:“这个办法很好。有机会再来。……劫后聚首,人生之幸福宁有甚于此乎?”

刘尊一凭栏四望,说:“安谧正常,快走!”

我快步下楼,迅速溜出了西师的水岚垭后门。奔至由专政机关回家的常道,缓步走到那位无业妇女——治安委员的茅棚前,立正高呼:“报告刘委员!现管分子张紫葛出公差回来了!”

她没作任何盘诘,喝了声:“滚回去!赶快做自己的义务劳动!”

两次冒险成功,大大鼓舞了我。恰好第三天我又被叫去打篮球,专政机关的干部要赛球。活少人多,很快就完成了。时间这么早,我又情不自禁地溜进了西师文化村。

吴宓正跌坐在小木床上,念着陈寅恪的送别诗。听见我来了,他很高兴:“好,来得好!我正百无聊赖。”

刘尊一过来,一起说了一会儿闲话,她便到走廊上“看报”去了。

吴宓说,他这几天很是想念天津的朱氏兄妹。往事历历,歉疚良深。“我有负于朱氏兄妹者大矣!他们对我之隆情厚谊如此,而我竟无尺寸之报……”

我说:“前缘如此,何恨之有?”

“你不知道!……”原来,邹兰芳临终前,将朱小姐悄赠人民币二千元、黄金首饰之事及当时的殷勤叮嘱,都告诉了吴宓。

“嗨,哎!自古常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此语实有不足,应加一句:尤多侠骨柔肠之女!”

我劝他，应以有此侠骨柔肠之女弟子为慰。师生之情亦当如手如足。……

他只点了点头。沉默了一阵，起身从褥子底下翻出了一个布包，打开来，拿出一个三十二开的硬纸壳封面抄本。翻开封面，露出里面横贴的一张照片，问我：“你认识这张照片吗？”

我接过来举到眼皮前端详，呀！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1937届外文系九位毕业小姐的全身合影。1953年我们和朱氏兄妹游北温泉时，朱小姐给我看过，然后当我面送给吴宓的。可惜此刻，我的视力已不能辨明照片上小姐们的面容了。我还能认出，这是九人并排身著白纺绸短袖旗袍的那张。

吴宓详细讲述了文革中，他如何保存这两张像片，又怎样丢失了那张他和八位女生的合照（半身）。

这张像片是贴在硬壳本里的。在抄本的纸页第二张上，还贴有吴宓三个女儿及一张他与妻女早年的合照。但这些照片都较小，我的视力无法辨认。系何像片，乃是吴宓指点相告。像片后一页起，则是钢笔楷书，一字占两格的文字。吴宓告诉我，这是他1973年起，到1974年上半年止，陆续写成的几篇杂感。自1974年夏秋以后，到此刻，他视力再度下降，只能写、认核桃大的汉字，就停止了书写。因而这抄本还有二、三十页空白。

45

反对批孔

这时,我左眼残存的视力,还可在逼近文书寸许距离内,如影片现字幕那样,一字一字辨认,缓慢地阅读。我匆忙、紧张却又是缓慢地看完其中的两篇。日今又整整过了二十年,我当然只能忆其大意。

一篇题为:《我反对批孔》。文字大意:极扼要叙述了批林批孔的“卷起千堆雪”。连篇累牍地,对孔子及其学说、思想,“作了极无常识、极不道德之中伤与秽骂。”甚至巧为绘画,制像片,于《人民画报》等高级杂志上刊出。

此一恶浪,实乃对中华五千年文化之彻底自我否定。是对自己祖先之野蛮侮辱与嘲弄。“人间之愚昧荒谬宁有甚于此乎?”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奉马、恩、列、斯为师。然余未见马克思辱骂歌德、席勒,更未闻列宁、斯大林秽骂罗蒙罗索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

“尤可怪者,”报载:联合国在会场悬挂世界各国先哲之警句,亦有孔子嘉言。而我国乃向联合国提出抗议,“愤怒”指斥联合国悬挂了孔子语录。“此不啻邻里恭称尔之大曾祖父德高望重,而尔乃愤然作色曰:‘住嘴!汝胡说!我之大曾祖父乃恶劣卑鄙之流

氓!’呜呼!炎黄子孙乃有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者!”“宓愿公开大声疾呼:余坚决反对所谓‘批孔’之无赖行径。倘为此而如耶稣之钉上十字架,亦所心甘!”

另一篇题为:《纯属捏造,历史云乎哉?!》

文章大要:

《人民日报》某月以某篇半版篇幅,刊了一篇署名“罗思鼎”(注:江青专用写作班子的化名)的专文。文章说,刘邦之妻吕后如何雄才大略,是刘邦创业的第一助手。说她如此全力建立关中根据地,为刘邦缔造了巩固之后方,源源提供兵源及物资,有力支援刘邦转战关东,终于击败项羽,平定天下。据该文所云,则楚汉逐鹿之际,汉方根本没有一个肖何经营关中,只有刘邦之妻吕雉耳!两千余年来,正史、野史,无不明文记载,刘邦入关直至楚汉相争,吕后及刘父太公都在故乡。到垓下之战前夕,吕雉才被接到刘邦身边。她何曾到关中根据地做半点事情?无数文献记载分明,江青辈竟然随意颠倒,凭空捏造。其情其状,实比赵高指鹿为马恶劣万倍,可耻可鄙百倍。

玄之又玄者,该文措辞行文,明显在写江青。吕后云云,不过是江青之代词耳。实即无耻捏造,江青乃毛主席缔造新中国之第一助手。其伟业勋绩远在宋、周、刘等公以及诸元帅、将军之上。她该是举国之副统帅。

罗思鼎!这个署名堪称绝唱,赤裸裸,没有半点遮羞布。罗、我谐音,罗思鼎,即我(江青)思鼎。思鼎!楚王问鼎中原,露垂涎天子神器之意。而江青乃直接了当“思鼎”,想,要,要夺取九鼎神器,要作皇上。

读此文,令人作三日呕。这般公开颠倒黑白,凭空捏造之文,居然辟专栏刊之于全国首屈一指之大报!余不禁愤气填膺而呼:

纯属捏造！历史云乎哉？！

赤裸裸颠倒黑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堂而皇之说弥天大谎！以普天下之人为白痴！眼里还有人民吗？黄钟不用，瓦缶雷鸣，此之谓也！

呜呼哀哉！

我大惑不解，一个这么谨言慎行，惟恐惹祸的吴雨僧，竟会直言不讳写下自己心声，如此坦率大胆地反对雷厉风行的批孔运动。如此大声疾呼，申讨权倾华夏的江青。

他的答复简单平淡：“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拱卫中华文化，那时，“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此绝非一时意气用事。实乃深思熟虑，理智之决定。眼见得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我辈焉能睹其糟而啜其醜？！……孔子乃中华文化之重要象征，为我中华五千年来少有之教育家、思想家，而其最重要者，乃为我中华民族高尚道德之一代宗师。践踏孔子即是践踏中华五千年文化，践踏中华之民族道德传统。我吴陀曼必须挺身而出，舍生以殉；庶几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不绝如缕，千秋万世得知。瓦缶雷鸣，黄钟仍存；乱草丛生而芝兰犹在也。……”

他接着告诉我：1974年批林批孔之际，他绝不止悄悄写下了这些文字，而是有实际行动的。整个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起初称病不参加学习。病假无法再请了，到会学习。他很少发言。必须发言时，则只批林不批孔。列举事实，痛斥林彪，却是绝口不提孔丘。这时是分系编组学习，中文系领导学习的一位中年男士亲找吴宓谈心，启发他带头批孔。吴宓的答复坦率得令那位先生瞠目结舌：

“宓为人憨直，从不作违心之谈。束发受书，即宗孔子。方今已年近八十，亦曾习西方学说，并亦研读马克思、列宁之经典著作，

汇通以观,深思穷究,更复对照马列经典,无法得出结论,孔子有害于中华文化,有害于今日之富国强兵,有害于今日革命如时下报刊所云。宓乃确知,批判孔子,尤其并林彪同轨而批判之,实为非是。认识如此,不敢伪饰。此乃宓之真心,……”

那位领导说:今日批判孔丘,中心之中心在于: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亦即主张恢复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化为封建主义。所以,今日推崇孔子,实质是为守旧复辟势力作张本。故从革命利益出发,应批孔以击退复辟势力。……

吴宓答:

适聆教诲,正属此次运动各项文件之精神。然宓愿说真心话曰:宓难苟同。姑不论今日有无复辟势力,宓但愿一陈固陋,申明一中心之点:方今批孔之“钢鞭材料”,不外孔子说过“克己复礼”。宓以为:时下之论,并未弄清克己复礼是何意思。先说这个“礼”,先秦著述,称“礼”者多矣。然其含义各不相同。古人言简而赅,一词多义者多矣。即如今日,汉文一词多义者亦颇不少。五经之“礼”,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各有所重,各有所精。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孙中山高举之“天下为公”,直到今天,也仍未听说斥为荒诞。宓且于学习文件中见到说:共产主义乃真正之天下为公,毛主席亦称人民公社之优越性在于“一大二公”。然则此“天下为公”之理想,即首见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简言之,即使是五经之“礼”,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奴隶制度”。

吴宓又说:

考之历史,东周——春秋之世,王室式微,奴隶制即已步入瓦解阶段;彼时士庶称“礼”,多指道德规范,例如早于孔子之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曰:“仓廩

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难道能据此把管仲所称之礼解释为“奴隶制度”吗?孔子“克己复礼”之“礼”即管仲“礼义廉耻”之“礼”也。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骄奢淫侈,道德败坏。孔子乃提出“克己复礼”,旨为倡议人人(自王侯至庶民)克制(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为合于道德规范。何得将此论定为孔子主张复辟奴隶制度?……

那位领导说:“克己复礼”的“礼”,确实包括法律规范。并举出孔子的话,表明孔子都有称美奴隶制之处。

吴宓承认:“克己复礼”的“礼”也可以解释为包括法律规范。但绝不能等同为奴隶制度。孔子确有祖述尧舜,称道先王之道等言论。但他从未说过恢复奴隶制度,更未声言反对新兴地主阶级。

吴宓说:今日评人论事,通常说要看主流,看实际行动。准此,我只举两点论孔子:第一,孔子一个最主要的实践是教书。他开私人讲学之先例,这完全是反奴隶制度的。而且,他的弟子,有名籍可考者,其阶级成分可定为奴隶主贵族阶级者不及十之二、三,其绝大多数为平民乃至奴隶。换言之,他以毕生之行动,身体力行,和奴隶制对着干,拿现在的话说:坚决反对奴隶制度。如何能丢开他的实际行动,凭空说他搞奴隶制复辟?第二,孔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提倡仁义道德,讲究忠恕之道;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称道颜回为弟子中最贤者,因为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要求青年“居勿求安”,“食勿求饱”。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把行放在学习书本知识之前。……这些道德,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仔细分析,其大半精神合于前几年大加提倡之雷锋精神。……

那位领导说:你别忘了,孔子提倡忠君,这是反动的。

吴宓说：

古时所说的君，固然是具体的统治者，却也同时是社稷——国家、民族的象征。现时批孔所加之最大罪名，是孔子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然而，新兴地主阶级之政权不一样有君吗？批孔诸公能举出何等证据足资论断，孔子所言之君乃是奴隶制之君而不是新兴地主阶级之君呢？今兹江青首长之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发表连篇累牍之雄文，称颂刘邦为伟大得无与伦比之法家人物，彼刘邦者，不正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第二朝代之皇帝——天下君乎？刘邦做了天下君，以神州为其私有，倒是个伟大法家，而孔子只不过在论述其学术时提到“君”，就该论断为奴隶制走狗，而百般挞伐秽詈之，天下宁有此理乎？且宓可举出许多论据，证明孔子所称之君乃新兴地主阶级之君。甚或更为进步。信手拈来，如，《学而》中有孔子这样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导也。如仿现在理论家之逻辑方法，完全可以断言，孔子称君为治国之“领导”，而不是“统治”、“专政”、“独裁”！并且，孔子在这里，对治国之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第一，敬事——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第二，信，——讲究诚实无欺。对臣民敦厚诚恳；讲究言而有信，说话算话，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第三，节用——节约俭省，绝不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第四，爱人——要爱百姓。第五，使民以时——一切驱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顾季节，不能有误农业生产。

孔子主张的君乃如此者，何曾主张恢复奴隶制？……这些，难道今天没有参考价值吗？……更重要的是，孔子继承发扬的中华传统道德，有诸多合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之处。象目前这一文化

大革命,全不要道德规范,仅凭造反精神胡整一气,这国家究竟还要不要秩序,要不要纪律呢?……

那位领导说服不了吴宓,便问:“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抵触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国性运动?”

“当然知道。”

“那你就该明白,这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受到严惩的呀!”

吴宓吐词缓慢、沉重:

“为了维护我的正确认识,为了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宓准备领受任何不测之祸。虽死犹生,含笑九泉。”

那位领导倒抽了一口凉气,注视着吴宓,沉默了很久,才说:

“看来,你的神志不太清醒。大概年纪太大,有什么病。你暂时请假,在家休息,建议你不要向同志们高谈阔论。今天,我们只是私人交谈。……”

吴宓摸不清这位领导的意图,却也接受了他的建议:请假逃避学习,在家里休息,默诵中外古代诗文,神会古人,或者反复念陈寅恪等朋友的诗作。怡然自安,静待大祸降临。

确实其祸难测。在‘四人帮’横行的1974年,吴宓的上述言行,足以论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言论,给予无情之打击。

吴宓横下一条心,准备接受意想不到的灾难。

可是日复一日,并无消息。

现在吴宓给我讲述这些情况时,已是1976年的10月下旬。他仍然安然无恙。没听任何人提到他“跳出来”反对批孔这一大逆不道之举动。一月复一月,直到现在,他仍在领教授工资,除了扣掉的房租、水、电和工会会费外,他每月实领272元5角的工资。何以竟得幸免?

吴宓判断,只有一种可能:那位批林批孔时掌握中文系学习的

领导保护了他。他说：那位先生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有学术气质。

吴宓又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我吴陀曼反对批孔，决心杀身以卫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复有那位先生庇护吴陀曼。幸甚幸甚！”

他拿起那硬纸壳封面的抄本，郑重递给我：“你藏在棉衣袖里，夹带回去，替我保存，务勿遗失。”他还告诉我：刘尊一的大孩子造她的反，随时抄她的家，和她生事。所以此事只能托我。

他说：他现在视力日益下降，对面不辨人物。本“向阳院”邻居多为造反人士，“他们进我这屋自由来去，很可能拿去这抄本而我实无所知。……怕的是他们拿去了生事。——我的视力已不能再写，而那照片尤其是北平大学诸生之照片，就永远无法重新获得了。”

我很踌躇，以我的身份，藏着这么一本东西，实在太危险了。

他说：“怕个什么？充其量打你一顿。承文化大革命之宠恩，挨几下拳打脚踢，我们已习之有素矣！”又说：“自从身经百斗，饱尝牛棚折磨，复经黑旗队之深造，我已早失五十年代之戒慎恐惧，也多少学得了红卫兵小将之‘天不怕，地不怕’。怕个什么？祸福无由，捶楚无因！纵万千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亦无能回避飞来之横祸。复何恐惧战栗之有呢？”

我顿受鼓舞：“说的是！”接过那抄本，捞揭起棉衣，把它揣在掖下裤腰上。将烂布条搓成的裤腰带扎得更紧了，盖好棉衣下襟，拍拍腰间，觉得抓扎停当了。吴宓竟有兴趣说了句笑话：“善哉！你我弟兄都叫锻炼出来了！想1951年在磁器口，你叫扇了一耳光，就一个僵在床上不饮不食；一个夜不能寐，谆谆慰勉解劝。现在想来，实在大惊小怪，殊属未见世面。”

我刚跨出门,却又怔住了:“兄长,我不怕挨一顿打,怕的是万·叫搜走了,就丢掉了你的手迹和那珍贵的照片!”

他想了一下:“唔,是这个道理。这样吧,你把这个暂时留下。今天先带去我这破布鞋,给我好好保存。”他从小床褥子下翻出那双拴着徐方庭院长手搓麻绳的烂布鞋,显然他已精心洗刷过,鞋底鞋面都无灰尘。

他说:“这是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听说,徐院长一‘解放’,马上发现了肝癌,现已去世。我是再也见不到他了!见此鞋而思其人。务请为我好好保存。”如果是那抄本,即使我能侥幸带到我家,我也没把握能够保存稳妥。因为群众专政三天两头深更半夜突击抄家,透底翻拣,但有字迹之物,不论手写印刷,概行没收。至于这种拴有陈旧麻绳的烂鞋子,可保万全。

这次侥幸,安全回到家了。当即到指定的地段去做清洁(义务劳动)。一面刷阴沟,刨屎尿,一面盘算:吴宓那个抄本必须转移。若被那些造反派拿去是会生事的。以我看过的两篇而论,目前,华国锋虽已“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痛斥江青那篇当无关系,但迄今为止,并未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批孔运动。那么,吴宓反对批孔的文字还会惹祸。

46 黑夜送别

又过了两天,正是例行听训之日。一大早,我的大女儿笑星来了。她这时是川中油田荣获“勇攀高峰石油钻井队”7002 钻井队队员——化验工。昨天去重庆出差,今早过此返南充钻井队所在地,路途中来探望祖母,就自然探望我这父亲。说是停留 6 小时,下午饭后乘车回队。我这女儿当然坚决和我“划清了界限”,实际父女感情甚深。经过文革的疾风骤雨,也渐知事理。托她保存吴宓的抄本当无问题。我暗自庆幸:真是天赐良机,我只须从吴宓那里夹带回来,交给我女儿,便可得到妥善保管。

于是,听训完毕,我径奔吴宓那里。文化村一舍很是安静。我一溜烟窜上二楼,并未遇见谁人。可是一踏进吴宓房里,他却抓住我的手,拉我往小床沿上坐,声音极小极小:

“今天要特别小心:尊一不在,去歇马场她大孩子那儿了。那边几个造反派都在家。……”

我忙回身:“那,我马上走!”

吴宓依依不舍:“坐吧,悄悄的,他们不会知道的。……”

就在这时,拥进来一伙人,为首一个青年妇女冲我大叫:

“哪来的坏分子?”

吴宓上前答：

“他是好人。”

那妇女仍冲我叫：

“说，你是什么人？——休想蒙混半点。我们向阳院全体革命群众在此！”

她后面有七、八个男女，不用说，这都是西师的教职员。也许我一个也不认识，也许有从前的熟人，现在我视力不行，认不出他们来了。而那青年妇女，我很怀疑她就是她的一位好友的女儿，那个1950年时常坐在我膝头上要我讲故事的小姑娘。因为她的身材、体态和语言音色，都很像她母亲30来岁时的大谱儿。可是，即便是她又能怎样？这年月，子女狠斗老子娘的事儿多着哩。我该怎么答复呢？我的身份是见不得人的。说假话？说个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姑且站着不语。

吴宓再次上前：

“同志们，是这样的。我上街去了一趟新华书店，回来走到小校门坡下那三岔口，实在走不动了。你们知道，我的脚断了，跛久了，疼痛难熬，硬是没法走了。恰好这位师傅路过，我才请他扶了我回来，刚进屋……”

一个男子：“他这模样像工人师傅？”

另一男子直问吴宓：“你何以见得他是工人师傅？”

吴宓：“耶，他这模样，就像老工人，退休工人，多年辛苦劳动，累得面黄肌瘦了嘛！”

又一个男子问吴宓：“你看见他穿的什么衣服吗？”

吴宓：“我眼不好，看不清楚。他很朴素嘛！老工人师傅都是很俭朴，穿得很马虎的嘛！”

那妇女：“叫她自己说。”迈进一步，问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不敢说。说真的？马上挨打。说假的？拷问确实了，反多一条大罪名：隐瞒“反革命”身份，——就是重新犯罪，要受重惩。

那青年妇女冲到我面前：“说不说？”

呀，我看清了。正是我那好友的女儿。因为她的脸貌几乎与她妈妈30岁时一模一样。

然而我又能说什么呢？而且，不容我再作思考，她叫了一声：“搜！同志们，来！”

两个男子上前，左右抓住我的两臂，青年妇女动手搜身。我穿的是劳改棉衣。经过细心反复洗刷，拆补改缝，却是无法改变它的本质：制作劳改服的再生布，再生棉。再生棉者，旧朽棉絮加以捶弹仍然板结。衬在布里，把衣服拱得七翘八凹，极不贴身。而再生布——以某种先进方法将烂布朽纱再生为布，虽然染成了黑色，但穿不几天就褪色俨如干牛粪。正是这倒霉的衣服外观太糟，使得“向阳院”的革命诸君直觉判断我是“坏分子”，而前来追究。这上衣的式样也很特殊：仿中山装，但衣领无翻边，亦无封领挂扣。只左下幅有一个无盖的口袋。这就是说，搜身的第一步，——掏衣袋，很简单。

那青年妇女伸手朝我这唯一的口袋掏了一下，什么也没有。搜裤子，压根儿没有衣兜。于是就扯开我的上衣。这可露馅儿了。我太穷，棉衣里既无毛衣、绒衣，也无衬衫。只有一件陈旧的针织圆领短袖汗衫。

那是我在监狱里积极劳动，年终大评，三选九审，荣获“劳改积极分子”称号而得到的特殊奖赏。当那妇女扯开我的棉衣时，汗衫当胸横排的六个大红字立刻出现在这伙人面前：

“劳改积极分子”

那青年妇女大喝一声：

“好个龟儿子！原来是个劳改释放犯！打你个龟儿子！”出手狠扇了我一耳光，一面叫：“同志们，来，把这劳改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人声嘈杂，蜂拥而上。

鲁迅在其杰作《阿 Q 正传》中有一妙笔，描写阿 Q 对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产生了条件反射，见到假洋鬼子举起哭丧棒（文明棍），就本能地双手抱头，静候哭丧棒打在头上，“篷，篷”，响个几下，就一块石头落地，心情轻松了。我这位教授，经过长期特殊生活的陶冶，也学得了这一“本能”，且有沉痛教训，那年挨了几拳——只不过是几拳，便打瞎了一只眼，左眼视力及耳朵的听力也受到损伤。为此，凡遇挨打，我就仿阿 Q 路数，双手抱头，或伏倒地上，以背臀顺受之。

正当我逆来顺受之际，吴宓跳过来，拦住众人：

“同志们！这是我的不对。是我要求他扶我过来的。要打，请打我！打我！请你们打我！打我，打我！”

人们把他掀开：“你休想包庇劳改犯！”“你和这劳改犯穿一条裤子吗？”“你等着吧！要理麻你的！”“你和这劳改犯搞什么阴谋？”……

吴宓却再三过来，挡住众人：“是我该打！打我吧！打我！……”

有个男子嚷道：“等等！叫他起来，交代，是怎么回事。”

我站起身。一个面目清秀，年不及 30 的青年语气平和地问：“说吧！你姓甚名谁？何罪劳改？何以窜到这儿来？”

我说了真实姓名，目前住址及现行管制等情。并照吴宓的搪塞之词，说我今天听训回来，路遇这位老大爷，腿跛走不动，要我扶他回来；他既住在西师，又一人上街，必是革命群众，我一个现管分

子,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命令我。我就接受命令,扶他回来了。

青年指吴宓问我:“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我说。

青年又问吴宓:“你认识他是谁吗?”

吴宓:“当然不认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是劳改犯。劳改犯怎么会在街上走呢?”

有人斥责他:“你装蒜!”

一男子上前,操了吴宓一把:“你滚开!”

吴宓:“这是我的宿舍,我滚到哪儿去?”

那男子:“到走廊上去,不准你在这儿和劳改犯串供。”

一青年说:“算了!我们没时间讨这麻烦,把这劳改犯送交他住地的治安委员会吧!”

那青年妇女说:“不行,得弄个清楚。马马虎虎,我们向阳院就太窝囊了!”

她转身出去,叫了一个什么干部来,那是一位年30多岁、身材魁伟的男子。他立在走廊上,把我叫过去,劈面赏了我几巴掌,几拳脚:

“你个王八蛋!从实招来!哪来的劳改犯?越狱逃跑的吗?……”

我又如实说了一遍。

那男子吩咐:拿纸笔,叫他写个亲笔供词。

我蹲在走廊的地板上,就着一张方凳,写书面交代。那青年妇女守在旁边,看我写。

既是供词,当然首先写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何罪判刑,原来在何地方工作,等等。当我写到原为西师教授,某某某等教授和我同系云云时,大概她想起了我就是她小时曾经抱过她的那个

长辈。她态度突然转变了。显得很是不安。赶紧拿了一个小板凳来,塞在我屁股下头,让我坐。一边说:

“别急,别急!慢慢写。嗯,能认识就好。……”

她踌躇了一下,突突突跑下楼去了。一会儿,她领了一位中年男子上来。

“喂,喂,X组长来了(或是某处长,我没听清)。”

人们零乱地站在走廊上。X组长站定,那青年妇女叫我站起来,问:“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我不知这位世侄女现居何官,任何职,反正这些年,我这身份,对人已有例行称呼:“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委员”(广泛适用于不明身份的人,因为“委员”确实多,如革委会委员,治安委员,居民委员,保卫委员,等等)。见到其派头稍大的,则称“首长”。

“报告委员,我的交代全部属实。”

“你知错吗?”她问。

“经委员们教育,我知错了。我不该扶这位大爷来这儿,这是不守现管分子的身份,就是不规规矩矩,就是乱说乱动,应该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能认识就好。”她取过我未写完的“亲笔供词”,递给那中年男子。

那人接过去,只看了头儿行,便睁大眼睛细看我,看了好一阵,才问:

“你是张紫葛?”

“报告首长,我就是张紫葛。”

“就是那个原女师学院教授,合到西师后任外语系教授,后调政法学院的张紫葛?”

“是的,是的!”

他又看了我一阵：“见鬼，你莫麻（四川方言：哄骗）我。张紫葛，哼！就该认得我！你说，我是谁？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如果你是老西师的，我当然认得。只是我日今眼睛瞎了一个，另一个也半瞎了，看不真切，识不出首长来。”

他又看了我一阵，困惑不解：

“真见鬼！你怎么可能是张紫葛？张紫葛，呃嘿，那阵在西师，行市（四川方言：有名气、有声望、有能力之意）得很哩！英俊潇洒，女教师、女学生围着他转！你这样子，是张紫葛？”他转问那女子：“你也认得张紫葛的嘛！你看，他像吗？”她再把我端详一阵，回答那中年男子：“我看，他是张紫葛。虽说皮包骨，肤色难看，可额头显得特大特高，还是张紫葛的骨架模样儿。……”

中年男子仍然将信将疑，又仔细问我，我在西师时，院、系领导各为何人，特点如何，外语系有哪些教授，当时我住在那儿，等等。

待我一一回答无误，他又定睛看了看我，自语道：“哎嗨，毛主席简直说对了。这些资产阶级货色，经过七斗八斗，就成了这模样儿——道地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随指吴宓，问我：“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X组长对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在西师外语系作教授时，系里教授中有个吴宓吗？他就是吴宓呀！”

我故作惊讶：“呀！他是吴宓！我现在眼睛不行。大概他也变了，老了，我都二十多年没见了嘛！我实在没认出他来！”

中年男子觉得有趣，问吴宓：“你认识他吗？”

吴宓：“我刚才就对向阳院的同志们说过，我不认识他，只以为是……”

中年男子：“从前，西师有个张紫葛，你还记得吗？”

吴宓：“当然记得，他后来调到西南政法学院去了嘛！”

中年男子：“他就是那个张紫葛！你看，毛主席说得多么正确，七斗八斗，他成了这么个狗屎堆了！”

这时，虽是一切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却也有了些小小变化。人们提到毛主席，不再冠以“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一套，也不再开口先背毛主席语录了。因此，吴宓接上说：

“呀！我哪能想象这就是那个西师外语系最年轻的教授！真是毛主席说得对，七斗八斗，他成了这么个狗屎模样儿。XX同志！我该严重检讨，该打该捶，路上叫了这个老反革命扶我回来，给向阳院的革命同志添了许多麻烦。”

中年男子又问那青年妇女：“你们听到张紫葛和吴宓说了些什么话？”

很明显，那年轻女子急于想解脱我：

“我瞥见他扶他回来，马上叫了同志们来追究。他们刚刚进门，没说什么。”

中年男子：“打你门前过时，他们说了什么？”

青年女子：“什么也没说。”

中年男子：“算了，算了。他是张紫葛。吴宓所说属实。”这位X组长又漫不经心地说：

“算了吧！两个狗屎堆，老熟人互不认识了。大白天相扶走了几百公尺，说不成个啥子的！”又将我未写完的那张纸随手揉成一团，扔给我，“以后不准乱窜！”朝人们说：“你们把他押回去。”

那青年女子押送我出了西师水岚垭小校门，说：“你自己回去吧！往后别上这儿来了。叫专政机关知道了可要挨斗的哟！”

可是，那向阳院的一位男士积极分子已经去向专政机关报告

了。当晚半夜,地段治安委员会来我家大抄查,破破烂烂全翻了个底朝天。那位拾破烂的女治安委员叫我立正低头,痛训了我一顿。并从第二天起,每日清早就把我叫出门,就地立正低头反省:

“你个现管分子,历史反革命,加上现行反革命,还不规规矩矩,还要现行,就是要取缔制裁,制裁取缔!好歹哪一天要砸烂你的狗头!”

主管本地段的派出所户籍(老百姓叫他“段长”),亲自主持,天天晚上斗我。还加上些零碎义务劳动“做得不彻底”啦,胆敢给人开中药处方啦,……没完没了地斗。不过比“四人帮”时稍好一点,只叫站好、弯腰、垂头。直闹了个把月,段长的夫人——北碚区卫生所的医生,身患疑难病症,认为只我才能医好,叫段长亲自陪她来找我。

段长说:“来,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给我爱人好好诊诊脉……,没事的,你有技术就贡献出来嘛!我给你撑腰。”

侥幸,我给她看了几次,开了处方,段长夫人的病就好了,并且怀了孕。斗我的事也就稀松进而停止了。

及至1978年底,落实中央55号文件,我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教授身份,并回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我回北碚去办户口,来至旧居,迎面碰见那位拾破烂的刘“委员”。她大声咋呼:

“耶,老张!硬是时来运转了呀!穿得好伸展啦!”

“哦,刘委员,你好!”

“老张,”她居然还是会笑的,“那些年,你走霉运,我任了这职务,没法子,应付应付,并没有过分你呀!……唔,你补了不少钱吧!这阵,你一个月的工资,我一年也挣不到那么多呀!还是有文化的好呀!……喽,你该请客哟!”

“是罗,我该请你。就兑现吧!”我掏出了两张十元的人民币递

给她。这在1979年当然是个大数目,可买150斤大米哩。

她笑逐颜开:“谢谢,谢谢!……”

巧得很,走进派出所,又迎面见到那位段长。

“耶,耶!张教授,”他趋前热烈握手:“欢迎,欢迎!来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嘛!”

“你客气!”

“客气什么?能得到政法学院的教授指导我们,可不简单哪!”

这里仍回头说1976年11月的事。

那天挨斗,大概是斗到第五晚上散场时,时间已近午夜。斗争者一哄而散,捷足归去。我因视力不佳,探步徐行,走得很慢。遇到路灯光射死角,还得蹲下用手摸索,或手脚并用犬行而前。好容易摸到可转往西师的岔道口,突有两个人影凑了过来。

原来是吴宓和刘尊一。两人各轻轻叫了我一声,便一人捏了我一支手,吴宓捏我右手,刘尊一捏我左手,并排朝我回家的道路徐行。一路悄语。

刘尊一告诉我,这几天晚上,他俩一直在斗争我的会场窗外旁听。斗争会系借用街道办事处劳动辅导站的过厅,辅导站不是街道办事处的编内单位,而是居民劳动自救的公益组织,由街道办事处主管。实际负责人选自待业会计人员。凡以筛河沙、拣河滩卵石、捶道渣石、刻写钢板、糊纸盒等劳动自救的人,在此登记编组,准其自我活计,请开发票凭此向客户算帐收费并向此辅导站交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这样一个单位,它的过厅就靠近马路,并朝马路开了一个大窗户。房高,马路低,斗争会的吼声,叫喊,马路边清晰可闻。而过厅砌在高约三公尺许的堡坎上,行人在下来来去去,也看不到过厅的斗争会场。吴宓和刘尊一便每晚在窗下踱来踱去,聆听朋友在里面挨斗之一般。

今日吴宓收到陕西他妹妹吴须曼来信,打算叫她儿子(吴宓的甥儿)来北碚接他归老家度晚年。吴宓决定今晚在这儿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三人并排走的这段路,傍山背街,行人稀少。且马路笔直,前后如来人,远远可见。刘尊一眼睛较好,就专心前瞻后顾,保证安全。

“兄弟,”吴宓说,“是我要你转移那抄本,才使你挨打挨斗。”

“别这么说,兄长。我们经得多了,这算不了什么。……而且,从根本上说,我今天的命运,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当初没听兄长教导,涉足政治,才有今日,我,愧对兄长。”

“不然,不然!你是听了我的告诫的。能从宋美龄那儿不辞而别,所以我说,真吾弟也。至于在新疆,不能怪你。人家要分裂祖国领土,身为炎黄子孙,岂能不挺身反对之?处那情景,便是我,也得奋起。……”

刘尊一插话:“机会不易,时间短促。你们拣紧要的说吧!”

吴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陕西老家,……我视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是告别吧!”

“兄长回安吴堡最好。与胞妹相聚,欢度晚年。……”

“我心里很乱,不知该叮嘱你一些什么。”

“兄长历年的教诲,我均历历铭记在心。……”

吴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判定中央必会改弦易辙。移星转斗,为时不远矣。望你务必振作,咬紧牙关,度过这最后的困难时刻。务必坚强,坚强,……”

“兄长说的是。我会熬过困难,迎接太平盛世。……”

吴宓:“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来日无多,恐怕这次生离,就是我们的永别。异姓手足数十年,能不依依?!”

“兄长不要伤感。倘我这年把沉冤得雪，我有了自由，一定去看望你，畅叙别情，纵论古今。”

“但愿能够如此！……”

刘尊一拉我们顿住脚步：“马上到管老张的那个治安委员门前了。不能再走，就此再会吧！”

吴宓车过身，面对我，紧握我的右手：

“兄弟，你来日方长，还有三十多年寿算。大器晚成，古恒有之。望你刻刻奋发，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谨记兄长教导。一旦沉冤得申，获有自由，我一定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为后生尽老马识途之劳。并力争在学术上略有寸进。”

“好！言有尽而意无穷。勉之勉之！兄弟……”他哽咽说不下去了。

“兄长！……”我也说不出话来，泪水顺颊而下。

刘尊一快速抓过吴宓捏住我的手（他的另一支手拄着手杖）。同时推了我一把：“快走！那边来人了。”

我赶快迈了两步，刘尊一在身后小声叫：“左转，到梯坎了！”

我踏上梯坎，扭头望去，路灯朦胧下，但见吴宓执杖的手伸到脸上在擦眼泪。他站着不走，一个劲儿朝我的方向挥手。直到刘尊一第三次催他走时，他才转身移步，却一面低声自语，声音极为仓楚：

“别了，别了！是暂别，也许是永别！永——别！”

……

后来刘尊一告诉我，就在这黑夜送别后的第三天，吴宓的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突然来了。小伙子办事伶俐，先找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办好交涉，革委会同意他领吴宓回原籍去赡养后，他才来到吴宓的宿舍，见他舅舅。他告诉吴宓赶快收拾，马

上动身奔陕西。他便转身去办各种手续：首先向西师财务处办理从本月起，由他代领吴宓全部工资的手续；其次是迁移吴宓的户口，转移粮食供应关系。他们家吃不到供应粮，必须将吴宓的这份干部供应粮的粮食关系转回去，然后才能每月凭证购买粮食和油、肉等副食品。

这里，吴宓且不收拾，却到刘尊一这边，告诉外甥来接他的事情。

刘尊一高兴地祝贺他，可以回原籍安度晚年了。

哪知吴宓却吐词凄凉：

“我实在不愿回安吴堡去依靠外甥们。我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是只在1961年回乡探望妹妹时才见到过他们的！”

“那，”刘尊一迟疑地说，“你就不去嘛！”

“但是，”吴宓极其缓慢地说，“不跟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我，……老了！眼日盲，耳日聋，腿日行走艰难。生活不能自理了！不能自……理了！”

“能不能和你女儿联系一下，大女儿？二女儿？幺女儿？看看她们能不能赡养你。你有高额工资，有粮食、布、棉花的定量供应，养你一个人，用不光，吃不完的。她们赡养你，不会累赘她们的！”

“是呀是呀！但是，她们不要我！……我，自……作……”他泫然泪下，没有再说下去。

刘尊一诚恳地说：“老大哥，那么，你就不回陕西吧！就在这儿，我照顾你。当然，我也会慢慢不能理生活的。可目前，我总还没老到那种程度。我一面照顾你，一面想法和你的女儿们……”

吴宓似乎没有听见，只是呆坐着，静静地流泪。

刘尊一心里也非常难受，她实在是爱莫能助。不仅孩子造她

的反,自己年纪也老了,而且她已经确切知道,自己已患癌症,并已到晚期。

吴宓在外甥的搀扶下动身了。刘尊一默默地送到楼下,又直跟到游泳池边。吴宓一直木然移步,两眼平视前方。这时才顿住脚,用英语对刘尊一说:

“请回去!谢谢!你珍贵的友谊我将永志不忘。别了,永别了!希望真能有个天国,我们能够在那里相见,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问题!”

“……请找机会告诉紫葛!”

吴宓走了之后,刘尊一不曾收到他一个字的来信。不两年,刘尊一也逝世了。

47

痛哭吴宓

这以后,时更事易,进展迅速。先是全城沸腾,当然是全国如此,欢呼邓小平出来工作;随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令人鼓舞的公报,神州大地开始了拨乱反正的新时代。吴宓 25 年前的预言硬是应验了:邓小平建立了移星转斗之功。再以后,西南政法学院重建,我和千千万万蒙冤者一样,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教授身份,并被召回西南政法学院,登台授课,获得了莘莘学子的热烈欢迎。而就在这当儿,我辗转获得消息,吴宓于 1978 年 1 月 17 日在陕西泾原县原籍逝世了。

1979 年,在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主持下,西师为吴宓举行了追悼会。郑重评价:他是一个饶有真才实学、道德高尚、热爱祖国的学者。

1980 年夏初,我到市上去参加一个会议。会间休息时,一个人几步迈到我的面前,拍拍我的肩头,曼声说:

“此非张教授紫葛兄乎? 别来无恙耶?”

我视觉昏眊,如在五里雾中,虽迎面相睹,也难辨清对方面貌。这时,但见面前是个大汉,容颜模糊,似甚苍老,或有眼镜。

“小弟现时视力微弱,难辨友朋。您是哪位? 请示大名。”

“唔，唔！小弟乃杜钢百——百炼钢，绕指柔也！”

“哦，老兄，幸会！”我站起与他握手。

他摇着紧握的右手，左手扶我肩头，朗声说：

“我原以为昔日友朋，惟我独活。岂料还有兄台健在——不，幸存！真可谓唯使君与操耳！”

我笑道：“兄台依然口无遮拦，故态不改！我非刘备，君亦不似曹阿瞒，此喻甚为不当！……”

他抢着说：“无碍无碍，今邓公拨乱反正，已无‘恶攻’之罪矣！”（注：“恶攻”系指文革中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开会铃响，我们移步走向会场，他继续说：“今日相逢，正如隔世之聚。晚上好好促膝夜谈，聊叙别情。”

华灯已上，在重庆市委第一招待所的客房里，我俩品茗夜话。

“我的兄台足下，”他开言说，“朋辈中，你挨整最重最惨，竟然独得幸存！你是怎样活下来的？”

我笑道：“孙悟空进入八卦炉，炼出来的嘛！……你又是怎样活出来的？”

“我？不算好汉！挨整级别不高。拔了白旗，未交劳教，留在学校改造，夹着尾巴，灰溜溜做人而已。文革当了反动学术，牛鬼蛇神，进牛棚小住耳；继而到黑旗队劳改，前后批斗驾喷气式飞机数十场，狠挨棍棒、拳脚、皮带不过数百次有奇。最严重者不过是倒拖一番。这可不是董学隆那次拖法，……”

于是他细加描绘，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一次上午大会斗过，并未宣布下午再斗，天气闷热，他乃溜到北碚市区的河街，到嘉陵江畔乘凉。河风徐来，暑气大减，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品类之多，不觉怡然有得。孔子云：“浴乎沂，风乎舞雩。”我今沐乎棍棒，风乎嘉陵江！

谁知造反派正在到处缉拿他，终于在这江边发现了他。

“混蛋！真是花岗岩脑袋！不但不反省罪恶，反敢逃到这里逍遥！走！”

拳脚、皮带并加，杜钢百被击倒在地。造反派们拎起他的两支脚颈，拖向西师。先是穿街过巷，继而登坡上坎，专走碎石马路，绕到西南师范学院大门，经大操场，拖到西师斗争会场。造反派一路快捷，不问高低；杜钢百盛暑单衣，无可支撑。直拖得他痛彻心髓，自尾椎至颈后大椎，并后脑及肩胛，全被拖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接着，他自己评说：“我头脑昏糊，以为就要作古。哪知进了斗争会场，人们抖起我的双臂，我居然还能站起来，在皮带、拳脚的逼迫下，照旧蹲成了喷气式飞机。善哉！捶楚之下，四肢百骸竟有意想不到的潜力焉！”

我问：“后来背上能不发炎，化脓……？”

“炎是炎了一阵，也脓了些个，可是怪哉，并未治疗——谁来给牛鬼蛇神治疗？炎来脓去，秋风起兮，就自个儿慢慢结疤落痂，无事大吉了！你说，人这种动物，岂不是贱得可以么？”

妙！这个人还是这么个性格。顽皮？逆来顺受？怎么说也不恰当。总而言之，他不愁，不怨，不伤感。也许正是有这个性格，他才活下来了。

我急于说别的。“吴雨僧作古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你参加了西师的追悼会吗？情况如何？”

想不到他竟没有参加。“我一个人在家里追悼吴宓，”杜钢百说，“我北向——朝陕西那个方向，长跪流涕，痛哭，哭诉，沉痛追悼我的师尊吴雨僧！不如此不足以寄托我的哀思……。你说个什么？我也有痛哭之时？什么话！想想雨僧夫子一代鸿儒，学贯中

西而通古今,竟然遭时不造,迍邐无所用其才,神州之大,却不能容一书生展其才学,后代学子也不能传其学术造诣,而蹉跎岁月,磨难20余年,岂不哀哉!岂不痛哉!博学如雨僧尚且如此,滔滔天下书生,似我杜钢百之皓首穷经、犬马俯仰者,又何足论?言念及此,能不泣血痛哭!”他音色凄楚,泫然泪下。他啜泣了很久,才渐渐收泪。哽咽说:“说到底,我能活下来,要归功于雨僧师尊的教诲。如果没有他的教导,我一定逃不了反右巨浪,那么,我也早已狗马填沟壑了!雨僧夫子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而我对他乃无尺寸之报,眼见他文革受苦受难我无能为力,日今他逝世了,我更无所表示。遗恨哪遗恨!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说:“你硬是江郎才尽了吗?老是比喻不当,怎得以《长恨歌》来譬说你和雨僧的友谊呢?”

“哎,我方寸混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了!”

我说:“我们说别的吧!”说个什么?不外是文革奇闻,书生冤狱。聊了一阵,又说到了吴宓。我才知道,还有一些事情,吴宓没有对我提谈。其中有几件事颇为突出。

一个是:本书前面叙述过,在文革前,西师曾有几位青年教师,报经院党委批准,做了吴宓的在职“研究生”,吴宓当然尽心指导他们。他们也确实获得了不少教益。但是,文革时,有两位研究生却出来揭露、批判吴宓,甚至伙同造反派出手打他。其中有一位在发言揭发时,自我暴露出他当时做“研究生”就是为了负责监督吴宓。

杜钢百一一指名讲起了那两个“研究生”之后,猛地上火:

“然而,这两个人这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吴宓的忠诚弟子。一个个对吴宓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如丧恩深显考(注:父亲)。并且在各种场合摆出一付吴宓及门弟子的架势,俨然得到了吴宓的真传,继承了吴宓的衣钵,成了学术权威。……”另一件事是:一个

五十年代的西师学生，吴宓并未教过他，没有毕业便被淘汰了。文革初期，他天天来看吴宓，具道崇拜之忱。随即自告奋勇要给吴宓转移保存书籍文稿。时机紧迫，吴宓无计，胡乱给了他几样。谁知其中有一本日记，在这日记中，吴宓楷书工整，对红太阳作了史家评议。这位“弟子”如获至宝，据之以为把柄，在吴宓停发工资前，及出了牛棚恢复工资之后，说是他生活困难，要挟吴宓接济他，往往取其工资之半。无独有偶，另有一位青年，自称是吴的学生，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如此这般骗去了吴宓的一些书籍文稿。在吴宓恢复工资之后，隔两个月来“看望”一次，诡称他要下大工夫研究吴公的学术著作，如何整理，如何编纂，如何联系出版，但需费颇大，请接济千元云云。吴宓明知此人用意，却想：自己的笔记不是日记，虽无疵议毛公之语，但如文革章法断章取义，亦可滋生事端。似此，戳破弄翻很可能惹起麻烦，只好忍耐敷衍，付给100、200元打发之。这样两个后生循环勒索，吴宓深以为苦，却又无计可施。

哦，原来如此。我想起那次去吴宓那里，巧遇他在分配工资支出方案，清单上有两个户头，一为“乌奚奴”，一为“马边生”，下面各注“月摊30元”。那么，这两户大概就是那两位“学生”了。吴宓无奈，只有按月分存，以备二人不时之需索。现在想来，“骗”字正着马旁，“马边生”就是“骗子生”。“乌”是乌鸦，“奚”与“欺”谐音，“乌奚奴”当指此奴乃专门欺骗人的乌鸦一般的不祥之物。由此可见，吴宓对这两个后生厌恶到了什么程度！

“你看，”杜钢百恨恨地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把这些青年后生教坏到了何等程度！鲜廉寡耻，无良已极！却还口唱共产主义道德！……”

我寻思：吴宓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呢？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杜钢百说，“那时节，他和你会面紧

张、紧迫,来不及说这些次要内容。还有,他不愿给你增加思想情绪上的困惑与愁思。”他告诉我,关于这两个后生的诈骗行为,吴宓对他也是讳莫如深。只是杜钢百几次在吴宓那里巧遇这两个人,深觉可疑,过后再三诘问,吴宓才告知备细,还嘱咐他,千万莫说出去,以免滋生不测事端。

接着,他又讲述了一些比较琐细的吴宓文革逸事和其他相关人等的情节。其中有件事令人啼笑皆非。

挨斗最频繁的时期,往往陪斗一场后,将吴宓他们押在一间小屋里等待下一场陪斗开幕,却不给任何饮食和水。天气太热,奇渴难当,吴宓在房角拾得一只缺口茶杯,就房角小便入杯,然后自己喝了,并转身给杜钢百传授经验:“小便亦解渴,自己的尿是可以喝的,古代医家称之为回笼汤。”

杜钢百继续说:“我不觉好笑。似苦笑,又似无可奈何之笑。夫子言之有理,如法炮制,饮了一杯自产的佳酿,真是其妙无比:生津止渴、通体舒畅,只是觉稍苦涩。我乃忽然省悟:大抵清热祛暑之品,总不免有点苦涩,苦瓜味苦,汽水稍涩,不亦然乎?!”

杜钢百长我十多岁,却似比我精神杨旺。只见他围绕吴宓,旁及友朋及黑旗队走资派的诸般趣闻,越谈越多,一直扯到毛泽东的老师、墨学专家谭介甫在文革中的幸运。滔滔不绝,妙语泉涌。我却有些疲倦了,说:“老兄,夜深了,明天晚上再谈,如何?”他颇为不快,说:“大劫幸存,隔世重逢,剪烛西窗,人生之快莫过于此,兄台何乃扫兴耳耳?”顿了一顿,“哦,你比我所受磨难深重得多,体力差些,是可以理解的。好吧,我们明天再谈。来,我们现在郑重起立,为吴雨僧兄长默哀三分钟!”照他的指点,我俩并肩面向陕西方向,低头肃立默哀。他小声念道:

“雨僧夫子! 我的恩师、兄长,我和你的异姓手足紫葛兄在这

里悼念你。你,以及千千万万和你一样受尽磨难而含愤歿落的神州书生浩气长存!我为你们以及我们的不幸遭遇无限悲痛,……想起那苦难的年月,我不禁悲从中来!”他真的流泪呜咽了。

我接上说:

“陆游临终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我们今天应该本此诗意,告奠于雨僧兄长之灵:你的预言实现了,邓小平建立了移星转斗之功,华夏改观了,书生不再臭老九了。我们已经带领莘莘学子,弦歌重作了!……”

道晚安时,杜钢百约定明天准备点供果,我俩就在这里郑重祭奠吴宓,然后继续畅谈。

谁知,第二天上午我赶回学校上课之后,院领导交阅两篇学术论文,我未能返回城里开会。而第三天杜钢百又回西师去了。其后,我们各在一地,未能相值。再不久,杜钢百就逝世了。

跋 磁器口纪事

八月下旬,应邀赴蓉,与少年同窗——来自境外的孟博士夫妇聚会。送别他们后,我拜会了大学时的老师张紫葛教授,读到先生的近作《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打印稿(以下简称《祭吴宓》)。所纪之事大都为我所闻,读来倍感亲切,几有欲罢不能、欲舍不忍之势。几十年前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眼前,恍如昨日。

一

我于1948年秋考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川教院”),就读于史地系,系主任为明史专家张圣庄教授。不久来了一位胖胖的秦汉史专家李源澄教授。李先生上第一堂课时所说的“上我的课,全班如有一两个听懂就不错了”,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李先生身边仅有一个读小学的长女,请了一位中年妇女杨嫂经管他的家务和伙食。

此后不久,来了一位清瘦的老学者吴宓教授。吴先生只身一人,长期在源澄先生家搭伙,一日三餐,来尝或缺。

源澄先生系忠厚长者,为人质朴、待人敦厚,从不摆师长的架子,后来作了我的系主任,师生来往日多,情谊日浓。那时学生伙食不好,登门求教,聆听教诲后,先生多留下吃饭。此后凡有佳肴,源澄先生总是招呼:“石琼生,今天杨嫂炖了鸡,来喝喝汤吧!”或“今天青菜炖腊肉,来吃青菜头。”我不便推辞,在李先生家吃饭便成了常事。

吴宓先生是饮誉世界的著名学者,早有所闻,并由衷崇敬。但真正认识却是在李先生家的餐桌上。吴先生很守时,每次总是菜、饭刚刚摆好即来就餐,从不迟到,也不提前。保姆杨嫂从不上桌,女儿李志勉夹点菜,端着饭碗到处跑,也不上桌。平时就是二位先生端坐桌前,相对而食。我在时,则是一个学生陪两位先生,各据一方,鼎坐而食。吴先生就餐时,严守“食不言”的古训,很少说话,细嚼慢咽,从不饮酒。饭后饮醋一小杯,每餐如此,从不例外。后来我问李先生“吴先生怎么不饮酒而喝醋?”李先生告诉我:“陕西人喜欢吃醋。饭后饮醋是他特有的习惯,其他时间或菜肴中是不兴要醋的。”从此,我和吴先生也日益相知。

二

入校的新生吃、住、上课均在分院(柑园),与本院虽仅一溪之隔,但生活条件特别是伙食很差,冬天热水供应不足,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同学们不满、苦恼不已。受地下组织的派遣,我和康大钧(教育系,地下党员,后任四川省农机厅副厅长)等,出面组织、成立了跨系科的1952级级会,并出任级会主席,我们从改善伙食、改进生活条件做起,团结全年級同学,逐渐将他们引向反饥饿、反内

战、争温饱、争生存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经过1949年春夏之交的“4·21”运动及其后的各项活动和重庆解放前夕的护校活动,我和许多出头露面的地下党、社的同志在广大觉醒的同学们中赢得了声誉和信任。因此,在重庆解放第二天成立的学院庆祝解放委员会上,我被当选为主席。此后不久,我又当选为解放后的第一任学生会主席。当时社会活动特多,而学院旧领导已经靠边,新机构尚未建立,一切社会活动的安排,人员的调遣配备,以及学院的一切事务,大至开学行课、上课停课、教师的薪俸,小至环境卫生,无论巨细,均由学生会统管,发号施令,被称为“学生会专政”。后来军管会的文办和西南文教部先后派来了联络员汪国祯同志和李志刚同志及姚丰、亢士元同志,来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并着手筹建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由学生会酝酿,推选出德高望重、有进步倾向、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作为候选人,并由志刚同志了解考察,修正增删后报西南文教部核准,再交由我们分头去做这些老师的工作,动员他们出来领导学院的工作。周西卜先生是个热心分子,一说就乐意。而吴宓先生和李源澄先生均属不问政治、清白自守、埋首做学问的人,开始均坚辞不就,经再三劝说和志刚同志(后调往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工作,现已离休)细致的工作,终于应允出任院务委员。吴毓江先生为著名的墨子研究专家,为人正直,早年曾任北伐军师政治部主任,后来任过旧县长和国大代表。解放伊始,存有多种顾虑,不愿从事政治活动。经过多人先后轮流动员,也愿意承担院务重任并兼院务委员会秘书。院务委员中有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由徐淮淳(史地系三年级,地下党支部书记。50年夏调离学校,先后任西南团工委秘书科长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科副科长、重庆四女中校长、重庆社科联办公室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长,现已离休)和王远明(农制系四年级,地下

党员。50年夏调离学校,后任《当代化工》主编,现已离休)。我以学生会主席身份参与院务。吴宓先生是个惜时如金的人,非常珍惜时间,并善于利用分分秒秒,连上厕所也不放过口诵心维学习俄语;他特别守时,每次会议均准时到会,从不迟到,也不提前。委员中常有人不按时到会,吴先生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是中国缺少时间观念的愚劣表现,常引经据典,以简练的语言及时予以委婉批评。主持会议的主任委员周西、教授系美国留学生,不善言辞,发言不够简洁,吴宓先生常从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引述故事一二,善意地予以批评,不留情面,希望周先生抓住要害,突出中心议题。因而大大提高了院务会议的质量,缩短了议事过程,节约了时间。于兹,可以概见吴先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神之一斑。

三

1950年“五·四”,举行重庆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选出9名执委,组成重庆市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我代表学院出任“学联”执委兼联络部长,脱产离开学院到团市委工作(当时“学联”与团市委学生部合署办公,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因为工作关系,常常回到学院,公余常常看望李源澄、吴宓、吴毓江诸先生。当时,先生们的革命热情很高,积极主动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领袖著作,毛主席的一些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是他们经常阅读和研究的。每次拜访,源澄先生总要我介绍他学习这些著述的心得、体会和收获。他特别告诉我:毛主席著作中的某些内容均源于我国古籍中的某书某段,并翻开夹着诗干小纸条的许多线装书的一些段落告诉我:“你看,毛主席的这

段话源于这里。”边翻边说：“毛主席的这段话是从这里引来的。”“是从这里演绎来的。”我仔细对照着看，果然两边的意思相近，有些甚至完全一样，只不过古籍中是文言，而毛著中是白话而已。于此可见这些教授们渴求进步，学习革命理论是何等地勤勉。

李先生还告诉我：吴宓先生最近思想有较大的转变，已开始看《新华日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李先生说：李志刚同志以陕西老乡的身份，很有礼貌地很谦恭地接近吴宓，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以及他的学术研究，使他感到共产党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不像国民党的官僚们那样盛气凌人、漠视民瘼；因而值得信赖，所以看党报了。

吴宓、李源澄等先生的变化从衣着上也看得出来。以前他们均穿灰色长袍，一胖一瘦，风度各异，均极随和潇洒。现在都脱下长衫换成中山装了。

1950年8月“暑期学园”结束后，川教院和在九龙坡的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校舍暂定在磁器口，同时在沙坪坝与磁器口之间“沙磁乐园”一带建立新校舍（现为重庆建筑大学）。方敬先生（外语系教授）、李源澄先生被任命为教务长、副教务长，王元吉先生（数学系教授）和蒋成九先生（理化系主任、教授）出任总务长兼建校委员会正副主任。方敬先生是位诗人，后来作了副院长，年前病逝。李源澄先生随校迁北陪后，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讲话言简意赅，颇受学生欢迎，和当年上第一堂课对我们讲话时的情景完全两样，且早就参加了民盟。不料，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是天真而古道热肠的源澄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也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当即神经分裂，送往精神病院后不久，即肝裂辞世。其长女李志勉，中学毕业后在一家电厂当工人，现已年近50，其夫人系家庭妇女，李先生不幸逝世后生活无

着,雇佣无门,穷困潦倒,后来被当作“地主分子”,携其未成年之幼女,被强制遣返原籍农村,至今生死不明。宽厚爱人、博学精专、不断探索进步的源澄先生及其家人遭际如此,良可哀叹,令人心戚!

王元吉和蒋成九先生于1951年冬开展的“三反”运动初期,均被打成“大老虎”,与其余数十名“老虎”囚禁在男生一宿舍达半年之久。运动后期查明,所谓“老虎”全系乌有。王元吉先生恢复自由后,坚决要求离开西师,调往重大,成为该校的先进教育工作者。蒋成九先生被囚期间,其夫人不堪精神、政治压力,自缢而死。蒋先生获释后,虽经领导再三劝慰挽留,怎奈受伤的心灵难以慰平,两年后调离西师,返回故里河北师院任教。

四

1950年秋,学院通过学生的评议,为老师定级定薪,主持其事者为西南文教部派驻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张一夫同志(时为西南文教部中小教育处处长,后来出任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有一天我回校,适逢召开学生干部会议于办公楼底楼,我应邀出席会议。张一夫同志在听完各系评议情况汇报后,对外语系的同学压低吴宓先生的薪级,提出了委婉而有原则性的批评,并及时予以纠正说:“中国只有一个吴宓。他是国际知名教授,是有世界影响的,怎么能够那样低呀!我看他不是最高等的,至少也应当是第二等的。”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听到他的讲话,都很质朴、坦诚、实在。可惜这样一位颇有见地、讲老实话、精通并善于贯彻党的政策、尊重并了解知识分子、拥有广博知识的共产党员,后来却在西南农学院的领导岗位被迫自杀。至今,他那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谈

笑风声的神态仍然浮现在我眼前。

陈平章先生是我的业师，曾先后教过我的《自然地理》和《苏联地理》。那时他不过是个30岁左右的人，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拥有地理专业各方面的知识，曾讲授过各种地理专业课，且言词简练，善于表达，是很受同学们欢迎的少数老师之一。他的夫人陈克理是位俄国女性，在外语系讲《俄语精读》，很受学生欢迎。平章先生“文革”中因受到李春伟编造的谎言之牵连，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长期的吊打，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健康状况恶化，身体十分瘦弱。即使如此，陈先生于拨乱反正、重执教鞭后，在一门课程数人分章讲授之风颇为盛行的当时，他却一人担任了颇为艰深的《地理通论》和《地理概论》（又名《数理地理学》或《普通天文学》）两门课程的讲授任务。于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平章先生还编著出版了《天文观测原理和方法》（重庆出版社），同时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佛天文台台长M·E·马丁和著名科普作家D·H·门泽尔合著的《星星之友——怎样认识星座》（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将这部世界科普名著介绍给我国读者。这两本书均被中国科协收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并获省市优秀图书奖。1989年5月，平章先生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终于卧病不起，终年70岁。

五

紫葛先生系1950年秋两校合并随女师院师生来磁器的，是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戴一副金丝眼镜，很为潇洒，和吴宓先生及西南文教部的驻校代表李志刚三人比邻而居。后来，紫葛先生调西南政法学院，负责引进苏联教材，并给教师班讲授俄语。不意57

年被打为“右派”，惨遭斗争，关押达15年之久。七十年代中期自狱中归来，由其胞弟正东先生（外语教学法专家、西师教授，1950年为西师外语系助教）搀扶着来看我时，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位满脸皱纹、双目失明、秃顶的孤苦老人，和磁器时代的年轻而潇洒完全判若两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的张紫葛！遭际的不仁和岁月之无情，令人扼腕。

这次相聚，使我对紫葛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历有所了解，因而鼓励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作为资料留给后代，是有价值的。拨乱反正后，紫葛先生劫后复苏，精神振奋，文思勃发，于教学之余从事写作。此时，我也洗雪“五七”之冤，调到出版社工作，为紫葛先生平反后的第一部长篇纪实作品《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的出版，略尽绵薄。本书出版后，得到各方好评。1986年冬我去京公干，张治中先生的女长公子、全国政协常委张素我女士见到笔者时，再三要我转达她对紫葛先生的敬意和感激。此后，紫葛先生文思泉涌，在其年轻娴淑、极具才华和个性的妻子温晓莉副教授的精心协理和具体帮助下，接连出版了多部长篇纪实作品。

《祭吴宓》是紫葛先生最近的新作。所纪之人，大都是我所熟悉或认识的老师，除文中提到的，其他如教育系主任刘尊一教授、黎澍玄先生、杜钢百先生、柴有恒先生等，都已先后作古。所述之事，作学生的我，当时即有所知。不过于事理的全部和细节的了解，却是在看了《祭吴宓》的打印稿后获得的。在阅读中，我感到既亲切又熟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磁器口，回到学生时代，又在一方面聆听老师的教诲，一方面就某些问题和老师们展开争论；又在和同学们嘻笑、逗趣，或就祖国的前途和现实以及学习中的问题进行着热切而美幻的论争。我为书中记述的真情所感动，情不自禁地掩面痛哭；也为某些细节的凸现而快然大笑，捧腹不已。

《祭吴宓》并非研究吴宓的专著，也不是吴宓学术思想研究史。所记之事虽然具体而细微，但却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文化、学术、经济、思想等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吴宓先生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幸与不幸的生活史、生存史、欢乐史和灾难史，很有史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人所共知：吴宓、李源澄、吴毓江先生等，都是三、四十年代因在某一学科内的创见、成就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地位而蜚声学林的，但在吴宓先生最后的28年中，他们都很少著述问世，更谈不上什么传世之作。吴宓先生的遗憾和苦闷也正在这里。不唯如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不同阶段均遭受到不等程度的伤害、折磨、摧残和凌辱。有的性命不保，早升天国；有的仅保残缺之体，苟全性命，无所作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损失、不幸和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不幸和悲哀！

因以为《跋》，即痛吊吴宓、李源澄诸先生之早逝，死非其时，术业未张，复证《祭吴宓》所述之真，言之不虚，尤望紫葛先生更有佳作早日问世。

石琼生

1996年国庆于重庆袁家岗寓所

后 记

作者希望这本《心香泪酒祭吴宓》，能够真实地反映这位已故学者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因此，只写事实、情节，述而不作。

凡不是作者亲历亲见之事实，例如 1958 年至 1973 年我俩天各一方时的所遭所遇，虽系吴宓亲自向我讲述的，我也只记载了后经刘尊一、杜钢百一再重述印证的若干则。

我与吴宓的友谊交往，始于 1939 年，止于 1976 年冬。长达 38 年。逝水流年，可纪之事甚多，只能择精取要。因而：

- 1、有关吴宓的学术思想，他的著述，概未详述。
- 2、吴宓为人谨讷，不轻易谈论、评价同时代的学者。但由于和我私交笃厚，就前前后后和我广泛地谈到了半个世纪初、中叶的文

科学者及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评论极为中肯,褒贬极为敦厚。这些内容,很有记载介绍价值,但因篇幅所限,均未记叙。

3、在他和我以及同诸好友聚谈时,吴宓也曾对古今名家作品做过精辟的分析。这些谈论,广泛涉及中外名家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内容丰富,广有独到见解。诚恐回忆不全,记述失真,也就从略未叙。

三

作为本书作者,有几件事我要向读者深表遗憾:一是未能提供有关人物照片及文物摄影。原因很简单,我是被捕入狱劳改了15年,再继之以管制5年的人。放捉之时,支身人囚,裤带袜带都没收了,家里的一切照片(包括幼、少年的单人照,与亲人、好友合影),我前半生的学历、资历证件(包括历年在各大学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授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等的聘书),各种证件,论文,著作,总之,一切有我姓名的东西,全都被没收了。经文化大革命,西南政法学院遭到“砸烂公检法”的“革命”风暴涂炭,待我平反后回去查找已无着。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弟妹、亲人、朋友如刘尊一等,无人不遭再三再四抄家,各色像片,洗抄一空。如此这般,我只有让读者失望了。

二是很多地方未能确指当天的月、日,这是因为,一如上文所说,我劫后幸存,赤条条一身,所有从前的笔记、札记,一切我捉笔落墨的东西,概已乌有。年时既久,回忆不起准确日子。无可奈何,只有记为某年某月的月初、中旬、月底云云,甚或概而言之,“大

约是”、“春末”、“夏初”等语。但我所记年份却绝对准确。

三是有些事情需要说明。文革中,吴宓出了黑旗队,要求领导发还所抄书刊、文稿等等,只发还了很少一点云云,这绝不涉及吴宓去世后,时已拨乱反正,西南师范学院发还给他家属的一些文稿等件。本书还记叙了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吴宓上交了几本“反动”书籍,却没详述吴宓藏书情况。吴宓平生最为爱书。他向来自奉异常俭约。抗日战争以前的16年,他的薪资优厚,而彼时币值稳定,每月收入,除了仰贍俯育、资助困乏者之外,余钱颇多,他就全用来买书。至抗战前夕,他的私人藏书已愈万册。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长沙时,他选带了四千本之谱,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经过长沙南逃,过香港,转云南,所带图书少有损失。于1939年挑了一千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944年至成都,鉴于内迁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到抗战胜利赴武汉大学时,他身边的书籍仍有千册之谱。1949年4月,他由武汉赴重庆,精选了二百余册随身携带,在相辉学院被窃失百余册。至1950年在磁器口与我邻室而居时,他身边的书籍已不足百册了。西师迁北碚,学校渐入正规,吴宓乃设法将多年寄存在北京的书籍先后运来,他自己从中选了几百册,余书分两次、全部捐赠给了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一次一千册,一次三千余册)。到文革时,他身边的图书约一千册。抄家风起,他托生、友保管转移了三、四百册。其余随后全部抄去。

四

本书一如我近两年出版的几本书籍,完全是在我妻温晓莉的

辛苦协作之下完成的。

我在运动中挨黑打,遭非刑,当场打瞎了右眼,左眼视力,也大受损伤。延至平反时,左眼仍残存一些视力,在寸许距离内,逐字审视,可以缓慢读书看报。着笔难正行距,仍可写字为文,只是不能抄正入格。三尺之外,不辨来客面貌,但能辨别衣着颜色、男女面貌特征。就靠这点视力,先后在西南政法学院及成都一些高校讲学。谁料命途多舛,1991年在成都我住宅前街上,由于目眵,未看出窨井盖被盗缺位,一脚踩了进去,几乎丧命,当即跌断双腿。又为某电视台的有偿新闻所误,上了伪医的贼船,越医越坏,卧床两年之久。虽后经西医手术治疗,恢复了行走功能,然因长期僵卧,气血阻滞,视力急速下降,以至左眼残存之视力消失殆尽,仅存微弱光感。当然不可能再看书写字了。

从此,我的“写作”就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那样,用手扞摸金属空格写字板盲写初稿,然后由我妻将初稿一句句念给我听,让我逐句修改。我口授说:某字某句如何添改涂抹,她就执笔代为勾画增删。这种修改一般要进行两次。定稿后由她代为抄正或输入电脑打印成文。说起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麻烦。因为我盲写的字笔画混乱,字形不全,又常重叠或结构移位,简直无法辨认。我妻长期耐心审阅琢磨,居然能够识得十之八九,这才练就了辅助我的特别技能。

在修改中,她完全尊重我的文思。有时也给我提出意见,甚至建议某段某章重写。但最后定稿却完全遵照我的意思。

写作本书时,我妻温晓莉已是年资较久的副教授,是所在学校学科带头人,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在家庭里,我这个丈夫不仅不能分担家务,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需要她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切抚育照料,如督促复习功课,开家长会等

等,概由她一人承担。她的忙碌就可想而知了。因而她帮助我写作此书,就完全靠她废寝熬夜来完成。

五

本书的动笔以至完稿,也完全得力于我妻的鼓励和催促。

我得平反,重上大学讲台,20年生死以求之期望终于实现。感何如之,奋何如之。唯愿夙兴夜寐,将我平生万般艰辛积累而得之知识贡献给莘莘学子。念兹在兹,丝毫不曾想到再组织家庭。何期月下老人偏爱,前缘难违,西南政法学院1978级冒尖的女弟子温晓莉对我产生了感情,并以她特有的勇敢和耐心,冲破重重阻力,鼓舞焕发我的青春朝气。我们终于组成了极为美满的家庭。

我的晚景甜如蜜,不愿回首坎坷岁月。何况,我平生推崇嵇康“破甑不顾”之精神,很少回首往事。

偏偏我妻对我的坎坷经历特别感到兴趣,或连类提问,或旁敲侧击,掏我的“故事”、“趣闻”。今天一节,明天一段,如挤牙膏,如引清泉,并且认为“很有价值”,应该一一写成专书。其中,对于我和吴宓的友谊,特别是吴宓这个人,她作了特殊的评价。认为吴宓固然学贯中西,而其道德情操尤为可贵。比如,他敦厚诚实,立身谨严,治学勤奋,自奉俭朴,乐于助人,发之自然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等等,中华传统美德,他都身体力行。古人常说:人生之价值在于“立言、立功、立德”,而以“立德”为其最高境界。吴宓正是以毕生之精力,致力于“立德”。他的道德实践非常感人。这种精神,经过文革浩劫,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殊为珍贵。正是因了吴宓这样的知识分

子,中华文化的根才得以保存下来。

我虽认为她说得有理,但却踌躇不愿执笔。因为写吴宓也就得写我的过去,得逐一揭开我那些已经徐徐淡化或结痂的历史创伤。这太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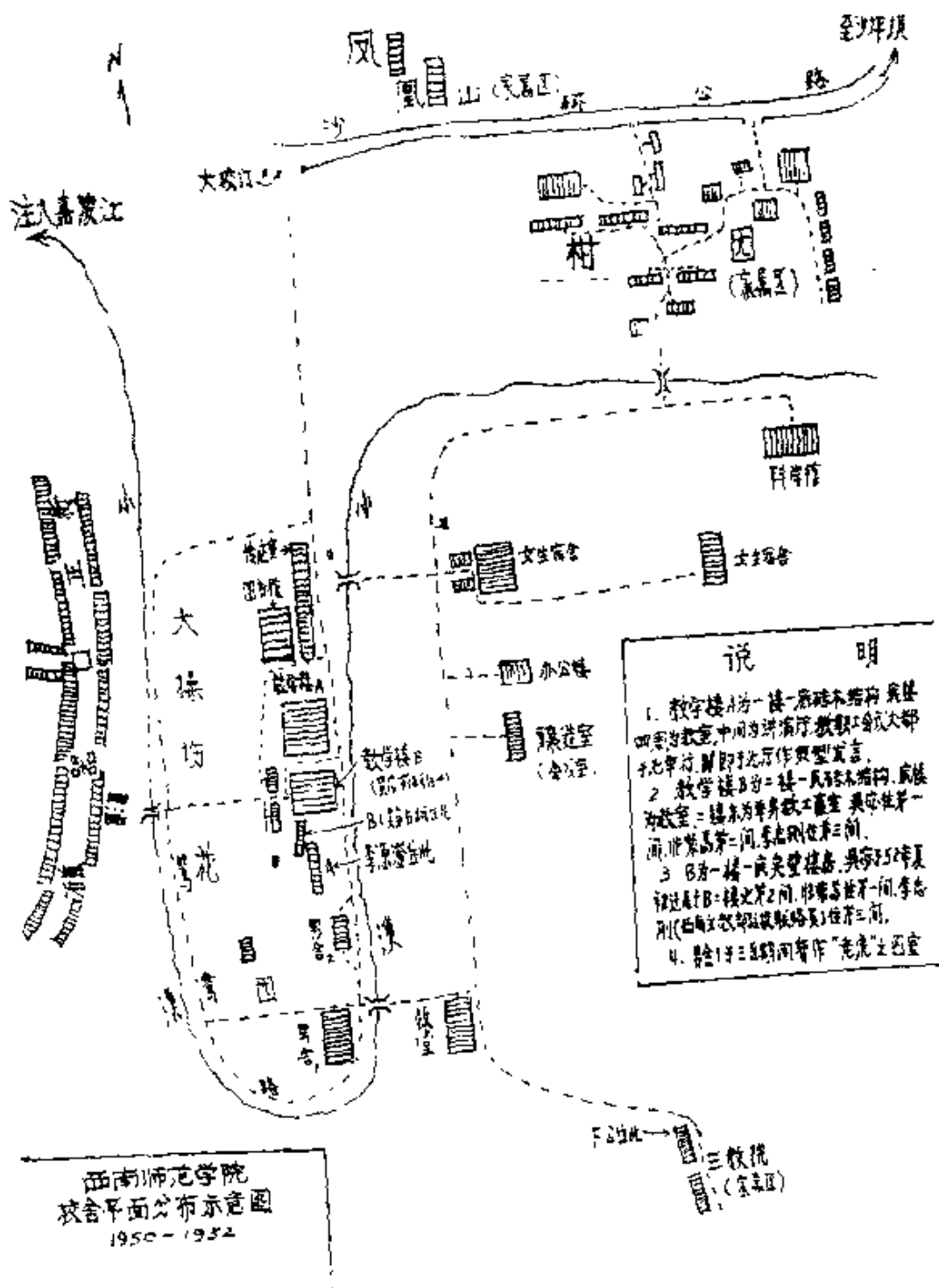
然而,自从她询问我和吴宓的友谊,实际上已经一点点地揭开了历史的创伤。终于,在她重复提了几次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了。果然,一经动笔,我就陷进了过去的坎坷岁月里,再也不能着枕入睡,而是每晚辗转反侧……。

几经踌躇,几经辍笔,却又想到我叨天之幸,得以幸存而顽健,我妻又进而恳词勉励,乃又奋起执笔,再次进入痛苦往事的回忆中,反复回味与朋辈友谊感我五内的深情,回想悼念之下,在忧思哀伤与甘苦荣辱等等诸般情感的交互激荡之中,不顾严冬酷暑,听任蚊虫叮吸,楔而不舍,苦作年余,于1996年8月底完成此书。

张紫葛

1996年9月于成都

附图一：西南师范学院磁器口时校舍平面分布示意图（1950—1952）



绘图：石琮生，西南师范学院史地系本科1952年毕业，当时的西师学生会主席。现为重庆出版社离休干部。

